

# 民國叢書

第三編

• 66 •



# 民國叢書

第三編

· 66 ·

歷史·地理類

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

中國大革命史

華

崗編著

上海書店

---

華 崗編著

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  
中國大革命史

125386

---

一九三一年七月一日初版



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  
中國大革命史

精裝一冊大洋一元四角  
平裝三冊每冊大洋四角

編著者 華 崗

發行者 上海春耕書局

代售處 各省各大書局

本書據春耕書局1942年版影印

## 自序

這部革命史的初稿是在前年冬季與去年春間寫成的，當時因為我自己對於內容及編制上還有許多不滿意的地方，同時因為服膺並執行「與其作文章來論革命的經驗，不如實地做革命的經驗更爲有益」遺訓的緣故，所以情願讓原稿給耗子們去嚙食批評。至去年冬天我不幸病了，事實上不能不暫時離開實際運動，病中納悶，便拿出原稿來重讀一過，雖然很想趁此機會加以補充和修改，但因物質生活條件的困難，不能辦到，僅在不洽意處畧加增刪而已。

我最初起意編著這部中國大革命史，正是廣州暴動失敗不久的時候，覺得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國大革命，可以給予我們的經驗和教訓實在太多了，它不但教訓了領袖，而且教訓了羣衆，如果能夠以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和革命的教訓爲立場，把大革命的史料整理出來，一定可以取得許多具體的歷史辯證法的教訓，那時我便着手寫了一個大綱，同時即開始搜集材料。後因事出國，此事便被擱置下來。及至一九二八

年秋間回國，則過去苦心孤詣所搜集的材料已經完全喪失，於是一場心願全歸泡影。

然而企圖完成這一任務的意思始終沒有取消，所以便又重新着手搜集材料，經過半年多的時期，所搜得的材料還非常少；而且因為實際工作關係，始終沒有時間寫。

一直到前年秋間，托洛斯基反對派與中國機會主義者結合成取消派，一致攻擊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他們——特別是中國機會主義者陳獨秀等，不但不願正確的去了解大革命的教訓，而且還想一手推翻歷史的事實。因此，真確史實之流傳，乃更有必要。便又鼓勵了我編著這部革命史的勇氣，因此便利用我僅有的一些材料和我自己參加實際運動的回憶，開始動筆；但是時間總不允許，往往隨寫隨攔，有時簡直一攔就是幾十天，想不到積少成多，結果終竟免強的把本書完成了，這在我自己總算暫時了却了一件心願。

不消說，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中國大革命的過程是很複雜的，區區三十萬字自然不能說得充分。同時在整理分析的路綫上，也難免有錯誤之處，讀者有所指正，是很歡迎的。至各種參攷書籍雜誌刊物等，則因生活流動的關係，大都東遺西散，所以

引用參攷時不能一一註明其出處，這是事實上的困難，並非有意剽竊，合併聲明。

最後，我敬以至誠，將此書紀念大革命中及大革命失敗後成千上萬爲革命犧牲的英勇的戰士。

一九三一年一月五日 華崗自序於上海

研究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中國大革命史的意義與我編著這部革命史的用意，在本書的緒言與結論及上面這一短序中都會指明，現在我還可以這裏補充幾句。我認爲在中國革命現在這樣嚴重的歷史時機，本書的出版有更大的實際意義。因爲現在黨內所發生的政治錯誤，有些簡直就是過去大革命中我們黨所犯錯誤的重覆和補充。立三路綫的歷史根源顯然就是六次大會前形成而到現在還沒有肅清的機會主義與盲動主義。立三路綫根本否認一般的革命高漲基礎之上世界革命發展的不平衡現象，因而也就否認中國革命勝利與鞏固的可能；立三路綫根本不了解中國政治經濟環境的特點，根本否認中國國內革命發展的不平衡性，因而也



就取消中國革命發展有一省或數省首先勝利的可能；他不但不能正確了解中國革命的性質與現時階段的任務，而且用托洛斯基否認中國革命之資產階級民權主義階段的觀點，來代替列寧的革命轉變的理論；立三路線不但對於黨是革命的組織者的作用完全不了解，對於共產主義的先鋒隊和工農羣衆之間應當有的關係完全不了解；立三路線不但曲解而且實際上拒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武裝暴動的理論，在理論上去替冒險盲動主義建立基礎，並且實際上推動黨走這條道路（立三曾在去年六月至八月間提議全國總暴動，而且說『工人只要暴動不要罷工鬥爭』）。除此之外，立三路線還有更危險的特色，這就是立三同志竟用了共產主義『左』右叛徒所用過而已經被打碎的理论，竟不惜師承過去大革命中斷送中國革命的機會主義者陳獨秀等的故智，居然說共產國際不懂得中國實際情形，共產國際不能領導中國革命，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針，必然引導到這種敵視布爾塞維克主義敵視共產國際的言論。另一方面，躲在反立三主義旗幟之下的右派羅章龍等，客觀上也正在進行他們反四中全會反黨反革命的活動。對於他們，一九二五至一九

二七年的中國大革命竟完全是空過去的一樣。

然而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國大革命果真是空過去的嗎？絕對不是的！立三路線與右派的面目暴露破產之後，黨內真正革命的同志將一定繼續并加深這種兩條戰綫的鬥爭，堅決執行國際的路綫，廣大的工農羣衆將更加團結在布爾塞維克的周圍，進行革命的鬥爭，將更加堅決的去認識并接受過去大革命的教訓，領導中國革命到新的偉大的勝利。

一九三一年三月一日 華崗

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

# 中國大革命史目次

## 上册

自序

第一章 緒言

第二章 中國大革命的性質與造因

第一節 中國大革命的性質與任務

第二節 中國大革命的社會經濟基礎

(二) 帝國主義的侵略及其與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矛盾

一 帝國主義勢力侵入中國

二 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迴溯

三 帝國主義侵略之下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出現

四 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特徵

五 中國民族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的矛盾

(二) 封建勢力與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衝突

一 外國帝國主義與中國封建勢力的關係

二 買辦階級的出現對於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影響

三 軍閥戰爭對於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影響

四 封建勢力與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衝突

(三) 農民的貧困及其與封建地主的矛盾

一 中國農村經濟的危機

二 中國的土地關係

三 中國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與土地關係

四 帝國主義勢力侵入中國對於農民的影響

五 中國農村資本主義發展的傾向

六 中國農民爭取土地鬥爭的意義

(四) 中國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性民權革命

一 中國無產階級的形成

二 中國無產階級的生活狀況

三 中國無產階級發展的特徵

四 中國無產階級對於中國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作用

(五) 各種社會基礎的總結

## 第三章 中國大革命的預演

第一節 戊戌變法與義和團暴動

第二節 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

第三節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

第四節 香港海員罷工與『二七』流血

第五節 國民黨改組與鎮壓商團反革命事件

第六節 促成國民會議運動

## 中册

### 第四章 中國大革命的經過

第一節 『五卅』運動開闢了中國大革命高潮

(一) 『五卅』前夜的罷工浪潮

一 上海小沙渡日本紗廠大罷工

二 青島日本紗廠大罷工

(二) 鐵路代表會與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

(三) 『五卅』準備時期中國農民運動發展形勢

(四) 『五卅』屠殺前福州青島之慘殺事件

(五) 五月三十日南京路開始大屠殺及上海民衆之反抗運動

(六) 緊接『五卅』上海事變後之各地屠殺及反抗運動

(七) 『五卅』事變的歷史意義

## 第二節 由『五卅』事變到北京慘殺

(一) 『五卅』事變後中國反帝國主義運動的新形勢

(二) 帝國主義新式的進攻與羣衆的革命鬥爭

(三) 反奉戰爭與北京政治示威運動

(四) 日本出兵與北京「三一八」慘案

### 第三節 三月二十號事變與廣東北伐

(一) 東江勝利後之廣東

(二) 國民黨第二次大會

(三) 三月二十號事變

(四) 反革命戰綫的破裂與罷工及一般革命運動的發展

(五) 國民黨五月中全會與廣東北伐

### 第四節 由廣東北伐到漢口九江租界之奪取

(一) 北伐軍佔領長沙武漢

(二) 省港罷工的結束與上海罷工運動的繼續發展



(三) 萬縣慘案與反英運動

(四) 北伐戰爭與兩湖工農運動的發展

(五) 「一二三」慘案與漢口九江租界之奪取

## 第五節 上海三次暴動與蔣介石叛變

(一) 第一次暴動

(二) 第二次暴動

(三) 第三次暴動

(四) 上海「四一二」與廣東「四一五」慘變

## 第六節 土地革命與武漢反動時期

(一) 蔣介石與民族資產階級叛變前後的武漢

(二) 土地革命與武漢政府

(三) 馬夜事變與國共分家

(四) 甯漢妥協——武漢政府反動之結果

## 第七節 『八一』南昌革命與秋收農民暴動

(一) 葉賀南征與『八一』南昌暴動

(二) 各省秋收農民暴動

## 第八節 廣州暴動

(一) 廣州暴動前之中國一般狀況及廣東情勢

(二) 廣州暴動的決定和準備

(三) 十二月十一日的發動

(四) 蘇維埃政權的成立

(五) 廣州蘇維埃政府的政策

(六) 廣州暴動失敗的原因和教訓

(七) 廣州暴動的政治結果及其歷史意義

## 下冊

### 第五章 中國大革命中的各社會階級

第一節 中國買辦地主階級與帝國主義

第二節 中國大革命中的民族資產階級

第三節 中國大革命中的小資產階級

第四節 中國大革命中的農民

第五節 中國大革命中的無產階級

## 第六章 大革命中的中國共產黨

第一節 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關係問題

第二節 中國共產黨對於中國革命性質及動力的估計

第三節 中國共產黨與工人運動

第四節 中國共產黨與土地革命

第五節 中國共產黨與參加革命政府問題

第六節 中國共產黨與革命武裝問題

第七節 黨的生活與對國際的關係問題

第八節 反機會主義鬥爭與盲動主義

## 第七章 結論

# 第一章 緒言

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國大革命，顯然是有極大的世界歷史的意義。這次大革命自從五卅怒潮勃發，有時伏流昂進，有時則簡直像暴風疾雨似的，直到廣州暴動失敗，中國革命無產階級退兵一戰之後，才暫時降落下去。中國是馬克斯所謂『自古反動的冰山』，但是因為長期受着國際帝國主義勢力的衝擊，這種衝擊迫着中國『亞洲式的生產方法』迅速解體，導引着中國社會經濟政治組織急劇動搖，繼後更因帝國主義政治經濟文化的猛烈侵略，聖經鴉片槍砲子彈交相輸進，造成中國不斷的軍閥戰爭，廣大農民羣衆加速度的破產，工人生活狀況日益惡化，民族資本主義與外國帝國主義矛盾的加深，各國帝國主義爲分割中國搶奪中國統治權利的衝突亦復加緊，於是中國成了帝國主義一切矛盾集中而且最尖銳的地方，到了五卅前後，世界資本主義各種矛盾都在中國鬱積待發，到處都預示出大風雨之逼近，『五卅』上海南京路慘案，正如投射一點火花於那充滿了炸藥的近代工業系統的礦洞中，必然引起多年預備下的

大恐慌之爆發，爲礦洞的深閨和炸藥的猛烈，所以恐慌居然延長至兩年以上，這一大恐慌雖然沒有一下就破壞中國這座『自古反動的冰山』，雖然沒有能够立即繼續斯拉夫人之後『帶來各民族之溫和之春』，但却開闢了未來勝利的大道。

中國有四萬萬人口，佔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在東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中佔第一等位置。列甯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大會（一九二〇年）上會明白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對於世界革命有絕大的意義，第二次世界大會以後各種事實的發展，證明列甯的指示完全正確，列甯在第二次大會上『民族與殖民地問題提綱』中所提出的傾向，後來完全成了事實。一方面，從殖民地是帝國主義剝削所必需的對象看，殖民地半殖民地已經比以前更成爲帝國主義侵略的經常目標；他方面，許多主要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中，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無論在經濟上和在整個社會結構上，都已經起了不少的變動，工業的成份已經加增的發展，無產階級跟着長大，農業的危機也更加劇烈。再則國際形勢亦已起了變動，各首要的帝國主義列強在大戰時及在戰爭初停的數年，處境都非常困難，革命暴動前仆後繼，在匈牙利芬蘭等國資產階級都暫時喪

失了政權，在俄羅斯則乾脆引導資產階級沙皇攢進了墳墓，特別是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不但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推翻了地主沙皇資產階級的統治，建立了世界無產階級專政的祖國，而且蘇聯解決民族問題又成爲世界民族解放的模範。及至資產階級得着改良主義者的扶持，暫時渡過國內直接革命恐慌，資本主義得着暫時和部分的穩定，於是英美法日等國的殖民地政策又加濃了強盜式的侵略性，這必然要惹起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壓迫民衆有力的反抗，加以大戰後西歐無產階級直接革命恐慌雖被暫時渡過，但是各資本主義國家內的共產主義運動還是漸次增長，這些國家內無產階級援助殖民地解放運動的革命鬪爭（例如『Hands Off China』即不許干涉中國的運動等）仍不斷發展。這種種情形，對於殖民地半殖民地廣大被剝削被壓迫的勞苦羣衆，自然是一種強有力的推動，促醒他們起來做救死求生的鬥爭，引起他們的革命戰爭和暴動，而且這些革命戰爭和暴動，大多數都是在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和內部階級鬥爭形勢擴大緊密結合的基礎上發生的。一九一九年三月高麗的叛亂，一九二〇年一月土耳其民族資產階級革命，一九二五年四月摩洛哥的暴動，同年八月敘利亞的暴動，荷屬

印度的暴動，印度的革命醞釀。各國帝國主義侵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反動行爲，差不多都遇到大力的反抗。英國進攻阿富汗竟被擊退，法國帝國主義的大兵竟困不倒敘利亞的抗鬥，里夫民族的遊擊隊與法國西班牙具有最新式武器的常備軍竟能相持兩年之久，美國鎮壓尼加拉瓜民族之反抗亦達一年以上，數萬萬印度工人與農民的革命浪潮，時刻威脅着要搗毀世界帝國主義的城堡——大不列顛的統治，一切這些情形，都證明一九二三年以後，資本主義列強雖獲得部分與暫時的穩定，西歐無產階級革命雖暫時消沉下去，但同時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却如海裂山崩的起來，中國大革命更可說是這種含有極大世界意義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運動的代表。中國大革命實是世界革命主要組成部份之一，他不但對於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運動有極大的啓發推進作用，不但震動了全部的亞洲大陸，而且成爲搖撼資本主義暫時穩定的主要原素之一。中國大革命中直接間接捲進了幾千百萬的羣衆，無產階級第一次表現他在殖民地革命中具有獨立的政治作用，他在鬥爭中的英勇毅力不但使得帝國主義者驚惶失措，而且使得民族資產階級恐慌萬狀，亟亟由參加革命轉入反革命營壘，五卅以來的事變，尤



其是英勇的上海暴動與廣州暴動，在世界革命歷史上始終成爲光榮的一頁。中國革命在蘇聯直接影響幫助之下而開展，同時轟轟烈烈的中國大革命本身就是消滅資本主義和建設社會主義的總鬥爭的一部份，因此也就直接間接幫助了蘇聯的建設和他政治影響的擴大，所以中國大革命的失敗也就增加蘇聯的困難，所以「保護中國革命」與「保護蘇聯」一樣成爲世界革命的中心口號。

可是中國大革命也並不是完美無疵的，中國大革命固然有軸不可磨滅的偉大意義，但是大革命過程中所表現的錯誤與弱點也非常嚴重，這樣偉大的中國革命終竟遭到極慘痛的失敗，失敗後使中國廣大工農及革命青年羣衆受到曠古未聞慘無人道的白色恐怖。中國大革命所以受到這樣慘痛的失敗，一方面固然由於許多客觀的困難，但最主要的原因還是由於當時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共產黨指導機關所犯的機會主義的錯誤，因此中國大革命給予革命階級與革命政黨的教訓也特別重要。現在正是中國大革命失敗之後，同時又是新的更深刻的革命浪潮將要興起的時候，我們更須仔細研究過去在大革命各種重要流變的過程，學習過去大革命的經驗，求得許多活的具體的歷史辯證

我的教訓，以幫助推動我們當前的實際鬥爭任務，以保證我們將來的勝利，這便是我在百忙中編著本書的主要用意。

## 第二章 中國大革命的性質與造因

### 第一節 中國大革命的性質和任務

中國是半殖民地，所以中國大革命的最主要特性也就是半殖民地革命。這種半殖民地革命的客觀任務：第一就是要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取消外國帝國主義在華的一切特權，澈底從帝國主義壓迫之下解放出來以統一中國；第二就是要澈底肅清一切封建殘餘，根本摧毀地主階級的私有土地制度；第三，這一革命如果澈底勝利，應該是無產階級與農民的勝利，建立工農民權獨裁政權，以準備轉變到將來社會主義革命的階段。這些任務在客觀上都並沒有超過資產階級性民權革命的階段，因為反帝國主義與土地革命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內容，這兩件事都還沒有超過資本主義發展的條件，而且客觀上正是掃除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障礙，使中國民族資本主義更快更高的向前發展的條件。

帝國主義是中國政治經濟的真實統治者，中國的豪紳軍閥封建殘餘，又是帝國主

義剝削中國的主要基礎，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與帝國主義經濟的侵略顯然含着很大的矛盾，驅逐帝國主義，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首先解放出資產階級的中國，而事實上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在革命的初期確實是贊助并且參加過革命的。一九二七年四月以後，因為革命鬥爭發展深入，民族資產階級公開背叛革命，由參加革命轉入到反革命營壘，這也只是表示革命鬥爭發展深入和革命動力的轉變，革命的客觀任務

——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與肅清封建勢力却一點也沒有完成，因此革命的性質並沒有轉變，所以在反帝國主義的意義上說，中國大革命所表現出的資產階級性是顯然沒有疑義的，因為「一切民族主義的革命運動，只能是資產階級民主性的運動」（列甫）。

土地革命是中國革命的主要社會內容，土地革命是不是社會主義的革命呢？關於這個問題我們也可以引證列甫的話來答覆：「在馬克思派，農民運動不是社會主義的，而是民主主義的運動。他在俄國也如在其他各國一樣，按照他的社會經濟的內容，他必然是資產階級民權革命之伴行的衛星。他並不是反對資產階級的基本制度，他並不反對商業經濟和資本。他所反對的乃是農奴制的殘餘，鄉村中資本主義前期的關係

，以及反對爲一切農奴制的殘餘之主要砥柱的地主的壟斷土地。所以農民運動的完全勝利還不是廢除資本主義的經濟關係，相反的，農民運動的完全勝利在客觀上正是創造資本主義發展更廣大的基礎，加速資本主義的發展。農民運動的完全勝利只能創造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牆基，在這牆基下自然要發展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按照他的客觀意義，農民運動的完全勝利是澈底消滅一切農奴制的殘餘，但却不是消滅資產階級的經濟，因此也不能消滅社會階級。可是覺悟的工人階級對於農民運動應當採取什麼態度呢？應當贊助農民，以最大的努力幫助農民運動，領導農民澈底推翻豪紳地主的統治，但同時應向農民解釋僅僅推翻豪紳地主還不夠，推翻地主政權，應當同時準備消滅資本主義的統治，宣傳社會主義（見列甯論小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於是可知土地革命還不是社會主義革命，農民佔中國人口的最大多數，而這些農民正是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經濟關係的代表，所以在土地革命的意義上說，中國大革命更顯然還沒有超過資產階級性民權革命的階段。

至於革命所要求的工農獨裁政權固然是開闢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前提，但就

當時工農政權的階級性上說也並沒有超過資產階級的性質。這不但在資產階級還沒有叛變革命以前的所謂國民革命時代是這種資產階級性質，就是在資產階級叛變革命以後的工農蘇維埃革命也還沒有超過資產階級民主性的階段。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廣州暴動所創造的蘇維埃政府以及其他各地農村蘇維埃政權都顯然是資產階級的民主性質。因爲：第一，蘇維埃是社會主義革命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形式，也可以是資產階級性民權革命工農民權獨裁制的政權形式，而且在民權革命的階段，蘇維埃是保證民權革命徹底勝利使之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無產階級專政的最好方法，但不因採用了蘇維埃的政權形式，就改變了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本身性質。第二，民族資產階級叛變以後，土地革命深入發展，中國革命進到更高的階段，從工農與資產階級結合的聯合戰綫，進於工農反帝國主義封建階級及民族資產階級的戰綫，這是革命階段深入和革命動力的轉變，而不是革命任務的轉變，革命性質固然與革命動力有很密切的關係，但是革命性質是要決定於革命客觀任務的。

再進一步說，在一九二五至二七年中國大革命前面，中國政治經濟也並沒有發展

到可以實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佔中國最大多數的是農民，工人毫無疑問的只佔少數，農民的本身是小私有財產者，是資本主義經濟關係的代表，但是農民羣衆是中國大革命基本動力之一，就是工人階級本身，固然在中國大革命中已經成爲獨立的政治力量，已經表現出他那英勇奮鬥的精神，但是如果說他已經是社會主義革命的覺悟的領導者，那就未免過早，擺在中國大革命之前最急迫的而且可能做到的任務只是肅清封建勢力完成土地革命與趕走帝國主義。固然因爲民族資產階級背叛革命，走入帝國主義封建勢力的反革命營壘，而加重了中國革命反對民族資產階級的客觀任務，而且一定要在堅決反對民族資產階級的基點上才能完成驅逐帝國主義和土地革命的任務，但這些任務在客觀經濟內容上都是沒有超過資本主義範圍的。固然因爲中國革命發展在特殊的環境中，除了中國是處在國際帝國主義宰割之下半殖民地的地位這一個中國革命顯著的特點以外，還有另一個特點，即中國革命是發生於世界革命已經開始的時期，而爲消滅資本主義制度的國際革命運動中之不可分離的一部分。所以中國革命的資產階級民權革命性質並不和十九世紀歐洲的資產階級革命及一九〇五年的俄國革命

相同。中國革命不但有確定生長到社會主義革命的趨勢，而且中國革命一開始大爆發（一九二五年五卅之後）就帶有社會主義的成分在內，主要的就是因爲『在沒有進到世界革命時期以前的民族解放運動，僅是整個的德謨克拉西運動之一部分，而到現在蘇俄革命勝利以後，已經進到世界革命的時期，民族解放運動便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列寧）。但是構成中國大革命之客觀的經濟的內容和在一定階段上所要直接與可能完成的任務如驅逐帝國主義，統一中國，肅清封建殘餘等，並還沒有超過資本主義存在的範圍，托洛斯基派不能了解客觀的事實，硬說中國封建勢力已經完全肅清，中國農村中已經完全資本主義化，因此認爲中國革命已經超過資產階級性民權革命的階段，已經進到社會主義革命的時期，這完全是站在他那『不斷革命論』的觀點，想跳過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階段，顯然是莫大的錯誤。第二節我們將進而探討中國大革命之造因，研究中國革命之社會經濟基礎，即可從事實上得到更確切的答覆。

## 第二節 中國大革命的社會經濟基礎



## (一) 帝國主義的侵略及其與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

### 的矛盾

#### 一 帝國主義勢力侵入中國

外國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已經有八十餘年的歷史，原來資本主義的發展在十九世紀就已經形成世界的經濟，漸漸撤毀一切「民族」的藩籬，使世界任何地方都被結合在一個世界經濟紐帶之下。根源於資本主義制度無政府生產所表現出來的經濟恐慌——生產過剩，原料缺乏，工人失業等，逼使資本主義國家不得不向外找尋市場和原料地，於是帝國主義出世，地球之上遂有所謂殖民地。中國是東方產業落後的國家，又是資源豐富的地方，在歐洲資本主義國家已經宰割了美非澳諸洲及亞洲西部和中部後，中國便成了資本帝國主義侵略最肥壯的對象。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和侵略其他殖民地一樣，首先就是挾着商品來找市場，可是因爲一開始就遇着中國閉關主義的擋箭牌於是接着而來的便是武裝砲艦的轟擊，造成歷次的侵略戰爭，如鴉片戰爭，中法戰爭，

中日戰爭，八國聯軍戰爭……等等，結果強迫中國開放商埠，打破了中國封建的國有貿易，於是帝國主義商品如潮湧進，所謂『他（帝國主義）那價廉物美的射擊力，就是中華的城壁，也被他打破了』（共產黨宣言）。於是收括原料，移植資本，文化侵略相繼而來，中國也就成了帝國主義的『國際的殖民地』。

## 二 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迴溯

鴉片戰爭以後，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真有突飛猛進的形勢，而且侵略的方式也是一步厲害一步，鴉片戰爭（一八四二年）是帝國主義先進國家——英國勢力侵入中國的第一幕，鴉片戰爭結果，締結南京條約，英國取得了香港，滿清政府還賠償了他二千萬元以上的軍費，開闢甯波上海廣州福州廈門等五口為通商口岸，並於無意中斷送了關稅自主權。英國既然打開了中國閉關的局面，於是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也就隨之俱來，此時各國都和英國一樣，都還在商業資本主義的時代，他們主要的目的，就在取得銷售他們剩餘商品的市場，因此跟着南京條約而來的中美條約與中法條約，其最主要的精神，都是要挾中國在對他們有利的條件之下和他們通商。自此帝國主義的侵略也就

得寸進尺，一八五七年英法兩國便聯合進攻中國，結果是中國戰敗，締結天津條約；一八六〇年再戰，又強迫訂立北京條約，於是香港對岸之九龍半島割讓於英，英法兩國各得賠款八百萬兩，增開九江漢口天津等十餘處為商埠，且於天津漢口及南京條約中之上海三處正式劃為租界。此外又規定了凡外國輸入中國之貨物，除南京條約強定為值百抽五外，北京天津兩約，且更進一步規定，於進口稅百分之五外，再增繳百分之二五之子口稅，即可在中國內地通行無阻，從此中國商品因負擔稅額過重，就再也不能和外貨競爭了。在中英天津條約中，又明顯規定英國在華享有領事裁判權，允許外國人只要有領事的護照，即可在中國內地自由通行。北京條約更承認了法國教士在中國內地自由傳教和租賃土地建造房屋之權，各國也就競相援例，從此外國領事裁判權已通行於中國全境，再也沒有限制了。

不僅如此，天津北京兩約締結的時候，正是中國太平天國事件擴大的時候，英法美等列強乃乘滿清政府自顧不暇的時機，積極攘奪權利，在上海居留地積極擴張行政範圍與司法範圍，使上海租界儼然變成外國領土，又乘太平天國軍隊退出上海的時候

，英法美諸國即自派稅務司管理海關稅收入，從此關稅管理權便完全落於外人之手。英國又以武力幫助滿清政府打敗太平天國，藉以訂立芝罘條約，取得開關蕪湖溫州宜昌北海等處爲通商口岸及在雲南等地設立商埠之權，同時並設四川經濟狀況視察員和輸送探險隊於中國西部甘肅青海西藏一帶，由滿清政府担任保護，此約訂立，英國在華勢力，即由上海直達長江上游。同時緬甸安南暹羅亦於此時脫離中國，暹羅受了英法兩國的指使，脫離中國自主，緬甸安南則先後合併於英法。東北方面，俄羅斯沙皇帝國繼續英法美諸國侵畧之後，亦起而主張利益均沾，一八五八年跟着英法天津條約之後，締結愛琿條約與天津條約，舉凡英法在中國所取得的利益，俄國都援例取得之；一八六〇年，更訂立中俄續約，又將烏蘇里江以東之地完全割讓。西北方面，一八八一年訂立伊犁條約，又斷送了伊犁河以西之廣大領土，陸路通商關稅亦正式協定，內外蒙及新疆甘肅各處都開放通商，從此沙皇俄國的勢力，也便駁駁乎支配中國北部。

日本是新興的國家，他的資本主義的萌芽，在歐美各國資本主義高度發展之後，

及至他將次成熟的時候，全世界的市場，差不多已經宰割分配無餘，只有中國這塊肥大的禁樹，雖然已在英法美俄德等帝國主義列強包圍掠奪之中，但尚有容納更廣大的商品之餘地，所以新興日本帝國主義第一個進攻目標就是中國，並且進攻的手段也更加猛烈。中日甲午之戰是日本帝國主義對華侵略之最初表現，中國戰敗之結果，割讓遼東半島台灣及澎湖諸島，凡中國過去所與列強之最惠待遇，日本都同樣享受，並增闢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為商埠，從此日本亦是與其他列強互爭中國利益之一員了。

中日戰爭以後，正是十九世紀的末葉，歐美資本主義國家，已經達到工業資本主義的極盛時期，對於殖民地的需要，已不僅是專為商品的銷售，而更需要原料的供給。中國市場固然廣大，物產固然豐富，但已經數十餘年被歐美列強所掠奪，如今又新添加日本強盜，自然使列強中更增多一個角逐的份子，加以『壟斷原料』比以前僅僅爭奪市場的時候，必然引起更多的糾葛，因為爭奪市場與割地佔據還不十分密接相關，而壟斷原料却至少要有勢力範圍，因此列強對於在中國利權之擴張，比以前更為迫切，他們侵略的方式也就更進到列強爭相以武裝力量與外交陰謀各自佔據勢力範圍，實

行公開的掠奪，如膠州灣威海衛旅順大連等地之租借軍港，長江流域東三省雲南兩廣福建山東等處，英俄法日德努力划分，鐵路礦山之分配于各國。中日戰爭失敗，中國財政上已受到巨大賠款的打擊，軍事設備也一蹶不振，從此外債大批滲進，至庚子賠款更使中國財政完全破產。而且自從美國對日法英俄德奧意七國通牒主張中國「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便在中國不會享有勢力範圍之國家，都可得到經濟和政治的利益，辛丑條約，就是各個帝國主義瓜分中國利益的一個表現，而以關稅收入來抵償賠款，尤使中國永遠屈服于列強政治和經濟的束縛之下，中國從此事實上已經被列強共管了。

辛丑條約之後，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已進到更高的形式，已經由爭奪市場收括原料更進而向中國移殖資本，這種侵略的第一種形式，便是鐵道投資，本來各國經營中國鐵道事業很早就已開始。但是直到辛丑條約之後才始十分盛行；如俄國之于東清鐵路，法國之于滇越鐵路，德國之于膠濟鐵路；日俄戰爭後，日本之于南滿安奉鐵路，都先後把修築權搶去。鐵路對於整個國家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都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帝

國主義支配了中國的鐵路，便以鐵路爲支配鐵路沿線一帶的政治經濟之中心，譬如南滿鐵道會社表面上是一個營業性質的管理鐵道機關，實際上都是日本帝國主義統治東三省的代表。又如京漢粵漢川漢京奉津浦滬甯鐵路，表面上雖由中國政府自己管理，但這些鐵路都是由外國資本家借款建築的，結果也和外國自己建築的鐵路一樣，投資者在鐵路上佔着種種便益，不僅由此擴張經濟勢力，而且也由此扶植政治勢力，借款條築的鐵路與外人自建的鐵路，根本是沒有兩樣的了。

辛丑條約之後，列強對於中國進攻的第二個主要形式，可說是銀行團的組織，組織銀行團的動機乃是各國資本家都想做中國鐵路的投資者，結果不免互相衝突，所以成立銀行團想來避免這個衝突，同時以聯合的金融勢力，來束縛中國的財政，而且進一步監督中國財政。一八九八年美國公興公司取得粵漢鐵路的建築權和管理權，至一九〇五年中國備價贖回，並決定廣東的部份由民辦，湖南的部份由官民合辦，湖北的部份由官辦，其後兩湖因沒有資本，乃于一九〇九年六月，向英法德借款，于是三國銀行團遂開始成立，後因美國抗議，于一九一〇年三月容許美國加入，因是有四國銀

行團之成立，借款總額爲六百萬磅。不久，美國又發起幣制借款，定額爲一千萬磅，並邀同英法德三國加入，此契約于一九一一年四月成立，結果仍是四國銀行團操縱一切。至一九一二年三月日俄亦正式加入，于是由四國銀行團擴大爲六國銀行團。當時中國正直袁世凱當國，爲鎮壓革命，向六國銀行團大借款，此時美國因企圖取得獨立操縱銀行團的地位，未得成功，遂宣告退出，但其他之英德日俄法五國，仍舊成立五國銀行團。一九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大借款成立，全額有二千五百萬磅之多，利息五厘，名爲中國政府一九一三年善後五厘金幣借款，償還期定爲四十七年，以鹽稅爲主要担保品，以海關稅爲增加担保品，以直隸河南江蘇山東四省分担之經費爲臨時担保品，銀行團遂得公債優先權。這樣一來，中國的一切財源，便都在帝國主義支配之下，袁世凱也就在這筆大借款之下，做了帝國主義者的寵兒。

辛丑條約後，列強對於中國進攻的第三個主要形式是脅助和利用軍閥，助長中國的內亂，而乘機攫取權利。在第一次大戰之前，是各國帝國主義一致聯合（五國銀行團）援助袁世凱來鎮壓中國革命，一九一四年大戰發生之後，歐洲各國不暇東顧，於



是日本單獨來玩弄這個把戲，最初極力援助袁世凱稱帝，而以訂立二十一條件爲交換條件，二十一條約中承認山東和滿蒙爲日本勢力範圍，斷送了漢冶萍公司和南滿東滿及山東的採礦權，延長了南滿和安奉鐵路和旅順大連租界期限，又斷送了吉長鐵道經營權和膠濟鐵路烟台龍口支線的建築權。袁世凱死後，日本帝國主義又利用段祺瑞來做工具，一九一八年供給段氏二千萬元之參戰借款，後又繼之以滿蒙四路〔（一）開原海龍吉林間，（二）長春洮南間，（三）洮南熱河間，（四）由洮南熱河間之地點達於海港間；共長一千餘里，借款二千萬元〕山東兩路〔（一）濟南順德間，（二）高密徐州間；共長四百餘里，借款二千萬元〕借款四千萬元及軍械借款四千萬元等。大戰結束以後，歐洲列強侵略目標重新移向中國，於是各自操縱軍閥，軍閥戰爭延長擴大，中國遂更陷於糜爛不堪之地步，日本既以段祺瑞之安福系爲傀儡以圖壟斷中國利益，英國也就援助直系軍閥馮國璋王士珍以爲抵制，後來奉系張作霖得勢，安福系失敗，日本遂又利用張作霖作工具，英國也換以吳佩孚曹錕爲抵制，此僅就幾個大軍閥而言，其他各地小軍閥混戰，同樣也都逃不了帝國主義的關係。其他各國怎樣呢？當然他們決不願

中國利權歸英日獨佔，於是遂有所謂巴黎和會與太平洋會議對華問題協議和新銀行團之成立。太平洋會議與新銀行團成立之後，美國帝國主義在「門戶開放，機會均等」口號之下，對華侵略的勢力更有突飛的發展。

帝國主義對華企業投資雖然沒有像政治借款這樣容易投機取利，但自辛丑條約以後，帝國主義在華經營產業也是非常積極，僅就上海一埠而論，帝國主義在華所經營之工廠，大半都是辛丑條約以後才開始設立。

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既然這樣突飛猛進，於是便自然而然衝破了中國過去閉關社會的一切政治經濟組織，帝國主義為便利自己的掠奪計，始而建築鐵路及發達其他的交通工業以運輸商品，以後又移殖資本開辦工廠以更方便剝奪中國廉價的勞動力，循至外國財政資本壟斷經濟的形式也滲入中國，所以中國不但鐵路航行權礦山等在帝國主義壟斷之下，而且中國金融勢力也完全被帝國主義所操縱——匯豐花旗等幾個大銀行完全支配了中國的金融。

### 三 帝國主義侵畧之下的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出現

帝國主義侵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根本政策在於使殖民地奴隸化，因為殖民地是世界帝國主義經濟發展的有機的組成的一部分，如果殖民地經濟走上了獨立的資本主義發展，帝國主義便失去了消售商品的市場與原料的供給，便是帝國主義經濟基礎的根本上動搖，所以世界上任何一個帝國主義都爭相以瓜分與強佔殖民地的形式去籠罩全世界，他們都極力去維持並加強殖民地的附屬，以加深對殖民地的剝削，甚至他們帝國主義國家繼長增高的內部矛盾的壓力也都拚命加在殖民地身上去。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塊殖民地，毫無疑問的任何一個帝國主義都不肯對中國有經濟上重大意義的讓步，尤其不肯直接幫助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所以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生長發展，本來不是帝國主義所能容忍的。然而帝國主義既要投資投資於中國，就不得不相當破壞中國的封建社會的束縛，客觀上不能不造成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關係。因為帝國主義既要侵略中國，既要割據中國領土，收括中國原料，對於中國投資投資，就不能不破壞中國農村關係，造成資產階級所需要的勞動後備軍，中國手工業受外國商品侵入的影響日益衰敗，更加增加失業的勞動者，而且亦因外貨的輸入而使國內漸漸形成「商業資

本」。至於工業之中，外國資本主義本當力阻發達，却因欲行鐵路投資，且尤須採取煤礦，非有大規模之機器事業不可，於是借款官營，千方百計自取其管理權，成就中國特有的所謂「官僚資本」，實際上是外國資產階級的勢力；然而機器既已輸入，也就不得不引起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自然需要，且反因要與之競爭，而不得不趨於更集中的傾向，甚至於一瞬而已入最新組合企業的方法，如華商紗廠聯合會已具「新迭加」(Serial)的雛形。外國帝國主義投資時能象養一種寄生的中國商人階級，專消外貨或代收原料，然而中國民族資本主義既有片面的發達，市場上也就不得不發現「國貨」，也就不得不造成與外貨對抗的形勢，尤其是僑居外國的商業華僑，借外國市場完成他們「資本之初期積累」，能力更超過國內資產階級，有時居然能夠與外國爭投資呢！

#### 四 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特徵

自然，中國民族資本主義並不是獨立發展的，——這在帝國主義殖民地政策束縛之下是不可能的，事實上中國民族資本主義乃是由外國帝國主義外鏢侵入才開拓的，所以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發展首先就遇着下列困難：(1) 對外貿易受協定關稅之限制

(2) 自己缺乏近代工業中所需之半製原料及機器，不得受外國帝國主義壟斷操縱，(3) 財政權操於列強之手，一切金融信託事業全被挾持，(4) 工業界有進步，而農業反有退化之象（這也是帝國主義侵畧之下的必然現象！）原料食糧也受限制，(5) 軍閥混戰不息，苛捐雜稅繁興，(6) 農民手工業者破產者日多，而工廠所能容納者甚少，市場更受影響。因此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小生產商品與帝國主義在中國境內大生產商品之間懸殊更甚，外國巨大的財政資本與中國幼稚的資產階級之間根本談不上自由的競爭，列強帝國主義單刀直入逕借政治外交掠奪勢力範圍，對礦山鐵路的投資無不帶很濃厚的政治意味，竭力用外國大銀行——如英之匯豐美之花旗日之住友等以掌握全中國的金融，用新銀行團等方法操縱中國的財政交通，使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發展成爲外國帝國主義的附庸，因此中國雖有自己民族資本發展的形勢，雖也造成了一些新式銀行資本，但一則因大工業所需過多非其力所能及，二則政治投機獲利比較生產事業爲厚，於是使着中國資本來也來爭嘗異味，以政治投資爲營業，間接也就阻礙民族資本生產的發展。

然而外國帝國主義勢力侵入中國，究竟促進了中國經濟生活的變化，開拓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而且因為帝國主義初侵入中國的時候，帝國主義帶着西歐先進國的技術，使中國經濟生活中也不得不發生一些『產業革命』式的進步，這時候帝國主義經濟（開始的鐵道工廠等）在中國經濟生活中的確起了些進步的作用，事實上是提高了中國的生產力。特別是當世界資本主義危機暴露——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的時候，帝國主義無暇東顧，外國商品輸入減少，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得着比較暢快的發展。從統計上看，在大戰期間，中國對外貿易的入超數確實有些減少，例如一九一四年的入超數是二二二・〇一四・五五五海關兩，而一九一五年的入超數減至三五・六一四・五五五海關兩，一九一六年的入超數繼續減少為三四・六〇九・六二九海關兩，一九一九年的入超數更減少至一六・一八八・二六九海關兩。如果更具體的看一看各種棉織物輸出入的變動和原料品及機器輸入的增加就更加容易明瞭。一九一三年各種棉織物品的輸入為二一・〇九一・〇〇〇疋和二・六八五・〇〇〇担，輸出為九八・一一五疋和四九・三三三担；而一九二二年的輸入減為一三・四八三・〇〇〇疋和一一

九二・〇〇〇担，輸出則增至四一五・六三九疋和一〇三・四二四担；其次，一九一三年的紡織機農業機及其他機械的輸入統計爲四・五〇五・〇〇〇兩，而一九二二年的輸入增加至二一・九七一・〇〇〇兩，原料品的火柴材料和棉花的輸入在一九一三年爲三・五二三・〇〇〇兩，一九二二年則增至四四・八一三・〇〇〇兩，這種機械及原料品輸入的增加，也足以證明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實際上中國民族工業在這個期間也確實是向前發展的，我們現在可以舉出幾個實際數目字來證明：

(A) 一九一五至一九二五年華商棉織工廠發展表

年份	紗廠數	錠子數	布機數
一九一五年	二二	五四四・〇一〇	二・二五四
一九一九年	二九	六五九・七二二	二・六五〇
一九二二年	五一	一・二三八・九〇二	六・六五〇

一九二三年	五四	一・九四三・六七二	八・五八一
一九二五年	六九	一・八八一・八二二	一六・三八一

(B) 一九一三至一九二五年中地毯輸出比較表

年份	條數	價值
一九一三年	一一・三九六	九九・八六三
一九一九年	五一・二〇五	四六〇・五五〇
一九二一年	九〇・四五九	九七五・三二二
一九二三年	—	四・六九一・〇五二
一九二五年	—	六・三六二・六三三

我們再引中國資產階級自己做的一個簡單統計(見上海總商會出版第八卷第五號



的『商業月報』來看看：

(C) 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九年商辦工業發展比較表

工業種類	商辦工業形成時期 (一九二一——一九二四年)		商辦工業煥發時期 (一九二四——一九二九年)	
	平均每年所 增加的工廠	平均每年 的資本	平均每年所 增加的工廠	平均每年 的資本
生絲紡織	三分之一	五〇・〇〇〇元	一・六七	一七六・四〇〇元
棉紡織染	六	四四七・二二二元	五・六七	一・〇一八・〇〇〇元
麵粉	五・六七	九九・〇五九元	五・六七	一八八・〇〇〇元
電業	四	一三八・五八三元	七・三三	一六〇・〇〇〇元
火柴	四・二三	三〇・五三八元	三	七三・〇〇〇元

自然中國民族工業這種發展比之於帝國主義的生產實在是非常可憐的，但是如果

說中國還沒有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或者說中國還只有小資產階級，並沒有大資產階級，都是不合事實的。

##### 五 中國民族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的矛盾

中國既然有了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首先就要與外國帝國主義的統治發生衝突，中國民族資本主義不但在經濟上要求解放，成爲帝國主義的對抗力；而且因爲帝國主義不只是伸手於中國經濟生活中，他爲適應於種種經濟侵略起見，還造成了另外的生產關係，政治制度。所以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勢必要求關稅自主，要求根本推翻帝國主義之一切經濟的政治的特權。（讀者要注意：不可以把這裏所說「民族資本主義」，完全看「民族資產階級」，事實上過去爭取這種民族資本主義自由發展之條件的、不只是民族資產階級，而在一九二七年四月事變及七月武漢反動之後，爭取這種條件的簡直沒有民族資產階級）。加以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世界資本主義國家創鉅痛深，弄得歐洲經濟糟不可言，他們爲維持自己垂死的生命，必然要更凶猛的恢復其經濟政治的威權於中國——當時唯一可能的市場，中國民族工業既在大戰期間有些發展

，而戰後不久就遇到更強的經濟侵襲，於是中國民族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之間發生更大的矛盾，所以中國民族資本主義要求抵抗帝國主義的侵襲，要求脫離帝國主義的箝制和束縛，要求從帝國主義壓迫之下解放出來，爭取自己自由發展的條件，實在是中國大革命之第一個經濟基礎。

## (二) 封建勢力與民族資本主義的衝突

### 一 帝國主義與中國封建勢力的關係

但是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基礎不僅在他自己的經濟與武力上，並且他已經與中國的封建勢力發生了聯系。社會上時常有這樣的矛盾，就是帝國主義經濟侵入殖民地本是造成殖民地資本主義經濟關係而破壞封建關係的，但是另一方面他又維持封建關係以阻礙資本主義的發展。這是因為帝國主義爲要維持他對殖民地經濟政治上統治起見，不得不利用殖民地的封建勢力，實際上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壓迫，極大部份是依據中國經濟的落後，依據於農村中的封建關係，中國社會經濟關係及政治制度中之封建

殘餘，是外國帝國主義無限制剝削中國民衆之最好的依據，帝國主義維持着中國地主豪紳及其封建勢力，封建勢力又在維持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統治。

## 二 買辦階級的出現對於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影響

第一，帝國主義爲要無限制剝削中國廣大民衆起見，不得不經過買辦地主豪紳的封鎖勢力以作他剝奪的中介，中國地主豪紳自己也企圖在帝國主義卵翼之下，可以蛻化爲買辦階級，因此也願意做帝國主義的中介，於是辦理「國立」的郵電鐵路礦業航業等事，以及經手交付賠款借用外債等「國立」和私立銀行的官僚士紳，便都變成帝國主義御用的經紀買辦，他們的發財是靠那種「以官僚署爲企業」的手段得來的，他們的地位是靠帝國主扶持起來的，他們簡直是帝國主義所雇用的洋奴。這些做帝國主義的洋奴買辦大半都是舊時的貴族地主豪紳，即使有些官僚買辦（軍閥）是游民土匪出身，他們也必定變成官僚士紳，譬如張作霖的奉系軍閥，就和東三省山東的封建地主豪紳結成密切的關係。中國封建地主階級的士紳，雖然在百年前已經沒有很顯著的「農奴主式」的優越地位和特權，彷彿可以由考試而取得官爵，由官爵而取得積聚資本之可

能，由取得資本而購買田地房產，然而各省各縣的世家，大半是「世代科甲」，別成「貴族」，何況百年來科甲早已不值錢，「市僧庸僧」都可以由捐班出身而取得官爵。貴族士紳的身份門第之界限，早已漸漸變為貧富懸殊之地主佃戶的階級關係，所以士紳不一定是官僚，却必定是地主豪富。他們既然被帝國主義委託雇用，取得各種銀行礦務鐵路航行等事業之管理權，便可分潤一些帝國主義剝削中國民衆膏血之所得，於是他們的田地財產日益增多，可是因為他們是在帝國主義支配影響之下，而帝國主義又要妨礙中國工業的發展，所以他們的資本積累，反而都投到土地高利貸方面去，而很少的投到工業方面來，其中雖然也有些買辦階級把他的積累資本投到工業中的，例如「南通王」張謇，山東的潘復，直隸的曹錕兄弟，其他交通系，研究系，政學系的人物中，也有投資到工業的，但是這種買辦階級投資工業，對於真正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並沒有很大的幫助。因為一則他們完全在帝國主義支配影響之下，二則他們的主業還是官僚機關田地重利盤剝以及政治投機（借款，戰爭，扣餉等），就是投資於工業也不過是他們的副業而已。而在積極方面，封建勢力既在農村中做了帝國主義間接的媒

介，於是外國帝國主義的商品侵略如狂風暴雨一般的在中國封建剝削階級有力的幫助之下，一天一天深入到中國的經濟生活之中，外國商品充滿了中國全國大小的都市，甚至窮鄉小邑中，中國舊有手工工業家庭工業因無法抵抗而不能不漸次崩潰，所謂『火柴從外來，洋油及洋油所帶來的各種洋燈，代替了中國工業的大部份』，一個小鄉的農民，他若買布則大半是洋布。而且地主由農民那裡所榨取出來的血汗，因為民族工業難以與帝國主義競爭，又很少拿來投入於民族工業中，這樣自然要使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受着很大的阻礙。

### 三 軍閥戰爭對於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影響

第二，中國是所謂『國際的殖民地』，各國帝國主義為爭奪世界的霸權爭奪中國的統治利益，必然要利用封建軍閥實行互鬥，『自從一九一一年中的中國革命以來，外國帝國主義絕未給中國以一小時的休息。英國資本資助吳佩孚統率的直系，日本資本資助張作霖及奉系軍閥』。各派軍閥為爭權奪利，亦必然割據稱雄，這樣自然造成中國不斷的軍閥混戰。這種不斷的軍閥混戰毫無疑義的，首先就要造成割據局面，使中國

不能統一；其次就是賦稅的增加，軍費的收括；再其次就是交通的破壞，市場的縮小，使中國幼稚的工業生產，更加不能與帝國主義商品競爭，中國自己的工廠常常被帝國主義併吞了去。所以封建勢力割據中國之後，帝國主義的經濟並不受惡劣的影響，或者受得很少，即就各省的稅收來說，軍閥總是不會向帝國主義者征收的，但是封建軍閥的混戰割據却非常阻礙着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

#### 四 封建勢力與民族資本主義的衝突

根據上述的分析，可見中國的封建關係對於帝國主義不但沒有多大的妨礙，而且還是帝國主義剝削中國的一種依據，但是非常阻礙着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這種封建勢力與民族資本主義的衝突，可以說是中國經濟生活中之第二個大矛盾，也就是中國大革命之第二個社會經濟基礎。（這種矛盾，雖然在相當的意義說，仍然是變象的帝國主義與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衝突，但却有他另外各種不同的關係和形式）。何況在買辦制度方面來說，當然是籠罩着全中國整個兒的鐵網：從官僚式的最高買辦，經過市場上的巨商買辦，經過官署軍隊下之政客胥吏，經過內地的批發商，甚至於小洋

貨舖的店東，經過農村中收括原料的富農小紳士——帝國主義伸着如此之長的「巨靈之腕」（買辦制度）來剗削中國。但在買辦階級方面說，這一階級却不包括二三等以下的小買辦（如洋行小鬼，小洋貨舖，富農，普通商人等），買辦階級只限於相當掌握着經濟最高權的巨商軍閥大官僚大地主，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過程日益發展，買辦階級之中亦逐漸發生階級分化，一方面仍舊受帝國主義的操縱支配而日益互相併吞衝突，另一方面，有一部分買辦階級或者破產失業，或者因為積累資本日多。逐漸蛻化爲民族資產階級，逐漸增加他自己一些「獨立性」，再則當北洋軍閥統治着大部份中國的時侯，外國帝國主義都承認北洋軍閥是個總的「政治買辦」——中央政府，帝國主義一切大的借款都只經過這個總買辦，南方的軍閥地主實在吃醋不小，南方軍閥羨慕着北洋軍閥買辦的勾當，心併便存了一個「彼可取而代之」的觀念，所以當着中國民權運動初開始的時候，這一部分吃醋的軍閥買辦地主便也藏在「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的旗幟之下「參加了革命」——他們不是來革命，乃是因吃醋而爭風，想爭取一個總政治買辦的資格。並且因爲帝國主義侵入中國，維持封建勢力與發展資本主義混在一起，資



產階級爲要爭取自己發展的前途，也想利用這種南方軍閥的力量去反抗北洋軍閥，所以當時跟着南方軍閥一齊去『參加』革命的，其中有許多自然是當地之商業的小地主，同時還有許多民族資產階級的成份，所謂『二次革命』，所謂『護法』，就已經是資產階級利用豪紳地主軍閥力量去反對北洋軍閥的有力表現。因爲在開始民族資產階級與買辦階級還沒有明顯之『階級分化』的時候，這些南方之民族資產階級性比較濃厚的大地主買辦，自然容易與民族資產階級混在一起，去反對北方封建性比較濃厚的大地主大買辦。固然這種軍閥地主爲吃醋爭風而『參加』革命，在他們主觀上並不是爲解放中國，並不是爲推倒中國社會上之封建剝奪，但在客觀上，這種資產階級南方軍閥地主對北洋軍閥反抗之中，必定要叫出些革命口號，客觀上在一個相當情形之下是有利於革命之發展的。

### (三) 農民的貧困及其與封建地主的矛盾

#### 一 中國農村經濟的危機

中國廣大農民羣衆，一方面受外國帝國主義之經濟政治的進攻，大批的破產失業，發生極強度的貧窮化過程。另一方面受着封建地主之殘酷的剝奪，農民對於地主的租額一般都非常之高，全國各處都沒有少於百分之五十的，有的地方居然到了百分之七十，遇着災荒往往全部收獲還不够交租，加以軍閥混戰兵匪災荒的連年侵擾，苛捐雜稅的重壓，使一部份還沒有破產的小農亦急劇的趨於破產。農村中佃農增加自耕農減少的過程非常顯著，同時荒地面積也日益增加，據日本東亞同文會出版之『中國年鑑』所載，中國全國荒地面積增加的趨勢，有如下表：

年次	畝數
一九一四年	三五八・二三五・八六七畝
一九一五年	四〇四・三六九・九四八畝
一九一六年	三九〇・三六一・〇二一畝

一九一七年	九二四·五八三·八九九畝
一九一八年	八四八·九三五·七四八畝

據上表，四年之間，中國荒地面積，竟增加到四萬九千萬畝之多，農村經濟危機已可概見，我們再從海關統計上看看自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二五年之間糧食進出口的情形：

年次	進口總額	出口總額	進出口總價之差	入超或出超	糧食入超佔對外貿易總入超百分比
一九二三年	二六·六九三·九九	二〇·五七·一九二	六·三六·五七	入超	一五·八
一九二二年	三三·二五三·三四七	一一·四七·二四六	三·七五·二〇一	入超	一三·〇
一九二四年	四六·四三九·九三三	八·四〇·一八五	一九·一七九·七六	入超	一三·七
一九二五年	三三·七四七·九八	九·六七五·四九四	三三·〇七五·四四	入超	六四·七
一九二六年	三八·八九〇·〇天	四·八〇·五五一	三三·六五八·四七	入超	六八·一
一九二七年	三五·七四三·八一	八·七二·三三九	二六·九八一·五三	入超	三一·一
一九二八年	二五·八〇零·一五四	六·七三·一四五	八·三六五·六七〇	入超	一·二

一九一九年	一三·一九·三五八	三九·三三·五八	二七·〇四·一六〇	出	超	—
一九二〇年	一·一八·六八三	五七·六五·四八〇	四六·五八·六六七	出	超	—
一九二一年	五〇·八九·四四〇	三三·一四·八九三	一七·六九·六六九	入	超	五·〇八
一九二二年	一四·〇三·九四三	三三·〇三·八八七	八三·三〇·一七〇	入	超	二八·三
一九二三年	一四〇·三八·七五〇	三二·三六·五六一	一八·八四·二二六	入	超	六九·七
一九二四年	一九·七五·六二六	二五·四元·七三三	八四·三八·八三三	入	超	三四·二
一九二五年	八五·四八·七九二	二九·八七·七三六	五·六二·四〇四	入	超	三·二

中國是所謂農業國家，但因兵匪連年侵擾，災荒繼續擴大，荒地日益增加，農業生產絲毫沒有改良，軍閥盤據的地方，更要強迫農民栽種鴉片，以增加他們搜括軍費的來源，所以弄得糧食也要仰給於外國，依據上表看來，自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二五年這十四年間的糧食進出口，只有一九一九和一九二〇年兩年有些出超，其餘十二年即完全入超，而且在一九二三年這一年糧食輸進竟超過出口一萬萬一千八百八十四萬海關兩之多，中國農村經濟的破產衰落真是不堪形容了。

## 二 中國的土產關係

中國所有可以耕種的田地，極大部份（根據一九二七年武漢國民政府調查為百分

之六十二。根據『中國年鑑』統計則爲百分之六十·三。尤其是肥沃的土地，都是集中在地在階級的手裏，農民自己所有可以耕種的土地非常之少，佔土地所有者人口三分之一二的農民（貧農，中農）所有土地還不到五分之一（根據武漢國民政府調查及『中國年鑑』統計均約爲百分之十九）。中國差不多沒有歐洲式的地主經濟，而小農經濟佔着優勢。中國所有可以耕種的田畝，大半都分割成極小極小的農業生產者，他們之中的極大部分又可分爲：（A）完全沒有土地的農民（佃農），（B）小農自己土地太少的還要承租地主的田地的（半佃農），（C）小農自己有些土地的，但是仍須做些其他工作，以補耕田之不足的（自耕農）。中國農民羣衆之中至少有四分之三都是無地的農民和地少的農民，他們是歷史上地主兼併土地的結果。兼併土地的過程之外，同時就是土地被集中在非農業階級——『金錢資本家』手裏去的過程，農民所有的土地一天天的減少，因此農業生產者（親自耕種的人）極廣大的農民羣衆，一天天更加受地主的束縛，所以中國土地關係的根本問題，就是土地所有制度的問題，而土地使用關係上的剝削，亦成爲剝削農民之主要的剝削方式，農民與地主階級的對立也就從此日益尖銳起來。

中國土地制度的發展歷史是和大地主與小地主的互鬥的歷史有密切關係的。再則，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有許多特殊的條件，因此最近幾百年來，土地制度之中也發生出許多特點。其中最主要的是：（一）資產階級式的土地所有制已經佔着優勢，土地大半可以買賣，這種優勢日益發展，（二）物產地租仍舊是很廣泛的現象（有時僅只是表面上用金錢的形式），（三）地主階級之中，大地主比較少，中小地主佔着優勢（土地集中於地主個人的比較少，然而土地集中於地主階級的過程非常之急劇），（四）各省地主的大小的關係是不平衡的。

中國大地主的發展並不厲害，但是地主階級所有的田地都是肥沃的居多，地段也比較的好；中國的農業勞動又是極強度的，中國的農業在較小面積的土地上可以吸收巨量的勞動，土地所有關係上和土地使用關係上農民的田地分割得極小，中國農村人口又日益增多而過剩，於是地主階級對於幾萬萬農民羣衆的剝削更非常厲害，而且地主越小，他的剝削方法越厲害越兇惡，他出租田地的條件也越苛刻。還有一點更須特

別注意的，就是中國農村中資產階級式的土地所有方式和落後的半封建式的剝削農民的方式互相勾結着，一方面，土地固然集中到金錢資本家手裏去，別方面，農民（佃農）替地主做勞役的制度還是存在（如湖南的應工，江蘇的送工等），很多農民受地主的束縛甚至喪失身體自由，要賣男鬻女。地主方面，用超經濟的方法，就是說用強迫的方法剝削農民，那就更有許多方法，實行得非常廣泛，例如在成立租佃關係時，佃農事實上並無自由決定之可能，一切決定之權，都操之於地主，有時在承攬約中，甚至規定佃戶須永遠服從地主支配，地主可以任意壓迫驅逐佃戶，可以自由審判處罰甚至屠殺農民，大部份佃農實際上是被地主強迫束縛於土地之上，各地地主對於農民的剝削，無論是產物納租或貨幣納租，至少也要佔百分之五十以上，租額以外，還有許多附加的剝削，如廣東的田信雞田信米，湖南的年雞年肉等；在有些地方（如廣東）雖然已經採取貨幣納租形式，但其剝削方法與殘酷程度，絲毫沒有變更和減輕，……這些種種不同的方式，都互相勾結着，互相混合着。因此逼使中國廣大農民羣衆更加速度的貧困化（Pauperization）更使無地和地少的農民，大受殘酷剝削，使他們更

不能恢復自己的勞動力——有廣大勞動農民，連維持自己最低限度的生活都不可能，因之也就沒有餘力來改進生產技術，甚至不但沒有能力來改進生產技術，就是連故有的技術水平，也都不能維持下去，因為他們多半不能恢復自己的生產資料；同時也就使他們不但不能實行擴大的再生產，而且連簡單的再生產也都無法進行，因為他們在殘酷的剝削之下，已經沒有重復生產的條件。因此，中國農村經濟更加停滯衰落，使極大多數的農民生產者羣衆，很多因極度破產貧困而致活活的餓死！

何況中國廣大農民羣衆，不但受着地主私有土地租田制度的殘酷剝削，而且還有所謂公田的出租，如族田祠田以及各種寺院廟宇官田等等。地主土地上的地租，是地主的收入，所謂公田的地租，表面上是所謂公共機關的收入，其實都是豪紳的收入，豪紳把持着公田向佃農收租，在經濟上也就等於地主。中國舊時地主階級是紳士階級，後來則凡是出租田地的人以及富豪在鄉村之中都成爲紳士，享有政治上的某種特權。舊時破落戶的紳士，自己雖然沒有田地，却因爲有政治上的特權，能够把持着所謂公產，而成爲實際上的地主。豪紳地主階級是中國官僚式封建制度之下的統治階級，



是實行政治上壓迫中國農民的階級。再有一種現象就是地主爲要鎮壓農民的反抗而辦保衛團或團防，由團防而割據地方，或者實行所謂「武裝收租」，或者直接變爲軍閥，更厲害的剝削農民，掠奪農民的土地，變成更大的地主，使農民漸次變爲農奴。在小農經濟佔優勢並且小自耕農佔多數的地方，除地主直接剝削佃農外，還有另一種的剝削，就是軍閥的課稅制度，這種課稅制度在實際上還是封建式的軍事賦稅，亦是一種榨取地租的方法。軍閥課稅是非常之重，並不比普通租田的地租少，而且各地軍閥強迫的拉夫拉差，抽丁當兵，強徵牲口糧食等等，簡直是一種封建式的「軍事徭役」——同樣是剝削農民勞動的方法。

### 三 中國商業資本高利貸與土地關係

根據上面所述，我們已可看見中國廣大農民羣衆受着如此殘酷的掠奪剝削，已經使幾千百萬農民羣衆破產窮困。豈知中國農民羣衆實際上所受封建地主豪紳的壓榨還不止此。中國因爲貨幣經濟關係的發展，到處都已經使用金錢交易，以前那種「自做自吃自做自用」的自然經濟（以前中國的農村中大半都是這種自然經濟）早已崩壞，市

場經濟的制度已經籠罩一切成爲統治的制度（農民生產品必須出賣一部份得了錢再能買其他日用品——洋油火柴布匹食鹽等），於是農民一天天的格外需要金錢，因此造成了高利貸資本發展的條件——農民大多數每年都借債，所以地主富商便放債收息，利錢越抬越高，例如東三省有些地方，要出六分年利，才可借到錢；安徽滁縣一帶，農民借錢十元，在三個月內除本金外，更須還稻或麥一石（按市價約爲五元左右）作爲利息，照這樣計算，年利竟爲百分之二百！江浙產絲區域，在蠶忙時借錢，要用加一的利息，即借銀一元，限期四十天歸還，還時除本銀外更須加利一元（這樣，以一年計，利息竟高至百分之九百！）。南通地方，農民借銀一元，在三個月內，須還棉籽一担，其代價約三四元，倘照年利計算，竟高至百分之一千四百！江甯各鄉，農民借銀一元，在一年內須還穀或麥一擔，如當年不還，待下年即須多還二担。崑山上海一帶，有所謂十元五斗者，即借錢十元一年之內加還息米五斗。武進一帶，有借米一石，在一年之內，須還穀三担者。這些顯著的事實，很明顯的指示出，許多地方高利貸的年利，一般都在百分之百左右，甚至超出百分之百以上。商業資本對於農民的剝

削也是如此，中國商人豪紳，大都在青黃不接的時候，出賣米穀給農民，或者出賣肥料給農民，他們也往往採取放債的形式，加上極重的利息。再者，商人買辦收買原料（絲繭，茶米，棉麥荳，烟草等），往往也趁着農民急着要錢用，先付價錢，扣算利息，並且預先抑低原料的價格。這種高利貸與商業資本對於農民的壓迫和土地使用關係上的剝削方法（出租田地）互相勾結聯繫着——中國農村經濟關係上的特點，尤其是地主階級和商業高利貸資本的代表，差不多完全是混合的。一個人兼做地主和商業資本家及高利貸資本家，一個地主他一方面壓榨佃農的地租，別方面便是債主，拚命的用高利貸盤剝農民，結果地主簡直將自己的佃戶和債戶，變成了債務上的奴隸和像牛馬似的對待他們。因此，豪紳可以用這種手段奪取農民的田地，中國很多自耕農往往因為欠債而將田地抵押或典質，結果變成了佃農。喪失了自己土地的農民，重新要向地主去承租田地，往往所租得的就是自己原有的田地。

中國收租的辦法，大半還是以農產品交租，借米借錢而無法還清的農民，亦往往出賣田地而隨後替債主（高利貸商人官吏）耕種自己原有的田地。新的地主自然仍用

放債的手段，繼續剝削農民。總之，中國社會中有錢的（高利貸者）有地的（地主）有貨的（商人）都是那一批人，他們用三種方法同時並進的剝削農民。有錢的是在變成有地的，有地的變成有貨的（收括農民的勞動生產品，甚至變成「佔有農民的」）（暗中的奴隸制度，例如賣男鬻女，出賣妻子，替地主做苦工當還債）。高利貸資本與商業資本，彷彿石磨上的兩片磨，榨取農民的土地和血汗。商業高利貸資本，既然加緊的沒收農民土地，加緊的集中土地於金錢資本家之手，同時就使喪失土地的農民，更加受着獨佔土地的束縛而喪失其自由。出賣了田地還是欠債，於是這種束縛更加深刻起來。中國高利貸商業資本的作用，就是事實上兼併農民的土地，同時又用公開的方法掠奪農民的土地。農村中直接的統治階級——富商高利貸者地主以及正式的軍閥官僚「強佔民地」「強占民地」「強買民地」「吞沒田產」「勾結惡棍侵占土地」之事到處發生。中國數千百萬受剝削受壓榨的農民羣衆，不但他們辛勤困苦所生產的大部分都飽了豪紳地主軍閥官僚的私囊，而且自己的一些土地也大多被地主豪紳所掠奪，所以極大多數的農民羣衆，不但遇着天災戰禍或者歉收的時候，不免活活的餓死，就是在一般

狀態之下，亦大都陷於水深火熱之中。

#### 四 帝國主義勢力侵入中國對於農民的影響

帝國主義勢力侵入與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矛盾在前面已經比較詳細分析過，現在只就帝國主義勢力侵入中國對於農民的影響一方面，再扼要的說明幾句。

帝國主義既然採取殖民地政策侵略中國，勢必阻礙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維持中國封建關係殘餘，維持中國軍閥封建式的割據並利用之作爲他們爭權奪利的工具。帝國主義的侵略實際上乃是中國廣大農民羣衆破產貧困的主要原因，他利用官僚買辦的收括和軍閥政府苛捐雜稅的掠奪，利用他們財政資本與中國商業高利貸資本的密切的勾結，以達到他們收括中國數千百萬農民膏血的目的。

中國政府對於帝國主義一切賠款借款的負擔，最大部分都壓在中國農民身上，中國對外貿易每年幾千萬兩的入超也大部分都是對於中國農民羣衆的壓榨。因爲商業高利貸資本得到帝國主義強有力的幫助，所以中國農村裡的價值（原料利錢等）才大量的輸出而得不着經濟相當的代價，使中國整個的農村支出超過收入。外國教堂差不多都

是直接霸佔田地剝削中國農民，中國受着銀價銅價低落的影響，使錢業的投機商大大的掠奪農民。

中國的剝削制度，完全是一種半殖民地的經濟，民族工業不能暢快發展；另一方面，帝國主義經濟的侵畧，却在一天天的增高貨幣經濟的作用，擴大商業交易和貨幣的流轉。他不但使商業流轉日益擴大，金錢作用一天天的大起來，而且因為帝國主義需要原料，使中國農村之中，茶絲豆烟等工業植物的種植增多，發展了所謂「商業的農業」。於是得着兩種結果：（一）資本家多來購買田地開辦懇牧公司或種棉植桑等，這種現象在中國還很少；（二）中國農業市場受世界農業市場的支配，帝國主義需要某種原料，他就能用比較高的價錢收買，於是其他沒有銷路的原料就要少種，所以中國農村經濟的命脈就握到帝國主義手裏去，使中國變成資本主義列強的農業原料國，成爲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附庸。

國際帝國主義在中國發展了金錢和市場的權利，促進中國農村中宗法社會關係的崩潰及一切家庭工業的衰落，一方面逐漸消滅落後的農民家庭手工業，別方面，促進

新的資本主義的各種方式家庭工業發現，不過農業與家庭工業破產衰落來得很快，而城市大工業的發展慢得多，於是農村之中便發現極大的人口過剩的現象，中國人民出國一天天的多，土匪流氓後備軍一天天的增加，工力的價值一天天的低落，同時又是中國各地軍閥雇傭軍隊的來源。加以因為帝國主義妨礙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使農村中的資本積累，不用來提高農業的生產技術不投到工業裏去，反而再投到土地和高利貸方面來（因為投資到工業中沒有像投資到土地和高利貸方面那樣容易賺錢！），更加重的用半封建的形式剝削農民。所以中國農民一定要推翻帝國主義的壓迫；然後才能最終脫離地主商業資本高利貸的束縛，脫離官僚封建制度與軍閥豪紳的壓迫，同時不澈底掃蕩舊時官僚豪紳政權機關，不消滅農村中經濟政治壓迫的主人翁——地主豪紳階級也就不能推翻帝國主義。

##### 五 中國農村資本主義發展的傾向

帝國主義統治着中國，阻礙了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維持着中國封建制度的殘餘，因此也就使中國農業資本主義的傾向，變成寄生蟲似的中世紀式的形式；同時因為

帝國主義的影響，能够使金錢和市場的權利加強起來，商業農業的發展，雇傭勞動與土地買賣的過程增加，因此又不能不引起中國農業中相當的資本主義的發展。因為中國是處在半殖民地地位，而且過去的歷史發展有許多是遺留的特殊狀態，所以中國農村經濟的資本主義發展有他自己特殊的性質，並不和別的國家相同。中國農村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是在一般的經濟停滯狀態，尤其是在農業經濟破產停滯狀態中，再則中國沒有大農經濟，差不多完全是最小的小農經濟，不斷的軍閥混戰，而且在帝國主義橫暴侵畧，中國一般經濟破產狀態之中。帝國主義從中國掠奪去的資本，極大部分是用在中國國境之外，中國供給了帝國主義必需的原料、消售了帝國主義剩餘的商品，而所得到的却是羣衆的破產，失業，死亡和屠殺。中國受着資本主義之最厲害的壞處（破產，失業，廣大羣衆的貧困化等），但是沒有受着資本主義之偉大的好處——生產力的提高，雖然當帝國主義初侵入的時候，帝國主義帶着西歐先進國的技術，幫助中國相當的提高生產力，但不久就反成爲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桎梏了。

在這種情形之下，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尤其是農村資本主義的發展是很困



難的，是非常之畸形與半途而廢的，這種情形是中國農村資本主義各種可能的發展途徑的共同的特點。

中國農村經濟發展的資本主義傾向，首先表現的最明顯的就是農村之中發生富農的資本主義式的大農經濟——應用雇傭勞動的富農經濟，自然這種富農經濟在中國還是很少的。但是因為金錢與市場作用的增長，促進了農民階級分化的過程，所以在中國農村經濟生活中，也已經可以看見農村資本主義的成份。他的具體表現，一方面是在中國農村中已經發現剝削雇用工人的小小的農村資本家，別方面無產階級及半無產階級的羣衆發生出來，所謂勞動後備軍日益增加，因而增加了城市中勞苦工人的數量，農村之中所謂短工長工的雇農也日益增多。所以開始造成資本家經營農業的條件，農民中的富裕分子，便能雇用工人工（僱農）而成爲富農，於是剝削雇農的方法，便開始成爲富農的主要的經濟特點。然而中國經濟的一般條件，使生產力的生長十分停滯，這對於農業經濟的資本主義化，自然是非常之大的阻礙，對於農民上層分子的資本主義的發展，造成極大的困難。因此農村資產階級（富農），一方面實行雇用工人工（雇農），

別方面仍舊要出租田地，而且還要經營商業和高利貸盤剝。再則中國農民羣衆實際上是極無政治權利的，農村中一切強暴侵畧的現象是常見的。在如此特殊狀況之下，一般農民之中強有力的人，便不用經濟的方法，而用直接的掠奪，侵畧田地，強掠財產，如此而變成富農。

而且中國農民的階級分化已經可以看得清楚：在一個極端上分化出農村資產階級——富農，在別一個極端上則分化出農村無產階級——雇農，在兩極端之中還有許多過渡階級，如中農，貧農等，通常所謂貧農之中階級的分析上還可以分爲『小農』與『最小農』——『最小農』是最接近雇農工人的，可以稱之爲『半無產階級』。農村無產階級就是農村工人，如長工短工日工等，此等農業工人被雇於資本主義的農業經濟及與農業經濟有關係的工業（如油車，茶廠，糖廠等）中以維持其生存。最小農的特點是他還有最少量的土地可以自己耕種者（或者佃農或者自耕農），他們的收入只能勉強維持生活，而且每年虧空，他們收入的主要部分實際是靠兼雇工（兼做短工，苦力工人等）的收入。這種農民非常多，而且因爲中國經濟的落後，這種最小農的半無產階級

與農村無產階級間之區別往往是很模糊的。『小農』就是小耕作農，他們有田地可以自己耕種，勉強供給一家人貧困的生活而不用僱農。即便有時要僱用短工，同時也要自己兼做短工，那也大半帶些親友宗族『勞動互助』的形式，然而最近，這種僱傭關係也漸漸進到資本主義的僱用方式。中農的意義，在經濟上是小私有土地者，不論他是自己的私產或是租來的土地，都只是較小的土地，然而在資本主義經濟關係之下一般而論，這種田地不但足以維持一家生活，而且得着些餘錢剩米，年成好的時候，可以變成小的資本，他們常常要僱用僱工。根據上面一些簡單的分析，可以看見中國農村中大致的幾種形式，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特殊條件之下，尤其是農業經濟之中實際上可以看見許多過渡的中間的形式。這種農民分化，因各地金錢作用及商業作用發展的不同，而分化之程度亦不同。金錢和商業愈發展，農民的分化也愈厲害，而且天災戰禍，使一般的農民生活降低，而更促進農民中的階級分化，窮的更加窮，而極小部分的富人更加富。富農經濟雖然很少，可是小農經濟在中國佔極大的優勢，農民自己的土地上也是小耕作的經濟（出租給很多小農耕種）。除農民經濟外，差不多完全沒有其他

經濟（其他耕種營業的方法，如地主經濟，包括幾百畝田地以上的農場，或者資本主義式的農場——在中國是少而又少）。因此，歷史上中國農村之資本主義道路，正是上面所說的農民的資本主義式的小農經濟之向前發展，這是戰勝封建階級殘餘的一定形式。可是這種小農經濟正被帝國主義及封建殘餘強力壓迫等所層層束縛着。

中國農業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理論上還有別一種的可能。因為中國工業發展很落後，生產的資本不夠，所以歐洲式的模範的資本主義式的小農經濟之發展是不可能（就是說中國不會有一方面保存地主經濟，別方面又有資本主義式的小農經濟之現象），所以第二種可能，理論上可以是「大封建地主，或半封建地主經濟變成資本主義的農業經濟」。但是，這第二種可能是非常之少的，第一個主要原因，就是中國完全沒有封建式的地主經濟。即使認為佃農所耕的地主土地是「地主經濟」，那末再將佃農都變成僱農，使用資本主義式的農業生產方法，也是非常之困難，因為如果要如此辦法，先就要有農業生產方法上技術革命，必須要使農業生產的技術增高（利用人造肥料，改良水利，利用機器，改良家畜的應用方法等），然後才能真正運用資本主

義式的僱用制度，否則仍舊只能出租土地。如果照現在中國這種農業技術，那末在經濟上看來，地主不出租田地來改用多數的雇農，是很不上算的。可是要增高技術，先就要在農業裏投大筆資本，中國的中小地主又沒有這樣的大資本。不但如此，即使中國中小地主有這許多資本，這種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也仍舊非常困難，因為革命的農民運動非常之厲害，必須先將農民革命鬥爭都鎮壓下去才可以投資，否則是不可能的。因為國內政治制度要有極大的變革，否則軍閥混戰連綿不息，資產階級的法律秩序都不能確定，土匪沒有肅清，這樣投資也是不可能的。政治上這種情形不改變，封建式強暴的剝削農民，將永遠是農業經濟中的一般現象，所以這第二種的可能，客觀上是非常之少的。固然在滿蒙等處，已有少數較大的資本主義式的農業經濟，如農業公司等，可是他們大半還是過渡式的半資本主義居多（仍舊採用出租制度）。而且這種滿洲農業的資本主義的發展多半還是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的作用，仍舊限於殖民地的經濟形式，同時因為遇着許多中國特殊條件的阻礙，這些過渡式半資本主義農業經濟的發展，也非常之慢，他在中國農業之中的份量是很小很小的。

然而理論上中國農業資本主義式的發展還有第三種可能的道路，就是外國資本家投資在中國農業，組成很大的農業公司，如英美烟草公司的農場（一種特殊的資本主義的集中）以及其他方式。這一道路可以使資本主義發展的速度加強，但是中國農業的這種資本主義發展的方式也不能夠有多大的範圍，因為這是保持并且加重帝國主義對華統治，使中國從半殖民地變成完全殖民地的道路。如果假定中國農業資本主義的發展，可以在「地主經濟」或地主租田制度轉變到資本主義經濟方式中進行，那末，農業的這種資本主義的發展，必然是非常之慢非常之痛苦的，他將使中國農民受着更殘酷的壓迫束縛。只有痛快的革命方法，根本剷除封建地主的壓迫剝削制度，沒收所有地主階級的土地，推翻封建軍閥的政權，才能得到農村經濟自由發展的條件。

#### 六 中國農民爭取土地鬭爭的意義

中國土地關係照以上所分析的特點，很明顯的表現出來，中國農村中的社會經濟制度，完全受着封建制度殘餘束縛着，中國農民力爭土地的鬥爭，顯然是幾千百萬完全被掠奪而無土地的農民（佃農）以及還沒有被吞併的農民反對獨占土地的階級——

豪紳地主階級，力爭經營使用土地的自由，脫離封建式的剝削和壓迫的鬭爭，這種鬥爭是表示農民要力爭自己最主要的生產資料及維持生活的來源——土地，客觀上是在力爭農村經濟資本主義發展的自由條件。這種鬥爭主要的是反映農民經濟與封建勢力的衝突，這種衝突是中國大革命第二個社會經濟基礎。

#### (四) 中國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民權革命

##### 一 中國無產階級的形成

帝國主義勢力侵入中國，促進了中國經濟生活的變化，帝國主義爲便利自己的剝奪計，始而建築鐵路開闢航路及發達其他的交通工業以運輸商品，接着使用移殖資本的方法直接在中國開辦工廠，以更便利的來剝奪中國廉價的勞動力，於是西歐新式工業資本的勢力，衝破了中國閉關社會之政治經濟的範圍，逐漸由中國破產的農村中吸收許多喪失土地的農民到工廠中去做工，於是照着新式的資本主義技術而組織的大小企業中便逐漸團聚着很多的失業失地農民，逐漸形成了中國的無產階級。再則帝國主

義勢力侵入中國，固然要極力阻礙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但究竟不免要造成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關係，逐漸傳佈開新式工業的種子，形成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因此從「工廠生活的鍋爐裏鍛鍊出來」的工人也就一天天增多，「現代工人的無產階級跟着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照同一的比例發展——工人必須找得着工作，才能够生活，而同時也祇有他們的勞動力能够增多資本的時候，他們才能找得着工作」（共產黨宣言）——這也就是說，工人推動資產階級向前發展，工人階級自己也就發展起來。中國無產階級的形成，則更有許多特殊的狀態，他們不但在自己「民族」資產階級的「工廠生活鍋爐」中鍛鍊出來，而且還直接從帝國主義在華的「工廠生活鍋爐」中壯大發展起來。

中國無產階級的形成，還只是最近幾十年間的事情，而且因為中國民族工業發展的困難，所以中國無產階級的數量也還很少。根據北京政府農商部自民國元年至九年調查統計（見第一次中國勞動年鑑），總計全國織染工廠（包括繅絲業，製棉業，紡績業，製線業，刺繡業，織物業，編物業，成衣業，染工及漂白業），化學工廠（包括窯瓷業，造紙業，製油製蠟業，漆器業，製火柴火藥業，製藥業，肥皂製造業，製



皮製革業，製燭業，化妝品製造業，製染料顏料業，漆液製造業，雜業），機械及器具工廠（包括機器製造業，船及車輛製造業，器具製造業，金屬品製造業），飲食物工廠（包括釀造業，製糖業，製烟草業，製汽水及冰業，製茶業，糕點製造業，罐頭食物業，碾米製粉業，畜產及水產製造業），雜工廠（包括印刷刻字業，紙製品業，製草帽及草帽辦業，皮革毛羽製品業），特別工廠（包括電氣業，金屬精鍊業，自來水業）（工人數量有如下表（根據中國勞動年鑑統計）：

年次	工廠數	職工人數
民國元年	二〇・七四九	六六一・七八四
民國二年	二一・六八三	六三〇・八九〇
民國三年	二〇・三五五	六二四・五二四
民國四年	二〇・七四五	六四八・七二五

民國五年	一七・〇八八	五七五・八五四
民國六年	一五・七三六	五五五・五九二
民國七年	一四・三七四	四八八・六〇五
民國八年	一〇・五一五	四一〇・二七九
民國九年	六・五二四	四一三・〇四〇

這個統計自然非常不可靠，不但帝國主義在華工廠工人不會統計進去，就是上列本國工廠的統計也是非常不完全，據農商部自稱，有許多報告都不能代表全國，例如根據農商部同一處統計，在民國九年僅是礦工工人（探礦工人與採礦工人合計）一項就有五十九萬另八百八十五人，而猶稱報告未全，不足以代表全國，則上表所載必多與事實不符，蓋可無疑。

另據『工人旬報』估計（日人西川喜一轉載於『支那勞動者之現狀』一書）則中

國機械工廠勞動者及普通勞動者人數，各如下表見『中國勞動年鑑』(一)：

(A) 機械工廠勞動者人數表

業別	勞動者人數
鐵工	二〇〇・〇〇〇
電工	一〇〇・〇〇〇
洋灰工	二五・〇〇〇
麵粉工	一五・〇〇〇
火柴	九〇・〇〇〇
運輸工	五〇〇・〇〇〇
印刷工	八〇・〇〇〇
紡織工	一六〇・〇〇〇
烟草工	一〇〇・〇〇〇
繅絲工	一三〇・〇〇〇

(B) 普通勞動者人數表	
業別	勞動者人數
造船工	二五〇〇〇
製革工	二〇〇〇〇
總計	一・四六〇・〇〇〇
車夫	二〇〇〇〇
鹽業	三〇〇〇〇
釀造	一〇〇〇〇
理髮	二〇〇〇〇
磁器	五〇〇〇〇
染織	三〇〇〇〇
製茶	一〇〇〇〇
竹木器	五〇〇〇〇

建築	六〇〇・〇〇〇
製紙	一〇〇・〇〇〇
製藥	三〇・〇〇〇
裁縫	二〇〇・〇〇〇
使役	四〇〇・〇〇〇
窯業	二〇〇・〇〇〇
毛織	二〇・〇〇〇
總計	二・九五〇・〇〇〇

又據「工人旬報」估計（見「中國勞動年鑑」p. 36）全國交通工人總數有二〇〇・〇〇〇人，其中鐵路工人計有一〇〇・〇〇〇人，海員及郵差各有六〇・〇〇〇人。上海是中國無產階級的中心，據一九二五年時上海總工會統計上海一埠有產業工人五〇〇・〇〇〇人，合計江蘇外縣共有一・〇〇〇・〇〇〇人左右。上海之外，產業工人最多的地方，就要算着東三省，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北京順天時報，曾有大概統計，

據說合計東三省共有產業工人四十五萬左右，其次就要算着香港，武漢，天津，唐山，青島，廣州，九江，鄭州等處。所以比較嚴格的估計，全國產業無產階級大約總在四百萬人左右。

## 二 中國無產階級的生活狀況

帝國主義之所以在中國開設工廠的原因，首先就是要利用中國賤價的勞動力，所以帝國主義對待殖民地工人剝削，比對待他們本國工人格外殘酷。他們（帝國主義列強）往往把在殖民地以最高剩餘價值率剝削去的利潤，拿出幾萬分之一去分潤他們本國的勞動羣衆，去緩和他們本國工人羣衆的反抗，但因此殖民地半殖民地工人羣衆所受壓榨就更殘酷，在中國自然不能例外。同時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在帝國主義的經濟壓迫之下，處處不能與帝國主義競爭，更不能不加緊的剝削工人階級，以達到他們「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的目的。中國又當着農村破產危機的時候，中國工業的發展與農村破產的速度相差不知幾遠，農村剩餘人口都不斷的遷入到城市中來，造成城市中廣大的失業的勞動後備軍。資本家便以這種大量的失業羣衆去恐嚇在業工人，假使

工人若有比較嚴重的經濟鬥爭，則立刻便有失業的危險。因此，忍痛受苦，形成了中國無產階級之空前黑暗的勞動條件。

只有中國的工人，每天還作十二小時以上的苦工，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沒有像中國這樣延長的工作時間。西歐一般資本主義的國家，大多數都是八小時，八小時半，九小時的工作。蘇聯工人則在中國大革命之前，即已開始實行七小時工作制，中國工人每日做十四小時工作，則簡直司空見慣。各國在工作時間以內，都還有休息吃飯的時間，中國不獨沒有休息吃飯的時間，並且工人還應該早半點鐘站到工廠門外去候班，使着機器一刻不停，工人連預備，走路，吃飯，候班等等，一共必要十五六小時的工作。在礦山中，西歐多是七小時，八小時的工作，因為礦山中的工作非常殘酷，蘇聯為五小時半，六小時的工作，並且連休息的時間在內，中國則非常奇怪，譬如開灤磁博煤礦中，名義上是三班輪流。每班八小時，實際上工人因工資過低不能維持生活的緣故，往往不能不做連班，於是淨合工作十六小時。西歐各國，星期日照例休息，星期六減少兩小時的工作，每週約合四十六至五十二小時，蘇聯每週約合三十八

至四十二小時，中國工人每週最低限度亦在七十小時以上，最通行的是八十四小時，間亦有一百另二小時者。西歐工人中，青工童工比較少，近年因為實行生產合理化結果才逐漸加多，但工作時間比成年工人常要減少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雇用青工童工作危險工作亦有相當限制，蘇聯青工童工則帶學習性質，大半半日工作，半日讀書，工作時間當成年工人的二分之一。中國青工童工則與成年工人受同等剝削，工作時間一般都在十二小時以上，甚至有因資本家及工頭包頭等之加重苛待，而特別延長青工童工之工作時間，青工童工被雇作危險工作毫無限制，礦山中青工童工都很多，甚至如開灤萍鄉磁博等處礦山中，竟至雇用十五歲以下之童工，而且他們的工作時間都和成年工人一樣，常常在地獄不如的礦坑底下，繼續作十六小時的工作。女工在外國當生產前後都有長假，工資照發，蘇聯女工不獨有生產前後兩個月的休息，並有預備女工生產的特殊關係，供給生產女工以許多優待。再則一年之中，西歐工人大多數都有兩星期的長假，蘇聯有一個月長的長假，但中國工人雖當炎暑的時候，還要羣集於機器房裡，鍋爐旁邊，做那繼續不斷的十二小時以上的工作，因此常有熱死情事。



除了工作時間以外，中國工人所得工資也是世界上最底的，紡織業繅絲業及普通製造業等一般工人的工資不過三角左右，礦工不過二角至三角，其他機械及運輸工人一般的工資亦在四角至六角之間，青工童工女工工資更少。米價物價連年飛漲，而工人工資極少增加，中國工人工資既少，有時尚須被廠主工頭用各種名目罰去扣去，因此更不容易維持生活。至於勞動保險，失業保險，疾病救濟，工人子弟教育，在中國更是一無所有。但是中國幾百萬工人階級所受帝國主義，資本案，軍閥壓迫屠殺的嚴重，却又是曠世無雙的，他們不但受着資本家直接的剝削和壓榨，而還直接受着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各種野蠻殘酷的壓迫屠殺，一切政治自由甚至連組織工會的自由也被剝奪淨盡，有名的二七流血，便是由反抗軍閥剝奪工人組織工會自由而起。中國無產階級的勞動條件生活狀況實在是萬分低下黑暗的。

### 三 中國無產階級發展的特徵

中國無產階級形成的歷史是很短的，他們由『在自己的狀態』(Class in Itself)進於『爲自己的狀態』(Class for Itself)，更只是歐戰以後的事情。在一九二三年『二

七」事變以前，中國社會固然已經開始有罷工運動，例如一九二二年二月，海軍報館出的『最近之五十年』一書中五十年來中國大事表裡『勞動潮流』一欄就有以下之記載：

一八七六年 江西磁工因爭食白米，羣衆罷工。

一九一三年 漢陽兵工廠工人因所得工資均用紙幣官票，紙幣跌價，羣起罷工。

一九一五年 湖北乾成煤礦工因延長工時不加工資，罷工。

一九一九年 上海工人罷工援助北京學生。

一九二〇年 開灤礦工一萬餘，因要求加薪，罷工。

一九二一年 粵漢鐵路工人，因欠薪不發，罷工。

開平煤礦工人因與監督衝突，罷工。

粵漢鐵路小工，因要求改良待遇，罷工。

隴海鐵路機師因待遇不平，罷工。

上列記載中，一八七六年的江西磁工罷工，自然還說不上是近代產業無產階級的

運動，一九一三年以後的罷工也還只是中國近代產業無產階級微弱的自發鬥爭的開始，而羣衆的罷工還在俄國十月革命以後，尤其是自一九二二年香港海員罷工與一九二三年『二七』罷工以後，才真正開始中國無產階級的羣衆罷工運動，特別是『二七』罷工可以說是中國無產階級破天荒的羣衆運動，香港海員罷工人數雖然多，但其意義沒有『二七』那樣大。『二七』不但是中國無產階級破天荒的羣衆運動，而且是中國無產階級破天荒的政治鬥爭；上海工人一九一九年的『六三運動』和香港海員罷工，雖然也都政治性質，但一則處從屬地位，一則主要從經濟性質的要求，不如『二七』之明顯提出無產階級自己的集會結社罷工要求。中國無產階級自從『二七』以後，才明顯從『在自己的狀態』進到『爲自己的狀態』，才明顯從自發的經濟的罷工進到自覺的政治鬥爭，才積極參加中國革命運動和無產階級鬥爭的行伍，於是中國共產黨迅速的發展，各業工人迅速的組織，工人罷工的浪潮逐漸洶湧起來，至五卅運動遂一躍而爲領導總的中國革命的階級。

中國無產階級和中國農民羣衆所組成的軍隊有同一樣的弱點，中國軍隊中的農

民，大半在沒有當兵以前，先經過長期的『土匪學校』，中國無產階級隊伍中的工人，也大半在沒有當工人之前，先經過長期的『流氓學校』。中國經濟生活中工業資本之發展既遲且緩，多所阻滯，而商業之發達却非常之迅速，廣大農民失地失業，只能急劇貧困化而不能一時都無產階級化，這是土匪流氓生活之普遍於中國社會的原因。譬如上海的工人之中，差不多一大半是屬於青幫紅幫等類的祕密組織的。工廠工人尙且如此，苦力更不必說了，這種現象尤以長江一帶爲甚。加以中國無產階級因工業發展之遲緩，其階級年齡亦很幼稚，大部份工人都還沒有脫離小農業或小商業的關係，——工人往往經過宗法社會制度而和他們小資產階級的家族有比較密切的關係，尤其是小工業和手工業的工人；兄弟做工人，哥哥當佃農，叔叔開小舖子，是很平常的事。同時，帝國主義及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都在利用這種宗法社會的舊習慣舊關係及工人的小資產階級性，如包工制度紅利制度賞工制度等。這種利用落後的社會制度之情形，尤其是在於多量的雇用女工和童工，中國女工童工的總數，差不多要占無產階級二分之一而強，據上海工部局調查，在一九二四年時，僅在上海一埠就有十六萬八千

多的童工。何況在數量上比較起來也還是很少的少數，根據前面的估計，中國有四百萬左右的產業無產階級，差不多只占中國全人口百分之一光景，所以中國無產階級的弱點是很多的。

既然這樣，是否中國無產階級在中國革命中的作用也就很小呢？那却大謬不然！中國無產階級在五卅運動時便已開始躍登歷史的舞臺，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三年之間已經有很勇猛的鬥爭，香港海員罷工與『二七』事變之後，革命的職工運動便一天天發展起來，五卅怒潮爆發，中國無產階級不但表現出是反帝國主義反軍閥運動的先鋒，而且一躍成爲領導總的中國革命的階級。何以中國幼稚的無產階級能有這樣大的力量，這是因爲他們有許多特殊的優點，足以蓋過他那些弱點。

中國無產階級的優點，正是中國資產階級弱點的反面：（一）中國的工業資本及一般資產階級的成份裏，有極龐大的帝國主義及官僚買辦階級的勢力，而中國無產階級却完全是『民族的』，——中國境內的工廠主之中，有許多是外國資本家及其爪牙，而這些工廠裏的工人，却都是中國工人，最革命的階級。（二）中國無產階級有極大極多

的同盟軍——農民羣衆，資產階級自始就只能延宕農民問題。而不能解決農民問題，無產階級却能澈底領導國民革命去實行「耕地農有」，引導聯合並領導農民羣衆自動手起來沒收地主階級土地，實行土地革命。(三)中國無產階級有偉大的國際無產階級的援助，尤其是已經開始建設社會主義的蘇聯無產階級，中國工人階級將要利用他們的贊助，使中國革命與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相匯合，以過渡到社會主義，因此中國無產階級必定能夠力爭而取得革命的領導權。

#### 四 中國無產階級對於中國資產階級性民權革命的作用

中國無產階級一開始鬥爭，便是積極的政治的鬥爭，便在國際無產階級革命已經開始的時候，便在中國國內不斷的革命鬥爭的環境中。中國無產階級基於他自己所受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軍閥等殘酷野蠻的壓迫和束縛，他是非常有利於驅逐帝國主義肅清封建殘餘的，他是非常有利於使民族資本主義更快而無阻礙的向前發展的，中國無產階級也很有利於推倒帝國主義地主買辦軍閥豪紳的反動統治以保障發展工人運動之德謨克拉西的條件。無產階級有他自己偉大的歷史任務，他當然更要起來推動歷史的

車輪前進，因此中國大革命雖然是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性質，但是大革命中的主要動力却是無產階級（自然同時還有廣大的農民羣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革命性是非常有限的，他固然也受着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的損失和封建勢力的束縛，但是他并不能向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反抗而取償，反而更加加重剝削中國工人以求取償，如果要找一個簡單的事實來證明。那末，五卅時上海帝國主義工部局停止供給華商紗廠的電力，中國資本家立刻便向帝國主義磕頭求饒，立刻露出他那殘酷的面孔，幫助帝國主義進攻上海總工會，強迫停止對英對日的罷工，便是一個最好的例子。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雖然受着外國資本的壓迫，需要關稅自主，所以他當初頗想利用工農羣衆力量去嚇嚇帝國主義，牠想藉此和帝國主義磋商得些讓步。帝國主義呢，表面的口頭的讓步是不妨做做的，但是他同時即以更大的威力壓迫中國革命，威迫中國資產階級替他鎮壓工農。工農羣衆革命力量的發展，也正在根本掃蕩着中國封建式的剝削，動搖着帝國主義的壓迫，於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打算着：他如果鎮壓了工農革命，一則可以自救，二則還可以在帝國主義之前邀賞，幻想着帝國主義爲他們的「剝共」功高，『多少總可

以實行一些讓步吧？」因此，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在革命的初期雖然是贊助并且參加過革命，但是革命鬥爭一經劇烈起來，中國革命中階級分化的過程也就像迅雷閃電似的開展起來，五卅運動一開始，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也就實行他對帝國主義的妥協政策及出賣無產階級的策略，就發現戴季陶主義與蔣介石的三月二十日政變。然而無產階級却有他自己特殊的立場，『無產階級是現代社會的最下層，如果不消滅那壓迫在他上面的築物和通常所稱爲社會的上等人，便決不能站立起來，伸直自己的身體』（共產黨宣言）。中國無產階級在過去大革命中雖然因爲受着當時共產黨機會主義的錯誤領導，沒有完全『伸直自己的身體』，却也已經自動的站起來，一邊堅決反對帝國主義與封建殘餘，同時即與中國資本家作殘酷的鬥爭，使得一般資產階級及機會主義者高呼『工農運動過火』。而且，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不是獨立發展起來的，他雖然與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與封建勢力的束縛有很大的矛盾，但是一則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是被帝國主義所開拓出來的，二則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大半由豪紳地主買辦階級蛻化而來，他們與帝國主義及封建勢力都有很密切的聯系，革命更加深入的時候，中國民族資產



階級即更進一步成爲帝國主義壓迫所依據的支柱，所以無產階級反對民族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正可以掘斷帝國主義壓迫所依據的支柱。中國無產階級因爲客觀狀況的關係，是力爭中國的民族解放最堅決最徹底最革命的階級，所以中國大革命雖然是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性質，但是革命的主力軍却是中國無產階級，沒有無產階級的參加和領導，中國革命是不能如此蓬勃發展的。

##### 五 各種社會基礎的總結

根據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生長發展，與帝國主義及封建勢力之間有極大的矛盾；農民與封建地主之間更發生根本的衝突，就在這些矛盾衝突之上建築了中國大革命的經濟基礎，革命的任務就是要消滅這些經濟發展的衝突，是要推倒帝國主義的統治，肅清封建勢力，徹底解決土地問題。無產階級基于他自己所受帝國主義封建勢力的壓榨和束縛以及爲爭取他自己歷史的偉大的前途——建設社會主義的前途，都是非常有利於推倒帝國主義統治和肅清封建勢力的。這樣便造成了中國無產階級勇猛革命的特徵，『中國之所以發生紛亂(革命)，特別因爲那裡創設了

工廠的工業」這決不是過分的估量。而且因為中國無產階級發展的特殊條件，中國無產階級反民族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還有一種斬斷帝國主義壓迫所依據的支柱的作用，所以中國國民革命與階級鬥爭不但不是對立而且還是相成的，機會主義的錯誤，正在他不能了解這種中國革命的基本原則。實際上中國革命只有在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與內部階級鬥爭緊密結合的基礎上發展擴大，只有中國無產階級力爭並取得革命領導權，才能實現中國革命的基本任務，因為只有無產階級是唯一的能夠革命到底的階級，只有無產階級能夠聯合一切勞動者和被剝削者，起來作革命的鬥爭。但是構成中國大革命之客觀的經濟的內容和在一定階段上所要直接與可能完成的任務，如推翻帝國主義，統一中國，實行土地革命，肅清封建殘餘等，並還沒有超過資本主義存在的範圍，反之，在客觀上他正是爭得資本主義自由發展的條件，因此，中國大革命乃是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

## 第三章 中國大革命的預演

### 第一節 戊戌變法與義和團暴動

外國帝國主義的侵略孕育了中國大革命的胚胎，革命的大爆發雖在五卅事變的時候，但是他的起源却遠在中日戰爭以後，當時所謂『士大夫』（官僚與知識階級）受戰敗之刺激，由反對李鴻章議和誤國運動一變而為維新自強運動，這個運動的中心人物，就是翁同和文廷武張謇康有為梁啟超等。當時政治思想分為兩派：一是文人派，首領是在北京的大學士翁同和；一是實力派，首領是在天津的北洋大臣李鴻章。隸屬翁派的是些「下名士」，是崇拜舊的中國文物制度的；隸屬李派的是些辦鐵道輪船電報海軍等洋務人才，是主張採用西洋軍事交通制度的。在當時前一派屬於守舊，後一派屬於維新，兩派在思想上在政權上，中日戰爭前即有不少的暗潮。戰後維新自強運動起，兩派思想互變，李派屬於守舊，翁派屬於維新，而暗鬥愈烈，卒以翁派得清帝之助及時論同情，李遂失政權而入居北京。自康有為入北京上書變法救亡并設保國會，而

翁派勢力大張，翁康互相利用，結託清帝，遂造成戊戌變法的局面。當時所謂變法維新實際是由外國帝國主義侵畧而起，翁同和康有爲這些人可以說是當時封建官僚當中最比較進步的分子，所以他們能夠看到改革的需要，他們比前此老維新派李鴻章等採用西洋的軍事交通制度，更進一步主張採用西洋的行政教育制度，因此李鴻章等退爲當時之守舊派。當時這種變法維新運動，在政治上及社會思想上都發生了相當變化——雖然當時這種思想上的變化並沒有能夠跳出孔教範圍，康有爲梁啓超等主張變法維新的人都還死死背着孔子招牌，但却傳佈了一些維新改革的種子。這種變法維新運動爲什麼會失敗的呢？這是因爲當時這種維新變法運動還沒有社會羣衆基礎，而且翁康等人都是封建官僚，他們不過比袁世凱慈禧太后進步一點，只能主張變法維新稍稍改良一下，並不主張革命——因爲革命是要與他們本身利益衝突的，因此他們只能包圍光緒，採用宮廷政變的方式，並不敢建築在人民羣衆基礎上來真正推行改革，結果自然只有一敗塗地。

戊戌政變後，滿清政府更加反動，同時外國帝國主義之政治的經濟的侵略亦更厲

害起來，自一八四二年至一九〇〇年即義和團起事之前夜，帝國主義強迫中國所開的商埠已達五十一處之多。自一八六四年至一八九九年，帝國主義商品輸入由五千一百萬兩增到二百六千四百萬餘兩，由出超二百萬餘兩倒轉來至入超六千九百萬餘兩，於是中國現銀幾全為帝國主義所括去，以致中國的金融完全破產。在工業方面，當時帝國主義者亦已開始在中國設辦，比如僅紡織一業，英國有怡和（設立於一八九五年）老公茂，（設立年同上），德國有瑞寶（即後來英之東方，一八九五年設立），日本有上海紡織有限公司第一廠（一八九六年設立）第二廠和第三廠（均設立於一八九五年）。這些紡織工廠當時規模雖不甚宏大，然比起中國當時民族工業（如恆豐，三新等）始終是佔優勢。在礦業方面，帝國主義的勢力也是非常大的，許多重要礦山採辦權都歸他們掌握。在財政經濟方面，那時帝國主義者完全是獨霸形式，因為那時中國的舊錢號已漸破產，新式銀行尙未有一家成立，而帝國主義銀行則已有麥加利（一八五三年設立）匯豐（一八六五年設立）有利（一八七五年創辦）東方匯理（一八七五年設立）荷蘭（一八四二年設立）橫濱正金（一八八〇年設立）與台灣（一八九五年設立），等對於國外的一切

通商匯兌，固然完全由這些銀行包辦，即國內一切金融，尤其是商埠所在地，亦幾完全受他們的操縱。他們還在中國發行鈔票，又對滿清政府實行政治借款，從中取得重利，我們只看從一八九四至一八九八年四年之間，外國帝國主義者直接對滿清政府借款就有下列數目：

借款類別	起債期	債額	年利
匯豐銀借款	一八九四年	一·六三五·〇〇〇鎊	七分
匯豐金借款	一八九五年	三·〇〇〇·〇〇〇鎊	六分
麥加利借款	一八九五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鎊	六分
瑞記借款	一八九五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鎊	六分
俄法借款	一八九五年	一五·八二〇·〇〇〇鎊	四分
英德第一借款	一八九六年	一六·〇〇〇·〇〇〇鎊	五分
英德第二借款	一八九八年	一六·〇〇〇·〇〇〇鎊	四分五厘

以上借款合計起來，為四千九百四十五萬五千鎊，以每鎊值華幣十元計，則為四

萬九千四百五十五萬元，利息又從四分到七分，超過尋常利息二三倍，這種巨大借款與前面所說貿易入超及當時大批賠款，直接間接都要歸中國農民手工業小商人負擔，其中極大部分特別要落在農民身上。所以全國尤其是北方窮苦的農民及手工業者之生活困難與失業增加和帝國主義經濟侵略成正比發展。加以帝國主義又在中國取得許多政治特權，帝國主義更用領事裁判權等各種不平等條約加緊壓迫蹂躪中國，帝國主義當時對中國文化侵略更是可怕，傳教已成爲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之重要武器，我們只要看一看德國帝國主義者利用傳教侵略中國的一點事實就可明白：

『先是俾斯麥在一八七三年至一八七五年之間，對於加特力教徒盡剝奪其政治上之權力，凡不服從政府命令者，皆嚴重處分之，因此當時教徒多逃往他國。後來有加特力教安察爾和富治南特美士於一八七九年至山東傳教，不久安察爾竟在山東南部取得牧師長，甚有勢力。適其時值德國探險家維斯曼烏爾夫之徒，稱揚傳教事業，於取得殖民地大有作用，俾麥斯聞之，於是即回復加特力教徒之權力，適安察爾歸柏林，他又接見安察爾，厚加禮貌，與之約束，并說德國今後對

於傳教事業，當加以熱心保護。結果因安察爾，德國竟取得青島膠州灣以及山東一切特權。」（見清朝全史第四冊）

其實不獨德國爲然，其他英法意等國帝國主義者無一不如此，我們現在另外引一個描寫法帝國主義利用天主教侵略中國的記載來看看：

『犧牲者的血是法國在中國侵略的種子（當時在中國的天主教，完全在法國帝國主義者羽翼之下，故單言法國。）法國用教會和本地的教徒作挑撥的代理人，遭禍和犧牲是其政治上的收穫。英國商業的優勢之對於英國，猶之天主教徒的保護權對於法國一樣，因此他們地位的影響，對於中國人差不多相等。但是法國從宗教的材料較英國從商業的材料所得利益更多十倍。在法國政府羽翼之下，天主教已經成爲無上的威權。不顧本地的法律和習慣宰制異教鄰舍。超越所在國的法律。無論何時，教徒與非教徒有爭論，不管爭論的是非如何，牧師就立刻爲之祖護。牧師如果不能恐嚇地方官，強迫給權利與教徒時，他即自己作當事人，控告於法國領事。如此無法無天，是非的真意完全顛倒了。在列強方面，這樣的干預自必



跟着而來，天主教徒由此亦更加橫蠻而腐敗。當法國教會官廳可以壓迫人民時，本地的教徒亦更變本加厲的恐嚇」（見英國牧師 Hewitt 所著『China in Convulsion』一書中所引 A. R. Colquhoun 所著『Overland to China』一書中批評天主教的一段）。

義和團事變之前，各帝國主義利用傳教以剝奪中國之事特別盛行，當時自西江揚子江流域以至山東直隸東三省各地差不多無日不發生教案，同時，滿清政府又正厲行反動政策，拚命媚外圖結外人之歡心，以和緩其責難，保護外人及教堂之嚴令紛如雪片的頒布到各縣各鎮鄉，因此遂逼成義和團事件。

義和團事件一方面是滿清政府黑暗反動趨於極端之結果，另一方面便是基於外國帝國主義勢力侵入中國，引起中國的生活情形破壞中廣大農民羣衆的憤懣而來。這種憤懣就是帝國主義的偵探——牧師 Hswith 自己也覺得沒有方法可以掩飾，他在對義和團暴動所著『China in Convulsion』一書中說：

「許多「文明」人逐漸地進攻中國內地，中國的無數受禍者自己不明白受災害

的原因，好像日本農民被地震所造成的海水或海岸沉落所起的潮水之淹沒一樣。可是有許多人很知道在外國商業未進來擾亂舊秩序以前，在普通的年歲裏是够吃够穿的。現在各方面都缺乏，覺得前途一天一天地可怕，像這樣的經驗，在活動的方面，能怪中國人對新秩序（帝國主義侵略）感覺很深的滿意麼？」

「火柴從外來，洋油及洋油所帶來的各種洋燈，代替了中國工業大部分，對社會有極大的影響，此處不能詳說。人們讀了輪船公司的報告，棉紗貨商業在中國怎樣興盛，此種商業從廣東到牛莊，將來極可樂觀。……但是沒有一人能讀到此種商業的發展，實大影響於中國生產棉花地面上之無數萬人民。這些人民以前靠着紡織十五寸寬的布來謀極低度的生活，一尺布須費兩天勞力，在市場上把布賣去，買進能够一家最低度的生活需要品，餘則再買些棉花來繼續紡織。但是現在呢？外國棉紗貨有很好的「樂觀」，可是土貨則完全失掉了他的市場，從那時到現在都是如此。……費力的紡紗工作沒有利益了，又沒有別的生產來代替他。」

1945.1.14.5.1 這樣描寫帝國主義勢力侵入之後使中國廣大農民手工業羣衆窮困悲慘的情

形自然還是掛一漏萬的，實際的情形必然比他所描寫的還要可怕幾十百倍，特別是北方數省廣大農民及已失地失業的游民羣衆，他們眼看着帝國主義者在中國橫行霸道，教堂教徒氣焰薰天，英法聯軍入京火燒圓明園，中日戰爭割地賠款，洋貨充斥物價飛漲，政府因仿辦洋槍洋炮等而增加租稅，覺得自己的生活一天艱難一天，失業的一天天多起來，災荒一天天厲害起來（義和團事變之前，北方數省有很嚴重的旱災）而政府却無一點方法補救，所有這些情形，便是造成他們極深刻的憤懣的來源，便是造成義和團暴動的社會基礎。因為他們的憤懣過於深刻，而且又是農民之原始暴動，所以事變情勢非常嚴重，據說當山東直隸各處農民投入義和團及天津直隸鄰近的義和團進北京之時，簡直瘋狂的一樣，人數非常廣大，據當時帝國主義列強派來鎮壓暴動之聯軍統帥瓦德西在他『拳亂筆記』中說：『在山東直隸兩省之內，至少當有十萬人數，加入此項運動。』（見『瓦德西拳亂筆記』中譯本P.141）。

現在我們來分析一下義和團的起源及其結合的成分。義和團的祖先是白蓮教，創造白蓮教的韓林兒是一個仇視北胡（元韃子）的民族主義者，所以白蓮教的根源就是反

抗外族壓迫的民族結合，他們假教爲名，不過希冀藉以逃避當時之法網而已。自朱元璋恢復漢族統治，於是白蓮教之目的已達，因而自然消滅，所以白蓮教在明代三百年中，寂然無聞。自滿族入主中夏，漢族統治權又落於外人之手，於是明朝遺老與當時一般不甘屈伏於滿族統治下之志士，羣起結合，復借白蓮教之名，以圖實行恢復漢族統治權之實。在乾隆末年和嘉慶十八年，兩次大舉，皆以恢復明祚爲口號，因力量不及均爲滿清政府所撲滅。從此白蓮教更被嚴禁，其教遂分爲『天理教』與『八卦教』二派，義和團實爲八卦教之一分派，由此我們可以知道義和團的來源，在他歷史上就帶有反抗外族壓迫之特性。

但是義和團爲什麼拋棄他那『反清復明』的本來目的，一變而爲『扶清滅洋』的運動呢？爲什麼本來反對滿清的義和團反而與滿清政府結合起來呢？這是因爲中國到了義和團運動時代，已經變了一個局面，最高統治者已經不是滿清政府，而是國際帝國主義。義和團看見那時剝削中國壓迫中國民衆的主要敵人還不是滿族，而是國際帝國主義。當時，農民羣衆最迫切的要求是反抗那帶痛苦給他們的『洋人』。所以義和團的組

成分子雖然和過去白蓮教差不多，最大多數是農民羣衆，其次是手工業者，失業游民和少數知識分子，但是義和團組成分子的性質已經和白蓮教時代不同，這些義和團的羣衆已經深深體驗到洋鬼子（帝國主義者）的剝削滋味，在他們眼中心中，只有『可恨的洋鬼子』『該殺的洋鬼子』所以只要有人說『殺洋鬼子』『我們可以有方法殺洋鬼子』『我們可以堵住洋鬼子的槍不能開放』。他們聽了，直狂跳起來，什麼都不管了，只一心一意『殺洋人去』！那里還管得什麼反清復明和受人利用呢？這就是義和團變反清復明運動爲扶清滅洋運動的根本原因。

同時因爲那時的中國，已經開始成爲資本帝國主義宰割之下的半殖民地，帝國主義列強對華侵畧一天天變本加厲，滿清政府已經沒有方法可以抵抗牠們，中日戰爭失敗以後，滿清政府一切對外國帝國主義都節節讓步屈伏了，可是外國帝國主義仍對他們要挾備至，滿清政府固然害怕義和團，但是也恨外國人，而且他們覺得如果能够利用他們去反對洋人，便可轉移他們那反清復明的意志，政府中雖然有很多人（如直隸總督榮祿等）反對這種『危險的政策』，但是端莊毓賢剛毅慈禧竟利用了義和團，

義和團得到滿清政府的同情與援助，聲勢更加大起來，以後居然進京圍攻公使館，打死了德國公使克林德與日本使館書記杉山彬，

這樣嚴重的事變，使帝國主義列強更有所藉口以進攻中國，並且組織了八國聯軍，調動大兵到北京天津來剿滅他們認為『破壞文明』的所謂『拳匪』，佔領中國的都城，施行絕無人道的殘殺，實行明顯的共同劫掠，李鴻章榮祿袁世凱等封建官僚軍閥更在帝國主義指揮之下鎮壓義和團，於是中國農民羣衆這次反帝國主義的原始暴動便很殘酷的被鎮壓下去。當時帝國主義雖然聯合進兵中國，但是列強之間因為爭奪權利的關係仍不免發生衝突，而且拳匪已經被他們撲滅，所以就在一九〇一年訂立『辛丑條約』，從此，北方的國防，如大沽砲台等完全撤廢，京城附近，自北京至天津，沿路駐紮帝國主義的駐防軍，北京使館界變成了外國領土，東交民巷變成了中國太上政府的堡壘。英國取得海關監督權，中國賠款四萬五千萬兩，即所謂庚子賠款。

悲壯熱烈的義和團暴動，結果是被葬送於血海中了！這一次事件，決不是什麼少數無知拳匪的暴動，而是舊中國衰敗的結果，是以後中國革命的先兆，雖然他們被滿

清政府利用了，可是他還是表示舊中國崩壞的一個伏流的波浪。後來一般中國社會，附和帝國主義『二毛子』『三毛子』的反宣傳，把義和團事件看成是『野蠻的排外』，自然是很大的錯誤。其實真正『野蠻』的倒不是義和團，而是帝國主義者自己。世界革命的偉大導師——列甯，當一九〇〇年義和團事件發生時，曾在『火星報』第一期上發表了一篇『中國之戰爭』，充分暴露了沙皇及其他帝國主義的陰謀。他說：

『我們試想中國人爲什麼反抗歐洲人？英人法人俄人日人要肅清中國的叛亂究竟從何產生？主戰者（帝國主義者）倡言黃種仇恨白種，中國人嫉視歐洲文化。誠然不錯，中國人是嫉惡歐洲人，可是究竟爲什麼要嫉惡歐洲人，中國人所嫉惡的又是那一種歐洲人呢？中國人並不仇恨歐洲人民，他們彼此之間並沒有什麼衝突，中國人所仇恨的乃是歐洲的資本家和代表歐洲資本家的政府，他們矜誇西方的『文明』，到中國肆意誑騙和竊盜虐待，此等貪慾無厭的歐洲人在中國，豈有不使中國人嫉惡的嗎？他們對中國開戰乃爲掠奪權利，爲要自由販賣鴉片權藉以昏迷中國人民，利用基督教的假面具藉以達到盜竊政策之實，這樣豈有不使中國

人嫉惡的嗎?!此種盜竊政策在歐洲資產階級政府固早已實行於中國，而今又有俄皇專制政府參加其中。……他們不過沒有公開瓜分，而像暗中的偷兒一樣，他們搶掠中國好像偷兒竊屍體，但是如果這個假屍起來抗拒的時候，則就立刻如對待野獸般的攻擊，把樹林也燒了，屠殺沒有武裝的人民，同時却大聲疾呼去制服野蠻的中國人。」

列甯的論斷完全符合事實，當時各國帝國主義派來勦滅拳亂的八國聯軍，簡直在北京天津大肆搶掠，這種搶掠的情形，就是聯軍統帥瓦德西自己也不否認，他在他的『拳亂筆記』中會有如下的記載：

『從大沽至天津之間，以及天津重要部分，已成一種不可描寫之荒蕪破碎，據我在津沽路上所見，所有沿途村舍，皆成頽垣廢址，——塘沽係五萬居民之地方，已無華人足跡，從此地到北京之一段，我的參謀長Schwarzhoff少將，曾兩次經過其地，據他報告，凡軍隊行經之地，但見其一片淒涼荒廢而已。即北京自身，亦因燒搶之劫而大受破壞，失所流離之民，據估計約有三十萬人，但實際上似



或多於此數，散居於該段旁邊，大半均在露天之下，在現刻天氣良好之際（瓦德西寫這個報告的時候是九月二十九日），或者可苟延幾時，至於飢荒疫病之必先後繼至，實已毫無疑義。我相信此種無居無食之災民，必將使附近居戶，咸陷恐慌搶掠之不安狀態，或者此項災民竟自投身拳黨，我因此之故，遂以爲如此行軍則只能多多製造拳黨，且其製造之數，當遠較戰時勦殺之數爲多也！」（見『瓦德西拳亂筆記』P.28—29）。

帝國主義強盜自己『製造拳黨』，同時又當他匪徒剿殺，這就是帝國主義者口中的『文明』，同時也就是義和團事件的真相。有人說，假使這匪徒不這樣胡鬧，八國聯軍也不會來，辛丑條約也不會訂了。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義和團是少數無知愚民做的事，外國人不應該將這種責任和罪名歸到全中國人身上，使全國人負擔這樣鉅大的賠款。這種意見完全是受了帝國主義宣傳而且是不顧事實的謬論，——他們簡直連帝國主義劊子手瓦德西都不如，因爲連瓦德西都不敢否認『拳亂』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結果。帝國主義的侵略，外貨的輸入，原料的吸收，使中國舊時的經濟急劇破壞

，連帶着政治組織及一切社會生活也都起急劇的變化，使手工業及農民經濟急劇的破產，結果失業游民一天一天的多起來。這些失業破產的農民羣衆，迫於生活上經濟上的困苦，自然要挺而走險，起來反抗外國帝國主義。實際上不但是庚子之役，就是那一時期種種平英團（廣東）等類的組織，歷次的所謂教案，無一不是這種反抗運動的表現。所以義和團事件，實際上就是當時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他們這種反抗帝國主義的精神是非常之可敬的。自然義和團運動本身包含着很多的錯誤和缺點；他們沒有別的進步階級做領導，於是就不可避免的被封建社會的迷信神權所支配。他們拒絕一切『洋貨』，拒絕并且反對一切科學文化，他們主張『國粹』，相信五行符咒，他們迷信拳術符咒可以抵抗鎗砲，他們盲目服從所謂『大師兄』『二師兄』，他們被狹義的民族主義及國家主義思想所蒙蔽，結果竟被封建貴族所利用。然而無論如何，義和團運動究竟是一種『羣衆的運動』，『凡屬羣衆的運動，起初必然是混沌的，因為它總搖擺於許多矛盾之間，羣衆思想往往是缺乏明顯性和凝結性的』（恩格斯）。義和團運動實在是一種原始的農民暴動，而且是失業羣衆的暴動，在義和團運動中，還沒有

一個先進的有組織有力量的階級做領導，因此不能不歸於失敗。義和團這一原始的農民暴動，雖然有他本身的弱點，雖然他被滿清政府所利用，打着『扶清滅洋』的尊皇口號，不免有保護舊制度的反動意味，雖然被國際帝國主義和袁世凱等軍閥血葬了，可是仍不失為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史上悲壯的序幕。

## 第二節 一九一一年的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

自義和團事件至辛亥革命十二年中，外國帝國主義的侵畧一天厲害一天，滿清政府的昏庸暴虐和其貪官污吏的暴斂橫征也日甚一日。不但廣大農民和手工業者更加破產，成爲參加辛亥革命中堅力量之一新軍會匪的來源，而且一般華僑及國內新興資產階級亦因此而要求改革，所以辛亥革命之前，立憲與革命之辯論，紛起於僑居日本及上海知識分子之中；同時，內地士著資產階級及知識分子『收回利權』運動亦轟然特起，最著者，有對俄之東三省『主權收回運動』，對美之粵漢鐵路收回運動，對英之山西河南煤礦收回運動，安徽銅官山礦廢約運動，滬杭甬鐵路之拒絕借款運動，蘇直

津魯鐵路廢約運動，對法之滇礦收回運動，拒絕滬紹航權運動，對比之收回京漢鐵路管理權運動，吉林河南四川都組織了保路會，成了比較廣大的羣衆運動。後來有一個曾經參加過當時四川保路運動的文學家追寫那時羣衆運動實際情況的一幕很足動人：

「保路同志會在當時有兩個口號，一個是「庶政公諸輿論」，一個是「鐵路準歸商辦」。這聽說是從光緒皇帝的一道上諭上摘下來的。……由保路同志會發出來的命令，是四川人在爭路期中一律都要供光緒皇上的牌位。理由不消說是戊戌政變的一個插話，表示這位滿州人是一位英明天子，而同時川漢鐵路準歸商辦又是在他在位的時候實現的。這個策畧在當時的指導者中可以說是傑作。保路同志會有的的是錢，因為有鈔路公司做背境。宣傳的文件因而也層出不窮，如像小冊子，如像日報，都絡續發行，還發行了無數的光緒皇帝的牌位。那牌位是用長條的黃紙印的，正中寫着「大清德宗景皇帝之神位」，左右兩邊寫着「庶政公諸輿論」，鐵路準歸商辦」的兩個口號。這在現在想起來，覺得好像有點滑稽，然而他在當時的效力的確在後來的傳單標語之上。每家每家的人都把這種黃紙條貼在自己的

門口，一早一晚都焚香點燭的禮拜。……這使運動帶着了一種宗教的色彩，利用着封建時代的迷信，無形之間把羣衆在一個目標之下統一了起來，團集了起來。……鐵路的股東是由各縣派來的代表，在成都所擬定的宣傳方針，在成都所擬定的運動步驟，便照樣的傳到各鄉各縣，於是俄頃之間而運動便普遍於全省。……趙爾豐早是有準備的了。他在總督署的門口及附近的要隘處已經派兵把守着的了，手無寸鐵的市民剛好走到督署的東轅門，門口的衛兵便一排槍打過來，可憐爲頭的便打死了好幾個。附近要隘處把守着的衛兵聽見督署的衛兵在開槍，他們也就開起槍來，打那如潮水一樣崩潰下來的羣衆。這樣，羣衆便陷在槍彈的重圍中了，大家只好向兩街兩側的舖面裡逃避。槍聲只開了幾次便停止了。街上一街都是光緒的牌位，一街都是線香，一街都是踏脫了的鞋子。打死了的人，打傷了的人，究竟有多少，當時沒有人作過詳細的調查，我現在連大概的數目都忘記了。我所能記憶的，只是那死者裡面有十二三歲的小兒，也有五六十歲的老媽，街上的聖位台也同時由軍警折毀了。這樣一來，簡直是趙爾豐造反，成都全市從那天

起便開始罷市。對於成都附近的縣份，消息是很容易轉達的，各地的同志會便都暴動化了。對於遠方的縣份，當時的宣傳方法是利用的「水電報」。「水電報」這個名詞乃至這個方法是四川人特造出來的。方法是在一個木板上寫着成都的消息，叫各地的同志會起義，速來救援，上面塗以桐油，就把這種信板投在川河中，四川的河差不多是四通八達的，它便被傳達到各處下遊的地方去了。這個方法最初是學生會發明的，一應用起來便一個傳十，十個傳百了；一處的人接到了一通水電報，同時又仿造出無數的信板流下河去。在這時儘管當局者在怎樣的戒嚴，要檢查郵電，檢查出版物，然這遍地遍河的「水電報」，它怎麼也沒有方法來扣留了。暴動的中心是在新津，這兒是首先發難的地方。這兒的同志會把城池攻陷了，殺了縣官，佔領了縣城，各地的武裝勢力便都絡繹的投到這兒來。趙爾豐先派鳳凰山的新軍去攻打，但是派去的新軍不惟無戰意，而且有的竟倒向了民軍。舊式的營防軍更毫無戰鬥的能力。新津一縣既不能彈壓下來，各縣的同志軍又聞風興起，趙爾豐弄到無兵可派，無兵可戰的地步，他不能不屢電滿清的朝廷請援，甚

至於請撤回鐵路國有的命令以緩和民意了。四川一局部的亂機已經使中國的全局騷動。各省的諮議局都起來力爭，有的省份（像是浙江）更請朝廷速斬趙爾豐以謝天下。

除了這種收回礦權與鐵路商辦運動以外，各處鄉民反抗官吏苛斂運動，在庚戌年亦幾遍全國，無慮數千百次，參加每一次運動的鄉民人數從一千到十餘萬不等，如廣西歸順數縣數百餘村鄉民反對抽捐運動，河南葉縣萬人反對加稅運動，三月間湖南長沙饑民暴動，五月間山東萊陽海陽兩縣人民反對苛稅亦起暴動等。這些運動顯然都是對於外國帝國主義者經濟侵略與滿清政府高壓反動之反抗。

本來，鐵路國有政策的本身原是一種進步的政策，然而在當時資產階級反對鐵路國有，要求鐵路商辦的運動却是很有意義的，因為當時所謂鐵路國有國辦，實際上就是帝國主義所有所辦，第一，外國資本家對鐵路投資可以獲得巨大的利潤，這些利潤的主要來路就是中國政府實收借款數恆較名義借款額為少——通常如借一萬元，實收僅有九千元，利息不按九千元計算，却按一萬元計算；並且每年利息還有担保。同時

建築鐵路的外國資本團又可取得代購建築鐵路一切材料權，這樣一來，則借款的外國銀行，不僅獲得利益，並且又在代購材料中賺錢不少。我們知道銀行與外國工廠訂購材料時，在名義上雖然材料的價格須取得中國監督官之同意，但是照例外國銀行家只要稍為賄賂一下中國官吏，於是材料價格便可大大超過實價以上了。第二，鐵路實際上其落在外人手裏，雖然中國政府經常委任督辦職員，但實際管理權都屬於外國工程師，而不在中國職員手裏，而且實際上一般的重要職員如會計及管理工程師等全屬於外人，甚至技術上人員亦多數屬於外人。最後，更特別的就是假若中國政府付不出利息時，鐵路就歸外人所有了。當時滿州政府郵傳部盛宣懷所找的財東便是英美法日四國銀行團，他所要收回國有的主要對象便是商辦的川漢粵漢鐵路，當時中國資產階級力爭鐵道商辦，實際上是一種反對帝國主義的運動。

辛亥革命的主要基礎原是外國帝國主義的侵畧，但是因為中國資產階級在辛亥革命的開始，就表現出他的妥協性與不徹底性，並沒有提出資產階級的鮮明革命的政綱，並且根本沒有認清革命的主要對象，所以當時革命的口號只有簡單的『排滿』，不



但不敢反抗那站在滿清政府背後的帝國主義，反而滿口尊重外人在華條約權利，力避排外的惡名，革命軍行所至，皆以冒犯外人爲大戒，這裏我們可以把中華民國武昌軍政府於辛亥起義（武昌辛亥起義在八月十九日）後數日對外發布的一通照會一字不動的附錄於此，以資證明：

『爲照會事：軍政府自廣東團體潰散後，乃轉西向，遂得志四川；昔者各國未認我爲與國者，以惟有人民主權而無土地耳；今既得四川屬之土地，國家之三要素備矣。軍政府復祖國之情切，憤滿奴之無狀；復命本都督起兵武昌，共圖討滿，以期維持世界之和平，增進人類之幸福；同時對於友邦各國，益敦睦誼，所有軍政府對外之行動，特行知照，免致誤會：一、所有清政府與各國締結之條約，皆繼續有效。一、各國人民財產，居留於軍政府佔領地域內者，一律承認保護。一、各國之既得權利，亦一律承認保護。一、賠款外債照舊由各省按期如數攤還。一、各國如有暗助清政府戰事用之物品者，搜獲一概沒收。一、各國與清政府所結之種種條約，成立於此次照會後者，軍政府概不承認。一、各國如有助清政

府與軍政府爲敵者，則仇視之。——以上七條，特行知照。俾知師以義動，無排外之性質參雜其間也。相應照會貴領事，轉呈貴國政府查照，須至照會者。黃帝四六〇九年八月廿四日。』

因此一九一一年武昌起義，清帝退位，而政權依舊移入另一個反革命勢力——封建軍閥袁世凱手裏，不但在同盟會領導之下的辛亥革命不反對外國帝國主義而反示好於帝國主義，而且當時革命首領孫中山亦完全與袁世凱妥協，所以辛亥革命之後，除了幾條辮子和掛上一塊民國空招牌，別無所謂成功。因爲辛亥革命雖然『造成』了一個有名無實的中華共和國，雖然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仍不失爲英勇的先烈，但是一則『所有清政府與各國締結之條約，皆繼續有效』，外國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剝削中國的狀態完全沒有變更；二則根本沒有影響到人民的大部分，首先沒有影響到廣大農民羣衆的生活。推翻帝國主義與打倒封建勢力乃是辛亥革命的客觀任務，可是辛亥革命沒有完成這一任務。直到中國一九二五至二七年大革命失敗，也都還沒有完成這一任務，所以中國革命的性質，仍然是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

### 第三節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

單獨排滿的辛亥革命，失了中國國民革命的真面目。國民革命的對象——帝國主義與國內軍閥因而虐餓愈熾！在此虐餓之下忍受了八年（自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九年）的中國青年，受了歐戰後世界革命潮流的激盪，遂發生『五四運動』。五四運動重要的事實是：北京學生團三千餘人，反對巴黎和約簽字，民國八年五月四日，舉行羣衆示威運動，火燒曹汝霖宅，痛毆章宗祥；同月十九日北京各學校學生宣告罷課：首言外交緊急，次言國賊未除，末言日本逮捕中國學生，政府毫無辦法，故罷課表示反抗；六月三日，北京學生講演團被捕者千餘人，上海學生罷課商人罷市工人罷工，要求罷免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三人，並釋放被捕學生，同時南京杭州武漢天津九江山東安徽廈門廣州的學生及搬運苦工，先後繼起 一致聲討賣國賊及排斥日貨；至七日北京被捕學生釋放，十日北京政府下令罷免曹章陸，上海始開市復工上課。

五四運動的政治意義是很大的。辛亥革命之後，中國社會裏的革命潮流，因袁世

凱的反動而低落下去。二次革命失敗之後，幾乎一般社會都認革命是作亂，民黨是亂黨。而民黨自己呢，則右派宋教仁黃興等在二次革命前力主妥協緩進，使袁世凱得以借帝國主義之資助鞏固反動勢力；在二次革命後，就已有許多民黨投降軍閥，受其收買；再則，這些右派於宋案發生之後還迷戀於所謂法律手續，和平解決，同時各地紳商階級爲保存自己的優越地位起見，竭力去結託革命後初興的軍事勢力以鎮壓所謂「土匪」——貧民的暴動，造成新的軍閥，并且鞏固軍閥的地方政權。這樣，所謂革命黨便不啻與廣大民衆脫離關係，袁世凱等軍閥和士紳階級自然容易拿着和平秩序的假面具欺騙一般動搖不定的小資產階級，結果，反動勢力便完全戰勝了革命黨。

直到五四運動那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終了，中國資產階級的發展已經要求自己的前途，所謂提倡國貨；俄國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無產階級革命勝利，遠遠的可以聽得到西歐無產階級與東方被壓迫民族聯合革命以反抗列強的呼聲，所以五四運動的爆發，在世界史上實在是分割中國之政治經濟思想等爲前後兩時期的運動。當時的運動：第一，是積極的羣衆的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運動，在這運動裏，我們切不可

只看見學生，學生不過是運動的先鋒，當時上海天津等處的商人都以實力參加，這的確是辛亥革命之後；中國社會裏各階級努力以行動干預政治，而且帶着羣衆運動的第一次。第二，五四運動時所發生的種種羣衆的組織，如檢查日貨，抵制日貨等行動機關，往往真能直接以革命手段行使平民的政權，上海罷市的幾天內，革命的學生商人竟直接行使警權，尤其是工人的罷工，也居然能以舊有行會的工人組織自行指揮。第三，這種民族革命的潮流，居然開始衝動中國工人階級的覺悟，從此發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運動以及工會的組織。這種情形，顯而易見是辛亥革命以後第二次的民族革命。辛亥革命前後，直到五四運動，中國的革命運動往往只是軍事的反對北洋軍閥的運動，或者是限於士紳階級的排外的愛國運動，沒有羣衆的反抗，直接要求廢除對外條約，收回外國攘奪的領土的。五四運動，一方面反對賣國親日的官僚和軍閥——安福系曹章陸等，以革命的羣衆的直接行動襲擊這些反動派，別方面很明顯的提出廢除二十一條，收回青島等要求。於是便把辛亥革命以來反動派與革命派爭相『保護外人尊重生命財產條約權利』而求帝國主義者之援助的局面更變了。換過說，便是把義和

團運動失敗後『尊洋主義』的天經地義打破了。這是五四運動在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史上最值得注意的一點。

固然，五四運動的時候，中國社會還正受着美國威爾遜的欺罔，忽畧了國際帝國主義者對華侵略的全部形態，甚至誤信美國帝國主義者能夠幫助中國爭什麼人道正義。所以『五四』興起的民族革命運動，發生專門排日的錯誤。可是五四運動乃是在歐戰後世界革命的怒潮中和中國城市工業開始發展中發生的，因此，五四運動雖然未能達到理想的成功，而在此運動中最努力的革命青年，遂接受世界的革命思潮，由空想而進於實際運動，開闢了中國革命之新的方向，這新方向便是社會中最有革命要求的無產階級參加革命，開始表現他的社會勢力。

#### 第四節 香港海員罷工與『二七』流血

五四運動開始了中國革命之新的方向，最革命的無產階級躍登歷史舞台，這新方向的運動不過才開始進行，即已做出兩次使帝國主義及國內封建軍閥驚心動魄的運動

——香港海員罷工與『二七』事件。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二日香港中華海員聯合會，因要求加薪不遂，全體罷工，前後加入罷工之海員二萬餘人，全市搬運工人煤炭苦力公私傭工等同情罷工者數萬人，相持至八星期之久，以達到加薪要求而解決。在這次罷工中，我們可以看出同情援助者由全香港工人以至中國北方的鐵路工人之階級的覺悟，我們可以看出香港公私所雇華人全體罷工時之民族的覺悟，我們可以看出英國帝國主義者運輸停止之恐慌及運輸工人之威力，我們可以看出英政府保護資本家（船公司）嚴厲的壓迫罷工之一致——香港政府封禁海員工會，勒令各行船館繳銷牌照，以武力禁止海員及一切人民自由出境，上海英官則代船公司招工，並拘捕同情於香港罷工之工人數名。

香港海員罷工可以算得中國工人運動有史以來第一樁驚天動地的事件。他不但得到香港和廣州全體工人的同情罷工和經濟援助，而且影響到北方工人，京漢京奉隴海正太京綏等路工人，發起『香港海員罷工北方後援會』，曾舉行大會多次，並發出許多通電和文告，一面向鐵路工人宣傳階級休戚相關之義，一面充分援助海員罷工。正

當海員罷工的緊急關頭，「援助香港海員」的旗幟從北京一直飄揚到漢口，隴海京漢京奉正太京綏等路工人匯寄海員工會之捐款至二千元，這就可以表示北方工人運動怎樣受香港海員罷工的影響了！

關於這次香港海員罷工的意義，我們更可引 Elinor Burns 在『British Imperialism in China』一書中的一段話來證明：

「中國工人之大罷工，雖始於一九一九年夏季漢冶萍公司鋼廠；然首先當推廣東爲工人活動之中心。一九一九年罷工結果，工人得如其要求，增加工資。同年，廣州所成立之工會，凡二十六，其運動勢力，及於香港。一九二二年，第一次之總工會成立於廣州，相因而生之罷工事件，發生於各工業區域。在各罷工事件中，香港海員罷工，最爲重要。此次事件，相持至八星期之久；香港既爲英國所屬，且爲英國對華貿易中心，遂採用猛烈之處置以鎮壓罷工，而維持其貿易。

一九二二年香港殖民地報告有云：「海員罷工起自一月十三日迄於三月八日，其進行也，包括大多數之貿易在內，其影響於殖民地之商業甚巨。」



港政府禁止此六萬罷工工人離港，而大部分之罷工工人，必欲離港，英兵遂開槍射擊。然罷工工人堅不屈服，其結果工資增加百分之十五至三十，而當罷工時，港政府所撤消之香港海員工會之特權，亦得恢復。

自此次罷工以後，海員之組織，將中國舊式之行會制，根本推翻，而成爲一爭鬥之團體。影響所及，遂使中國之工人，成爲最有力最奮鬥之分子。』

自海員罷工勝利以後，全國各地的工會運動和罷工運動有如雨後春筍，當時工會組織得最完善的，有京漢鐵路工會和安源煤礦工人俱樂部等；罷工運動最主要的有五個月間的上海紗廠工人罷工，七月間的漢陽鋼鐵廠工人罷工，八月間的京漢工人罷工和九月間的安源礦工罷工等。而且這些罷工都得着相當勝利，不消說得，罷工勝利的結果，自然使工人得到許多教訓。工人的團結力亦因之而增厚，工會的組織更易擴大到各地各業工人了。

工會發展的過程中間，遇着一個最困難的問題，便是集會結社的自由問題，工會發生之初和罷工運動中，沒有一處地方未曾遭過強權壓迫與武力恫嚇，如上海紡織工

會漢陽鋼鐵工會之被封禁，京漢及各地罷工中以及安源礦工中，都遇着嚴重的武力的恫嚇。因此一九二二年八月會發生全國工人的勞動立法運動，要求國會通過勞動立法案。這個勞動立法案共十九條，第一條即是要求承認工人集會結社自由，第二條要求承認工人同盟罷工自由，第三條要求承認工人團體的契約締結權，同時又要求取消束縛工人的治安警察法和罷工刑律。工人們從自己痛苦中了解自由之可貴，要求自由之迫切，於那次布爾全國的勞動立法運動中完全表現出來。自然直系軍閥篡竊之國會，絲毫不肯給工人以自由權，不過那次運動是工人羣衆爭取自由之必須的初步辦法，也是工人羣衆進行政治運動之發端。十一月間唐山五礦三萬餘礦工發生反抗外國資本家的虐待和要求加薪的罷工運動，罷工支持至二十餘日，竟橫遭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楊以德的武力壓迫。唐山五礦工會，京奉路唐山工會及洋灰工會都被封禁，礦工受傷五十餘人，京奉路唐山工會書記彭禮和君被捕入獄。那次礦工罷工之受摧殘和工會之被封禁，北方鐵路工人異常憤激，愈覺得非爭得工人集會結社和罷工的自由不可。

正當唐山礦工罷工失敗之際，全國各鐵路工會代表聚集北京，議決各鐵路一致罷

工，要求恢復唐山鐵路工會礦工工會和洋灰工會，並承認礦工罷工條件，雖然因爲時機已過，各路罷工運動沒有實際舉行，亦足見那時工人所感受的切膚之痛，便是壓迫工會的事件。那次會議最終決議有兩點：①籌備成立全國鐵路總工會，次第統一各路的組織，②如某路遇到壓迫時，各路工會一致行動，以圖全體互相保障工會之存在。從此兩決議案看來，那末，我們便知道，一九二三年二月一日京漢總工會成立大會被禁止，因而引起大罷工，實非偶然。再則當時國際帝國主義已暫時鎮壓住了西歐無產階級革命怒潮重復向世界工人階級及東方被壓迫民族進攻，何況新興直系軍閥正抱着武力統一的雄心，恰好和新興的工人階級統一全國鐵路工會的運動相抵觸，冤家狹路分外眼明，復加以漢口帝國主義者之教唆，沿京漢路各埠商人對於罷工工人的非難，於是民國十二年二月七日京漢鐵路工人之流血慘劇乃起。

民國十年以來，京漢工人繼續組織『工人俱樂部』，至十一年春，全路皆組織就緒，得十一個單位。四月九日在長辛店召集全路代表，籌備組織總工會，以統一全路的組織。八月十日後召集全路代表于鄧州開第二次會議，製定總工會章程，舉定總工

會籌備委員會，決定總工會地址設在鄭州。緊接着第二次會議以後，即同月二十四日，復由北段工人發起全路總同盟罷工，作第一次經濟的奮鬥，全路一致響應，支持二日，結果工人勝利，路局不得已承認工人九條要求，每人每月加薪三元。足見京漢工人稍有全路組織的雛形，便不能忍耐，奮起而為改良生活之決鬥。勝利自然又給與新的興奮，京漢總工會也就無形中得到權威了。總工會籌備了四個多月，十二年一月五日總工會籌備委員會復在鄭州開會，爾時全路紀律確已一致。即該路少數工人組織之傳習所，亦自行宣告取消——該所之百餘工人，亦悉數加入總工會。至是全路總工會統一之局完全告成，遂定於二月一日在鄭州舉行京漢總工會成立大會。

成立大會既已定期舉行，於是由籌備委員會登報宣告成立總工會的宗旨，并邀請各工團各界到鄭州參與盛典。不料一月二十五日京漢局長趙繼賢兩段段長馮雲忽致電吳佩孚，要求他禁止開會。吳佩孚遂利用機會，以趙馮等報告為根據，下令靳雲鶚嚴禁開會，靳又指使鄭州警察局長黃殿辰執行一切；至一月二十八日，黃殿辰即到工會聲明禁止開會，工會與之相持三日，終無結果，至三十日，忽得吳佩孚致總工會電，

召代表赴洛計議，工人於憤激之餘，遂派代表楊德甫史文彬李震瀛李煥章凌楚藩等五人即日赴洛與吳交涉。三十一日貝吳，吳一味敷衍恐嚇，仍聲明禁止開會，交涉遂無結果，代表即於當日晚回鄭。是時京漢十六個分會，到鄭代表已六十五人，應召而到鄭之各工團亦有三十餘，計代表二百三十餘人。各地男女學生及新聞界到者亦有三十餘人。不但成立大會已準備好，幷已由總工會籌備委員會命令各分會全體工友，於是日舉行慶祝大會。成立大會自然不能因吳之禁止而遂中止。

代表由洛回鄭後，即召集全體代表會議，報告與吳交涉情形，當時全體代表一致憤激，咸謂集會結社乃人民應享之自由，吳佩孚何得而干涉！然猶再三計議，委屈求全，共同議決成立大會或可延遲一二日舉行，但各工團所送之牌匾，則必須於二月一日迎送總工會會所。當以此意詳告黃殿辰，亦足見工人讓步求全之苦心。不料二月一日清晨，鄭州全部緊急戒嚴，軍警荷槍實彈，如臨大敵。當各代表及鄭州全體工友整隊護送牌匾向工會進發時，中途竟被軍警包圍，舉槍威嚇，阻止前進。於是全體大憤，羣以人民自由既遭武力干涉，誓非開會以雪此恥不可。全體鳴立街心約二小時，代

表與軍警長官再三理論，終無結果。乃奮勇拼死衝開陣綫，擁入會場，首由主席宣布組織總工會宗旨，及此次強權無理壓迫之可怕，并鄭重宣布京漢鐵路總工會正式成立。羣衆亦遂大呼：『京漢鐵路總工會萬歲！』『勞動階級勝利萬歲！』等口號。是時全場四周，已盡被武裝軍警包圍，羣情至此，更加激昂，奏樂歡呼，聲震屋瓦。既而黃殿辰至，出言百般恐嚇，強迫解散，但羣衆仍照常開會。延至下午四時，始衝出重圍，宣布散會。是日下午，代表所住各旅館，即有重兵監守，不許偶語，總工會在酒館所定酒飯，亦不許開售。各代表一時完全喪失自由，飲食不得。各團體所贈的匾額禮物等，亦盡被毀棄道旁，不許餽送。總工會及鄭州分會會所均爲軍警佔據，禁止工人出入，室內一切文件雜物，盡被搗毀。責問他們何以如此強暴？兵士都說，是奉大帥命令。當晚鄭州會所即被封閉。

各處代表目擊此種情勢，知毫無挽救之餘地和退縮之可能。即鄭重致函京漢總工會，其大要云：『京漢鐵路總工會能否健全，實全國工人共同問題。我們希望京漢總工會必能爲爭自由而取得最後奮鬥之手段，各工團誓必爲實力的後盾……』。

各團體代表於當日晚車及次日早車分別離鄭，各回原地準備實力奮鬥，臨行時無不慷慨激昂，大有破斧沉舟之概。京漢全路各分會代表於十分忍無可忍之中，當即祕密會議，本着擁護總工會之天職，眞實代表全體工友的憤恨心理，爲緊急之決議，其大意是：『我們爲力爭自由起見，謹決於本月四日午刻宣布京漢路全體工人總同盟罷工，同時爲事實上的便利起見，總工會決移江岸辦公，全路一切進行，於罷工期內，全視總工會命令而定，我們是爲爭自由而戰，爭人權而戰，決無退後的』。這個決議案，便是中國工人運動史上最具有價值的決議案之一，如火如荼的『二七』大罷工，便根據這個決議而爆發了。

到了四日上午十二時，果然全路一律罷工，所有客車貨車軍車一律停止。工人罷工後，卽向旅客散發傳單，說明罷工之原因。罷工工人之組織尙稱嚴密，因全路工人，自司機升火以至小工，都是工會會員，各會員均聽命於各分會，各分會均聽命於總工會，秩序井然。維持秩序，則有糾察隊；刺探消息，則有罷工期內臨時組織的調查隊。但在組織上仍有缺點。第一，罷工後，車輛一概停止行動，總工會與各分會的信

息來往，亦遂斷絕，可是敵人——曹錕吳佩孚蕭耀南趙繼賢等，却能往返電商，調動軍隊，屠殺工人；罷工工友反不能互通消息，以致敵人殺來，猶在夢中。這種缺點：一則因為鐵路上的電報生未加入工會，二則因為電報局工人沒有組織，并與鐵路工人沒有連絡。第二，北段各站員司及站長等，居然私自開車，運輸軍隊，屠殺工人，而北段工人亦未曾阻止，這種缺點也就是『二七』鬥爭中很可寶貴的教訓。

四日罷工時，京漢路總工會即發表宣言，提出五條件，其原文如下：

『一、要求由交通部撤革京漢局長趙繼賢和南段段長馮雲，要求吳靳及豫省當局撤革查辦黃殿辰。

二、要求路局賠償開成立大會之損失六千元。

三、所有當日在鄭被軍警扣留之一切牌額禮物，要求鄭州地方長官用軍樂隊送還總工會鄭州會所。所有佔領鄭州分會之軍隊立即撤退，鄭州分會匾額重復掛起，一切會中損失由鄭州分會開單索償，并由鄭州地方長官到會鄭道歉。

四、要求每星期日休息，并照發工資。



##### 五·要求陰歷放年假一星期，亦照發工資。」

總罷工的第二日（二月五日），蕭耀南派其參謀長張厚生至江岸，以強硬態度，要挾工會交出楊德甫（後來成爲工賊）朱蘭田張濂光羅海臣林祥謙五人，工會答以「如有對於曹吳及交通部正當負責人來，總工會當然有全權代表與之正式接洽，否則，恕不能接待」，延至午刻，忽探報廠內已被大批軍隊佔領，大智門車站已開始賣票，張參謀長至工人家，拘去開車二人，用軍警壓迫，強逼開車，江岸二千餘工友聞訊，卽全體衝破軍警防綫，將該二工友搶回，張之陰謀歸於失敗。於是一變其陰謀破壞之手段，而爲威嚇強橫之暴行。首先捕去糾察隊工友三人，并連工會派往要求釋放被捕三工友之代表項德隆羅海臣等四人，亦一并拘禁，百方威嚇，謂須槍斃斬首，他們毫不爲動，而二千餘工友又與軍警對壘相持，張氏無法，只得將項羅等七人釋放。

武漢各工團代表自鄭州歸來後，各以此次所受歷次壓迫情形，當衆發表，有痛哭者，有憤誓者，奮發激昂的態度，實可動天地而泣鬼神。全體議決，願以死力與京漢鐵路工人一致奮鬥。遂於大罷工的第三日，由各工團各派代表數十百人，各持旗幟來

江岸慰問，即在江岸舉行慰問大會，當時全江岸工友到者約萬餘人。首由京漢鐵路總工會執行委員長楊德甫報告招待慰問代表的盛意，并申述此次大罷工之意義及希望。繼由各工團代表及真報舖記者數十人演說，無不激昂慷慨，次由京漢總工會祕書李震瀛同志代表總工會向衆致詞，略謂：『我們此次大罷工，爲我們全勞動階級運命之一大關鍵，我們不只是爭工資爭時間，而且是爲爭自由爭人權。……：：：：工友們！要曉得我們京漢工人的責任如何重大，麻木不仁的社會早就需要我們的赤血來渲染了！工友們！在打倒帝國主義和軍閥的火綫上應該我們去作先鋒！只有前進呵！勿退却……：：。』最末有人高呼：『京漢鐵路總工會萬歲！湖北全省工團聯合會萬歲！全世界的勞動者聯合起來呵！』凡三，羣衆和之，聲如雷動。羣衆乘茲憤怒之餘，遂舉行大規模的遊行示威，由江岸經過租界以抵華界，歷二小時許，沿途加入三千餘人，所過巡捕崗警無敢阻攔，聲容之壯，實爲僅見。那知同時即有督軍代表與資本家在租界正大開會議，準備施行大屠殺呢！

二月七日，距罷工開始已四晝夜。蕭耀南因屢次誘騙威嚇不遂，乃變更方法。至

七日下午二時，果有一警官來工會說：『刻奉蕭督軍命令，特來請求貴總工會派全權代表開會談判，如特同意，張參謀長即可來貴會晤談，並擬穿便衣來，以示誠意，條件均可承認，惟請先將全權代表名單開示』。當時由總工會全權代表李震瀛張濂光二人接見，在軍警包圍中，因窺見來人態度猝變緩和，頗有可疑，始終未以真姓名相見，來人乃約當日下午五時，參謀長准親自來工會談判，遂匆匆別去。至五點廿分頃，代表等正欲赴會中相候，半途槍聲大作，於是流血慘劇開幕！蓋他們乃用誘敵之計，以爲時機已到，工人領袖定皆在所，遂由該參謀長戎裝指揮，率領武裝軍隊二營急馳而至，先將會所包圍，開槍環擊，計放槍在五排以上，當時有工友數百人在工會門前等候消息，一時躲避不及，又都赤手空拳，無從抵衛，當被亂槍和馬刀擊死者有曾玉良等三十二人，殘傷者二百餘人。在工會慘殺之後，軍警乃分途搜捕，有一家又被殺男女三口，分會長之弟亦被慘殺，總工會委員長之姪則被斬去其腿。於亂殺之頃，軍隊又大肆搶淫，計福建街一夜連洗三次，工人家中所有細小都被一掃精光，當時情態之慘暴，恐江水漢河亦爲之嗚咽不流！

當江岸分會被殘害時，尙有工友六十餘人被捕去，該分會正執行委員長林祥謙亦在內，縛於車站電桿上迫其下令復工，林君嚴厲拒絕說：『此事乃全路三萬人生死存亡所繫，我分會非得總工會命令決不開工。今既如此，頭可斷，工不可上！』如此問答者凡三次，張厚生即呼喝下令斬首。同日長辛店亦有大慘殺的事情發生，長辛店於四日上午十一點鐘罷工，六日軍隊開到，即把工會包圍，至工人家內按戶搜索，捕去工友與工會學校教員史文彬陳勵茂吳雨銘等十一人，痛加拷打，捆縛地上，預備送往保定，此時工人憤極，哀號痛哭之聲，漫澈天地！七日晨工人集合者三千餘，手持小旗，到軍隊駐屋門前，要求釋放被捕工友，軍隊見羣衆聲勢浩大，即下令衝鋒，一時彈如雨下，刀劍飛揚，馬隊踐踏，工人中彈受傷者紛紛倒地，結果死四人，重傷者三十二人，越日死去者又不少，被捕三十多人，輕傷及逃亡者無數，事後兵隊強拉工人入廠工作，否則就地正法，因此喪命的竟至不可勝數。鄭州則於五日軍隊將工會職員三人捕去，加上錄銬，視同盜賊，強迫三人下令上工，三人不爲動；六日又捕去工友二人，均上錄銬，此五人被押至車站，意在威嚇工人，工人愈加憤激；九日有少數工

既被路局收買，破壞罷工，強拉一百多較落後的工人上工，其餘工人得漢口七日慘殺的消息，見大勢已去，不得已忍氣吞聲的上工，以釋放被捕工友為條件。此次鄭州雖未死亡工人，但因罷工失業者前後凡三百餘人，所有工會職員無一能在鄭州立足，大半亡命各處。其他各小站分會如保定高牌店正定彰德信陽新鄉偃城亦備遭蹂躪。京漢路總工會法律顧問施洋，以熱忱贊助工人之故，亦於二月十五日被害。這就是京漢工人『二七』大罷工及流血的經過。

其次，我們再來看各路及各地同情援助的情形。

先說正太路。二月四日京漢路罷工後，是日下午一時，正太工會即召集緊急會議，討論援助辦法，結果決定：①立時發出通電以作聲援。②準備實力援助，七號實行罷工。③派糾察隊往京漢正定分會石家莊部分，夜間幫同守望。④下午六時，召集全體大會。晚間全體工人大會開會，工友異常憤慨，委員會議案一律在大會通過。七日正午，該路即一致罷工，直至九日晚得到京漢工會通知，謂京漢工潮已被武力壓迫上工，請貴會明日開工，免遭意外。此通知證實後，正太方面才於十日一律忍痛復工。

他們復工後，雖經武力恫嚇，但工人團結堅固，故未受害，工會雖被封閉，然路局開除工會委員時，工人復一致反抗，路局遂不得不允許他們復工。道清路工人數量不過千人，然於『二七』奮鬥時亦甚勇猛，該路工人與京漢路同日同時舉行罷工，支持九日之久，工會領袖王惟儉等四人被捕入獄，黃業興李培學谷零嶺秦夢虎等均因此被開除，工會亦遭封閉。津浦路工會秘密約定於十三日上午五時，全路一致罷工，但南段浦鎮方面已先行發動，於十日上午實行罷工，嗣因京漢工友已遭武力壓迫上工之消息傳到，該路南段工人遂不能不即時恢復工作，而全路罷工之計劃，亦只好中止。粵漢路自八日起罷工，隨後該路工人即被軍警用麻繩捆綁上工，徐家棚工會亦被封禁。其餘如京奉路工會京綏路工會均一致議決於八九日實行罷工，一切罷工手續，均已準備完善，不幸京漢大慘劇發生，罷工風潮亦漸平息，他們同情罷工的舉動也只好相機停止了。彼時即尚無組織之膠濟路工人，亦準備於津浦路罷工之後，立刻參加此次光榮之奮鬥。武漢各工團熱烈援助情形前面已提到一點，七日江岸慘變發生，同時武漢即宣布特別戒嚴，湖北工團聯合會及各重要工團均被封閉，然八日起執行湖北工團聯合

會之議決案而實際舉行罷工者尙有：漢陽鋼鐵廠工人，漢冶萍輪駁工人，丹水池工人，揚子機器工人等；其餘如電燈、電話、自來水工人，事先即被重兵看守，故未能實行踐約。其他各處，亦有同樣之準備和行動，如上海總同盟罷工之醞釀，香港海員工人之大憤激等。此外如湖南、廣州、北京等處，亦都有同情援助之表示，發表宣言，舉行示威，集款援助，不一而足。『勞動者聯合起來』的意義，於奮鬥中特別能夠表現出來。不但得到全中國工人階級及一般被壓迫民衆的同情，而且震動全世界的耳目，共產國際與赤色職工國際都專爲此事發表宣言，海參崴工團總會和日本朝鮮無產者同盟，均有懇摯之電報，遙寄其階級之同情。

綜觀上述『二七』大罷工及流血之經過，可以想見當日工人之奮鬥精神，實不愧爲反抗軍閥爭自由之先鋒。在這次鬥爭中充分地表現了中國工人階級團結與犧牲的精神，當鄭州會議被壓迫解散，京漢路工會的總同盟罷工命令下時，各路工人幾如響斯應，雖各地軍閥走狗百般威迫利誘，然而全路工人始終服從總工會命令。至『二七』失敗，各路各地更是激昂慷慨，憤起而與軍閥抗爭。江岸工友處槍林彈雨之下，倒斃

者已三十餘人，猶死守工會，無一逃避者，相持至數十分鐘，得工會退後之令始漸次退散。雖然在『二七』鬥爭中也有不少缺點，例如進行工會運動中往往偏重於上層的號召，忽畧了下層羣衆的組織與訓練，而且在流血前不會看清帝國主義軍閥凶殘的面具，有些工人甚至指導工人運動的領袖對於吳佩孚『保護勞工』的假面具沒有認識清楚，總以為吳佩孚不至如此凶暴槍殺工人，因此也就沒有準備更殘酷的鬥爭，致使敵人高壓屠殺一來，工人措手不及。但是『二七』鬥爭畢竟是中國工人階級由日常鬥爭到政治鬥爭的空前偉大的運動，『二七』流血之後，工人階級很深刻的認識『工人階級的自由須由工人階級自己的血去換來』這個教訓的意義了。

中國的職工運動在『二七』以前，只是初期的發生，『二七』流血證明了工人階級奮鬥的力量和決心，工會的需要從此普遍於中國工人的一般羣衆裏去。英美帝國主義者走狗吳佩孚等施行『二七』屠殺，大欲恐嚇工人羣衆，撲滅他們的革命運動，可是實際上，正是『二七』之後，廣東上海山東南湖北湖南以至全中國的鐵路工人，礦山工人，紗廠工人等運動大大的發展起來，他們只能在極短的期間鎮壓住這個運動



，所以到一九二四年二月七日即『二七』流血的一週年紀念節，全國鐵路總工會畢竟從全國鐵路工人代表大會產生出來。『二七』之後不久，各地工人響應『二七』的鬥爭積極發展起來，他們都是繼續『二七』的精神，提出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工會和罷工的自由的口號和要求，這種發展的結果——上海青島日商紗廠工人罷工運動，才爆發而成偉大的五卅運動。

『二七』以前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雖然開始了很久，可是自五四以來，這一運動的極大部份還只在學生羣衆中，一直到『二七』以前唐山京漢等的大罷工，尤其是『二七』流血之後，才深深的滲入工人羣衆，這一殘殺的創痛驚醒了中國最革命的階級，使他們如潮水一般湧入國民革命的隊伍。『二七』之前中國工人運動始終還是束縛在很小的範圍，但是『二七』流血，就使中國工人階級加入國際工人階級的戰綫了。所以共產國際爲『二七』事件告中國工人書中說：『確實說，你們的行動已經進到世界無產階級的行伍了！』『二七』鬥爭顯明了中國工人階級是反對軍閥與帝國主義的前鋒，『二七』鬥爭實在是開關一九二五至二七年中國大革命的先聲。

## 第五節 國民黨改組與鎮壓商團反革命事件

國民黨在辛亥革命之後，早已崩潰瓦解。辛亥革命前的同盟會——國民黨，在革命『成功』之後，大部分腐化，投降袁世凱，投降種種軍閥。辛亥革命時的革命動力之一，華僑式商業資產階級已經買辦化。他們當時在國命黨中是右派的代表，他們當初還希望袁世凱總統之下的責任內閣；隨後，簡直完全變成豬仔議員軍閥走狗，如吳景濂等。就是這老國民黨之中的左派孫中山等，也只是想憑藉小軍閥的武力，去打倒北洋軍閥，他們不能和羣衆發生關係。中國的資產階級的民權革命，根本上的社會內容是農民的土地革命，但是孫中山只有改良主義式的平均地權的空政綱，而且當時還藏在口袋裏不敢拿出來；孫中山的民權主義，並不是代表民衆去爭政權，——中國國會制度迅速破產之後，他是沒有出路，只有『護法』的口號。至於中國革命的反帝國主義任務，孫中山那時也除『富國強兵』，爭些『國際平等地位』之外，絲毫不敢有什麼主張，反而在未得政權之前，先就百口應承的對帝國主義列強發出許多『保護外人生命

財產』的預約券。他那時已經是懦弱的資產階級的思想代表。

國民黨的復生，導源於五四運動期間，國民黨領袖中一部分的『左傾』；然而國民黨真正改組，始終等到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贊助方才見於事實。這一過程，就是中國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發動起來，一般平民小資產階級反帝國主義運動（這種反帝國主義運動除了五四運動以外，還有一九二三年六月一日長沙市民學生罷工罷市罷學反抗日本帝國主義兵艦登陸槍殺中國民衆事件，也很有歷史的意義）的進展，而結成中國國民革命聯合戰綫之新的國民黨——一九二四年改組的國民黨。『自孫文與越飛會晤（一九二三年一月間）後，國民黨以容納共產黨員之條件與蘇俄攜手，兩方已有默契，至去冬（即一九二三年冬）鮑羅廷來廣東，乃決定改組方針，至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一日遂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實行改組，容許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之面目精神，俱爲之大變』（見『中國六十年大事記』P. 337）。

新國民黨是國民革命聯合戰綫的表現，是事實上聯合戰綫的反映。這在中國革命的第一階段，就是代表無產階級農民小資產階級及民族資產階級的革命聯盟。在改組

之前，國民黨根本沒有反帝國主義的意義，但是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宣言和政綱，確實接受了反帝國主義的口號。孫中山的民生主義之中，原來只有『平均地權』，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中才加進一條『節制資本』，同時也就決定了聯合蘇聯的政策。經過這次改組之後的國民黨，的確表現了他相當的革命作用，成爲反帝國主義聯合戰綫的政治組織，在國民黨獲得政權的區域，如在廣東，工農組織及鬥爭的發展，也開始得着相當的自由，一九二四年勃興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和馮玉祥政變以及國民會議廢除不平等條約的要求，都在國民黨的聯合戰綫之中發展出來，孫中山赤化和馮玉祥赤化的名聲，也在這一時期喧騰於帝國主義者之口。當時革命戰綫之中，民族資產階級是贊助并且參加的。然而因爲國民黨之中，不但有民族資產階級，并且有買辦階級及華僑商業資產階級買辦化的成分，所以一開始改組，國民黨內便有右派馮自由等反共的老前輩起來反對。改組之後，國民黨之中仍舊包含着不少買辦軍閥豪紳的分子，他們根本反對國民黨改組，他們不但需要反對帝國主義和軍閥，而且他們自己就是帝國主義的工具。所以改組之後，國民黨老党员張繼謝持鄒魯等馬上出來『護黨』，他們

曾公開宣言：『自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其所宣傳打倒英美日法等帝國主義者，其作用係在破壞國民黨在國際之好感，一方面則注重打破國民黨與國內各實力派（軍閥）之合作……其計劃係在消滅國民黨』（見張繼等護黨宣言及當時他們所辦『護黨特刊』『民權旬刊』等出版物上的言論）。他們看見國民黨改組之後，居然接受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打倒帝國主義與軍閥』的口號，自然要妨礙他們勾結帝國主義與軍閥的勾當，他們看見國民黨改組之後，滲入了許多C.P.、C.Y.及一般左派革命分子，漸漸幫助并發展工農羣衆運動，自然覺得必日益和自己利益相衝突，因此他們也就一天天更加反動起來，他們共同的政策就是反對蘇聯，勾結帝國主義，壓迫工農運動，不但在口頭上言論上處處表現出他們此種反動主張，而且在實際運動中充分表現出他們此種反動的行爲。客觀形勢一天緊張一天，這種革命與反革命的鬥爭也一天天尖銳起來，在當時這種鬥爭之最劇烈的一幕，便是鎮壓商團反革命事件。

廣東商團鄉團，乃是一種買辦豪紳地主商業資產階級等的法西斯蒂組織，久有和工人農民對抗的形勢及衝突，國民黨改組之後，因爲革命鬥爭逐漸發展，他們反革命

面目也就日益鮮明起來。恰在那時沙面英法租界新定入界苛例，無理壓迫中國民衆，工人羣衆舉行罷工抗議（一九二四年七月），廣州市工人羣起援助，香港海員亦表示同情，着實使英帝國主義受了一些打擊。加以當時廣州政府雖然在他主觀上還不能算得有力，有決心反帝國主義的政府，但是因爲國民黨改組之後，廣州政府之下左派勢力很能幫助工農組織及鬥爭的發展，與廣州政府本身接近蘇俄的事實，都大足以使帝國主義恐慌。於是英國方面便分兩路進行：一路勾結右派調和派，加緊反對共產黨的活動，一路趁商團運械暗中與以贊助，教唆並勾結買辦商團起而推翻廣州政府。所以沙面罷工將了末了的時候，商團運械被扣事件也就爆發了。

商團運械被扣之後，商團卽以罷市相恫嚇，廣州罷市之前，佛山方面有陳恭受的指導，已經先行罷市，要求無條件發還槍械，當地豪紳所組織之民團都有武裝，威脅小商人，使不敢開門；此時國民黨中之革命派卽積極主張嚴厲對付，要在政府方面，趁商團陰謀布置未周，後援者無確定担保時，先予解決。政府方面不但有軍官學校四處，共二千人，而且有工人農民之贊助——當時廣州市郊農民協會工人代表會都起而

斥責妥協派爲反革命所利用，要求解除買辦商團之武裝而武裝工農，其中市郊農民的農團軍原有三千枝鎗，工人則可以扣留下來的軍械立刻武裝起來，革命派已經看清商團是帝國主義的武裝——當時商團自己也說後面有英人援助，而且北通曹吳，東連陳炯明，都說扣械事件發生後，商團必然求助帝國主義和軍閥，當時雖然罷市謠傳很盛，而始終遲遲六七日不發，便是有意等援兵，假使猶豫坐待東江與英國方面從容動作，廣州政府就只有束手待斃了！因此應當先發制人，堅決用革命的手段鎮壓他們。就有人提議派人到佛山（當時廣東商團聯防總部在廣州被禁止，即於八月二十一日遷往佛山）組織市民大會，工人農民都願意拚死奮鬥，若商團方面敢於壓迫示威運動者，便可以立即強迫商團繳械而武裝工農。

可見實際上佛山雖然開了市民大會，而國民黨及政府的態度都非常動搖，右派軍人在示威運動時名爲保護工人市民，事實上却舉槍干涉工人行動，反而保護商團軍。革命派所提議的宣言及武裝工農的主張都不曾採用。

到八月二十五日，廣東全省因商團軍械被扣而罷市者已有一百多埠，廣州亦繼各

埠而起。當時商團等反革命派的策略，一方面便是放出「共產即在目前」的謠言，以罷市要挾交還扣械，同時即以「中華民國政治定國軍」的名義通電全省各縣商團，命令他們驅逐縣長，宣布獨立。罷市之後商團更用法西斯蒂的暴力政策對付革命民衆，因此許多小商人自己雖然不願意贊助商團，也只得被迫罷市。另一方面英國領事又通知政府說，已奉香港海軍總司令命令，若政府對商團開火，駐紮廣州的英國海軍便將立即攻打政府。這種景象顯然是帝國主義買辦階級夥同顛覆廣州政府的反革命行爲。然而當時國民黨及其政府却只能畏畏縮縮的託名於『和平調停』，實際上是和勾結帝國主義買辦商團軍訂城下之盟，並不敢用革命的手段鎮壓他們。當時革命派的主張則完全兩樣，革命派主張反革命商團槍械完全沒收，分發真正之政府軍隊及廣州之工人農民自衛軍，買辦階級之武裝不準存在，另編平民警備軍以勞動平民爲基礎。此外更主張取消一切苛捐雜稅，統一財政，使作亂及反革命的軍人無所憑藉，又可減少貧民的負擔。工農及一般市民，自然都非常憤慨，堅決贊助政府，堅決主張解除商團武裝，主張決然以革命的手段鎮壓反革命，並且各舉代表會集於省長公署，組織平糶委員會，



預備收管食糧以及比較重要的公共消費品，使商團不能以罷市相要挾，尤其使他們不能以餓死平民的手段脅迫政府。當時工人代表會與農民自衛軍都積極準備着與商團反革命決戰。然而國民黨及其政府游移妥協的根性終究叛賣了革命利益，結果完全對帝國主義買辦階級商團妥協和屈服，爲使我們更能了解當時的實情起見，可以引一段當時（一九二四年九月三日）香港『循環日報』對於商團事件的記載於次：

『……………扣械罷市風潮，自二十八日（八月）滇軍范石生廖行超二人出任調停，形勢已有轉機，……………二十九日范氏進謁孫文，對於此事力主調解，並贊助容納商團之請求，以冀早日和平了結。孫氏不允，范石生謂：市面危機四伏，險象環生，萬一變故發生，全局皆壞。在此兩三日內，無論如何，必要解決，否則我撤手不理，將全軍調回，竭力保護市內治安，無論何方部隊，如有騷擾商場，我當派隊迎頭痛擊，斷不令此璀璨五羊，供一二人意氣之爭而犧牲也云。孫氏開言，顏色立變。但見范氏詞語決絕，且以范氏之力量而論，又儘可辦到，復有廖行超爲之協助，湘軍亦一致主張和平，僅藉樊鍾秀之豫軍千餘人，必無濟於事，乃毅

然答應范氏。遂與商團代表於二十九日下午訂立條件，雙方簽字，三十日商店復業，以條件而論，商團可謂完全達到目的，軍械照原數目發還，聯防又准予成立，陳廉伯陳恭受亦取消通緝，不過以五十萬元爲代價耳！……二十八日白鵝潭外艦共有九艘，其砲位似已向永豐艦監視，大有戰時行動情形，此亦未嘗不足以促風潮之解決也。」

這一事件真可算得極帝國主義買辦階級軍閥官僚國民黨右派夥同宰制當時革命政府之奇觀：組織這次叛亂的是英國帝國主義者，領袖這次叛亂的是陳廉伯陳恭受諸買辦，公開的袒護這次叛亂的英國帝國主義的炮艦政策，『武裝調停』廉價拍賣革命政府的是范石生廖行超諸軍閥，而勾結於帝國主義買辦階級軍閥官僚商團之間的是當時國民黨右派分子。國民黨右派一面勾結帝國主義與買辦階級，一面勾結軍閥官僚以把持廣州軍政市政財政諸權利，這是自從設立廣州政府以來公開的事實。這次事變的罪魁陳廉伯不僅是匯豐銀行的買辦，而且是國民黨廣州市黨部職員，這次主張罷市反抗孫中山最力的陳恭受等，無一不是當時國民黨右派黨員，至於范石生廖行超李福林輩之

屬於右派黨員更不待說。所以這次事件，一面是帝國主義打擊中國革命運動，一面就是當時國民黨右派反革命之具體表現。

『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不是革命派勦滅反革命派，便是反革命派勦滅革命派，國民黨領袖對於帝國主義買辦階級商團之妥協屈服，並不能使帝國主義買辦階級商團等對革命派退讓一點，反而使帝國主義買辦階級商團等反革命勢力取得優勢更有利的進攻革命，雙十節果然又大大地爆發了！

因為當時國民黨中之革命派及一般工農羣衆對於國民黨領袖和帝國主義買辦商團的妥協政策非常不滿意，因此就決定把那時即日到來的雙十慶祝節改為雙十警告節，號召廣大羣衆的示威運動。示威羣衆在廣州第一公園集會，會場中羣衆情緒都很激昂，特別是青年與一般工農羣衆對於國民黨領袖與商團妥協的事件表示非常憤激。到三點鐘的時候，會開完了，各團體即結隊遊行。本來在這參加遊行的羣衆裡，並沒有那一個有武器，號稱工團軍農民自衛軍與講武堂的學生也都徒手沒有帶武裝，他們不過各人手中拿着各種標語的旗幟以表示警告的意義罷了。可是帝國主義買辦商團既已取

得初步勝利就決不肯對革命勢力讓一點步。因此羣衆自第一公園示威遊行至太平南路的時候，即與全副武裝佈滿長堤西濠口太平路直連西門的商團軍迎面相值，某店樓上預先埋伏的商團軍號槍一鳴，街上商團軍立即向示威羣衆施放排鎗，連放五次，前列示威隊伍紛紛倒地，餘衆大亂奔走逃命，商團軍隨後追擊，福軍亦加入追逐，擊斃徒手羣衆在二十人以上，油業工人黃駒中槍擊斃命後，復被剖胸割勢，死得最慘！此外重傷的落水的蹤跡不明的被捕而遭商團軍與福軍架鎖毒打的不下數百人。在這一場慘毒屠殺中，我們可以看到買辦商團對於工農羣衆革命勢力的凶毒，他們靠着英國帝國主義的威權與軍閥官僚（如李福林范石生廖行超李朗如等）的屏障，對於革命勢力真是毫不容情！

商團對徒手羣衆大肆屠殺之後，即全體動員出發，在街市上橫衝直撞，他們的步哨由西關一直到東山，都佈滿了！他們一面在西關一帶的街衢中張貼請孫文下野的布告，一面即以武裝威嚇南市重新罷市，并且明目張胆的請陳炯明回來主持政事。

在商團叛亂，危在旦夕的廣州，革命與反革命的鬥爭事實上已經更加顯明，不是

撲滅商團，就是政府覆沒，其間絕對再沒有妥協的餘地。在此形勢緊張局面之下，革命派乃對孫中山作嚴重警告，當時孫中山一面因為政府危在旦夕，另一方面因為受到革命羣衆的影響，才決定以武力平服商團，於是先將北伐各軍調回廣州肅清內亂，再行北伐，並組革命委員會指揮戰事。同時東莞告警，陳炯明軍已進攻虎門，而滇軍福軍等恐為陳所乘而散失地盤（當時因利害關係上不能與陳妥協），故又不能不暫時改變態度與政府合作，這也是當時所以能够平定商團的一種客觀的條件。令下之時，商團即緊急集合，以西關為大本營雙方嚴陣以待，至晚七時商團方面即先行放槍挑戰，滿城槍聲，相續不絕。夜十時警衛軍即佔領商團總部。至次晨四時各軍下總攻擊令，雙方相持至五小時之久，商團因在屋頂居高臨下，地勢較優，故政府方面軍隊為所擊斃及傷害者達四百餘人。工團軍死傷數十，商團軍方面死傷不及百人。至十時商團不支，即向西北逃竄，政府軍始佔領西關，至此兇焰萬丈的商團軍始被擊散。

此次鎮壓商團反革命之戰爭，雖然在他本身還包含着軍閥搶奪權利的的作用，例如李福林等軍加入作戰，完完全全是想趁火打劫，并不是真正要反對帝國主義與買辦階

級。而且並未澈底撲滅商團，縱然商團一時潰散了，但四鄉與商團同性質的民團仍在；縱然二陳及商團代表一時逃走了，但買辦階級勢力依然存在。可是無論如何，在客觀上，總是革命勢力擊敗買辦階級商團陰謀反動之悲壯的一幕。而且在革命營壘這一邊的主力軍乃是工農羣衆及當時一般國民黨中之革命派，尤其是工農羣衆最爲勇敢，孫中山最後所以能決然用武力剿滅商團反革命，最主要的動力也是因爲受了革命羣衆的影響。所以這次鎮壓商團軍的戰爭，在客觀上乃是工農羣衆及一般國民黨中之革命派反對帝國主義買辦階級商團及右派分子等反革命勢力之革命行動，它是當時中國特別是國民黨改組之後革命派與反革命派鬥爭之縮影。在當時這種鬥爭本很普遍，例如當時（一九二四年九月）上海南洋烟廠八千工人罷工中國民黨右派葉楚傖鄺光耀李援愆惠資本家壓迫罷工工人事件，廣州印刷工人因要求加薪不得已而罷工，而當時國民黨中央工人部長廖仲凱和胡漢民等幫助資本家壓制罷工事件，及上海雙十節國民大會中國民黨右派喻育之常理璋徐畏三等利用流氓打死黃仁等事件，更是不一而足，不過在當時這種革命與反革命鬥爭中之最劇烈的一幕却是鎮壓商團事件，所以我們可以說鎮

壓商團事件在當時乃是革命派與反革命派鬥爭之縮影，因此在客觀上，鎮壓商團事件實在有很重要的歷史意義。

## 第六節 促成國民會議運動

「國民會議」的口號是中國共產黨在一九二三年黎元洪出走北京政變時發表第二次對於時局主張的宣言中提出來的。宣言中指出「逐黎不過是歷來外力和軍閥勾結爲患，造成中國危局之一個必然的結果，而非時局危機之因，北洋軍閥舊勢力統治中國，抑制民權，勾結列強，斷送利權，此乃是中國危機四伏之根本惡因，此惡因一日不除，其危機連續起伏之惡果將一日不止」。又指出「擁護黎元洪」「擁護段祺瑞」「國會南遷及制憲」「團結西南及聯省自治」「藉助列強」這些辦法都不能解決時局」。因此主張：「由負有國民革命使命的國民黨，出來號召全國的商會工會學生會及其他職業團體推舉多數代表在適當地點，開一國民會議，來建設新政府統一中國」。到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北京政變，馮玉祥倒戈直系潰敗後，中國共產黨第四次發表對於時局的主

張，仍舊主張『只有國民會議才可望解決中國政治問題，并希望國民黨努力使國民會議預備會急速在北京召集』；更主張：『各階級的民衆及與各派帝國主義者尙無確定關係之武力，擁護此預備會，在正式政府未成立以前即爲臨時國民政府』。當時共產黨并向臨時國民政府及國民會議提出下列最低限度要求：

『（一）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第一重要是收回海關，改協定關稅制爲國定關稅制；因爲這是全民族對外的經濟解放之唯一關鍵。

（二）廢止治安警察條例及罷工刑律，保障人民集會結社出版言論罷工之無限制的自由權；因爲這是人民對內的政治解放之唯一關鍵。

（三）全國非戰時的常備軍，均以旅長爲最高級軍職，廢除巡閱使督軍督理督辦總司令檢閱使護軍使鎮守使軍長師長等軍職；因爲這是杜絕軍閥勢力集中盜國亂政之重要關鍵。

（四）軍閥之禍，罪在最少數高級軍官，失業入伍的兵士們所受壓迫與困苦，與其他一切平民等；今後旅團司令部，應採用委員制，軍餉公開；應改良現役兵士



之生活及教育；兵士退伍，須給以土地及農具或其他種確實可靠之生活。

(五)規定最高限度的租額，取消田賦正額以外的附加捐及陋規，謀農產品和其他種生活必需的工業品價格之均衡；促成職業的組織（農民協會）及武裝自衛的組織，這都是農民目前急迫的要求。

(六)八小時工作制，年節星期日及各紀念日之休假，最低限度的工資之規定，廢除包工制，工廠衛生改良，工人補習教育之設施，工人死傷保險法之規定，限制童工之年齡及工作時間，女工妊娠前後之優待，這都是工人目前最低限度的要求。

(七)限制都市房租加租及建設勞動平民之住屋。

(八)沒收此次戰爭禍首的財產，賠償東北東南戰地人民之損失及救濟北方水災。

(九)各城市鄉鎮之煙金牙稅及其他正雜捐稅。在國庫收入無多，而小本營商者則因之重感困苦，宜一切廢止。

(十)廢止鹽稅米稅，以裕平民生計。

(十一)增加海關進口稅，整理國有企業之收入，徵收遺產稅，徵收城市土地稅。此等大宗稅收，不但足以補償廢止舊稅——厘金牙稅鹽稅米稅田賦附加稅及其他各種正雜捐稅——之損失，並可用為補助退伍兵士失業貧農及推廣教育之經濟。

(十二)為保障知識階級之失業及青年失學計，國家預算中，不得將教育經濟移作別用，並應指定特種收入如收回庚子賠款等，為實行中小學免費優待小學教員及推廣平 教育之用。

(十三)婦女在政治上法律上經濟上社會地位上，均應與男子享平等權利。

同時孫中山離粵北上，過滬時因為受到上海廣大羣衆的革命影響，同時又多受了一次帝國主義切實的教訓（上海帝國主義者反對孫中山登岸），因此比較確定了反帝國主義的決心，當即宣言號召國民會議，孫中山并說他自己準備到京後，在國民會議

中第一須提出者，爲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收回租界及領事裁判權」。當時國民黨所號召的國民會議預備會，曾要求各種人民團體，商會工會農民協會學生會等，都應派代表參加，這是辛亥革命之後，國民黨第一次覺悟到國會制度法統問題護法口號不能解決中國政治問題之表示。國民會議的實際運動從此開始。上海浙江廣東湖南湖北等處都先後成立了國民會議促成會，各地的民衆團體都紛紛通電宣言擁護國民會議的主張。

但同時執政府段祺瑞一面宣言『外崇國信』，承認金佛郎案，保護外人條約與特權；一面因爲想堵住廣大羣衆的革命要求，於是也提出召集善後會議來和共產黨國民黨的國民會議運動相對抗。根據他的善後會議條例，列席善後會議的資格是：（一）有大勳勞於國家者，（二）討伐賄選，制止內亂各軍最高首領，（三）各省區及蒙藏青海軍民長官代表，（四）有特殊資望學術經驗，由執政府聘任或特派，不逾三十人。完全是第二個軍閥官僚政客名流的籌安會，與共產黨所主張由下層民衆湧現出來的國民會議完全不能相容。所以只有善於妥協的孫中山『不敢作露骨的反對』（一九二五年一月孫

中山在北京的態度），但是全國工農學生革命羣衆却竭力反對，竭力堅持由民衆團體所選舉產生的國民會議。因此段祺瑞在一九二五年二月一日召集他所御用的善後會議而國民會議促成會全國代表大會亦於三月一日在北京召集，儼然與善後會議對抗。

此次國民會議促成會全國代表大會在北平開會，前後一月有餘，到會代表二百餘人，雖然沒有得到什麼具體的結果，但在反對善後會議，引進羣衆參加政治活動的立場上，確實有相當的影響。

到一九二七年中國大革命失敗之後，中國革命已經進到工農蘇維埃革命的階段，工農蘇維埃已經成爲唯一代表革命的旗幟的時候，仍舊提出『國民會議』的口號，自然是極大的錯誤，而且是反革命的表現，（至於最近蔣介石南京政府所決定同時又得改組派第三黨托陳取消派所贊助將在五月間召集的國民會議，那更是赤裸裸的豪紳地主軍閥官僚資產階級的分贓會議，它的主要作用是借此與工農蘇維埃革命運動相對抗，乃是極端反革命的舉動——一九三一年二月編者自註）然而當一九二四年與二五年時這種促成國民會議運動，却無疑的有它很重要的革命意義。

以上所述，乃是中國大革命爆發之前二三十年間中國革命歷史上幾個重要的環子。這個短短的革命過程，包含着原始的反帝國主義的農民暴動，有名無實的資產階級反抗君主貴族的辛亥革命；學生平民反抗帝國主義與賣國賊的五四運動，血淋淋的工人階級爭取自由的英勇鬥爭，工農平民羣衆反抗買辦階級的鎮壓商團事件和促成國民會議運動。在這許多革命運動中，自然包含着許多錯誤和弱點，特別是政綱的不明顯以及妥協軟化的傾向，但都有他不可磨滅的歷史意義，牠們都是中國一九二五至二七年大革命的預演；從此之後，排山倒海的羣衆，滾入革命的急流之中，於是中國大革命爆發了！



# 第四章 中國大革命的經過

## 第一節 五卅運動開闢了中國大革命高潮

### (一) 五卅前夜的罷工浪潮

#### A 上海小沙渡日本紗廠大罷工

日本資本在中國棉紗業裏的勢力，大家都知道是很大的。帝國主義的這種侵略——移資中國，就近剝削中國的廉價勞動，實是最可怕的手段。一則中國工人生活程度低；二則中國破產失業的人多，勞動供過於求；三則中國工業在發達初期，工人都是初從鄉下進城的失業農民，缺乏職工運動——組織工會，指揮罷工，積聚罷工基金等經驗；四則中國殘酷的軍閥政治，絕對禁止民衆的集會及一切政治自由，而且租界內更純然是外國政府，對待中國『下等人』可以用對待牛馬的法子；所以中國工人工資既低，工作時間又長，待遇又可以隨心所欲——這都是日本資本家在他們本國求之不得

的。因此，日本英國等的資本家，搜括了中國的原料，便在中國建築起工廠來。這樣一來，外國資本家不但可以消納他們自己國內的餘剩資本，緩和他自己國內的社會革命運動，而且可以在中國工業化的過程裏，儘先佔領中國市場，永世不讓中國實業發展，盡量剝削『馴服』的中國勞動者，取得異於尋常的多量利潤。

『五四』以來的抵制日貨運動，實際上是中國的資產階級發展——實業發展的要求所表現出來的運動。從那時起，『提倡國貨，以杜漏卮』差不多成了一種口號。其實外貨的輸入，還是次一等的問題，——日本資本家在中國境內這樣發展紡織業，將來一切實業都照這樣下去，中國人雖欲排貨而有不得的日子。中國人要抵制帝國主義的這種侵略，不但排貨運動沒有用，便是宣言提倡國貨也是沒有用——當時中國人自己辦的紗廠，已有許多被日本人併吞了去。要抵制帝國主義的這種侵略，必定要勞動平民覺醒起來，必定要那『馴服的』勞動平民奮起鬥爭，爭得中國人民所應有的權利及中國民族的解放和獨立！然而要這一鬥爭能得到勝利，最先的必要條件，便是中國勞動者的自由，中國勞動者一般的生活改善——中國勞動者的政治的經濟的權利。



中國勞動者已經不再馴服了！一九二五年二月九日小沙渡的日本紗廠裏二萬多的中國男女工人罷工了。中國工人反對資本家的鬥爭，反對外國帝國主義的運動，從此就擴大起來了。

小沙渡的這些紗廠，屬於一個名叫『內外棉』的日本公司，這公司資本很雄厚，他在日本，青島，上海共有十五個廠，在上海小沙渡的共十一廠。平時這些廠裏對於工人非常苛待，工人稍不聽話，非打即罵，慘無人道。工作時間是日夜輪班，每班十二小時——夜工并不加錢；工資也很少——最少的只二百餘文一天；而且每月在工資裏要扣除所謂『儲蓄金』，工人死傷疾病的時候却並不發還，只有每月另發很少的『儲蓄賞』；然而差不多個個工人每次領工資時都要被廠裏藉故剋扣，結果所謂『儲蓄賞』也仍舊扣去。再則，其中童工女工很多，所受欺壓更甚；成年男工總要比較強硬些，因此，廠裏更有一種極奸狡的陰謀——另外專養一批男女幼童，叫做『養成工』，平日便施以奴隸教育；等到長成之後，便想一批一批的將他們調換成年男工，把那些『不安分』的分子開除出來，——想使全廠都是些女人小孩子，可以隨便虐使剝削

而不受反抗。這次罷工，便是因爲有一廠開除一批男工，將『養成工』去替代，并且拘捕工人代表。這種待遇和工作條件之下，中國工人簡直是日本資本家的牛馬，——他們住的房子，是三四家合居一間小屋，吃的是喂豬的食料。此等痛苦，難道是宣言抵制日貨的人所能感覺得到的？！所幸這種工人已經團結，已經組織工會，二萬多人的羣衆已經開始鬥爭了！

這一次罷工的醞釀，是發生於二月二日，是日內外棉第八工場的初紡部全體工人，無故被廠方開除，四日，被開除工人到廠中領取工資，不料廠方不但不給工資，反將工人拘捕，工友們以廠方這樣殘狠，實在忍無可忍，遂一致罷工，提出不准打人，增加工資二成，被開除工人恢復工作，罷工期內工資照發，承認工人俱樂部有代表工人之權等要求。當初領導罷工的是滬西工友俱樂部，但不久內外棉廠工會就成立了。條件提出後，廠方完全拒絕，於是一九二五年二月九日二萬餘人的大罷工開始。同時曹家渡的各紗廠，都一致策應，楊樹浦方面的紗廠也起來響應。當時加入同盟罷工的計有日華紗廠，豐田紗廠，同興紗廠，大康紗廠，豐裕紗廠等，參加罷工工人共計七

萬餘人（根據唐海所著『中國勞動問題』統計）。七萬餘人的共通要求是：

（一）不準打人。

（二）照常發給工資不得延期，不得無故剋扣。

（三）發還儲蓄金。

（四）加工資十分之一。

（五）罷工期間工資照發。

（六）不得無故辭退工人。

（七）釋放被捕工人。

後經外界調解，至三月一日始告結束，這次罷工雖暫時結束，但因這次大罷工，是上海向來所沒有的，工人在鬥爭中得到許多經驗，從此戰鬥力比較強大了，工會也組織起來了，因此而顧正紅被殺，南京路發生屠殺，便如火燎原一般的，五卅怒潮也就從此爆發了！

B 青島日本紗廠大罷工

青島日本紗廠工人和上海紗廠工人一樣痛苦，上海日本紗廠大罷工，給了青島日本紗廠工人以一大刺激，適因青島日本資本家以野蠻手段制止工人組織工會，於是青島大康紗廠工人遂於四月十九日起，宣布罷工。他們所提出的條件，都是當前最迫切的要求，如：日工每人每天一律加大洋一毛，包工按原薪增加百分之二十五，夜工飯錢一律加倍，取消押薪制度，因工受傷者工資照發（醫藥在外），一律免收房費，延長吃飯時間至一小時，此後日人不得打罵華工，應規定保護女工每月給生理假日二日工資照發，減少童工工作時間每日不得過八小時，如工人違犯場規得由工會同意方可處分之，公司所罰工人之款應提交工會，作教育工人經費，此後公司待遇工人須一律平等。

大康工人罷工後，日本資本家即日夜調動中國警察保安隊，欲向工人示威。延至四月二十三日下午，始由警察廳長提出調停條件，對於工人要求各條雖有少許承認，但均係不關重要的幾條。工友等因深知自己組織能力尚薄弱及所受之種種環境，當即將自己所提出之條件加以最大之讓步，僅就警廳之條件畧加修改，更備函送至警廳表

示接受警廳調停之誠意。此公函送去後延至二十四小時尙未見答覆，乃資本家更變本加厲，復於宿舍斷絕工人飲食。工人等憤激異常，除一面派代表見廠長交涉發放已屆期之工資外，一面又派代表通知警廳，說明資本家之惡劣手段，輕視警廳調停及欺負工人等情。并聲明倘日本資本家不悟，工人收回昨日之修改條件，其責任不在工人。在大康附近之內外棉及隆興兩廠（同在四方）工人，因久受同樣之壓迫，聽到大康工人罷工，卽已躍躍欲試。特別是吃不飽穿不暖挨打挨罵最厲害之童工竟轟轟嘶叫，不安於工作。最初本希望俟大康得勝後，彼等可乘便獲得同樣要求，故另推出三四十代表議定發一宣言表示願作大康之後援，不料大康工人所要求之條件，久未得廠方之答覆，該廠廠主因見工人不安，更調遣海軍陸戰隊包圍工廠示威。壓迫愈甚，反抗亦愈烈，急待擴大之罷工風潮，遂一潰而不易收拾矣！內外棉於二十三日下午實行罷工，隆興亦於二十四日中午停工，鈴木絲廠亦於二十五日早晨一致罷工，並聞滄口日本紗廠工人亦將追隨四方各廠之後，聞風而起。至四月二十九日參加罷工人數，已達一萬八千餘人。

自大康罷工之後，各工廠均相繼成立工會，又特別組織罷工委員會，委員會之下有糾察隊調查隊宣傳隊，有團有組，隊有隊長，組有組長，團有團長，以指揮工作，全體工友都很服從罷工委員會命令，秩序很是嚴整。隆興自罷工後，日本廠主，即雇用二百多保安隊壓迫工人，不準工人開會和自由出入宿舍等。另一方面，青島工潮擴大後，上海各日本紗廠工會即派代表前往援助，全國鐵路總工會亦發布宣言，號召各路工友實力幫助，膠濟路工友尤爲出力，青島學生界亦組織後援會表示援助。而且工人的團結力亦逐漸堅固起來，弄得資本家無法可施，支持了二十三天，結果竟被工人戰勝了。五月九日雙方簽字，由工會宣布十號晚復工，十日下午三點開紀念罷工勝利大會，到會的人數，約萬人左右，每人手中都執小旗一面，上書罷工勝利，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擁護工會……種種旗幟，另有極大的紅色旗幟二面，上寫罷工勝利字樣，開會時演說的人很多，每一人演說後，即大呼工會萬歲！工人團結萬歲！工人勝利萬歲！工人自由萬歲等口號，散會後，結隊遊行并舉行工會懸牌額典禮，工人擁擠三塊工會的牌子爲前隊，次爲軍樂隊，次爲會員，隊伍銜接長逾數里，兩傍均由糾察隊維

持秩序，工人高唱勝利紀念歌，一時爆發震天，歡聲雷動，三個紗廠工會牌子，高懸於他們的會所門口了。

## (二) 鐵路代表會與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

中國鐵路總工會是『二七』的產兒，是當時中國工人階級已形成的唯一的產業的戰鬥組織。在『二七』以前，鐵路工友的全國組織雖有計劃但無成就。『二七』以後的第一週年，全國鐵路總工會正式產生，十餘路工人領袖開始作全國的祕密的集會。雖遭曹吳軍閥數次的明顯壓迫，逮捕工人領袖至數十人之多，可是一年內的艱苦工作，畢竟完成了全國組織的雛形，到一九二五年『二七』紀念日召集全國鐵路總工會第二次代表大會。

大會開會前後計共四日，到十二路代表，共四十五人，議決要案十餘件。其議題可概括為三部分：(甲)總會報告與各路分會報告；(乙)政治報告，戰畧報告及『太平洋』，『漢堡』，『莫斯科』，三次國際會議之報告；(丙)會務——如組織，宣傳

，救濟，消費合作等問題。這次代表會可以表示出中國工人階級團結力之進步與階級力量之發展。大會前後四日中，各路代表精神十分振作，每日開會多至十二小時以上，但秩序整嚴從容，充分表現『二七』的遺留精神。

在『工人階級與中國現狀』議題中，大會指明中國工人階級目前的責任及其未來的責任。中國工人階級之發展是與中國的政治經濟狀況有密切關係的。鐵路工人是集中的產業軍之先鋒，工會的組織是由資本制度社會中蛻化而出的工人階級之武器；所以大會規定工會的責任，着重於統一的階級性的組織。全國鐵路總工會在當時實担负了兩重的工作：一方面是本會的基本組織之建立與羣衆化，另一方面則是開始担负引導本國各種產業工人階級的勞動運動。

在簡短的歷史之全國鐵路總工會的實況中，本身的工作尤爲重要，因此，大會有下列的進行方針之決議：（一）恢復所有曾經組織之工會；（二）整頓現有工會，建立堅固的組織基礎；（三）力謀工會之統一；（四）救濟失業；（五）要求以前罷工爭得之條件實行；（六）爭工人切身的經濟利益；（七）爭集會言論罷工之自由；（八）訓



練並教育工友羣衆。

這次全國鐵路總工會代表大會在中國革命運動史上有很大的意義，兩年前的「二七」是工人鬥爭失敗而退守的紀念日，兩年後的「二七」便是中國工人鬥爭復興而再進攻的紀念日了。

中國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的意義比全國鐵路總工會第二次代表大會更加重要，因為牠是中國大革命之前夜中國工人階級團聚準備劇烈鬥爭之表現，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之後緊接着便發生了中國歷史上空前的民族革命運動——五卅運動，因此牠更值得我們嚴重的注意。

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是當時中國最大的四個工會，即：全國鐵路總工會，漢冶萍總工會，中華海員總工會和廣東工人代表會議召集的。這次會議於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國際無產階級的示威日在廣州正式舉行，到會的代表共二百八十一人，代表工會一百六十六個，代表有組織的工人五十四萬有餘。正式開會的日子先後共計六天，工人階級憤激的心理和再不願承受現存社會制度的熱情，沒有一次不在每個代表的演

說中痛快淋漓的表現出來。

大會的議決案共計三十多個，其中最主要的爲：加入赤色職工國際，工農聯合，剷除工賊，組織中華全國總工會，工人階級與政治鬥爭，工人階級與經濟鬥爭等。加入赤色職工國際的議案有很重大的歷史意義，牠表示：中國工人階級不僅已有全國工人階級大團結的覺悟，同時已有國際團結的覺悟。在這個議案中，還很鮮明的反對亞姆斯德丹黃色職工國際破壞國際職工運動之統一。說到通過組織中華全國總工會，更是這次大會積極的結果，當總工會的章程通過和執行委員會選出時，『全國總工會萬歲』，『工人階級大團結萬歲』之聲不絕於耳，於此可見中國工人階級謀全國統一組織的熱忱。

在經濟鬥爭的議案中，指明當時中國工人階級經濟鬥爭的具體要求。在政治鬥爭的議決案中，說明每個經濟鬥爭同時就是政治鬥爭。工人階級與軍閥資本家帝國主義者的利益是絕對不能調和的，工人階級不根本推翻現存社會制度，即不能完全解放自己。又說明爲什麼工人階級要參加國民革命運動和爲什麼須爲國民革命運動的指導

力量，最後還指明爭集會結社言論出版自由，罷工自由等具體目標。

大會開幕的一天，全國勞動大會的代表全體參加廣州空前盛舉十萬人以上的紀念『五一』之大示威遊行；示威之後并與農民代表青年軍人代表舉行工農兵代表聯席會議，通過工農兵聯合的決議案，更可以說是大風雨逼近之一種顯著的預兆。

### 三 五卅準備時期農民運動發展的形勢

五卅準備時期，中國農民運動亦已開始發展。不過這一時期，農民參加革命實任是不平衡的，農民的作用當時還沒有很大的發展。大多數只是不自覺的無組織的參加，或者是大刀會小刀會，或者是紅槍會土匪式的反抗，或者是當兵——當孫中山的兵，如此各種各式的直接參加革命。只有廣東則有比較大的比較有組織的發展。

當時在廣東政府範圍以內，已經有了農民協會組織者計有番禺，南海，順德，香山，東莞，寶安，增城，惠陽，海豐，陸豐，惠來，鶴山，廣甯，清遠，高要，新會，花縣，曲江，普甯，潮安等二十縣。其中已經成立縣協會者有廣甯花縣海豐陸豐四縣。其他各縣均已有了區農協會成立。農協會員人數已達十六萬人。

農民的鬥爭亦已劇烈發展，反抗苛捐雜稅及反抗土豪劣紳地主官僚摧殘農協的衝突時有所聞。農民自衛軍會積極幫助廣州政府鎮壓商團叛亂。一九二四年雙十節的慘殺，李福林同范石生的軍隊都幫助商團，圍攻工團軍及農民自衛軍，李福林軍會捉去農軍八十餘人。當時革命軍討伐陳炯明在東江的勝利，農民羣衆的幫助也是一個重大的原因。海豐農會在一九二三年八月間被陳炯明解散，捕去會員二十人，監禁半年；一九二四年三月農會領袖們被釋出獄後又開復活大會，到會羣衆萬餘人，地主豪紳和陳炯明大驚，旋遭第二次武力解散，陳炯明敗後乃又重新復活。不僅南方如此，當時北方河南陝西農民鬥爭亦很多，例如河南盧氏縣農民羣衆因反對駐軍勒索苛稅，反對拉夫派款，會發生三次圍城暴動，參加羣衆動輒數萬。又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五日上海新聞報亦載有陝西農民暴動情形：『陝西東通渭南華陰華縣各地駐軍十師及鎮嵩軍，年來想盡方法，敲剝百姓，去年歲尾，該縣人民，被迫無奈，相繼攜鋤持犁，赴縣交農器罷工，大起風潮，該軍與縣官，不惟不設法消弭，且恃兵力強迫彈壓，結果槍殺鄉民數十人，風潮始息』。亦可見當時農民鬥爭之一斑。

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廣東農民第一次全省代表大會與中國第二次勞動大會同時在廣州開幕。到會代表一百二十縣人，廣東省農民協會亦於是成立。

#### 四 『五卅』屠殺前福州青島之慘案事件

民國八年日本帝國主義會因福州學生抵制日貨殘殺中國民衆，造成一次『福州事件』。不料七年之後——一九二五年，醞釀幾個月之福州英華書院學潮（福州學生反對基督教會學校，反對美國帝國主義對華教育侵略的運動），一轉而爲美國駐閩領事拘捕學生張秋仁事件，再轉而竟又發生四月八日學生被殺七人受重傷數十人之大流血事件。當日福州學生聯合會曾有急電報告殘殺真相，茲將原電照錄如下：

『福州男女學生數千餘人本日向省長請願露宿公署，薩鎮冰命陸戰隊，警察隊并其他軍隊開槍轟擊，槍柄亂打，鎗刀亂刺，死七人，重傷數十人，血流遍地，哀聲震天。現全城罷市，請一致援助！』

這個慘殺，直接是福建省長薩鎮冰指揮軍隊開槍，而間接發縱指使的，實際是美國帝國主義者！這一次『福州慘殺』有人比之於俄國革命運動史上的『林那殘殺』。

因爲這次『福州慘殺』是中國『五四』運動消沉六年後革命學生運動復活之開始，猶之乎『林那殘殺』是俄國工人運動受高壓消沉七年之後開始復活一樣。『福州慘殺』之後，又發生北京學生『五七』反帝國主義圍攻安福系教育總長章士釗住宅事件，則簡直是五卅運動的號聲了！

青島慘殺就比福州慘殺更加嚴重！前面會說青島工潮在五月九日雙方簽字十日復工。因爲這次工潮工人方面得到相當勝利，所以日本資本案極不甘心，工人恢復工作後，廠方即故意三番四覆地不履行條件，向工人挑釁，藉此造作口實向中國官廳報告，說：『工人不安於工作，必須解散工會』。中國官廳對着這個太上政府，自然只有唯命是從，故得令後即召集工人代表，申言：『工會應該取消，因爲日本人望着駭怕』。并拿出委任狀及金錢收買工人代表。不知工人經過二十餘日忍飢耐餓的奮鬥，所得成果就是工會，差不多就是工人的生命一樣，那肯取消！延遲至五月二十五日，資本案見工會仍活躍存在，更脅迫中國官廳，非解散工會不可，當地官廳因收買工人代表不成，即派大批武裝警察保安隊至四方欲實行以武方封閉工會，卒經工人羣衆堅決

反抗未果。日本帝國主義者見此情形，仇恨工人更甚，至二十八日夜深人靜時，中國官廳突調大批海軍陸戰隊協同原有武裝警察保安隊和陸軍祕密馳赴工廠附近駐紮，至夜半三時許，即以武力驅逐工人出廠，工人奮起肉搏，中外軍警一齊開槍，工人當場受傷斃命者八人，受重傷者十餘人，被捕者七十餘人。

這次大慘殺，完全是日本帝國主義者事前準備計劃，中國軍閥官廳張宗昌溫樹德即如法泡製。青島帝國主義軍閥這種殘暴行爲，與上海五卅流血中所表現的完全如出一轍。其手段之殘酷，唯有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俄皇屠殺彼得堡工人之行爲，差堪比擬。此亦正如彼得堡流血星期日的嘗與工人階級以政治的客觀教訓，而終於引起全俄無產階級，走上革命之大道。青島五月二十九日之慘殺乃喚起千百萬中國勞動羣衆之覺悟，而此民族所潛蓄之強有力的革命勢力亦遂揮去其睡魔而起以行動。

##### 五 五月三十日南京路開始大屠殺及上海民衆之反抗

到處都預示出大風雨之逼近，帝國主義與中國被壓迫民衆之流血的接戰在「五卅」之前即已陸續開始，五卅之前各地罷工及各種革命運動的發展，早已促起了英美日

法帝國主義強盜的殺機；尤其是反帝國主義的主力軍無產階級勢力之形成，更加使得帝國主義列強萬分的恐懼，更加使他感覺自己統治的不安，而更窮凶極惡的採用鐵血鎮壓的政策。自一九二五年開始以來，首先是日本帝國主義因親日賣國派安福政府上台，越發在中國橫行無忌。二月間上海日商紗廠工人已先中國各階級被壓迫民衆發難反抗，舉行一次七萬多人的大罷工，接着青島日商紗廠工人也罷工反抗，日本帝國主義對於中國工人階級這種反抗已斷然採取屠殺政策。五月十五日，上海日商紗廠資本家開槍殺死工人顧正紅并殺傷十多人，二十九日青島海軍陸戰隊得日本政府命令槍殺工人八人并殺傷拘捕無數工人。二十一日上海文治大學學生爲救濟死傷工人，募捐被巡捕房捕去施文定謝玉樹二人，二十二日上海大學學生赴顧正紅追悼會途中又捕去韓步先，趙振寰，朱義權，江錦維四人。被捕學生定於三十日在帝國主義會審公堂同時開審，這是上海各校學生出發講演之直接的動機。但同時，帝國主義當時還有一種壓迫，兼能危害商人等上層階級：即所謂上海納稅外人會，要於六月二日通過工部局提出的增訂印刷附律，增加碼頭捐，交易所註冊，取締童工法案等四案，反對這四案，



亦是各校學生出發講演之題目及宣傳的口號，且能引起一般市民羣衆熱烈的同情。在這一種上海民衆反抗帝國主義的『不穩』空氣之下，爲消弭這種『不穩』空氣，爲鎮壓這種『不安分』分子的反抗。列強帝國主義斷然採取屠殺政策，決不是一件偶然的意外的事件。

五月三十日到了，上海各校學生二千餘人分頭出發到公共租界各繁盛馬路散發『打倒帝國主義』的傳單，講演顧正紅被殺及學生被捕事件并反對工部局的四提案。自上午起各校學生已被捕房捕去十餘人，旋即釋出；但到下午講演的學生愈聚愈衆，聽衆亦愈多，巡捕復開始捕人，至午後三時許，只南京路老關捕房一處已拘留一百餘學生在內，當時未被捕的學生及聽講的市民，見此情形異常憤激，其時適值有一隊學生經過其處，聽見此事遂參加要求立即釋出被捕者。至三時許，聚集捕房門首之羣衆將近萬人，三時三十五分鐘，突有一西捕向空放一槍，接着印捕即奉命平放一排槍，羣捕亦向空放一排槍，羣衆登時大亂四散。這一日計死十三人，重傷十五人，被捕者五十三人。

三十一日，大雨。學生繼續至各馬路散傳單，講演。捕房復拘捕學生。老闆捕房宣布戒嚴。

六月一日。公共租界全體罷市，自上午七時起，南京路上學生工人及其他市民極多，發傳單者講演者到處都是。至十時許，所謂萬國商團和西捕印捕各臨陣備戰，先以自來水注射羣衆，至十時五十分鐘，遂開槍。這日死傷比前更多，狀況更慘。二次屠殺後，南京路最繁盛的一段，由新世界起至福建路止，完全陷於戰爭狀態。機關槍鐵甲砲車馬隊佔據各要害，這一戒備區域內除電車外，其餘車輛及行人概不能經過。

二日。屠殺案到處不斷地發生。南京路北前更加戒嚴。上午小沙渡紗廠工人罷工。被廠方協同西捕槍殺四人，都沉屍蘇州河底，楊樹浦碼頭工人亦被英人雇打手打傷三人，拘捕數人。帝國主義會審公堂復於是日開審三十日被捕的示威羣衆，公堂周圍外兵把守異常週密。至下午六時，遂又發生機關槍攻打新世界之事。原因據次日各報所載係有一批『某國人』假裝中國學生（能假裝中國學生的某國人，自然是日本人無疑了！），在新世界門口射死二匹美兵的坐騎，於是如狼似虎的帝國主義軍隊遂用機

關槍步槍一齊向新世界射擊，砲如連珠，歷時約二十分鐘之久，死傷數目，無法調查，但被捕確在三百人以上，且有二三十人立即下獄。在新開橋，又有西印捕攜機關槍向羣衆示威，并開始拘捕罷工之電車工人。

三日。意美海軍陸戰隊登岸，把守電氣、來水等重要工廠，其他各艦亦陸續到來，或中途被召回滬。新世界下午被商團佔據去了！這日上午，楊樹浦又發生大屠殺。海軍陸戰隊上岸後，楊樹浦完全變成恐怖世界，『文明』的帝國主義軍隊遇見學生或工人裝束的迎頭便打。計三日一天之內楊樹浦死四人，重傷六人，輕傷者不計其數。是日并有一美兵武裝侵入華界尋釁。

四日。屠殺仍然繼續下去。外艦開來上海日見增多，計至四日爲止，各國兵艦共有十三艘，其中屬於英國的二艘，屬於美國的三艘，屬於法國的三艘，屬於日本的三艘，屬於其他國家的還有二艘。陸戰隊已經登岸的有五百五十人，尚有二千名正準備登岸。楊樹浦西捕開排槍轟擊罷工工人，幸未傷命。美日陸戰隊有多人帶槍入華界搗亂。英國商團和印捕也有數人闖入華界。尤其難堪的，即四日上午陸戰隊包圍上海六

學沒收一切文書，驅逐學生出校，強迫騰出爲陸戰隊駐紮。此種暴行到五日後復施行於大夏，同德，南方等校。還有滄洲，東亞，大東三旅社亦被檢查。

三十日大屠殺後之第二日，全上海卽已開始罷工罷課罷市。截至六月四日爲止，公共租界完全罷市。特別是四日那一天，罷工尤其突然高漲，全上海各學校之罷課自無待言了。上海民衆八十一年在帝國主義高壓之下過生活，其仇恨帝國主義自不必說，尤以下層階級爲甚。所以屠殺之後，全埠鼎沸，反帝國主義之潮流普遍於一切被壓迫的民衆。尤其是工人階級，因爲此次屠殺發生的主因是爲援助被殺工人而起，所以工人不惜犧牲生命務必達到各業罷工而後已。四日爲止，罷工總數已有二十萬人。三十一日各民衆團體在上海總商會開會時候，日商內外棉紗廠工會代表極激昂慷慨請求商人罷市，并且當場提出日商紗廠工人要求之七條件：

①懲辦打死工人學生之兇手，并賠償損失。

②承認工人有組織工會及罷工之權利

③禁止毆打工人。

④改良工廠衛生。

⑤禁止虐待童工和女工。

⑥禁用外國巡捕。

⑦反對印刷附律。

六月一日即已有數業工人實行罷工。自二日起大部份電車工人停止工作，小沙渡原未能工各廠，如同興日華內外棉第三第四等廠都開始罷工，楊樹浦祥泰木行等廠工人及大阪碼頭工人亦相率罷工反抗。三日起電車工人差不多完全停工，電話電燈工人亦罷工三分之二以上，祇剩少數人因被壓制不得已而工作；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二廠工人亦均停工；小沙渡則罷工者已達二十四廠，其中有四廠屬於華商，餘均為日本資本家所開；楊樹浦自當日慘案發生後，東方怡和德大豫豐各紗廠工人遂全體罷工，其餘亦自動的停止工作。自六月三日起，不但各工廠工人罷工，即在西人機關或住宅服役之西崽，亦開始罷工表同情於被慘殺的同胞。四日罷工風潮尤為突進。計四日罷工者有康益漢士兩洋行華人職員，日商絹絲廠工人，蘇生洋行，慎昌洋行，葡萄乾公司

，柯達公司等華人職員，英美烟公司及日華紗廠工人，同茂公司，立興洋行，挪威商辦中國五金物品公司，中孚銀行華人職員，日商伊籐烟公司，公大紗廠工人，美豐銀行，大英銀行，華比銀行華人職員，伊文思書局工人，上海總會侍者等。恆豐公司工人亦罷工。工部局鐵工廠工人，電汽處職員亦因工部局之殘暴，舉行罷工反抗。其他各洋行西崽亦多數罷工，碼頭小工完全停止工作。印刷工人除商務中華二大印刷廠已罷工外，其他亦多罷工，尤其是西報排字工人之罷工，使帝國主義機關難施其巧。西報工人并會開會遊行示威。自五日起，上海西報出版異常可憐，甚至文匯報用油印出版者，可見外報之苦況了！四日上午上海總會乃召集各廠代表在少年宣講團開會，共到五十二個工會，二百餘代表，各代表報告各該廠罷工情形與人數。代表報告時無不慷慨激昂，誓願堅持到底，於此可見中國工人階級是國民革命運動中有力的指導者了。

學生羣衆在此次運動中自然是熱烈參加的，首先起來援助工人的是學生，甚至於積極表示不怕犧牲反對『四案』的也是學生出頭。當時上海的學校，沒有一個不參加

運動，便是向來不做社會活動的聖約翰大學此次也激起義憤，與校長衝突，脫離學校投入此次之風潮，其他的學校便可想而知了。

上海中等商人和小商人階級此次亦積極參加。在三十日和六月一日的被害者當中，不少小商人和店夥。三十日屠殺之後，各馬路商界聯合會紛紛投函總聯合會，憤激地表示願意犧牲願意罷市爲學生後盾，總聯合會亦屢次派人和學生會接洽。三十一日各團體在上海總商會開會時候，各馬路商界聯合會也站在工人和學生一邊，共同脅迫總商會非罷市不可，並且各馬路商店不等至一日，卽已紛紛閉門停止營業。

上海的大商人階級此次亦被迫得參加運動。各馬路商界總聯合會首先答應工人和學生的罷市要求，但總商會則須工人和學生及小商人的三催四迫才勉強簽字答應罷市。五月三十一日午後各馬路商店多已閉門，到六月一日早晨七時南京路大商店還有開市者，直至流血重演之後，才完全關門。銀行公會和錢業公會則不從總商會決議，於全市停業聲中，依舊開門營業，祇寫一封信給工部局輕輕抗議而已。一直至工部局置此抗議信不理，及字林西報以滑稽口吻加以嘲笑之後，才於三日起勉強罷市。總商會

雖然答應罷市，但同時即與帝國主義妥協，公然出來以調人自居了！

不過無論如何，革命羣衆與帝國主義強盜的血戰却在不斷擴大。一方面，帝國主義的凶暴壓迫依然不稍減輕。上海大學被封後，接着南方大學附中，大夏大學，同德醫學也走同樣的命運，各國海軍陸戰隊繼續登岸，大炮機關槍把守各要區，南京路的戒備日益加嚴。開槍威嚇羣衆之事日必數十起，死傷時有所聞，租界內的人民日夜生活於恐怖世界之中。六月五日晚十一時，萬國商團突然下令同時在南京路接連山東路福建路湖北路一帶檢查行人，所有過路的中國人千餘人，無論男女老幼，乘車或步行，登時失其自由，在手鎗刺刀威迫之下，列成隊伍盡被驅入老關捕房嚴行搜索，一千餘人鵠立露天細雨之下一二小時，結果西捕查無所得，始釋放而出。當時并有一汽車夫因行路稍緩，被商團刺傷奄奄一息。八日搜查惠中旅舍無所獲，同日有河南來滬旅行之學生十五人在梁溪旅館被捕。六月五日爲止，英美日法意等國兵艦已增加至二十六艘，其中屬於美國的十三艘，屬於日本的五艘，屬於英國四艘，屬於法國的三艘，屬於意國的一艘；各國軍隊已增至五千至六千名。自三日起，各國陸戰隊商團及西捕



越界肇禍者日必數起。五日西捕在曹家渡越界捕人並開槍擊中國保衛團。同日南洋大學學生在華界講演又被便衣西捕捕去，十二日西捕在北四川路華界拘捕啓賢學校學生，調來鐵甲砲車二輛，英美水兵一二百人幾與保衛團接戰。其他外兵武裝侵入華界尋覓者極多，不可勝紀。截至六月十八日爲止，公共租界的戒備仍十分嚴密，恐怖空氣并未減輕。

另一方面，羣衆的反抗亦繼續高漲。除公共租界外，法租界亦於五日罷市一天，南市亦加入罷市。罷工工人更日有增加。截至六月十八日止，罷工工人已增至二十幾萬人。新加入的罷工最重要的是海員工人，據十六日統計，已罷工之船共四十八隻，罷工之海員共有二千七百五十餘人。公共租界華捕罷崗亦過半數，這更可證明帝國主義之橫暴，甚至激起其所雇用之巡捕的反抗了！積極指導上海民衆做反抗運動而爲其代表者是工商學聯合會。風潮發生不久，工商學聯合委員會即組織起來，其所包含的團體是上海總工會，各馬路商界聯合總會，全國學生總會，上海學生聯合會。政府特派員蔣廷幹會宗鑑及交涉員許沅到上海後，工商學聯合會特於六月十一日召集羣衆大

會，邀請蔡會許到會宣布意見，那日到會者各工廠工人，各學校學生及各馬路商人，近二十萬人，政府特派員及交涉員俱堅邀不到，會場中羣衆一致對外交官不滿，散會後並在華界遊行示威，革命情緒熱烈異常。先是六月七日上海工商學聯合委員會即已提出條件，計先決條件四，正式條件十三。現在分別轉錄如下：

A 先決條件：

①宣布取消戒嚴令。

②撤退海軍陸戰隊並解除商團及巡捕之武裝。

③所有被捕華人一律送回。

④恢復公共租界被封及佔據之各學校原狀。

B 正式條件：

①懲凶。從速交出主使開槍及開槍擊死工人學生市民之凶手論抵，並由中國政府派員監視執行。

②賠償因此次慘殺案所受直接間接之損失，如(甲)死傷者，(乙)罷工，(丙)

罷市，(丁)學校之被損害者等項，須詳細查明酌定賠償額，應由租界當局按數賠償。

③道歉。除上述二項外，應由英日兩國公使代表該國政府，向我國政府聲明道歉，并担保嗣後不再有此等事情發生。

④撤換工部局總書記魯和。

⑤華人在租界有言論集會出版之絕對自由。

⑥優待工人。外人所設各工廠，對於工作之華人，須由工部局會同納稅華工會訂定工人保護法，不得虐待，并承認工人有組織工會及罷工之自由，并不得因此次罷工開除工人。

⑦分配高級巡捕。捕房應添設華捕頭，自捕頭以下各級巡捕，應分配華人充任，并須佔全額之半。

⑧撤銷印刷附律，加徵碼頭捐，交易所領照案。該三案歷經我國政府聲明否認，嗣後不得再提出納稅人特別會。

⑨ 制止越界築路。工部局不得越租界範圍外，建築馬路，其已築成者，由中國政府無條件收回管理。

⑩ 收回會審公廨。

(甲) 民事案

(子) 華人互控案，華法官得獨自裁判，領事無陪審或觀審權。

(丑) 洋人控告華人案，領事有觀審權，但不得干涉審判。

(乙) 刑事案

(子) 洋人控告華人者，其有關係之領事，得到堂觀審，但不得干涉審判。

(丑) 華人互控案，華法官得獨自裁判，領事無陪審或觀審權。

(寅) 華人犯中華民國刑法或工部局章程，照(丑)項論，且原告名義，須用中華民國，不得用工部局。

(丙) 檢察處一切職權，須完全移交華人治理。

(丁)會審公辦法官，均須由華政府委任之。

(戊)會審公廨之一切訴訟章程，完全由中國法官自定之。

(己)對於會審公廨一切事權，除與上『甲至戊』五項無所抵觸外，均可根據條約執行之。

⑩工部局投票權案。租界應遵守條約，滿期收回，在未收回以前，租界上之市政權，應有下列兩項之規定：

(甲)工部局董事會及納稅人代表會，由華人共同組織，其華董及納稅人代表額數，以納稅多寡比例爲定額，其納稅人年會出席投票權，與各關係國西人一律平等。

(乙)公共租界外人之納稅資格，須查明其產業爲已有的，或代理的二層，已有的方有投票權，代理的則係華人產業，不得有投票權，其投票權應歸產業所有人。

⑪要求取消領事裁判權。

⑫ 永遠撤退駐滬之英日海陸軍。

這些條件本來都已經是很遷就的最低限度的要求，但在軍閥官僚買辦及資產階級看來却還是非常『過激』的，所以政府特派員和交涉員都不敢接受，加以當時反抗運動中已經起了鮮明的階級分化，所以上海總商會就把這些最低限度的條件擅自修改了。當時總商會所提出的條件如下：

第一條 撤消非常戒備。

第二條 所有因此案被捕華人一律釋放，并恢復公共租界被封及佔據之各學校原狀。

第三條 懲囚。先行停職，聽候嚴辦。

第四條 賠償。賠償傷亡及工商學因此案所受之損失。

第五條 道歉。

第六條 收回會審公廨，完全恢復條約上原狀：華人犯中華民國刑法或工部局章程，須用中華民國名義為原告，不得用工部局名義。

第七條 洋務職工及海員工廠工人等，因悲憤罷業者，將來仍還原職，并不扣罷業期內薪資。

第八條 優待工人，工人工作與否，隨其自願，不得因此處罰。

第九條 工部局投票權案(甲)工部局董事會及納稅人代表會由華人共同組織之，納稅人代表額數，以納稅多寡比例爲定額，其納稅會出席投票權與各關係國西人一律平等；(乙)關於投票權須查明其產業爲已有的或代理的，己的方有投票權，代理的其投票權應歸產業所有人享有之。

第十條 制止越界築路，工部局不得越租界範圍外，建築馬路，其已築成者，由中國政府無條件收回管理。

第十一條 撤消印刷附律，加徵碼頭捐，交易所領照案。

第十二條 華人在租界有言論集會出版之自由。

第十三條 撤換工部局總書記魯和。

由這二種條件比較起來，很明白看出：(一)總商會修改工商學聯合會「優待工人」

的一條，換言之，即總商會不許工人有組織工會及罷工之自由；（二）總商會獨不提『永遠撤退駐滬之英日海陸軍』『分配高級巡捕』和『要求取消領事裁判權』三條；（三）關於收回會審公堂一條，總商會祇要求恢復不平等條約的原狀（因會審公堂制度不是根據不平等條約的，簡直是不顧條約無理霸佔），而不想根本收回。這三點是最重要的，其餘各條減輕要求的很多。由這比較，我們很明白知道總商會妥協的傾向在對外祇要恢復不平等條約的原狀，對內則壓迫此次運動的主動軍——工人階級。工商學聯合會十七條件是代表革命勢力為一般人民謀少許自由，總商會十三條件則代表反動妥協勢力，因為他們只顧少數資產階級的利益。國民革命運動之中必然要起階級分化，上海五卅運動開始時期這種十七條件與十三條件之衝突，正是後來資產階級背叛革命聯合戰綫破裂之先聲。不過這在五卅運動的初期還沒有發生怎樣大的影響，所以運動還是如火如荼的向前發展。

## 六 緊接『五卅』上海事變後之各地屠殺及反抗運動

事變的進展是很迅速的。不消兩三個星期，上海南京路鎗聲已震動了全國各重要



城市，直至最偏僻的村鎮。帝國主義的鐵蹄不但踐踏了上海，而且走遍全中國。全國各地援助上海工人學生的運動，帝國主義祇有報之以屠殺。同時，帝國主義的凶暴壓迫亦祇有引起革命羣衆更熱烈的反抗。由遠處的回聲打轉到上海來，我們看見各大城市的民衆都已崛起捲入這一反帝國主義的浪潮。現在我們可以依次敘述一下緊接『五卅』上海事變後之各地屠殺及其反抗運動。

北京 帝國主義在北京的橫暴亦目所共睹。六月三日北京學生五萬餘人大示威，隊伍行至東交民巷時，竟被阻止不許通過。當時日兵及安南兵都嚴陣以待，使館界口預備水龍向羣衆射擊以及二美兵騎馬向隊伍亂衝并擊槍示威恐嚇羣衆。三日以後，公使館屢次無事自擾，使館戒備日益加嚴。至十四日，復在使館界口佈設刺鐵綫網。這就可見帝國主義在華的總坐辦怎樣看待中國人民了！羣衆反抗運動亦繼長增高，六月十日又召集國民大會，到會羣衆竟達二十幾萬人，議決援助滬案對付英日議案二十條，並在大風雨中作示威遊行（根據六月十五日上海申報紀載）。北京學生聯合會商會都發表宣言，正式宣布與英日經濟絕交，并定六月二十五日爲全國大示威運動，請各

地一律罷工罷市罷課半日，實行全國總抗議。

鎮江 鎮江英國帝國主義開槍示威，先繼上海屠殺而起。六月五日，鎮江各工廠工人及黃包車夫俱罷工參加三萬餘人之示威遊行運動。當隊伍經過銀山門時，突有英人汽車一輛馳來，撞倒牆壁，壓傷遊行女生八人。當日租界工部局不知如何忽然起火，巡捕遂開槍數響，并上刺刀預備衝鋒驅散羣衆，雖未殺人，但帝國主義處處以武力爲對待徒手羣衆之手段已昭然若揭了。

漢口 『五卅』上海屠殺後的大屠殺，不能不算六月十一日漢口一役。帝國主義的殘暴在漢口愈加充分表現出來，帝國主義者不但自己動手，而且勾結軍閥共同壓迫援助上海慘案的工人學生羣衆。『五卅』消息，六月一日傳到武漢，學生方面于二日即多數罷課，三日即總罷課，其後大遊行了兩次，平日半生不死的學生聯合會，至此亦生氣勃勃，實際上成爲學生運動的指導機關，他們組織的四五十個演講隊，不分早晚的在街上講演，傳單畫報，到處散發。他們一方面十分努力於國民革命主力軍之工人羣衆的聯合；另一方面，誠懇的要求商人參加。工人方面，亦已開始活動，決定

于六月十三日舉行大示威運動，十四日開始罷工，不幸十一日的慘劇發生，大罷工的事實，竟未實現；中間雖有三五處舉行罷工，然而都被軍閥官廳，隨即壓迫上工了。漢口商界，代表大商人階級的漢口商會，代表買辦階級的華商總會，對於『五卅』混案，都漠不關心，工學界的代表去和他們接洽，前後總不下一二十次，然而沒有一次不是以閉門羹相餉的；這還不算，當武漢學生要求武昌商界罷市，和漢口工人預備遊行示威的時候，漢口總商會會長竟連夜跑到蕭耀南那裏去，說這次運動完全是過激派在內煽動，請督辦及早解散。武昌商會和漢口各團體聯合會，比較起來是代表中小商人的，所以他們對這次的運動，還能表示相當同情，並且有時候還參加，如武昌商會，在蕭耀南鐵蹄之下，居然也組織了一個五六千人的遊行，其後因為總商會的告密，官廳捕拿他們的首領，於是中小商人的反帝運動，亦遂一蹶不振了。

蕭耀南當運動初起的時候，即具了壓迫的決心，所以在二三兩日的时候，就不許學生在街上張貼畫報，更不許學生過江講演，武裝軍警，星羅棋布，對待學生，有如盜匪。同時即以過激黨的名義，看管工人的首領，絕對禁止工人集會；未幾，而漢口

慘案發生，大壓迫更從此開幕了。

六月一日的漢口慘案發生，外表上是由於太古公司的毒打碼頭工人，然而實際上是因為漢口一般羣衆憤恨帝國主義的結果。當日事實的經過是這樣的。一般表同情於碼頭工人的車夫棉花廠及各種工人市民，集合到太古碼頭，氣憤的羣衆心理，當初還只表示於非正式的互相談論，自然是反對帝國主義以及斥責中國軍警不能保護國民的一派話，並未有正式演講，然而已經觸怒了中國軍警，竟欲以槍柄刺刀驅散羣衆，逼得羣衆無路可逃，大衆遂向租界方面移動，英界印捕亦遂武裝截擊，幾起衝突，後羣衆被逼，遂突圍向大智門方面逃避，其時英領卽召水兵登陸，一面下戒嚴令，將租界要案，概行把守，斷絕交通。大智門本是工人窟，當時見太古碼頭羣衆的被逐狼狽情形，憤激異常，叢集大街者，約四五百人，萬頭攢動，漸近租界，而租界以內的市民車夫等，亦聚集千餘人，英捕卽用水龍沖射，羣衆遂向華界奔逃，將鐵柵衝破，英水兵復提槍追擊，華界工人見此慘狀，熱血沸騰，急上前營救，英水兵見羣衆勢盛，便開機關槍射擊，一時彈如雨下，血肉橫飛，當場擊斃數十人，重傷三十餘人，輕傷者

不計。肇禍後英兵乃從容將電燈滅息，將死者屍首用汽車移往他處，將重傷者送往醫院，重傷者相繼死十二人。

慘殺之後，工人學生羣衆與帝國主義爭鬥的態度更決絕，定十三日開國民大會，以謀反抗。可是軍閥蕭耀南爲效忠帝國主義，乃大施壓迫，立即捕殺革命戰士蕭英等四人，拘六人，解散學生聯合會，封閉揚子江通訊社，禁止工人偶語，捕小商人首領鄭慧吾，指學生代表爲過激派，嚴行逮捕，通緝參加此次反帝國主義援助滬案運動者八十餘人，解散漢口中學，並出布告說漢案爲流氓所爲，以後如有羣衆示威運動，卽係流氓滋事，決就地正法。十三日的國民大會亦就因此流產了。

九江 九江也有機關鎗聲。六月十三日，日本浪人故意在九江台灣銀行廢址之內放火，藉以嫁禍『暴動的』中國人。軍警用救火車馳至時，日本浪人復制止救火，英日戰艦陸戰隊二大隊卽登岸排設機關鎗，并向空連放二響。事後各埠日文報紙都以頭號字登載九江『暴民』焚毀台灣銀行之消息，日本公使且以此事向北京政府抗議。然而帝國主義這種陰謀並不能阻止羣衆的反抗；而且帝國主義所以採用這種陰謀，適

足以表明江西民衆反抗帝國主義之激烈，因爲帝國主義施行這種陰謀的時候，正是九江民衆援助上海五卅被殺民衆，羣集於英日領事館前講演，因羣情憤怒難遏，致與外國巡捕衝突，發生搗毀領事館窗戶事件的時候。

湖南

『六一』（一九二三年六月一日，日艦水兵登陸槍殺中國民衆，激起罷工罷學罷市反日運動的紀念日）之夜，長沙民衆對日紀念的大示威後之夜，上海『五卅』慘劇之哀音已傳進長沙，六月二日上午已有學生講演隊的旗幟在街上往來，大公報叫號外亦飛滿街衢。傍晚六時，轟轟烈烈的兩萬人以上的市民大會在省教育坪召集了。這一大會分子，當然是工人與學生佔大多數。大會呼出『反對一切帝國主義』，『對英日經濟絕交』，『廢除不平等條約』，『收回租界』，『取消領事裁判權』，『收回會審公堂』，『沒收英日在華所辦工廠』，『撤退外人在華駐軍』，『實行國民革命』等口號；又通過即日成立『青滬慘案湖南雪恥會』。散會後立即整隊遊行，情緒十分激昂。六月三日和四日，工人和學生的宣傳隊遍布城鄉內外，各校學生會紛紛開會討論援助辦法。五日舉行空前的大示威運動，參加羣衆約十萬人以上，須經過四小

時始能通過一地。指揮這運動的是以工人學生爲中堅的雪恥會，雖然雪恥會分子不止是工人學生。雪恥會在這一天並通電全省各縣一致發起同樣的組織和同樣的運動。這一運動大有立即擴大的形勢，但是政府的壓迫來了。因爲六月二日晚激烈的羣衆運動，三日趙恆惕即滿城張貼告示，說什麼湘西戰事未靖，深恐土匪潛來省城，如有亂黨乘機煽動，定予就地正法。但這一告示並沒有能嚇退革命羣衆，所以工人學生之奔走呼號如故。六月五日雖然趙恆惕滿城戒備，如臨大敵，而遊行示威運動依然如期舉行。六日晚間因爲新河英人打傷華僕及上海新世界楊樹浦之慘殺迭起不已，工人及男女學生又沿街呼號，並勸軍警一致對外，軍警多感泣不已，不過軍閥官廳之壓迫亦隨之加重，六月七日長沙全市白晝戒嚴，各學校門口派兵站守，不許學生出門，教育會四圍重兵禁止出入，重要街道五步一雙崗，便衣偵探全數出發，羣衆領袖之住宅都被派兵搜索，『宣傳過激者斬，煽惑軍心者斬……』一類的告示，遍街小巷無處不貼，同時責令各校當局勒令學生上課，間有學生冒險上街講演者，旗幟都被撕毀，幾乎發生武裝衝突。

當時長沙的運動大概如此，現在再來看看水口山的一幕。水口山是省有錳礦，工人三千餘人，一九二二年成立工人俱樂部。一九二三年被政府收買工賊竄步程武裝解散，鎗殺工人二名。工人俱樂部解散之後，虐待工人更甚，工資積欠半年不發，平日以土匪看待工人，監視極嚴。『五卅』慘案發生，該處工人激於義憤，特派代表到衡州學生聯合會探問情形，適有由省回衡之學生彭平之君見工人如此熱心，欣然願往，到山後工人開露天大會，請彭君講演，并議決停工示威，旋被軍警解散。六月十七日早晨停工示威，當工人正在集會之際，局長鄧壽基下令軍警開槍轟擊，結果工人傷者十餘人，工人代表被捕者二十餘人，彭君亦在內。鄧并誣指工人反帝爲土匪劫槍劫餉，請示趙恆惕，趙立覆電就地正法，幸被捕工人及彭君對於土匪二字雖嚴刑拷打，亦不承招。省方雪恥會又急電警告并派人交涉，鄧始殺心稍戢，然而中國軍閥官僚之效忠帝國主義，於此亦就暴露無遺了！

廣東 廣東在當時乃一革命策源地，對於援助滬案反帝國主義運動，自然更不讓人後，所以『五卅』消息傳到，廣州學生聯合會立即聯合各團體在廣東大學操場開



羣衆大會，舉行示威遊行，並全場通過組織一個援助滬案的工農兵大同盟，進行一切工作。適其時英國帝國主義的工具楊希閔劉震寰等軍閥實行叛亂，時局嚴重，各界咸注全力於撲滅楊劉事件，對於援助上海五卅運動，不得不暫行停頓。然而對於外國的運動進行仍未稍懈，尤其注重在香港的活動，學生聯合會和新學生社都派代表到香港發動罷工罷課。中華全國總工會更專派代表到港切實指導罷工。本來香港工人對於八十年來的奴隸待遇已經受够，即使沒有上海五卅事件，香港沙面奴隸們也會有起來對不住英國皇家的一天，既有五卅屠殺，奴隸們便再也忍不住了。一聲呼喊，大家拋了工具，拍拍手，端正了帽子，成羣結隊的離開他們生活所托的香港和沙面了，這就是歷史上可資紀念的六月十九日。這次罷工最先發難的是海員電車印務工人，接着就是洋務起落貨煤炭工人。於是各種工人相繼踵起，機器船塢工人殿其後，前後約十五日，完全罷盡，而罷工局勢遂以造成。罷工後工人從火車輪船前山江門三水河口分道返省，沙面洋務工人亦同時並起。

香港工人既於六月十九日開始罷工，乃即發布宣言，說明罷工之原因，宣言之後

，附以要求，分爲兩大綱：第一綱，擁護上海工商學聯合會之十七條件；第二綱，對香港政府要求政治自由，法律平等，普通選舉，勞働立法，減少房租，居住自由等六項。香港政府對於罷工非常氣憤，因此宣布歐戰時所無的戒嚴令，及禁止糧食出口令與禁止金銀塊底紙幣出口令，一面以鐵血政策鎮壓香港，一面又欲以封鎖政策飢餓廣東。然而工人激於民族義憤，萬死不辭，蜂擁離港，沛然莫禦，素以兇殘著稱之軍官總督史塔士雖捕領袖數十，亦卒無濟於事。於是『東山崩裂，洛鐘響應』，沙面英領事撻米遜遂於六月二十三日對沙基遊行民衆施行大屠殺了。此時廣州時局已稍平定，乃定六月二十三日舉行援助滬案第二次示威大遊行，是日到者不下六七萬人，行至沙面租界對岸之沙基地方，被英兵發排槍及機關槍掃射，英法葡艦並開巨砲，轟擊達二十分鐘之久，當時擊斃中國民衆五十二人，受傷者一百七十餘人，是即轟動世界之沙基慘案。沙基屠殺之後，廣東民衆莫不悲憤填胸，厲行經濟絕交，封鎖海口，工人方面更成立省港罷工委員會，以主其事。

天津 自五卅慘殺消息傳到天津後，天津工人學生即異常活動，六月五日起，

學生一致罷課，在南開大學操場集合，議決援助辦法，並出發遊行，沿途大呼『打倒帝國主義』，『收回租界』，『取消外人在華一切特權』，等口號。此後他們便努力於羣衆的宣傳組織以及募款接濟上海工人等。不久，海員罷工了，天津總工會成立了，帝國主義者嚇得屁滾尿流，於是便指使他們的走狗奉系軍閥李景林出來干涉，封閉各界聯合會與海員工會。有日資關係之紗廠工人奮起罷工，李景林壓迫工人，更不遺餘力。六月十四日，日本帝國主義者更命軍閥包圍罷工工人，當場槍斃無數，並捕去學生聯合會職員多人，拷問會長辛璞田，逼令供出煽動罷工等『陰謀』的實情，辛璞田竟至昏暈三次，然而羣衆反帝國主義運動依然不斷發展。

南京 南京民衆素來比較消沉，但是『五卅』大潮突起，也就把消沉的南京民衆驚醒了。於是有六月三日和四日兩天很熱烈的遊行示威，六月三日在城內，六月四日在下關。到下關的唯一目的，在喚醒英廠和記洋行幾千工友起來共同做反帝運動，因為在南京地方，只有他們才可殺進英國帝國主義勢力的營寨。大隊到和記蛋廠的時候，剛剛是正午十二點鐘放工——這是預定的計劃。大隊圍着和記工廠差不多成了一個

半圓形，大喊：『工人團結起來』，『罷工援助上海被殺同胞』，『打倒帝國主義』等口號，學生在烈日之下這樣憤激，工人就受了很深的感動。晚上又有熱烈的學生羣衆——東大附中的特別多——跑到下關去接洽罷工的事情。果然，六月五日的一大早，和罷工第一次大罷工居然實現了。罷工後，第二天即進城遊行。遊行至東南大學體育館集合時，口號呼聲震動天地。擲帽的，擲旗的，跑的，跳的，簡直成了瘋狂狀態。罷工之後工人即自動組織工會，同時學生講演募捐之事亦積極進行。

罷工支持一月有餘，至七月十七日始以廠方承認十二條件復工。條件內容，工資自十六千小錢加至九元一月，其餘對於待遇上亦畧加改善。復工後工頭不像從前那樣兇暴，英監工也比從前客氣得多。工人方慶此次罷工爲有相當代價。不料資本家陰險狠毒，七月三十一日和記宣布暑期停廠，竟不照約發給工資，工人代表交涉無效。廠方乃調英『杜班艦』陸戰隊四十餘名，荷槍實彈包圍工人，工人見勢不佳，爭相躲避，秩序大亂，英兵竟開槍轟擊，遂有南京慘案發生。是役當場死工人一人，輕傷二十六人，重傷一人，左腿竟成殘廢，慘案發生後，南京各界遂有下關慘案後援會之設，

以指揮工作。

青島 青島第一次的慘殺，發生於五卅前一日，事出之後，因壓迫嚴重，消息不能外露，所以工人於傷亡失業之餘，一部分遂忍辱上了工，其餘則由資本家在鄉間招募新工補充。青島慘殺發生之後，次日上海即發生五卅巨變，接着掀起全國的反帝國主義的運動。可憐山東方面，受了官廳的壓迫，只許單提上海，而不許提青島二字！在這時候，膠濟鐵路總工會四方機廠分會的工人，因階級的同情，忍不住再鍼默了；所以就乘着全國反帝國主義運動的高潮挺身而起，出來領導羣衆去反抗強暴的日本帝國主義和軍閥。經過四方機廠數千工友幾次冒萬難的遊行演講之後，青島官廳包辦的愛國團體才失了勢，工學兩界的羣衆組織才成立；四方機廠又自己單獨組織一「青滬慘案後援會」，每日分派講演隊到各處講演募捐，有的沿膠濟綫出發到七八百里之遙的濟南去。在四方紗廠工人第一次罷工時，膠濟路工人即在實際竭盡助力和聲援，此次又獨力領導起羣衆向帝國主義進攻，自然在日本帝國主義的眼中，他們比紗廠的工人還要可惡。紗廠工人第一次（五月二十九日）被屠殺之後，不但在第一次罷工時所

得到利益完全推翻，并且更加虐待，有一個童工被打得頭破血流，工人理論不能得直，所以七月二十四日仍舊由大康紗廠發動，與內外棉隆興三廠又罷了工。

工人罷工後都被保安隊警察嚴密監視，行動不得自由。罷工的第二日，恰好日本帝國主義走狗，第一次屠殺青島工人的劊子手張宗昌巡行到青島，日本資本家看見他們的保鏢來了，於是向工人進攻得更加凶猛。二十五日午前四時，資本家所收買的走狗，即拿着手槍鐵棍，強制工人上工，工人不上工，當被走狗打傷二人，警察和保安隊都置若罔聞。幼稚的工人們雖見官廳如此之壓迫，可是心裏還妄想張宗昌總不至作第二次屠殺，所以就推出請願團十五人，做了一面旗幟，上書：『青島紗廠工人請願團歡迎張督辦』。那知到了青島，軍警宣布戒嚴，工人只得忍淚而回。

在工人請願沒有結果的時候，正是張宗昌在青島受日本領事和廠主及中國商家在歡迎席上，決定殺人大計的時候。日本資本家和領事，自然捏造事實，拿『赤化』，『過激』，『損失』，『治安』等德惠張宗昌；而一般商家，因為向來做的日本生意，自慘案發生以後，就高唱『對英不對日』，不肯實行經濟絕交，久為工學兩界所吐

罵，青島公民報主筆胡信之君，更是責罵得利害。所以商會會長隋石卿，真有將胡暗殺之企圖。這次張宗昌到青，商家歡迎極備張，甚至每商家均攤洋三千餘元，更受胡君嚴厲斥責；因此就由商會正副會長，在張宗昌面前告發，說紗廠工潮都是胡信之一人煽動起來的。狗頭將軍張宗昌於盛筵之下，又得兩方三十萬元的報效，所以青島第二次大屠殺遂又開始了！

首先將紗廠工潮摧殘下去，接着張宗昌即派大批軍隊，將膠濟鐵路「青滬慘案後援會」封閉，捉去工人十三人及四方小學教員李某一人；同時在滄口有幾處日本紗廠，也被廠主告發，被張宗昌捕去工人十餘人及青島學生七八人。——自接二連三雷厲風行的大捕捉以後，青島馬上變成了恐怖世界，四方機廠不敢去上工的工人達數百人之多，都逃往各處，有的還半途被捉。至七月二十九日晚間，公民報主筆胡信之和四方小學教員李某，沒有宣布罪狀就執行鎗斃了！其餘的工人學生等都陸續帶往濟南烟台鎗斃了！報館大半都被封閉，其餘通緝者更不計其數，於此青島反帝運動暫時又被張宗昌血葬了！

除以上各大城市外，其他如開封，福州，廈門，濟南，杭州，甯波等處，都有積極行動，而且普遍到窮鄉僻壤，陝西山西廣西雲南貴州等處都有響應。長辛店京漢鐵路工人五千餘人竟乘車至北京參與遊行，河南廣東數鄉農民亦開農民大會，對五卅流血有所表示。此外各地發起捐款救濟罷工工人尤指不勝屈。而且大大地引起了全世界無產階級及被壓迫民族之同情與援助；首先是蘇聯，自得屠殺消息後，莫斯科即有盛大的示威遊行，向各帝國主義作嚴重之抗議，紛紛募捐救濟上海香港等處罷工工人。共產國際少共國際赤色職工國際都特地發表宣言，援助中國各地被難戰士，并且訓令各國共產黨積極攻擊各該國政府，援助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其他各國無產階級及一切被壓迫民衆，都有嚴重之表示，於是五卅事變成爲國際的事件了！

#### 七 「五卅」事變的歷史意義

在繼續敘述五卅運動以後各種詳細經過及探討五卅運動所開闢的中國大革命的各種重要流變之前，我要在此先把「五卅」事變的歷史意義給它一個確定的位置。

「五卅」事變的起源自然包含在第二章論列中國大革命社會經濟基礎的範圍之內。



特別是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果，各帝國主義國家都已弄到民窮財盡，像一個作了連夜苦工弄得精疲力竭的人一樣，他們都要急於恢復他們的健康，即是說，要重新振興已經衰敗了的工業，補充已經洗空了的金庫，……。但是他們本國的工人農民們已經是沒有很多的油水可以榨取了；他們自然一方面要千方百計的進攻蘇聯，以便企圖霸佔俄國的原料和市場；另一方面便帶更濃厚的強盜性來搶劫東方殖民地 and 半殖民地國家。以富饒著稱的中國自然更逃不脫他們的虎牙鷹爪。他們拚命地從中國收買廉價的原料去製造貨物，再運到中國來高價出售；拚命地移殖資本到中國來開辦工廠，利用中國賤價的工資和原料，同時又可以轉而操縱中國的市場；拚命地指使并利用中國軍閥互相廝殺，以攫奪許多非分的利益——帝國主義對中國這樣拚命進攻侵略的結果，所以一九二四年以後，中國的經濟政治發生總的恐慌。促使中國革命運動不斷的前進，大戰終了，俄國十月革命勝利之後，更給中國革命運動以有力的推動和幫助；加以『二七』血戰之後，中國無產階級已經登上政治舞台，一九二五年開始，職工運動復興發展，全國鐵路總工會與中華全國總工會相繼成立，廣東沙

面罷工，上海紗廠的大罷工，青島紗廠漢口烟廠等處罷工的發展；小資產階級不斷的左傾，學生參加革命運動的奮發（北京學生之五七示威，太原學生之抗稅暴動，福州學生反日運動之流血等）。國民黨改組與鎮壓商團事件的勝利，促成國民會議運動普遍全國。一切這些事件，都表明五卅事變之前，各地民衆都已開始活躍，革命的火絨已經各地爆發。五月三十日，上海南京路的槍聲響了，於是潛伏在社會中許多革命的小潮至此匯聚一處，成一股大潮。帝國主義最初只以對待義和團暴徒的眼光和方法來對待「五卅」流血所引起的反抗，不知一九二五年已經不是義和團的時代了，帝國主義野蠻的屠殺竟如火上加油，結果反而促成中國革命更劇烈的發展，這是後話，我在下面再說，如今只說「五卅」事變，這是第一次使中國革命羣衆化的歷史關鍵——它展開了中國革命一個新的時期，從「五卅」事變起，中國革命才連肉帶骨的現形於世，才成爲實在的力量。「五卅」事變剛剛開始爆發的時候，季諾維埃夫（當時的共產國際委員長）就曾指明了「五卅」事變的歷史意義，我覺得他當時估量得很中肯，現在可以引他主要的一段如下：

「運動開始於很平常的經濟要求——中國的工人要求幼年工人每天做八小時的工作；成年工人每天做十小時的工作；星期日休息；這種要求是半世紀以前先進資本主義各國的工人早已提出要求過的。

這運動本沒有什麼非常的意義，結果竟變成了重大的政治事件，取得了世界的意義。

從八小時工作的要求到撤退駐華外國軍隊的要求，這中間有個長距離；而這距離，中國工人祇在幾天之內就跳過了。一九〇五年一月俄國的工人羣衆經過長時間準備以後，也會用很快的步驟走過了同樣的路。英日帝國主義者的軍隊現在所給於中國工人的教訓正像那被工人鮮血所噴濺的尼古拉斯羅曼諾夫皇朝反動軍隊所給與俄國工人羣衆的教訓一樣。

那時候俄國工人從痛苦的流血的經驗中悟得了經濟和政治的關係。俄國工人的爭鬥一點一點的變成了政治的爭鬥，而「人民的喊聲」：「推倒專制」也愈喊愈熱了。中國工人現在也從痛苦的和流血的經驗中開始不僅悟得了經濟和政治的

關係，而且也悟得了中國經濟和國際政治——喋血的帝國主義政治的關係。

英日帝國主義者的軍隊打死了幾十個中國工人和幫助工人的學生。英國的警察監禁了上海電氣廠和自來水廠的工人。上海這些部分的工人是在手槍的壓迫底下做工，然而罷工却在開展着成爲總同盟罷工，而運動的範圍却繼續不斷的擴大。反對國際帝國主義的口號一天一天的響起來，有力量起來；上海的工人一天一天的上前堅決的在這個大運動裏面做中國廣大羣衆的領袖。英國日本和美國的帝國主義者現在正打急電給他們的軍艦，喊他們到這個「活動的場面上來」。我們不必是一個預言家就可以知道，幾百兆中國人民對於外國資本主義強盜的憤恨一定因此而更深，他們的要求：「勿侵中國」一定因此而更響。

五卅運動不僅是上海無產階級的發動，而且是全中國無產階級的發動。五卅運動是中國工人階級開始反帝國主義鬥爭，工人階級並自己起來實行革命的獨裁——上海總工會領導極廣大羣衆，這些羣衆自動沒收日貨，省港罷工糾察隊用羣衆力量來制裁賣國賊，在這種革命的獨裁之前，張學良梁啟超等起初都不能不代表統治階級讓步。

在五卅運動中，中國無產階級客觀上已經在爭取革命領導權，無產階級的行動指明應用直接行動去反對一切帝國主義的統治和壓迫。「五卅」事變後中國無產階級的階級覺悟大大提高，外國廠家的壓迫要反對，中國廠家的壓迫也一樣要反對。國民革命的發展與階級鬥爭聯系起來，事實上無產階級已經開始拿階級鬥爭去領導國民革命，沒有這種領導，中國革命運動是不能如此蓬勃發展的。五卅運動中無產階級的路綫客觀上是要發動農民羣衆，上海的工商學聯合會，廣東省港罷工委員會都是五卅事變的直接產物。但上海有一缺點即附近農民尙未有影響，廣東則以這種力量遂建立了第一次的國民政府。「他目己國家裏面的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反抗，加上殖民地和半獨立國家的民衆的反抗」——這個，列甯同志高叫說，是『世界革命的要點』，五卅事變起後，這個公式便有鮮紅的血和肉附着上去了。

## 第二節 由「五卅」事變到北京慘殺

(一)「五卅」事變後中國反帝國主義運動的新形勢

空前的五卅大屠殺，乃是帝國主義列強鎮壓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之必然的現象，同時又是中國民衆形成廣大的革命聯合戰綫，反抗帝國主義，爭取民族解放運動的開始。自上海南京路英帝國主義者施行排槍掃射，無數革命健兒以鮮血染紅了民族革命的旗幟以後，不轉瞬間怒潮般的民衆反抗帝國主義的巨流即普遍激盪於全國。南京路屠殺之後，首先激起上海二十餘萬工人的大罷工，五萬餘學生的大罷課以及全滬極大部分商人的罷市。上海數十萬民衆合組之工商學聯合會所提出解決慘案的十七條件，成爲全國民衆之共同一致的要求。廢除不平等條約，收回租界，收回海關權，收回領事裁判權，撤退外國駐華海陸軍隊等口號成爲全國民衆一致奮鬥的政治目標。全國各城市，各市鎮之被壓迫民衆都一致崛起參加此次反帝國主義的運動。北京，武漢，廣州，天津，南京，九江，蕪湖，重慶，鄭州，開封，甯波等處之應援上海民衆，罷工罷課罷市的直接行動，無地無之。接着又迭有英日帝國主義者在漢口廣州南京九江青島等處之不斷的屠殺，更促進全國民衆反抗帝國主義的熱情而鬥爭愈烈。不但各重要城市爲罷工罷課罷市遊行示威種種反抗行動所籠罩，即在很小的縣鎮以至於窮鄉僻壤

亦隨處都能聽到「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呼聲。在此種遍及全國的反帝國主義的怒濤中，給予帝國主義以致命打擊的是上海廣州香港天津青島各地工人的罷工和各地民衆努力進行的排斥仇貨運動。五卅運動實際上是開始中國從古未有的羣衆革命運動，而且處處都是工人階級當先鋒，以最勇敢犧牲的革命精神，以實際的羣衆團結的力量，去爭平民的權利，爭自己階級的利益和民族的解放。各地工人在鬥爭中都很努力團結集中自己的力量，五卅事變起後不久，河南北京天津等地，都和上海一樣，有總工會的成立。再則當時廣州革命政府，亦於五卅運動爆發之後以斷然的手段驅逐楊劉，撲滅廣東內部的反革命勢力，進而以政府的力量援助香港工人之抗英的罷工運動。全國學生總會並於六月下旬召集全國學生代表大會於上海，在這次大會中，對於學生參加反帝國主義運動有一種比較急進的決議，各地學生羣衆因此大會之成功，對於民族革命運動參加更爲熱烈。全國各重要城市都有工商學聯合會各界雪恥會或者滬案後援會等類的組織，以指揮一切宣傳煽動示威遊行募集捐款等工作。這時因爲民衆革命勢力的暴漲，形成了國民革命比較鞏固的聯合戰綫，因此使得帝國

主義之間不能一致對中國進攻，段祺瑞的軍閥政府，亦恰在這個時候（六月二十四日），正式以外交公文要求列強『修改』不平等條約，以表示自己『愛國』；張學良到上海來鎮壓民衆運動的時候，也不得不先捐給學生聯合會兩千塊『買路錢』，表示是來防禦外敵的。此外，在五卅運動發生後之兩個月中，各地帝國主義文化侵略機關教會學校，也爲革命的巨濤所衝盪而受了很大的損失。自上海聖約翰大學學生因反對當局的壓迫而全體退學，各地教會學校因反對當局干涉反帝國主義運動所起的退學風潮先後崛起，使教會學校受到很大的打擊。當時中國大多數的民衆都燃燒着誓死反抗帝國主義的烈火，一切妥協的傾向與反動的主張，一拿出來就遭羣衆之鄙棄與吐罵。上海總商會之抹殺工人利益，擅自修改十七條件，引起民衆多方面之反感。一般高等華人，學者名流如梁啓超胡適之丁文江等所提出之『縮小範圍』，『單獨對英』，『雙方友誼的協商』等主張在在遭受羣衆之嚴峻的攻擊。上海申新兩報因登載工部局的『誠言』的廣告，曾受到革命羣衆之嚴厲的懲創。可見在革命高漲的時候，當局者一點點的遲鈍行爲，都要激起羣衆的憤怒，同時亦只有在革命勢力暴漲的時候，才能迫



得敵人或多或少的讓步。

## (二) 帝國主義新式的進攻與羣衆的革命鬥爭

帝國主義者在五卅施行大屠殺的根本用意，是在鎮壓中國民衆對帝國主義的反抗，他們因爲有了鎮壓義和團暴動的經驗，以爲一場屠殺便可以使中國人低頭伏氣，承認帝國主義者有理。不料結果適得其反，二十六年以後的中國和義和團時代大大兩樣了。五卅事變之後中國民族解放運動不但不因帝國主義強盜在滬漢粵甯各地之再三再四的屠殺而消沉退守，反因此而激起更猛烈更廣大的革命浪潮。於此帝國主義列強固然還不肯拋棄武力的壓迫，然而也就不得不使它發生一種新感覺：單純的槍彈炮火的政策已經沒有十分大效果，而且對於自己，倒一天的變成危險的把戲了！

他們既然感覺到這一點，便不得不想法保存自己對於中國的統治，不過另外要用一種新的方法，新的形式，使表面上那種強橫殘暴的侵略不大顯露，而實際上能夠仍舊繼續以前的狀態。於是他們提出了『司法調查』與『關稅會議』。所謂『司法調查』

便是帝國主義想用這種法律的手段來延宕交涉，彷彿五卅屠殺中開槍的究竟是巡捕是學生，殺人兇犯究竟是英國還是中國，還沒有知道，所以應該用司法來調查一下，而且經過六國委員的一度調查還不算，還要再來一個滬案重查。其實五卅屠殺事件不但在中國民衆方面早已瞭如指掌——五卅屠殺中，英日是主犯，美法意等等帝國主義者是幫兇；早就看清了這是帝國主義列強統治壓迫中國的必然結果，并且早就提出了解決這個問題的唯一方法，就是廢除不平等條約，收回租界，撤退外國駐華海陸軍，沒收帝國主義在華一切工廠和企業。而且五卅之後一星期內連帝國主義者自己的法庭也就判決羣衆無罪了。因此所謂司法調查與滬案重查等花樣，只是帝國主義所想用『法律』的手段判決『五卅』所殺的人是該殺，以後還可照樣狠狠的屠殺，和各帝國主義之間，要想妥商出一個一致的態度，來壓迫宰割中國罷了。美國帝國主義則更加狡猾，他甚至於說，可以討論關稅自主問題——帝國主義者忽然把忘記了三年的華會決議重新記憶起來，這正可見他們覺得中國革命勢力的發展一日千里，如果不早些讓點步，以收買鼓勵中國軍閥資產階級出來幫助他們快點鎮壓革命，將來恐怕要嫌太遲了。

帝國主義一面不得不運用六國調查團司法重查，關稅會議等延宕欺騙的政策以和緩中國的反帝鬥爭，同時即勾結嚇使中國軍閥與買辦資產階級來破壞並壓迫羣衆的鬥爭。帝國主義一面用關稅會議法權會議等詭計誘惑中國資產階級，一面在七月四日即用停止供給馬達電力於中國工廠的毒計（上海租界的電氣處本是壟斷上海電氣業的）以威脅中國資產階級幫同壓迫工人階級。於是軍閥和資產階級都奮勇起來了，上海總商會第一步修改十七條件（六月十三日），第二步先行開市（六月二十五日），第三步壓迫日廠工人上工（八月十二日），第四步與十一國上海外僑商會妥協而暗示軍閥使之封閉上海總工會。並且奉系軍閥也是同樣的政策，他們在七月間已經封閉工商學聯合會，不準啓封，以示恩威於資產階級，同時極端戒嚴，壓迫工人。自七月下旬上海工商學聯合會，海員工會，洋務工會等民衆團體先後被奉軍封閉後，天津青島濟南一帶工人學生的羣衆組織，無一不受奉系軍閥之摧殘。一方面戴季陶梁啓超等高等華人竭力宣傳『縮小範圍』『單獨對英』等反動主張；另一方面工會學生會不斷遭軍閥之封閉，工人學生的領袖不斷遭軍閥之逮捕與槍斃。在廣州則有帝國主義收買失意軍

閻與官僚買辦先謀顛覆國民政府的陰謀與反革命派暗殺廖仲凱事件之發生。上海數十萬工人的罷工苦鬥，支持至兩月以上，救濟金日益缺乏。上海總工會始則被工賊搗毀，旋又於九月底遭奉系軍閥之封閉。全國小資產階級因受軍閥資產階級的暗示與壓迫，一方面傾向於妥協，別方面畏怯革命的鬥爭，於是部份的退出革命戰綫，不但各馬路商界聯合會在總工會封閉之後，自行取消工商學聯合會；即各地學生羣衆也多畏縮消極。於是乎帝國主義列強，便又乘機加緊進攻，滬案重查便公然發現，第一次六國委員的調查，還說得比較冠冕些，這次滬案重查之後，英美日三國便一致判決五卅以來所殺的中國人都是該殺的了！五卅重查的提議（使團領袖的照會）還遠在十月一日，即離上海英廠工人上工不過一星期，雖總工會的被封不過兩星期而已。無產階級在民族解放運動裏的領袖地位，是何等的明顯呀！同時，上海總商會在總工會被封後的第三天（九月二十三日），便開始募集所謂愛國募金，名爲接濟英廠工人，實則五卅以來總商會所經手發的罷工維持費，最大部分是各地捐來的，小部分是總商會辦事人墊出的，愛國募金的作用，不過是爲這些辦事人彌補自己的『損失』罷了；況且到

九月二十七日，上海的英廠工人，已經因總工會的被封，失了革命行動的公開指導機關和自己的組織，因為總商會尅扣募金，不發維持費，又被壓迫，『調停』而上工了！資產階級的妥協當然再明顯也沒有，外交部與總商會口頭上儘管抗議滬案的司法重查，實際上他們每一步的行動都是成就帝國主義的滬案重查的；而小資產階級的猶豫退縮懼怯，當然也是資產階級策畧的實行中所必要的助力——因為他們可以滅殺革命派方面的勢力。蓬蓬勃勃的五卅運動受着帝國主義軍閥和中國資產階級這種多方面的摧殘，便暫時受着一個頓挫。

在這裏我們可以插進去說一說『五卅』事變後的九七屠殺事件。

九七辛丑條約的國恥紀念，全國各地的民衆都有示威運動的表示。當時正當五卅以來各地屠殺之後，這一個日子尤其是使中國的民衆深切的感覺到列強帝國主義的殘暴侵略。所以上海的民衆在這一天，雖然經學聯會等臨時變更日期，然而始終『不期而會』的還有二十多萬人，——上海的無產階級表現他們的力量和團結，實在足以使帝國主義者和軍閥慄慄危懼。於是帝國主義者竟又用殘暴狡狠的手段來摧殘革命運動

了。

當九七紀念籌備的時候，據全國學生總會及上海學聯會的通電和公函，明明集會和遊行都已經得了淞滬戒嚴司令部的允許，並且司令部還附加了三個條件：一，演講只許在會場內，二，傳單先呈戒嚴司令部核準；三，開會日期地址及遊行路線呈報司令部。不但如此，法國使館的消息也說：『事前上海之中國當局會請法總領事，謂將在中國街舉行大會，並監視該會，不使有軌外行動，要求法領允許居住閘北之羣衆，於散會後，得由法界經過等情，法國工部局準如所請……』。從這兩方面消息看來，顯而易見上海的中國官廳的確事前知道九七紀念日的遊行和集會，雖然與以種種的束縛條件，可是始終不敢禁止。然而羣衆遊行之後，經過法租界愛多亞路到公共租界的時候，法國巡捕竟阻礙工人的遊行，又開槍打傷了多人。於是中國的軍閥官僚受了帝國主義者的嗾使，借着外國老爺的威焰更進一步的壓迫民衆的要求，上海許交涉員不但不提出抗議，反而到領袖領事那裏去，聲明『出於意外』，『防範未周』卑躬屈膝的道歉。同時，警察廳布告禁止罷工，戒嚴司令部重申禁止一切集會的命令，——當

時上海對於廖仲凱先生的追悼大會亦在禁止之列。這明明是中國軍閥官僚於事前不敢自己壓迫民衆，却在允許遊行集會之後，中國人民又被屠殺過一次之後，借着外國帝國主義抗議的威勢，向人民開始總壓迫。

五月卅日上海南京路的屠殺，是工部局巡捕開槍殺人；九月七日愛多亞路的屠殺亦是如此。帝國主義者看見五卅以後中國民衆的覺悟和運動，趕緊的對中國『讓步』，答應開關稅會議。這一點帝國主義者桌上所拋下來的骨頭，便可以使軍閥官僚買辦資產階級軟化，一切愛國的口頭禪立刻忘掉。五卅以後的中國革命運動使帝國主義者着實受了些打擊。在經濟上，英日受中國排貨的影響，增加英日兩國的失業工人，英國在中國貿易之衰落，其每月入口商品僅及平常百分之二十。英國一百年來所經營的最繁華的香港，受廣東香港罷工絕交的影響，商業蕭條，幾成荒島。使倫敦郵報發出嘆聲，謂『一九二五年英國尊嚴之墮落，實爲中英通商二百年來所未有』。甚至不得不在中國革命勢力之前表示低頭，公開申言：『既然不能以兵力征服中國，便祇有先讓步』。而這種讓步的意義就是我在上面已經說過的，是爲軟化脅迫中國的軍閥買辦

和資產階級。等到中國統治剝削階級幫助他鎮壓了革命，帝國主義便又強硬起來施行屠殺；同時中國統治階級也就靠着帝國主義的威勢來壓迫革命。九七屠殺之後立刻開始大反動，軍閥官廳禁止一切集會，禁止罷工，解散工會，……；竟使蓬蓬勃勃的五卅運動受着暫時的頓挫。

然而這種暫時的挫折却並不能真正壓伏革命，民衆方面的革命潮流並不因反動軍閥摧殘壓迫與資產階級之妥協出賣而消滅退後。五卅運動的過程裏，無產階級的勢力在政治覺悟上在組織上都是非常之澎漲的時候，國內軍閥與資產階級的這種態度祇有使無產階級得到更深的覺悟：『外國帝國主義自己開槍殺人，而且雇用中國軍閥來幫着屠殺；壓迫禁止我們的自由結社，剋扣我們的工資，保持租界制度……的，不僅是帝國主義者和軍閥，而且還有中國的資產階級！』。況且中國勞動平民奮起反抗帝國主義的動機，本在於要求解除壓迫剝削以改善自己的經濟狀況和政治地位。所以五卅以後中國華商工廠裡的罷工，突然由對外示威的性質，變成切實要求經濟政治地位改善的罷工。——八月中旬上海郵局，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的罷工，便是無產階級



對於資產階級對外妥協對內壓迫之答覆，隨後全國電報局的罷工，天津河南山東的中國紗廠罷工，都是同樣的性質。各地學生亦因反對學校當局之干涉反帝運動而不斷發生學潮，十一月十一日湖南學生且有反對趙恆惕爭自由的全省總罷課事件。抵制英日仇貨的運動在上海受着買辦資產階級的怠工破壞，內地如太原福州甯波等處則反因此而引起學生會國貨商和洋行商的武裝鬥爭。十月十七日湖南還有收回大金碼頭的運動。同時廣州政府因廖案之發生而決心肅清內部反革命分子——討伐楊劉，肅清東江，繼續又扣留熊克武驅逐胡漢民許崇智等，左派與農工的勢力因此得着相當發展，省港罷工得以堅持，而且中國革命運動自從五卅屠殺之後，沖破了思想上政治上的萬里長城，深深的滲入到工人羣衆農民學生之中去，所以上海日廠罷工結束，工人階級正在疲於應付帝國主義者軍閥資產階級買辦工賊等四方八面的壓制逼迫搗亂的時候，各地的罷工運動仍不斷爆發，如八月中北京英使館的罷工，南京工人的流血，唐山罷工的爆發等。

再則五卅事變時期的世界史上雖然要以『中國革命』占第一等重要位置，可是

同時還有印度紗廠的罷工（九月十六日），非洲坦及爾因的罷市（七月三日），摩洛哥戰爭（六月二十七日），敘利亞革命（八月六日），波斯政變等——殖民地革命已經開始世界的發展，雖然他們和中國五卅運動還不能直接聯合，還是各幹各的，但在客觀形勢上顯然已經有互相呼應的作用。

### （二）反奉戰爭與北京政治示威運動

奉系軍閥自從一九二四年北京政變之後，一直便是北方反動勢力的大本營，他們極力反對國民會議，步步進逼，擴充他們在關內的地盤，排斥國民軍，佔據天津保定山東以至於江蘇上海。尤其是任「五卅」事變之後，奉系軍閥從奉天天津一直到上海，到處幫着帝國主義者壓迫摧殘革命運動，屠殺工人領袖，封閉民衆團體，剝奪人民的自由，橫征暴斂的搜括，非法的抽捐籌餉。當全國民衆在上海二十幾萬工人的先鋒隊之後，陸續繼起的反抗帝國主義，罷工罷課抵貨的運動，瀰漫全國的時候，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的威權，已經開始動搖，大部分是靠奉系軍閥來維持任的。全國反帝國主

戰鬥爭的先鋒——上海總工會，是被奉系軍閥以武力解散的。五卅後興起的國民革命運動完全爲奉系軍閥的高壓政策所壓迫。所以在當時，奉系軍閥確實是帝國主義者最有力的武器，最馴良的走狗，因此一般民衆反奉的心理非常高漲。同時因爲帝國主義爲要緩和中國革命運動，適有關稅會議的召集，直系軍閥等爲防止關會後之必有的大借款爲奉系軍閥所獨吞起見，遂於關稅會議開幕之始由孫傳芳起兵發動了反奉戰爭。此次戰爭的主要內容自然仍舊是軍閥間的循環報復戰爭，和以前的直皖直奉戰爭相類似。直系軍閥這次發動反奉戰爭的目的，第一是搶奪帝國主義拋下的骨頭（關稅會議借款），第二是報復一九二三年戰敗的舊恨。事實上直系和奉系同樣都是反動的軍閥，同樣是外國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工具，『二七』時吳佩孚蕭耀南之暴行與『五卅』時奉系軍閥的暴行毫無二致。孫傳芳討奉通電中反對奉軍壓迫愛國運動，不過只是利用人民反奉的心理，達到他自己乘機取利的目的而已。所以當奉系軍閥退出上海之時，戒嚴令已經取消，而孫軍駐滬後重復宣布戒嚴，禁止集會，不准啓封上海總工會；他們一面討伐屢次假借肅清赤化名義摧殘民衆的奉系，一面却趕緊對帝國主義者聲明防

止赤化，嚴拿共產黨，以獻媚外國帝國主義，和奉系軍閥在帝國主義者面前爭寵。所以這次反奉戰爭的主要內容仍舊是軍閥戰爭，只有機會主義者才把牠看成是『民族解放戰爭』（當時中國共產黨與共產主義青年團兩中央在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日所發反奉戰爭宣言中曾經說過：『此次反奉戰爭雖攙和了一些軍閥勢力，在客觀上却是一種民族解放的戰爭』。實際上這是一種錯誤的估量，事實上當時反奉戰爭的主要內容仍是軍閥戰爭，並不只是『攙和了一些軍閥勢力』，我們站在正確的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應該批評這是一種機會主義的觀點）。自然這次反奉戰爭的性質要比較複雜些，一九二四年的直奉戰爭，交戰者只是直系與奉系兩派軍閥，可是這次反奉戰爭的反奉營壘方面並不止直系，還有國民軍國民黨（國民軍國民黨在當時還是革命的勢力），但是作戰的主力依然是兩派軍閥，並沒有實行變軍閥戰爭為民衆反軍閥的革命戰爭，甚至連這個口號在當時都還沒有積極提出來，所以這次反奉戰爭顯然還說不上是『民族解放的戰爭』。不過因爲在反奉戰爭中統治階級非常搖動，革命運動又得了一個發展的機會。所以戰爭剛起於上海的時候，我們就看見有數萬羣衆的集會，反對關稅會議

，反對滬案重查，要求關稅自主，要求啓封工會及各種民衆團體，要求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權。其他各地亦都有示威運動。此種民衆勢力之興起，更加促成奉系軍閥內部之分崩瓦解，於是發生郭松齡倒戈事件（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下旬）。在當時這種軍閥統治動搖分裂，五卅後革命鬥爭積極發展的時候，如果在革命勢力方面，能够得到正確的領導，對於反奉的軍閥不存幻想，在策略上不犯機會主義的錯誤，而能更積極的發展革命鬥爭，積極武裝工農羣衆，實行變軍閥戰爭爲民衆反軍閥的革命戰爭；同時更嚴厲的督促國庫黨國民軍并批評他們的動搖妥協，一定還要造成更廣大的反帝國主義與反對軍閥戰爭運動，使國民革命開關出一個新的局面罷？但是當時沒有這樣做，工農貧民羣衆還沒有武裝的積極行動，國民黨國民軍猶豫妥協的傾向則非常厲害，所以反奉戰爭得着勝利之時，並沒有能够使國民會議實現，反而釀成軍閥勢力重新結合軍閥專政重新鞏固的局面。

不過無論如何，當時民衆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軍閥統治的鬥爭與要求畢竟是擴大的形勢，因之接着就有十一月二十八和二十九日北京革命示威運動和上海武漢長沙開封

等處相繼而起的倒段示威運動。自從關稅會議開幕時（十月二十六日），北京民衆示威在新華門與段政府衛隊衝突後，一般人民便十分憤慨。至十一月十日遂由全國學生總會（正值大會開過之後）與廣州外交代表團等數團體發起一個『關稅自主示威運動籌備會』，卽於是日舉行一次示威運動，北京總工會亦於是日舉行升旗禮。自是之後，『籌備會』屢次集議，決定以後進行方針，議決發出通電，主張全國革命民衆要致哀的美敦書於段政府，令其卽日下野出京。但加入此籌備會之國民黨右派團體，見革命空氣太濃於己不利，遂開始陰謀破壞，結果終於聯合少數團體退出籌備會。退出之後不久，政局突生變化，郭松齡倒戈及曾毓雋（段執政之親信）被捕，表示段張勢力已如日西落了，右派團體見有利可圖，復又加入籌備會。大衆當時卽決定於二十八日召集羣衆大會，舉行示威運動。二十八日下午一時，所有羣衆卽齊集於神武門前。到者以學生工人爲最多，北京總工會領導多數工人臂纏紅布參加此會，主席宣布開會後，羣衆卽喊着『打倒段政府』『打倒奉系軍閥』『組織委員制的國民政府』等口號，並整齊隊伍向段政府進行，當時執政府已停止辦公，羣衆遂轉赴段氏私宅，至時有國

民軍把守不能入內，羣衆不得已轉奔章士釗宅大打，李思浩梁鴻志曾毓雋等宅各光顧一次而散（但各宅早知風遠颺空無一物）。

二十八日的運動，民衆原定計劃並未能達到。其原因乃係當時國民黨右派之破壞與國民軍之妥協反動，國民軍對於段氏保護周至，出於羣衆意料之外。二十八日的大勢既去，二十九日的示威運動亦無補於事，結果只打毀一家反動的晨報館。這次示威失敗所得的教訓，就是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必須依據在廣大民衆之基礎上，軍事投機與陰謀政變是不能解決革命任務的。

北京示威之後，接着其他的都市如上海南京開封長沙漢口等處，皆有廣大羣衆的示威運動，喊出同樣的口號。上海當時除十月十二日舉行過一次反對滬案重查的羣衆大會，十一月二十九日有『五卅』流血半週年紀念會，十二月六日又有倒段反奉市民大會。

#### （四）日本出兵與北京『三一八』慘案

北京政治示威雖然沒有積極的成功，但是因為各地羣衆起來反段反奉的結果，使得數月以來在在遭遇奉張軍閥阻遏摧殘之民族革命的巨流又重新活躍起來。帝國主義看見中國民衆革命勢力的發展，自然非常恐懼。郭松齡的倒戈反奉，對於日本帝國主義又很不利——郭松齡倒戈反奉，客觀上受了些帝國主義進攻中國及中國民族革命潮流動盪的影響，很有些反日的色彩。自郭松齡出關以後，幾乎攻無不利，戰無不克。錦州下後，張作霖已準備孤注一擲；迨十二月廿一日佔領新民府後，郭軍乘勝追擊，越巨流河，抵大名屯，搗破奉系軍閥的老巢已是指顧間事。於是一向做日本帝國主義工具的奉張及安福政府，不得不公然跪在日本政府面前求援了；一向替奉張安福系保鏢的日本帝國主義者，也就公然出兵援助張作霖抵抗郭軍了！當時公開出發的日軍已有二千五百人，而且繼續進兵，同時在奉天的日軍已占領省城兵工廠及子藥庫；日本政府且公然宣稱：「據樸資茅斯條約，日本有權在南滿駐兵一萬五千」。日本帝國主義者在這次郭張戰爭中，一方面供給張作霖軍械子彈，爲張作霖運籌帷幄，公然以日本兵喬裝助戰，郭兵到白旗堡時，日本關東司令乃下令以八十餘乘飛機，向郭軍拋擲一



百磅重之炸彈，使白旗堡周圍三十里，燬爲焦土。一面又以『南滿附屬地不得干犯』爲理由，阻止郭軍前進，同時即從郭軍左側面，以日本所喬扮之大軍壓之，至十二日二十二日郭軍即已失利，二十三日遂一敗塗地而不可收拾，二十四日郭松齡遂以被殺聞。郭敗之日，亦即李景林在天津潰走之時，李則由天津日領以巡洋艦送往青島，安抵濟南。兩相對照，更可看出日本帝國主義之陰謀。

日本進兵滿州，撲滅郭松齡勢力之後，復進而號召張作霖吳佩孚的聯合，假手於張作霖，助吳佩孚以巨款，並且供給張宗昌李景林軍械子彈，軍事人材，以圖根本消滅當時所謂赤化之國民軍。在此時期，革命民衆仍然毫不退後的向帝國主義者施行一致抗禦與反攻，反對日本進兵滿州與反對奉直聯合，打倒張作霖吳佩孚的呼聲與示威行動普遍全國，各地國民會議促成運動，亦相繼從事於恢復與整頓，督促廣東國民政府北伐以解決反動軍閥的呼聲，不斷從各地人民團體中發出。而帝國主義與反動軍閥勾結，一致進攻革命的勢力却更大。吳佩孚自十二月三十一日發出結束反奉戰爭的世電之後，即積極進兵河南，於是國民二軍失敗，國民一軍瀕於危境。再則當時英日張

吳聯合戰綫的後顧之憂，便是廣州國民政府的北伐，所以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九日駐京英使通告北京政府，謂廣州政府煽動香港罷工，中國政府（即指北京政府）如無制止能力，英國決定自由行動，以武力糾正。并謂已預備每日以百五十萬元充軍餉，將來由關餘扣償。二月二十一日廣州稅務司又藉口罷工委員會糾察隊截取未驗貨物，停止驗放船隻封鎖粵海關以控制廣州國民政府。在北方，帝國主義更嗾使直魯聯軍，榆關奉軍，山西閻軍，及靳雲鶚的軍隊，四面八方壓迫國民一軍。當國民一軍連勝直魯聯軍轉危爲安時，斜刺裡忽然伸出日本艦隊，爲張宗昌李景林之應援，勾引奉艦襲取天津，不成則用公使團的哀的美敦書以爲威嚇。於是國民軍完全失敗，於是時局急轉直下而有北京『三一八』的慘案發生。

自從國民軍失敗之後，反動的空氣籠罩全國，帝國主義軍閥及其他一切反動勢力均急起利用此機會，全體動員與革命民衆宣戰。當時國民軍在事實上並不是真正革命的武裝，馮玉祥及整個國民軍在當時也並沒有真正革命的認識和要求，不過因爲他們當時的地位站在反動軍閥張吳的敵面，同時又因爲民衆革命潮流的高漲，革命勢力的

擴大，逼着他們不得不接受一些革命的口號，去抵抗張吳軍閥，然而這種條件在客觀上又確實可以幫助革命的發展，所以當時人民在他們的勢力範圍內，言論集會尙可不受干涉，工農運動比較可以自由發展，例如當時在天津唐山鄭州的工人運動及河南直隸某些區域的農民運動都很有些發展，僅在河南一省就有將近二十萬人的農民協會會員和六萬多的農民自衛軍；而且當時國民軍將領鄧寶珊李仲三等曾兩次通電主張推倒禍國殃民的段政府，贊成召集國民會議，這種表現雖然在他們主觀上不一定是爲解放中國，而在客觀上則很可幫助革命勢力的發展，而且國民軍當時比較接近蘇聯，至少在當時國民軍還沒有幫助帝國主義和反動軍閥反對蘇聯。因爲有這種種情形，所以當時帝國主義和軍閥及一切反革命勢力如國民黨右派，國家主義派等都說國民軍赤化，甚至把馮玉祥當作『赤化將軍』看待，所以當時國民軍的失敗確實可以助長反動的氣焰。當時在北方，既有張作霖李景林張宗昌閻錫山靳雲鶚對國民一軍聯合進攻，又加上日本帝國主義的軍艦，辛丑條約團之最後通牒。在南方，英帝國主義既藉稅務司利用中國海關封鎖廣州海口，香港增加警備隊，沙面又增加軍艦，加緊進攻國民政府。

在上海方面，帝國主義既於十二月十七日指使孫傳芳秘密槍斃劉華（上海總工會副委員長），帝國主義既在關稅會議之後，再用法權會議等把戲收買中國買辦和資產階級；一方面，上海工部局又在三月十八日（『三一八』慘案的一天）宴請高等華人，以籠絡中國買辦和資產階級以謀消滅革命。在那一次宴會中間，上海工部局總督費信惇曾大大教訓上海總商會會長虞洽卿，訓導他要和帝國主義者『合作』消滅革命，撲滅赤化。此時，外國帝國主義對於中國不但是有計劃的進攻，而且採用非常露骨的政策。關於這，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日上海字林西報（英國帝國主義的喉舌）所發表的一段倫敦通訊（這一段通訊應該編入歷史的文獻，因為它是我們研究歷史唯物論時一種很有興味的材料）。可以告訴我們一個明確的概念：

### 『英國進攻中國之計劃』

干涉中國，撲滅中國民族運動的戰爭計劃，已經過詳細的考慮，其範圍尙未爲外間所完全了解。外交界有兩種意見的爭執，一派相信『協商』，即會議許諾延宕，可以恢復英國在華的宰治，而另一派則唯信賴武力。依專家的計算，征服中

國只須用十萬大軍隊，半可由印度（該處有八萬英兵）調遣。香港的警備亦已增強。此戰爭的計劃，進攻中國，分南北二部，多數軍隊將配置於天津上海之間。第一部分軍隊將在天津上岸，將力求早與馮玉祥決戰，且已獲得張作霖之默許。在漢口，祇需數兵艦，即可征服。此外，英兵一團從沙面上岸，護以數月來從各地調集之軍艦巡洋艦，即可向廣州進攻。

依財政專家之計算，戰爭目的達到，戰爭停止以後，英國可以攫取中國的鐵路，英國人民的納稅可以減輕。假定此戰爭需時二年（亦即從前干涉俄國所需的時期）以克服中國，軍費每日十五萬鎊，此款由將來全國鐵路抵押給英國時補償，但必須再投資五千萬鎊，加造鐵路，由一千九百英里，增加至一萬二千英里。屆時中國既已完全戰敗屈服，租界割讓均有增加，則各銀行得英國國家銀行之幫助必樂投資。況今匯豐銀行行長，亦為英國國家銀行董事之一。

因為郵電可施檢查可以控制，大部分戰爭行動，可以在英國工人及別的激烈團體知道消息以前，迅速有效的實行。

目下英國國家銀行已寄款六十萬鎊，交匯豐銀行，以為在東方開始廣大宣傳戰勝中國的民族主義與蘇維埃宣傳的費用。」

英國帝國主義用十萬大軍進攻中國的計劃雖然不會實現，然而他那六十萬鎊的宣傳費，在中國却真發生了效力，所以當時反赤運動和反赤團體盛極一時，他們此項組織，計有兩種：一是國際的，一是中國的。國際的組織據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三日上海時事新報轉載上海字林西報的新聞說：

『本埠各國人士，組織一護憲會，以抵制過激主義，十二日下午三點四十五分鐘，在夏令配克影戲院開第一次英語大會，演說者有霍守華，瓊斯裴德等，同時并在日本俱樂部開日語大會，在法國總會開法語大會。按護憲會係一國際團體，其總部設在上海，於中國各大都會均設立分會，四月間在上海開全中國大會，香港，廣州，汕頭，天津，漢口等處，均將派代表出席，其目的在使公眾咸知過激主義之危險，計加入此會者已有十五國，上海總委員會之組織，係每國各推代表二人，內分十股云。』

中國的組織，就是所謂反赤大聯盟，領袖人物是章太炎尤烈徐紹楨魏邦平馮自由居正等國民黨前輩。此外還有國家主義團體聯合會，國民制赤會，人權保障會，中和黨及對俄外交協會等，都是專作反赤運動的機關；國家主義團體聯合會更成立在反赤大聯盟之前，在中國可算是反赤團體之前輩。當時反赤機關報除『醒獅』之外，還有『中國報』，『獨立報』，『正論週報』等。當時他們反赤的對象就是蘇聯及中國共產黨國民黨國民軍等。他們竟在日本出兵滿洲時，忽然反對莫須有的俄國出兵。他們的共同目的就是要維持帝國主義與封建軍閥的統治，中國人民只可伏伏貼貼做奴隸，不許爭鬥起來要求解放。

現在我們應該說到北京『三一八』慘案這一嚴重的事變了。

上面所述這一歷史過程的發展，便是造成北京『三一八』慘殺的政治背境。沒有日本出兵滿洲，幫助奉張擊敗郭松齡；沒有英國以大批軍械幫助吳佩孚攻打河南，日本以大批軍械幫助李景林張宗昌攻打直隸；沒有帝國主義號召組織反赤運動，英國封鎖廣州，日本砲擊大沽砲台，即不會造成『三一八』時英日段張吳聯合屠殺中國民衆

的時局。

段祺瑞對民衆的大屠殺，早已下有決心，據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二日上海商報電訊：『此次慘劇，政府早有決心，據知內幕者云，賈閣上台，正與列強進行大借款，約有五千萬，須以防止赤化爲條件，衛兵開槍，可藉以表示反赤』。加以北京的工人學生市民羣衆，過去一年來爲紀念『五七』紀念，爲反對關稅會議，爲實行首都革命，有三四次與軍警衝突流血，段祺瑞的統治因此日在動搖之中，使他更加恨入骨髓。所以三月十八日，北京的工人學生市民數千人，爲反抗公使團的最後通牒，遊行示威，向國務院請願駁覆通牒，段祺瑞就野蠻狠毒的下令衛隊開槍，轟擊十餘分鐘之久，慘死者五十餘人，傷者一百餘人。段祺瑞的兇橫狠毒竟超越『五卅』屠殺與『二七』屠殺的劊子手而上之了！

北京『三一八』慘案發生之後，各地民衆雖也震動起來，開會，通電，遊行，示威，表現羣衆『同仇敵愾』之心。但是因爲帝國主義進攻的總計劃已得着部分的實現，特別是收買高等華人，組織反赤運動的影響。所以五卅慘案發生，與國民衆差不多



一致的起來反抗帝國主義：工人罷工，學生罷課，商人罷市，均次第實行，給帝國主義一有力打擊，贏得帝國主義某種程度的讓步；而在這一次，慘案發生的第二天，輿論便大不相同，高等華人及一般輿論界不但不反抗帝國主義者假手段祺瑞的兇暴慘殺，反而攻擊示威羣衆的領袖。國家主義團體聯合會的宣言，竟說「鼓吹赤化」的共產黨亦是北京慘案的負責者之一，竟敢輕輕替帝國主義與軍閥脫罪！上海民衆反抗北京屠殺的時候，上海總商會公開宣布「暫停辦公，絕不參加」。這一切種種的阻撓破壞，便使各地民衆對於北京屠殺除追悼抗議之外，不能更前進一步去奮鬥——這是五卅運動以來一個重要的階段。從五卅屠殺到北京屠殺，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經過了極辛苦的過程。最初在五卅發生二月之內是中國民衆向帝國主義勇猛進攻，帝國主義退守；以後是帝國主義反攻，得到部分的勝利。自反奉戰爭爆發，直至郭松齡失敗，是中國民衆向帝國主義第二次進攻，尤其威脅到日本帝國主義的生存。以後日本進兵滿洲，英日吳張聯合，又是帝國主義二次反攻，這次反攻竟得到不少的勝利，北京慘殺，便是帝國主義勾結軍閥對革命民衆反攻之最露骨表現。

## 第三節 三月二十號事變與廣東北伐

### (一) 東江勝利後之廣東

前面一直都忙着去探究五卅運動的重要流變，對於廣東的情形很少說及，廣東在當時乃是革命的柱石，現在我應該抽點筆墨來敘述一下廣東的情形。

在討伐楊劉以前，廣州政府完全建築在西南小軍閥及買辦階級的勢力之上，因此苛稅雜捐拉夫開賭，鬧得一塌糊塗，也就是我們在前面敘述商團事變時那種形像。廣州國民政府之正式成立（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七日），實際上是五卅怒潮湧現出來的。楊劉敗後，國民政府雖告成立，但反革命派尙麇集廣東，日謀危害政府，所以又有廢案之發生。但在這一時期，因為工農革命勢力已有相當發展，所以能夠幫助政府剿滅反動勢力，而且督促政府廢除了苛捐雜稅拉夫開賭等秕政，謀得軍政財政之統一；對外則工農羣衆與國民政府一致與香港政府作戰，省港罷工成爲五卅運動中最堅強持久的戰鬥力量。

肅清東江戰爭在中國革命史上很有它相當的地位，在這次戰爭中，敵人對待革命政府的計劃非常周到。香港政府公開的送三百萬子彈到汕頭，港商資助陳炯明百萬多現金（內中有一部分也是英人拿出來的）；段政府幫助陳軍三十萬元，又派遣海籌永績兩艦助戰。粵軍二三帥駐防石龍增城東莞即與陳軍聯合一致，如黨軍出征則可讓其過路而截斷其歸路，川軍則從北江順流而下以攻省城，南路同時進攻江門，用北洋兵艦從虎門或橫門進擾黃埔及廣州。同時勾結土匪擾亂中山順德南海佛山九江及其他多匪地段。國民黨內部反動分子謝持石青陽許崇智等更多方勾結廣州反動軍隊，候在黨軍出征東江時，起來叛變。因此逼使革命政府不得不首先肅清內部，然後再以全力對付東江。東江作戰計劃，是想剪除敵人不使逃竄，故取包圍形勢，同時以二三兩軍解決川軍，乘川軍喪失主帥，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襲擊。至於中山順德等處擾亂，政府置之不理，祇用李福林軍隊以為應付，虎門則從布置安放水雷，橫門則由廢艦及黃石堵塞。革命政府此種計劃，完全實現。東江方面共繳步槍八千餘枝，機關槍五十餘挺，大炮五十門，陳軍二千亦為福建民軍繳械，其他各路敵軍亦次第勦滅統一（一九二

五年十一月初旬)。廣東內部統一之後，整頓財政亦很有成效，因此廣東政府地位逐漸提高起來。而且自從東江南路收復以後，罷工糾察的海口封鎖綫也擴張了；從前糾察隊封鎖海口僅限珠江口一帶，東起深圳，西迄前山。現在則東至於汕頭，西至於北海了。香港政府至此態度爲之一變，報紙都罵陳軍『搶了就跑』，并盛稱『國民政府的人是受過教育的』，香港政府知道用陳軍來解決罷工的政策（和上海帝國主義者利用奉軍壓迫罷工一樣）已失敗，勢非與廣東國民政府直接交涉不可了。

## (二) 國民黨第二次大會

自孫中山先生逝世，陳炯明等更乘機向廣卅政府反攻，段祺瑞亦收買一部分國民黨黨員，組織國民黨俱樂部，實行破壞國民黨。帝國主義軍閥見此『老頭子』晚年傾向『過激』，咸祝其早死，以爲他死了以後，國民革命運動就可因此瓦解。但是事實駁斥了反動派的幻想。孫中山逝世後，中國革命潮流不但沒有降落，反日益高漲，五卅怒潮就是孫中山死了以後才泛濫起來的，廣州國民政府也是孫中山去世之後才出現

的（孫中山的廣州政府，當初並不叫國民政府，而是大元帥府）。

國民黨自第一次至第二次大會，內部經過激烈的鬥爭，經過數度的分化。在前面第三章第五節中，我曾經說過，國民黨在辛亥革命之後，在政治上在組織上都早已崩潰瓦解，直到一九二四年改組，共產黨加入之後，才勉強有成爲國民革命政黨之趨勢，也直到中國共產黨替他定出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宣言和政綱之後，才在三民主義之中充實了某種程度的革命性。於是黨內鬥爭和分化也就跟着激烈起來，中山死後，國民黨極右派便正式分化出去而且他們自己另立組織：北京的國民黨同志俱樂部及上海的辛亥同志俱樂部。自五卅運動的高潮，表現出無產階級是中國革命的主力軍，豪紳資產階級急急危懼起來，於是又有西山會議及孫文主義學會之出現（一九二五年底）。第二次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於一九二六年一月在廣州開幕。共到海內外代表二百五十八人，通過實行中山遺囑誠意聯俄聯絡被壓迫民族抗議日本出兵及處罰西山會議派等議案。這是中國國民黨最後一次革命的大會，從此以後左右派的鬥爭更加激烈起來，形勢便急轉直下而有三月二十號事變發生，中國資產階級便開始反動了。

### (三) 三月二十號事變

剛巧在三月十八北京屠殺的時候，廣州三月二十號事變也同時爆發出來。三月二十號事變的事實經過，據蔣介石自己當時對軍事委員會的呈文，是：

「……本月十八日酉刻，忽有海軍局所轄中山兵艦，駛抵黃埔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向教育長鄧演達聲稱，係奉校長命令調遣該艦特來守候等語。其時本校長因公在省，得此項報告，深以為異，因事前并無調遣該艦之命令，中間亦無傳達之誤，而該艦露械升火，經一晝夜，停泊校前，及十九日晚又深夜開回省城，無故升火達旦；中正防其擾亂政府之舉，為黨國計，不得不施行迅速之處置，一面令派海軍學校副校長歐陽格暫行權理艦隊事宜，並將該代理局長李之龍扣留嚴訊，一面派出軍隊於廣州附近緊急戒嚴，以防不測。……」。

另據上海新聞報通信，則云：『蔣介石……乃往見汪精衛，告以共產黨之計劃與舉動，決用嚴厲手段處分共派，汪甚驚訝，頗重鄭重，蔣不允，汪喟然，蔣曰，今日下午二時在造幣廠開會，今時已至，請公偕往，汪本抱恙，至是不能不同

去，少侯譚組安朱培德吳鐵城古湘芹等均到，蔣即報告共派異動事實及處分共派辦法，謂徵求各位同意，各人面面相覷，不敢發言，良久，譚組安始期言曰，政府及公待共派已仁至義盡，而共派竟有此項異動，介公如此對待，誠不爲過，但親俄政策爲先總理所決定，恐如此對待，有礙中俄邦交，故某以爲宜分兩層辦理，最好不要牽涉俄人，蔣大聲曰，此次若不如此處分，恐國民政府及國民革命各軍，廣東地盤，已非國民黨所能有矣。衆見蔣主持堅決，亦遂不持異議，故此會議結果，完全照蔣提議通過，蔣回後即發命令嚴密進行。」

事變起後，蔣介石黃埔軍隊即於短時間內包圍省港罷工委員會及東山俄人住宅，宣布緊急戒嚴，斷絕省內外交通，逮捕李之龍及各軍黨代表等五十餘人。及共產黨表示一再讓步之後，事變才告結束。這一事變絕不是由於共產黨陰謀倒蔣而起，——共產黨在當時不但沒有倒蔣的『陰謀』，而且當時共產黨的中央正做着資產階級的尾巴，拚命盲目的擁護蔣介石，就是李之龍調動中山艦的事，後來事實證明也是由於歐陽格歐陽忠的陷害。當時上海申報通信中曾說：「此次之事件，係爲民黨中之右派反赤

運動。」時事新報通信也說：「據可靠消息，政變係孫文主義學會主動，拘捕黨代表，包圍罷工會，皆該會軍人所爲。」所以當時國民黨反動派鄒魯謝持沈玄廬等在上海大開他們的「二次大會」，聽到廣州事變一起，便欣欣然決定「移粵開會」，可見都是有計劃的舉動。因此這一事變的意義，很明顯的是當時資產階級要先打擊無產階級的力量取得國民黨的領導權，然後再行北伐，使北伐的結果完全合於他一個階級的利益。

本來，從五卅到三月二十號事變這一過程，資產階級會利用工農力量打擊豪紳地主，顯明的事實是西山會議問題，西山會議是代表地主豪紳的，資產階級對西山會議是用戴季陶的路綫，戴季陶起初是西山會議發起人，但當他走進會場時覺得當時就公開出賣革命還太早，對於國民黨很有損失，所以又退出來。蔣介石在當時已經反共反汪，但他爲奪取領導權又不得不聯共以反胡反西山會議，暫時利用省港罷工，一方面自己積極布置而表面上仍叫「世界革命萬歲」，就是上海總商會雖然已經勾結奉魯軍壓迫工人，但在表面上仍要啓封工商學聯合會，結束英廠罷工，繼續與工人發生關係，——一面賣工人，一面騙工人。這一時期的特點，是資產階級開始與無產階級鬥爭



，但是資產階級還不能公然反對無產階級，甚至還要利用無產階級去反對豪紳地主。這一時期發展到最高點，是國民黨第二次大會，在會前是工農小資產階級聯合對付資產階級，反對一切反革命勢力時期，二次大會後即以三月二十號事變結束。

三月二十號事變時最可注意的是：(A)三月二十號以前，無產階級力量已有很大發展，農民力量也發展起來，無產階級鬥爭已開始在經濟上反對中國資產階級，五卅後罷工不斷發展，工會的組織也不斷發展，在國民黨二次大會時，中華全國總工會已經包含着八十萬有組織的工人。這種事實在前面幾節中已說得很多。(B)同時農民運動已由開始組織進到武裝鬥爭的時期，當時廣東一省農民協會已經有六十萬會員，在這一時期已經提到土地問題——土地問題最早是一九二四年第一次東江戰爭時提起過，第二次是一九二五年五月國民黨中央會議中汪精衛所提的草案；一九二五年十月中國共產黨的擴大會議之後，廣東的農民對於土地問題執行得更堅決，——土地問題已由私人的外交問題變為羣衆的鬥爭的問題。(C)資產階級已經要得國民黨的黨權和軍權去反對地主豪紳同時反對無產階級。例如當時黃埔發生孫文主義學會與青年軍人聯

合會的鬥爭，黃埔軍校已經由第二次大會前左派空氣籠罩的情況而轉到資產階級思想及組織上找得了基礎，孫文主義學會就表明資產階級怎樣抓住軍權。這種形勢就表明工農的力量向前發展，而資產階級也正在準備進攻武器——在第二次大會前，資產階級還是不敢反動的，並且還要借左傾的空話去打擊旁的軍事力量；當時國民革命軍力量還只是自己發展，够不上與無產階級鬥爭，所以國民黨二次大會還能够通過左傾的宣言及決議，但是形勢既然一天天緊張起來，事變就很容易爆發，到了三月二十號上海大罷工已經終了，郭松齡已死，國民軍已退至包頭，帝國主義新式進攻的計劃已經部分實現，因此緊接北京『三一八』屠殺之後，就發生廣州三月二十號事變了。

#### (四) 反革命戰綫的破裂與罷工及一般革命運動的

#### 發展

前面各篇曾經說明帝國主義軍閥的聯合戰綫，利用買辦資產階級的自私與小資產階級的猶豫妥協，積極進攻并折散破壞國民革命的聯合戰綫。帝國主義這種精明的策略，實行起來又逐步的有些得手，北京屠殺之後，中國——尤其是北部的民衆運動，

自然要受着一時的壓迫，而不能立刻有廣大的發展，但是帝國主義這着得意棋子，却並不能根本撲滅革命運動。北京屠殺之後，我們首先看見帝國主義軍閥反革命戰綫的開始破裂。

北京屠殺之後，奉系軍閥帶着日本帝國主義的威勢迅速地攫取中央政權，可是李景林暗聯吳佩孚的傾向，做了英帝國主義的工具，張李內鬩阻擋奉系軍閥的前進。同時，吳佩孚的勢力努力前進，河南寇英傑斬雲鵝的衝突雖然暗鬥也很烈，但是斬軍不久便到保定，並且已經遣派代表到北京和國民軍議和。張吳之間的衝突重新開始。到一九二六年四月九日國民軍與直系妥協成功，北京便發生政變，國民軍將執政府武裝解除，驅逐段祺瑞，同時並將幽囚北京之曹錕釋放，歡迎吳佩孚入京，這種張吳軍閥之間的決裂，同時便是表現英日帝國主義間之裂痕。再則帝國主義——軍閥與中國資產階級之間的衝突，也因戰勝民衆而重新暴露。李景林等一到天津，便強迫行使軍用票，弄得商人罷市，他們更用飛機拋擲炸彈，想焚燬北京，弄得市民團體羣起抗議。河南方面，吳佩孚軍隊一到便勒索軍餉，山東更是久處於張宗昌鐵蹄之下。反革命戰

綫不能不開始破裂。

在革命勢力方面，在北京屠殺及廣州事變時期，固然受着很大的打擊，但並不是表明革命潮流已經低落，而只是挫折之後的伏流昂進，又向高潮走。上海罷工最足以表明革命潮流的方向，一九二五年十月以後罷工雖然暫時停頓，但到次年一月以後上海罷工又逐漸發展了。據響導週報第一百五十一期統計，上海自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至四月一日罷工統計如下：

產業	次數	參加人數	罷工期時間
紗業	一四	一二・八〇〇	五五七・二五〇
郵務	—	六〇〇	—
金銀業	—	四〇〇	二四・〇〇〇
印刷	—	四〇〇	四〇〇
麻袋	—	一・五〇〇	四・五〇〇

機業

一

七〇〇

共計

一八

一六・四〇〇

五八六・一五〇

五月英國總同盟罷工，特別是五卅週年紀念示威之後，上海罷工更不斷發展，五卅週年紀念示威時，上海就有七萬餘人的罷工，五卅週年紀念後，上海罷工潮流非常洶湧，五卅週年紀念後之一月內，上海竟發生一百多次的罷工，參加罷工工人不下七萬人，根據第一百六十一期響導週報，一九二六年六月中上海罷工統計（原註：這是最可靠的統計）如下：

表計統總

同盟與單獨罷工之罷工次數	三五
罷工中參加之企業總數	一〇七
參加罷工之工人總數	六九・五五六
罷工時間統計（以鐘點計算）	三・三六四・六二二
罷工所提條件	一一七
勝利條件次數	四九

數廠與業企工罷

析分件條工罷

總計	工會的	待遇的	經濟的	政治的
一一七	二	五八	五六	一

烟業	金銀業	郵電	印刷業	手工業	絲業	紗業
二	一	一	二	九	六二	一九
					總計	其他
					一〇七	一一

件條利勝工罷

總計	工會的	待遇的	經濟的	政治的
四九	一	二四	二三	一

件條敗失工罷

總計	工會的	待遇的	經濟的	政治的
六八	一	三四	三三	〇

總計	一週以上的	三天以上的	一天以上的	不到半天的
一〇七次	八次	五六次	一八次	二五次

罷工時間

爲什麼五卅週年紀念之後上海會有這樣高漲的罷工潮呢？這些罷工的總原因乃是：

- 米價高漲（當時上海米價已漲至十九元一石），別種日用品亦日見騰貴，直接使工人的生活入於更困難之境，所以各企業工人之罷工要求，以增加工資等經濟要求爲最多。
- 資本家向工人的反攻，更是使工潮直接爆發的原因，當時日商內外棉紗廠已經組織法西斯蒂謀打工人領袖，各手工業主趁端節時開除工人，又如印刷業主竟因工人紀念五卅停工而罰工人的工資至二元之多，烟廠藉口出貨不銷而減少工作時間，少付工資。
- 五卅週年紀念運動的影響，亦是主要的原因之一，在資本家方面固然忌恨工人的勢力（見後），忌恨工人在五卅週年紀念中所表現的偉大力量；而在工人方面却正由於五卅週年紀念運動的影響，深信自己的團結力量，又適逢帝國主義者與一般資本家之反攻，所以發生這樣蓬勃的罷工潮。
- 工人組織上的力量與團結運動，亦是促進罷工發展的重要原因，「有了組織，便要罷工」，正是中國工人的特性。當時上海有組織的工人方謀更堅固的團結，無組織的手工業工人亦紛紛起而作團結運動，但同時帝國主義資本家巡捕房及中國的軍閥官廳，都深深忌恨工人的團結而加壓迫，所以

工人之鬥爭愈加猛烈了。當時團結在上海總工會之下的有組織的工會可見下表（根據第一百六十一期響導週報統計）：

廠名或工會名	人數
內外棉 三廠	一・四〇〇
內外棉 四廠	二・一〇〇
內外棉東五廠	一・八二九
內外棉西五廠	一・九五〇
內外棉 七廠	一・一〇〇
內外棉 八廠	八〇〇
內外棉 九廠	三・〇〇〇
內外棉十二廠	六〇〇
內外棉十三廠	一・三〇〇
內外棉十四廠	一・三〇〇



公益	喜和	喜和	申新	申新	鴻章	鴻裕	統益	大豐	溥益	同興	日華	內外棉十五廠
廠	二廠	一廠	二廠	一廠	廠	廠	廠	廠	一・二廠	廠	三・四廠	

二	一	二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二	三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	上海	厚生	恆豐	公大	東方	新怡和	老怡和	絹絲	豐田	豐田	振太	崇德
二廠	一廠	廠	廠	廠	廠	廠	廠	二廠	二廠	一廠	廠	廠

二 ● ○ ○ ○	一 ● 八 ○ ○	二 ● 二 ○ ○	三 ● 五 ○ ○	一 ● ○ ○ ○	二 ● 五 ○ ○	三 ● ○ ○ ○	五 ● ○ ○ ○	二 ● 三 ○ ○	三 ● 五 ○ ○	三 ● ○ ○ ○	一 ● 九 九 一	三 ● 四 五 ○
-----------------------	-----------------------	-----------------------	-----------------------	-----------------------	-----------------------	-----------------------	-----------------------	-----------------------	-----------------------	-----------------------	-----------------------	-----------------------

中華書局工會	七〇〇
華商鉛印工會	二〇〇〇
上海印刷工聯會	三〇〇
墨色石印工會	一〇〇〇
彩印工會	二〇〇〇
商務印刷工會	三〇〇〇
碼頭工會	五〇〇〇
日華	四・三二五
永安	三〇〇〇
申新	一〇一〇〇
裕豐	二・八〇〇
同興	三〇〇〇
上海	四〇〇〇

商務職工會	四五〇
工部局電氣工會	一〇〇〇
虹口電氣工會	一〇〇〇
英界公共汽車工會	五〇〇
華商電車工會	一〇〇〇
茶箱工會	一四五
信封工人聯合會	一三〇〇
固本肥皂工會	二〇〇
洋務業工會	四・五〇〇
黃包車修理工會	一〇〇
烏木業工會	五〇〇
菜業友誼會	三・七〇〇
洋布職工會	一一四

海員工會	五〇〇〇
金銀業工會	一〇五〇〇
郵務工會	一〇五五〇
絲廠工會	二〇〇〇〇
香烟廠工會	一一〇〇〇〇
鐵廠工會	二〇〇〇〇
木行工會	一〇〇〇〇
總計	二一〇〇七〇四

二十幾萬有組織的工人，自然形成一種偉大的力量，自然要造成蓬勃的罷工運動，甚至在一九二五年五卅運動時都未能積極參加的閘北三十五家絲廠女工，在這時也發生同盟罷工。於此可見工會組織推進行鬥爭作用之偉大，當時直接組織并領導這樣蓬勃的罷工運動的總機關便是上海總工會，上海總工會在當時的威力實在不小，即中國資產階級北京社會調查部所出版之第一次『中國勞動年鑑』中也嘆為『一時聲勢煥赫

，爲我國工界從來所未有』（見第一次中國勞動年鑑第二編第一章之第九頁）。所以帝國主義軍閥資本家都把上海總工會看成眼中釘，因此當時上海警察廳長嚴春陽奉帝國主義者與中國「提倡實業者」之命，就以「煽動罷工」四字的罪名，把上海總工會封閉了。然而罷工運動還是繼續發展，而且罷工工人在各種的要求之外，都特別提出『啓封上海總工會』與『擁護上海總工會』的口號。

上海之外，廣東省港罷工還在繼續。英國帝國主義者雖然多方設法破壞，但是罷工委員會屹立不動，省港罷工不但使英帝國主義每日損失一百八十萬元，使香港變成荒島，而且是支持并鞏固國民政府的主要柱石。關於這，我們以後當有更詳細的分析。此時武漢橋口英國香烟廠女工也發生大罷工（五月十六日），動因爲反對添設裝烟機器以裁除工人。經過多次的全體大會和羣衆示威運動的奮鬥，搖動漢口英國新舊兩烟廠男女工人三千餘人和社會上一般革命民衆，且還用了他們鬥爭的隊伍，參加五卅週年紀念運動，直至六月三日因取得相當勝利，罷工才始結束。同時同地（橋口）日商太安紗廠工人二千四百餘人因感受生活壓迫與苛虐待遇，久欲反抗。六月二日新來

日本工頭以請酒爲名，招致該廠女工頭吃酒，恣情戲謔待若娼妓，致動全廠工人公憤，六月三日全廠工人相約出廠，舉行罷工表示反抗。所提要求條件是一律增加工資二成，星期日作工要雙工錢，不得打罵及戲謔女工，因工受傷或疾病須照發工資並給醫藥費及罷工期間工資照發等七項條件。罷工相持一星期，始因廠方勾結中國官廳壓迫及工頭出賣工人利益而了結。

其次，當時革命運動發展中的又一重大事件，便是五月一日在廣州開幕之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這次勞動大會不只於是個例會，而是中國工人階級經過自五卅以來一次長期大戰鬥後的會議，因此這次勞動大會有很重大的歷史意義。大會到會代表共五百另二人，代表有組織的可統計的一百二十四萬一千餘工人，共四百餘工會；其中會員人數在二十萬以上者有兩個工會，在一百以下者兩個工會，在一千至三千者九十四工會，在五千至一萬者三十七工會，在一萬至五萬者十六工會。代表職業爲運輸業爲最多，次爲食品，紡紗，織造，建築，煤礦，印刷，手工業等。在組織上，這次大會與第一二兩次大會比較起來（第一次大會有組織工人二十萬，第二次大會有組織工人

是五十四萬)，是進步而有成功的。即以罷工運動而論，一年中上海與省港兩大罷工運動，固然十分偉烈，充分表現中國工人階級政治與經濟鬥爭的力量，他如青島天津鄭州濟南焦作漢口諸地，均有浩大的罷工運動，總次數在二百次以上，由南而北，參加罷工者過八十餘萬工人。

大會通過下列重要決議案：①職工運動之總策略。②組織問題及其運用方法。③經濟鬥爭之最近目標及其步驟。④罷工的戰術。⑤工農關係。⑥宣傳教育問題。⑦女工童工問題。⑧勞動法大綱（附工會條例）。⑨失業問題。⑩合作社問題。作這些決議案的材料，指示中國工人階級以政治經濟社會與職工運動的觀念和策略，有下列各種報告：①一年來職工運動之發展及其在國民革命中的地位。②全國政治與社會狀況。③國民政府現狀。④世界革命狀況。⑤世界職工運動。⑥蘇俄狀況。⑦全國總工會報告。⑧上海總工會報告。⑨省港罷工報告。⑩各地各代表團的報告。⑪工農兵大聯合的報告。⑫出席赤色職工國際經過報告。大會對於各項報告俱有討論與決議。決議案中最重要的是要算總策略的規定，組織的方法，經濟鬥爭的目標及罷工戰術諸項



。在經濟鬥爭問題中，提出最低限度工資與最高限度工時，勞動保護，改良待遇，優待女工童工等目標與進行步驟及鬥爭的指導和經驗的交換。罷工戰術在本屆大會中是一個新的問題，引起到會代表的興趣和熱烈的討論，決議案中分析罷工的性質，決定的條件，準備的步驟，敵人的破壞之估計與對策等。這些決議案性質之重要，乃是從經驗與實際中產生出來。

正當大會開幕之前一日，增加全國工人代表一個世界的新教訓，國際資太帝國主義的厄運再度表現，大英帝國主義國家內之總罷工爆發了。大會聞此消息後，立刻拍電表示深厚的同情與援助，在戰鬥中的英國無產階級，接着這個被壓迫民族的半殖民地無產階級同情援助之聲，一定愈加奮發！廣東與香港的工人，又聯合大會該代表舉行援助英國罷工週，實行號召物質的援助。尤其是粵港的工人，他們將近一年來站在英國帝國主義之對壘裏，困苦艱難，自然格外的感覺欣幸。大會又特別致電英國工人，請援助省港罷工，督促英國政府承認罷工條件。這種事實，不僅證明國際工人之聯合，而更證明中國工人確是世界無產階級行伍中一支有力的軍隊。在英國礦工罷工

以後，各國無產階級都紛紛起而援助，但在此罷工前，遠東一支有力的軍隊，已經八九月長期在戰綫上衝鋒陷陣，應當爲世界無產階級所贊許且敬重的。

再則在這裏我們還應當特別說一說五卅週年紀念運動的大概情形，因爲這也是有很嚴重意義的。

這次上海的五卅週年紀念的運動，差不多在兩三個月以前，帝國主義者即已開始防備。前面曾經提起過的三月十八日北京屠殺時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總董及全體董事設宴款待上海紳商領袖虞洽卿等三四十人，算是帝國主義者公開地宣布防備的第一次。在這個『盛大』的宴會中，工部局總董費信惇有一篇很長的演說。他開始即申述關於五卅事件，華人歸咎於工部局之誤會（所以滬案重查判決書上便公開判決五卅南京路上被殺的中國民衆都是該殺的），工部局尙特別謙讓，『爲與中國人士和協起見，決定接受總巡與最有關係之總長辭職，並正式表示喪失人命之歉意，由領袖領事轉交中國當局七萬五千元支票，撫卹死傷者家族，作同情之表示』；繼即表示還特別開恩將要給些好處與華人，如工部局加入華董，歸還會審公廨，工廠內中國勞工問題，碼

頭指及印刷附律問題，越界築路問題都可從長商量等；最後並且最實際的結論就是：

「但鄙人今晚欲與諸君言者，尙非過去之事，而以後來之事爲尤要。鄙人今晚欲與諸君一言者，本局之意，本埠前途尙非光明，政治上工業上皆有不良徵象，或且發生不良情形，若任其自趨，則必至此。以政治言，五卅事件不解決，有人則不能知其故，有人則不願知其故，此乃一重要之事。以工業言，情形之不穩定，未有如今日者；今後二月間之日期，亦甚爲有關，五月一日爲全世界勞工日，五月四日爲民八學生罷課紀念日，五九爲國恥日，五卅亦自具一種意義。目下已有擬議，欲使以上數日之一，作爲一種時會。有數種團體自是不輕放過機會，團體之背後，必有人留意於此。今已接有消息，知近來紗廠罷工，尙屬後來大規模舉動之初步，我人（工部局）爲應付起見，自相籌擬相對辦法。鄙意諸君今晚到此者，爲一班有勇氣能代表他人之有勢力人士，此一班人向公衆聲明，以正道常識公平爲主張，能爲公衆之所信用，能爲有責任之中外輿論所擁護，最要者，當不論如何，必設法以阻事勢走於極端，致與公家權力復衝突之不能避免。惟有

如此辦法，以鄙人觀之，方能防備以後數月內潛伏之危險，此外無他方法，其防範之力能如此有效。鄙人今向諸君以此爲請，此心認真，與向來談公事時之認真，一般無二。」（費信惇演說詞的全文見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九日上海申報）。

從這篇重大的演說中，我們很明白地看出這個宴會完全是爲防備五卅週年紀念運動的。帝國主義者自己也知道：「五卅事件不解決，……此乃一件重要之事」，中國民衆到五卅週年紀念時必定有激昂的表示。他拿「高等華人」的高帽子給虞洽卿等套上，并以口頭的恩惠引誘他們，與他們建立反革命的聯合戰線。他教馮洽卿等：爲消滅五卅週年紀念的運動，應該及早動手，免得臨時倉卒來不及應付——五卅以前之五一，五四，五九等運動就應開始一個一個地壓伏下去，「近來紗廠罷工，即是後來大規模舉動之初步，急應籌擬對付方法；諸君都是有聲望有勢力之人」，不但不應當同情於民衆運動，并且應當「以口舌筆墨和緩民衆之憤慨」，繼到帝國主義者再以殘暴手段對付工潮及民衆反抗運動時，你們「高等華人」，都應當竭力贊助。

帝國主義者自做了這個防範之後，還接着做了不少的工作：公家（工部局）私家

(如聯華總會與)孫傳芳嚴春陽及紳商學閥等做了不少筵席的酬酢及公文上的往還——帝國主義者與中國官廳及紳商學閥各界人士這樣表示親熱是從來未有的。帝國主義者這樣防範的結果，於是：

(一)軍閥官廳方面，三令五申，嚴防赤化，加緊防務，禁止集會及散發傳單，『誠恐有宵小之徒乘機滋擾，妨害治安』。

(二)上海總商會於三月十八日宴會之次日即發出一電致北京外交部，請其關於五卅案『速與使團妥商了結，伸久鬱之民氣，即以弭未來之隱患』。這個很明白，就是要北京外交部與使團在五卅週年紀念以前再弄點交涉的把戲，以緩和民氣。及至五卅週年將屆時，總商會會長及其會董虞洽卿等即『逃之夭夭』跑到日本講『共存共榮』去了。

(三)學閥方面如郭任遠，朱經農等要算最賣氣力，據說帝國主義者除在三月十八日宴會中普遍地向『高等華人』表示一些口頭的恩惠之外，還暗地裏許可這班學閥們一點特殊利益，即將來英國庚子賠款退還時，他們可以先分點贓。所

以他們開始即聯合上海政治大學大夏大學中國公學光華大學復旦大學持志大學南洋大學商科大學同濟大學暨南大學大同大學等十餘校教職員組織各大學同志會及各大學學生同志會，有組織地有計劃地壓迫學生的革命運動。他們對付學生的手段，真是威嚇利誘，無所不用其極：商科大學教授爲學生停課援助北京「三一八」慘案，以罷教要挾學生填具志願書；同濟大學校長強迫學生填寫誓約書，終至於借助軍警威迫學生離校；復旦大學所附設之實驗中學也爲干涉學生運動，竟不惜將全校完全解散。他們在五卅週年紀念前即積極鼓吹甘地不合作主義登報做抵貨的徵文，召集學生在校舉行抵貨的宣誓典禮等把戲，以麻醉學生心理；及五卅週年紀念期到，他們又提出茹素鳴鐘誌哀，在校內開追悼會等把戲，千方百計阻止學生出外參加羣衆示威運動。

在這樣陰霾的空氣之下，各馬路商界聯合會所代表的商民雖欲對五卅週年紀念有所表示，但總不敢與革命民衆接近。照這情形看來，上海五卅週年紀念運動一定要被帝國主義者與中國官廳協同壓迫，高等華人的破壞及中小商民的畏懼，弄得岑寂無聲。

了！不料結果竟出乎他們意料之外。不顧帝國主義及軍閥的刀槍，不受『高等華人』的破壞與欺騙，五月二十九日上海大部分學校即舉行罷課，學生組織講演隊到華界及各工人區域講演。下午二時，工商學各界一千餘團體代表計五千餘人，在閘北方家木橋烈士墓地舉行五卅烈士公墓奠基禮，極盡悲壯激昂之概，禮成後遊行，工人學生市民參加者甚衆，隊伍延長至兩里許，遍經閘北各街市，高呼口號并唱國民革命歌，全市精神爲之一振。三十日學生繼續罷課，工人一致罷工者有七萬餘人，商店亦大半罷市，門口均貼有『臥薪嘗胆，永矢勿忘』之白紙條。同日上午六時各馬路商界聯合會因欲避免與工人學生接近，單獨在甯波旅滬同鄉會舉行五卅追悼會，到代表二百餘人。同日上午十時，工人學生及一般平民等乃在西門公共體育場舉行五卅週年紀念大會，到會者五萬餘人，以工人爲最多，并有日本台灣高麗等革命團體之代表參加。

民衆方面對此五卅慘案之重大紀念，當不以僅在華界開市民大會，遊行，演講散傳單爲滿足，必須闖入久經封鎖的神聖租界中，直接向帝國主義者做一次大示威。故事前各團體即商定一面開市民大會，一面即組織講演隊，分途潛至租界，到一定時間

，做大規模之演講。因此至上午十一時許，公共租界南京路浙江路河南路北京路福建路一帶，就有掩旗息鼓之演講隊陸續聚處於沿馬路兩旁，到下午一時許，差不多所有演講隊都布置齊了。計是日到租界有組織之演講隊，工人學生婦女約共五百餘隊，人數約三四千人。在一時半以前，因能市及戒嚴的關係，清亮的馬路中，行人甚少，只西人的若干汽車及半空的電車往來巡梭，而沿馬路之兩旁駐紮演講隊宛如兩道大黑綫，實是別有一番森嚴的氣象。英捕見人愈聚愈多，雖欲表示解散，但仍強顏相笑，不敢干涉。至一時四十五分鐘時，突有郵務工會自行車十餘輛往來飛跑於清亮的馬路兩次，皆手持小旗，高呼『打倒帝國主義！』兩旁羣衆陡然燃聲而起，掌聲如雷，於是一般市民也蜂擁而至。約至二時，各馬路演講隊，一齊展開旗幟，放聲演講并大放傳單，觀者如堵，各馬路幾爲之塞，原來很冷靜的馬路，至是沸騰起來了！同時由西門公共體育場出發遊行之羣衆亦開始衝入租界示威，青年女工爲先鋒，極爲勇敢，與巡捕小有衝突，卽已撞進。二時十分，羣衆已滿佈於南京路漢口路東新橋一帶。此時去年今日流血之南京路浙江路交界處已聚集有二萬以上之羣衆。電車公共汽車馬車及人



力車均停駛，羣衆即將車箱兩旁糊上『繼續五卅運動精神』等標語；一片呼聲及擊掌聲如雷響一般，自羣衆中發出，更從數商店之樓頭飛下雪片似的傳單，全地面均籠罩在緊張的革命空氣之中。一種悲憤之情緒襲人欲狂！最先，無數西捕及印捕向羣衆和平勸阻，迫令散去，後來此等西捕被捲於人海之中，自己亦不能自主；二時三十分，突有鐵網囚車數輛從西面飛馳而來，車上架有機關槍，並有中捕印捕各十數人；各巡捕下車後，即由西捕指揮，向羣衆作射擊狀。示威羣衆則更加憤激，在街巷中用磚頭瓦塊木棍等與巡捕搏戰，屢退屢進，直至帝國主義者放槍，放水沖射，都不肯退却，直至晚六時許，羣衆才逐漸散去。在新世界門前，在東新橋等處，羣衆與巡捕均有衝突。當日下午在租界被捕者工人學生及市民先後共十餘人，華人受傷者十三人，外人受傷者十九人，但均極輕微。租界電車玻璃窗被擊毀者計六十九輛。二時以後，公共租界電車及公共汽車均停駛。

這次五卅紀念運動在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過程中是有重大的意義的。五卅運動初起時，全國民衆都風起雲湧，本已使帝國主義者脚忙手亂，其後經帝國主義者多方舉

行反攻。一方面積極勾結奉直軍閥，在政治上造成反動局面；一方面號召并組織反赤運動，誘惑收買資產階級，使之幫助帝國主義者壓迫民衆運動。然而五卅事變發難地的上海，仍然發動了如此壯烈的紀念運動，而且與敵人開始了巷戰，雖然帝國主義與軍閥的防備那樣周至，而革命民衆畢竟衝破了敵人的防綫。在示威中民衆反抗能力比之五卅運動時有增無減。這樣鮮明的示威行動，足夠使帝國主義與其走狗胆戰心驚。

在廣州，卅日正午東校場所舉行之五卅週年紀念大會，參加羣衆竟達二十萬人，西關民衆且於五月三十日上午先開一紀念會，參加者五千餘人，會畢巡行，齊赴東校場參加紀念，西關此種大運動，爲五十年來所未有。其他如南京杭州甯波廈門安慶蕪湖九江蘇州嘉興北京漢口開封鄭州等處，雖不若上海廣州之熱烈，但也都有各種紀念運動。

一切這些事件之外，當時革命運動的發展，還有如下事實的表現；比如三月九日湖南的驅趙（恆惕）運動，在運動中曾經召集過三萬餘人的羣衆大會，一致通過政治主張二十一條，并組織人民臨時委員會爲督促實現的機關，政治主張中最重要的是：

打倒趙恆惕，反對聯治及廢除省憲解散省議會；討伐吳佩孚，擁護國民政府北伐；速開國民會議，保障人民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啓封一切工農團體；財政統一，廢除苛捐雜稅等。再則五卅週年紀念運動前後，各地反對北京政府借款賣國，反對捲烟稅，反對宅地稅，反對增設烟酒厘卡，反對增加米捐，反對房捐帶徵保衛團經費等，都充滿了怨憤不平的呼聲。五月一日與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同時開幕的還有廣東全省農民代表大會。至於反對中外官廳護庇烟土，反對增加房租，要求抑平米價，更成了一般平民普遍的運動。四月間浦東塘橋鄉，竟因巡警強迫徵收門牌費，惹起了數千人的暴動。

### (五) 國民黨五月中央全會與廣東北伐

此時，工農革命勢力仍舊向前發展，而另一方面，三月二十號事變之後，資產階級更積極向無產階級進攻；因此，又有五月十五國民黨中央全會之召集。開會之初，廣州城內即滿城風雨，蔣介石等一面四處散布「共產」謠言，廣州中央銀行也發生擠

兌，多方威嚇共產黨及國民黨左派；一面即在會議中提出所謂「黨務整理案」，其中重要之點即是限制共產黨在國民黨各高級黨部不得佔委員三分之一以上，共產黨員不得當國民黨中央各部部长，國民黨員不得加入共產黨，他黨加入民黨者須將其原存黨籍報告，共產黨須將加入國民黨之黨員名單交民黨中央保存及第三國際對於中國共產黨之訓令，須先交國共聯席會議通過等，總之無一不是對共產黨威嚇挑戰，共產黨與左派在事前毫無準備，甚至亦未估量到此，所以結果國民黨新右派蔣介石等主張完全勝利，因而軍權財權黨權全被蔣介石攫奪以去。於是資產階級的代表蔣介石遂一手握着軍政黨的大權而舉行北伐了。

講到北伐，我們須得稍稍說明牠的歷史根源。原來中國近數十年來的經濟發展是由南而北，由海濱而陸地。在古代的中國經濟是以黃河流域為中心，并且其發展的趨勢是由北而南（指唐宋以前），因為當時的社會經濟基礎完全建築在自給的農村經濟上。及西方帝國主義將牠們的商品源源輸入以後，長江和珠江流域的商業發展便一日千里，逐漸形成了初期的商業資本主義，并且逐漸開始了近代產業的產生，使舊時的

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受了很大的打擊而流於破產。在這種情形之下，新興的商業資產階級如華僑和破產的農民手工業者——兵匪以及少數工人，便成了革命的種子了。而在北方，雖然沿海沿鐵路的地方如山東直隸奉天等地商業亦頗發展，并有不少的近代產業，可是比起長江和珠江流域究竟幼稚得多，尤其在整個的經濟制度上，無論如何，北方比南方總要落後一些，北方的封建勢力比南方總要濃厚一些。在政治上中國歷代封建勢力（自滿清政府至北洋軍閥）的根據地又都在北方。這樣便造成一種『北伐』的根源。所以『北伐』這個口號並不新的花樣，在近幾十年的中國歷史上已經出現過好幾次，太平天國之北伐，姑且不提，單就辛亥革命以來，便已經有了三次，（一）辛亥革命軍的北伐，（二）民六南方護憲政府之北伐，（三）民國十三年江浙戰爭時孫中山之聲言北伐（彼時在北伐的本身力量上雖然有點滑稽，但孫中山確曾發表過北伐宣言，并進兵韶關，後因商團事變發生，乃將出發韶關之北伐軍調回），此外如民四西南討袁稱帝之役，雖然沒有北伐的口號，也可以說帶有北伐的性質。這些北伐顯然是南方軍閥買辦及資產階級利用豪紳地主軍閥力量去反對北洋軍閥的有力表現。這

裏我們所要說的廣東北伐（一九二六年），自然也有這種歷史根源，不過最重要的還是因為中國革命到了五卅之後，已經開始進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而一九二六年廣東北伐的革命戰爭實質上乃是五卅運動之直接繼續，從羣衆的反抗示威，抵貨罷工，進一步而至於更高的鬥爭形式——武裝的革命戰爭，這是一九二六年廣東北伐的主要社會基礎。表明工農羣衆已經要在參加革命戰爭的過程中，更加擴大自己的組織力與戰鬥力，使中國革命勇猛前進，向着與帝國主義和中國統治階級決一死戰的時機方面去。加以當時英日張吳爲緩和及彌縫自己反革命聯合戰綫之破裂，乃決定分討南北赤化勢力，支配直魯聯軍向南口進發及吳佩孚進兵湖南，吳之進攻湖南，不用說其目的地乃在廣州，廣州國民政府爲防禦『南伐』，亦不得不舉行北伐，但是這次廣東北伐的根本意義乃是繼續五卅運動并且是五卅運動更進一步的發展。

#### 第四節 由廣東北伐到漢口九江租界之奪取

##### （一） 北伐軍佔領長沙武漢

北伐開始以前，資產階級惟恐革命超越了他的階級利益，企圖首先奪取革命的領導權，使革命發展在他自己的控制之下，遂舉行了三月二十號事變及五月十五日的國民黨中央全會，共產黨以繼續退讓來應付這種嚴重的事變，資產階級的代表蔣介石遂一手操着軍政黨的大權（六月五日廣州國民政府特任蔣介石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凡國民政府下之海陸航空各軍，悉歸其統轄；他如政治訓練部，參謀部，軍需部，海軍局，航空局，以及兵工廠等機關，均直屬於總司令部。且自北伐動員令下後，凡國民政府所屬軍民財各部機關，均須受總司令指揮，以外如國民政府的軍事委員會，國民黨的中央委員會，國民黨中央軍人部，俱以蔣介石為主席為部長。）而舉行北伐了。但是因為當時北伐的主要內容乃是繼續五卅運動並且是五卅運動更向前發展的革命戰爭，全國民衆正受帝國主義及其工具奉直軍閥反赤戰爭的鐵蹄踐踏與蹂躪，所以對於廣州國民政府的北伐都表示十分的渴望。所以廣州國民政府自七月初旬出師北伐，兩星期之內就已攻克長沙。

佔領長沙之後，首先便壯大了北伐軍的聲勢，給了吳佩孚一個嚴重的打擊，壓低

了吳佩孚的氣餒，搖動了吳佩孚的軍心，於是北伐軍長驅直入，八月二十二日即繼續攻下岳陽。到十月十日辛亥革命紀念節，北伐軍便完全佔領了武漢，於是幾年來偏促一隅之廣州國民政府的勢力便伸張到了長江，到了中國的中心區域。這在革命勢力的發展上，自然有牠很重大的意義。因為一則武漢據中國地理之中心，扼長江和京漢粵漢兩路之樞紐；在經濟上除上海外，可以說是中國最大的工商業區域；在軍事上，北可以沿京漢路直趨河南而取北京，東可以順長江直撲皖贛以臨江浙，西扼四川而南障湖南，並且有全國產量最大之兵工廠；在政治上，坐守武漢可以鎮壓西南而與北京對峙。二則武漢是辛亥革命的發難地，當時革命義旗自武漢一張而全國響應，竟成辛亥革命軍擁有長江以南之局面，可是自民二黎元洪投降袁世凱之後，武漢便從此落於北洋封建軍閥之手，北洋軍閥據此得以鎮壓南方革命勢力；北伐軍佔據武漢，實際上是搗毀了吳佩孚的巢穴，結果了英帝國主義一個最兇惡的工具。

北伐軍的進展所以能夠這樣迅速，一方面因為北洋軍閥的勢力之分裂崩潰，使北洋軍閥不能成一整個的勢力來對付北伐軍；當時北洋軍閥內部的衝突如孫傳芳與張作



霖張宗昌的衝突，吳佩孚與張作霖與孫傳芳的衝突，互相防備，互相牽制，不能大舉援鄂，而且吳佩孚的內部亦號令不一，故北伐軍得利用孫傳芳的暫時中立與吳佩孚軍隊的弱點，一鼓而下岳漢。另一方面又因為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互相競爭，軟弱了國際帝國主義的陣勢；帝國主義本國勞動運動之發展，特別是英國在當時經過了一次空前的五百萬工人的大罷工，與殖民地民族革命運動之發展，且因中國革命進展的影響而更劇烈，及蘇聯無產階級政治權之存在和發展，他在地理上又與中國很接近，——這些條件都是國民革命軍北伐勝利的重大原因。最後還有一個重大原因，而且是最實際的原因，那就是全國革命民衆的鬥爭力量。前面我已經說過，一九二六年廣東北伐的革命戰爭事實上乃是五卅運動之直接繼續，從羣衆的反抗示威，抵貨罷工，進一步而至於更高的鬥爭形式——武裝的革命戰爭。事實上，當時北伐戰爭過程中，工農學生羣衆的力量確實是北伐軍取勝的主要動力。此地我們不妨追溯當時幾件重要的事實。

當北伐軍從廣州出發時，一切夫役都由民衆充當，而省港罷工工人還組織得有幾

千人的運輸隊。一入湖南，廣大工農學生羣衆不但積極歡迎，而且組織農民自衛軍直接參加作戰，株萍鐵路工人且在北伐軍攻克醴陵之前，即自將敵軍驅走。平江之役亦然，農民大部分都實際參加作戰。故當時廣州民國日報（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也說：『此次北伐勝利奪得平江，其力量全在農民』。當時此種消息，曾連篇累牘登載於報紙，不是說：『農民大舉幫助……冒彈衝鋒，勇敢登山，敵兵大亂』；即是說：『農民因猛攻太甚，陣亡者不計其數』。不是說：『北鄉西鄉涪口梓江一帶農民亦紛紛殺敵』；即是說：『此次敵軍被民衆殺死者不下二百餘人』。其『參戰之猛烈，勇敢之精神，犧牲之重大，已可概見』了。再看岳州之戰。『八月二十日晚，有岳平一帶農民協會士著農民，偵知岳州方面之敵軍，惶急萬分，軍心渙散，特向李軍長告密，請神速攻岳，並自願領導，由平江北鄉渡過微水黃茅山而撲岳州，敵軍不知有此小道，故未設防禦工作，比較容易得手。李軍長從之，遂於二十一日黎明，即取小道由農民領導，抄攻岳州。沿途路雖難行，幸未設防，二十一晚十時，李軍長部隊即抄至距岳城十里之某地，出其不意，猛力進攻。敵軍驚爲天降，紛向雲溪路口舖五里

牌羊樓司一帶潰退。葉逆開鑫（從來也是國民黨忠實同志）所部不願與北軍同退，反戈投誠者二千餘人。余逆陰森全部，則被截斷，全行繳械。中路之李何兩部聞耗，亦猛向岳州前進，上下夾攻，二十二日早，即收復岳州。」（同上）。又「據最近長沙方面調查，粵漢鐵路之工友，對於敵軍，曾作種種妨害其軍事行動之工作，如破壞路綫，截斷電信等。且於長沙未攻下以前，曾提議總罷工，雖因經費問題未能實現，然其擁護革命之熱誠，已足以代表民衆一般之意志了」。（亦見廣州民國日報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三日通信）。

汀泗橋一役。『北伐軍連下衝鋒十二次，均爲葉部之機關鎗隊掃回。彼此只隔一橋，聲聞相通，卒無法越雷池一步。橋下積尸，不可勝計。直至接戰之第三日，已得咸甯之右翼軍李品仙師，會同七軍一部，藉農民爲間道，竟能從咸甯取道牌州司，越嶺以擊葉軍之背。初時葉部尙未知南軍已襲其後，以爲吳佩孚援兵開到，不及防。迨李品仙大隊馳至，逐漸迫近，殆如飛將軍從天而下，於是腹背受敵，大驚失色。此時

前後夾攻，葉軍幾乎全軍覆沒而葉氏幾於成擒。」（見一九二六年九月七日香港華僑日報）。同樣，兩漢民衆也是對北伐軍盡量援助的。『當北伐軍於未克復漢陽之前，漢陽兵工廠全體工人，爲制吳佩孚之死命以援助北伐軍起見，竟一行於前月一日起，全廠工人舉行總罷工。及至現在北伐軍克復漢陽，始實行全體復工……爲革命軍製造槍砲。』（廣州民國日報九月二十與二十一兩日通信）。這些事實，雖然殘缺不全，但已足以證明工農羣衆的鬥爭力量實是北伐勝利的主要原因。自然當時北伐軍兵士的勇敢作戰，亦是北伐取勝的一個重要原因，因爲一則五卅運動以後革命潮流的激盪，趨使了大批革命青年投身革命軍隊，經過不斷的政治工作；二則當時北伐軍隊的組織部分，大半都是受過一些革命影響的失業工農及青年戰士，在當時他們和北洋軍閥純全的雇傭軍隊自然有些不同，同時又取得廣大民衆的援助，因此能够殺敵致果。固然後來資產階級和整個的國民黨都利用了此種廣大工農羣衆及北伐兵士鮮血所換來的勝利，造成他們妥協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中的地位，轉而屠殺工農及一切革命戰士，蔣介石汪精衛胡漢民等便在工農鮮血之中建築了他們反革命的宮殿。然而這并不是當時北伐戰爭的錯誤，乃是中國共產黨離開共產國際的領導，忽視當時當前最迫切的資產階

級企圖奪取革命領導權以破壞革命，叛變革命的危險；放棄戰勝資產階級爭取革命領導權這一根本任務的結果。在北伐戰爭本身，恰恰相反，它是繼續五卅運動并且是五卅運動進一步發展的革命戰爭。北伐戰爭猛烈的發展乃是表明工農羣衆要在參加革命戰爭的過程中，更加擴大自己的組織與戰鬥力，使中國革命更加勇猛前進。所以當時北伐戰爭的發展，實質上是做廣大羣衆革命火藥庫的導火綫，更幫助了羣衆革命鬥爭的發展；所以北伐軍到達武漢不到兩月，已經有三十萬工人羣衆組織在武漢總工會之下，兩湖的廣大農民羣衆都蓬蓬勃勃的起來鬥爭。這些我都留待下面再說，如今且先敘述一下北伐進展中省港罷工的結束與上海罷工浪潮的發展情形及此時發生的一件嚴重的事變——萬縣慘案。

## (二) 省港罷工的結束與上海罷工運動的繼續發展

省港罷工是反抗帝國主義者屠殺中國民衆，在中國革命運動進程中有名的政治罷工，是五卅以後民族解放運動普遍全中國之堅持最久使帝國主義受絕大打擊的罷工。

省港罷工在積極方面統一了廣東，建設了廣州國民政府，引起英國國內的總同盟罷工；在消極方面，毀壞了大英帝國主義在東方的威信，使香港政府受了極大實際經濟的損失，根據海關貿易冊：一九二五年香港對華輸入比一九二四年輸入減少了六千五百餘萬兩（一九二五年輸入是一七二・七八九・〇〇〇兩，一九二四年輸入却有二三八・三五五・〇〇〇兩），一九二五年的入超竟比一九二四年減少了七百餘萬兩（一九二五年的入超是五八・〇七四・〇〇〇兩，一九二四年的入超則為六五・一九二・〇〇〇兩）。所以省港罷工開始不到兩個月工夫，香港英國帝國主義者便說省港罷工『實公然與英國作敵且立意破壞中英條約』。

省港罷工盡了許多任務，建立了許多偉大的功績，早已到了結束的時期了。勇敢而覺悟的省港罷工工友們，也早已明瞭到省港罷工是政治罷工，政治罷工與經濟罷工的性質不同，故在一九二五年十一月間已願意犧牲一部分條件取得相當勝利便可解決罷工。但是，香港政府却甯可忍受經濟上的絕大損失——每天一百八十萬元（這是香港政府自己說的，其實還不只此數），而千方百計想恢復大英帝國主義在中國已墮之

威信；甯可幫助陳炯明和培植國民黨右派的政治勢力以推翻國民政府；企圖用武力強迫復工，而不願意和國民政府交涉，更不願與省港罷工代表直接談判解決罷工。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之後，三月二十號事變之前，當時的政府，何知道省港罷工是爲中國民族利益而奮鬥的。故一面極力幫助省港罷工，一面想與香港政府磋商有利的解決罷工。農工商學各界尤一致擁護罷工勝利，一九二六年二月初間曾熱烈地舉行過一次援助罷工週；即香港的中小商人，也知道香港政府的無理，願意私人湊足三百萬補助罷工工人，解決罷工。香港政府因懼於民衆擁護罷工之熱烈，不得不派人到廣州與國民政府談判解決罷工，也不禁止香港商人之湊資補助罷工工人，這是當時解決罷工最有利時期。

然而香港政府始終無誠意解決罷工，始終想維持大英帝國主義在東方的威信，始終想扶起陳炯明鄧本殷林虎等小軍閥和當時國民黨內的反動分子，取得廣東政權以破壞罷工。在省港罷工剛開始發動時期，香港政府即嗾使楊希閔劉震寰等與陳炯明結台，謀叛國民政府；繼而運動許崇智部下梁鴻楷莫雄張國楨等想根本推翻國民政府；繼

而又以金錢槍械資助陳炯明林虎等第二次佔據東江，鄧本殷魏邦平等在南路起事，熊克武等在北江響應，從東江北江南路聯合包圍廣州。幸而香港政府這種種計劃都失敗了，而省港罷工得以勉強維持。可是，以前各種的危機雖然渡過，而三月二十日事變又突然爆發。

三月二十日事變以後，自然廣東全個政局都起了鉅大的變化。右派乘機向革命勢力進攻，香港政府又得了一個破壞罷工的最好機會。於是香港政府立刻撤退派遣前往廣州談判解決罷工的代表，禁止香港中小商人籌資補助罷工工人的行動，同時決以一千萬元賄賂及一萬萬元借款收買國民黨右派且幫助他們攘奪廣東政權。依然採用從前破壞罷工的手段，而且更加厲害更加猛進。這是從三月二十日至五月十五中間的過程，這是省港罷工最危險的時期。

五月十五國民黨中央全體會議之後，國民政府另委陳友仁代理外交部長，派出政府代表三人直接向香港政府要求派出同樣的政府全權代表談判解決罷工，這已是一個讓步。香港政府雖始終沒有解決罷工的誠意，而表面上亦派出代表三人：一是香港政



務司，一是華民政務司，一是駐廣州沙面的英國領事。雙方正式代表於七月十五日在廣州開會了。香港政府想利用國民政府正在出師北伐，需款甚急，可以金錢收買或商量借款，所以極力離開罷工問題而單獨提出交涉排斥英貨問題，態度非常強硬，國民政府當時在罷工工人監視之下，雖然沒有接受香港政府的收買，但亦沒有堅決擁護罷工工人的利益，因此談判又歸於停頓。

七月中英談判停頓以後，廣東革命民衆擁護罷工仍舊非常熱烈，在八月底還舉行了幾十萬人的擁護罷工反抗英國帝國主義的大示威，這樣自然更加引起香港帝國主義的仇恨。同時北伐軍攻下岳州，革命勢力向北發展，香港政府急欲乘機一面予廣州以打擊，爲吳佩孚奧援，一面又擬製造一殺人機會，好壓迫罷工。於是迭派兵艦駛入省河西堤，向工人糾察隊蠻橫挑戰，因爲工人糾察隊不與衝突，所以尙未發生嚴重慘劇，不過排貨運動不免受些打擊。如此一直支持到十月的時候，一方面北伐軍佔領武漢，廣州維持罷工的力量逐漸薄弱。另一方面，省港罷工和抵制已經延長了十六個月，武裝的工人糾察隊能够斷絕香港與廣州的聯絡，但是不能阻止香港帝國主義的強盜從

別的地方招致新的工人。對罷工抵制的同情廣大地普遍到整個東方以至於世界，但是過去沒有現在也還沒有強固的工人組織在南洋羣衆中，能够阻止無業羣衆向香港投來。罷工能夠破壞香港的工業和商業，同時也就縮減了資本家對於勞動力的需要。他們所必需的三四萬工人，是可以從外邊找到的。所以當一九二六年六月廣州和香港中間的談判開始時，談到罷工問題，香港政府即宣言：罷工問題已成過去，香港已無庸過問了。因此爲了要施展罷工工人一切革命的經驗及毅力到香港新的工人羣衆中去，爲了要在香港內部建立起像在廣州省港罷工委員會那樣的革命砲壘，亦不得不終止罷工，於是省港罷工抵制便在十月中宣告終止了。

這次省港罷工抵制延長了十六個月。世界工人運動一直到現在還未曾有過這樣持久這樣廣大的政治罷工。中國工人從此將有長時間去研究他們在這鬥爭中得來的偉大經驗。省港罷工的根本特點，便是歷史上未曾有過的兩種鬥爭形式——無產階級之罷工與民族抵制之結合。這一罷工是直接聯繫於一九二五年五六月上海沙面青島屠殺後之中國民族革命鬥爭高潮的。香港十三萬工人連同他們的家屬，在工會指導之下，去

棄了工廠手工場和碼頭的工作，並離開香港而移住於廣州及廣東各地。罷工工人建立起罷工委員會，這個罷工委員會在十六個月中間指導罷工工人的英勇鬥爭，他自身也就成了廣東全省革命的堅強砲臺。罷工變成了抵制，罷工工人的前進分子武裝起來并組成特殊形式的『工人赤衛隊』——罷工委員會的武裝隊伍。武裝的工人糾察隊在廣東全省海岸佈置了一條很長的戰綫，嚴密地封鎖廣州和香港中間的一切交通，不放棄販私貨的帝國主義的反革命偵探到廣東來。香港這個英帝國主義在東方強有力的支柱，隨着有組織的工人意志而衰落了，中斷了其與廣州的聯絡——這種聯絡是香港在中國南部商業上佔優勢的原因。十六個月的長期罷工工人竟以自己的毅力和耐性消蝕了不列顛帝國主義的威權。罷工雖然終止了，但是英帝國主義強盜將永遠不會忘記了他們從省港十幾萬工人羣衆所得到的痛苦的教訓。

正當省港罷工談判和終止的時候，上海自五卅週年紀念運動開始的罷工運動却在如火如荼的向前發展。一月至六月中的罷工情形在前面已經有過詳細的分析。七月份的罷工運動比起六月份來，範圍更廣，人數更多，情形也更複雜。在這裡我們應該繼

續做一番扼要的敘述。

七月十一日上海總工會召集第三次代表大會，提出當時上海工人之總要求十一條，并發布宣言，說明當時上海罷工的現象和原因，指出（一）打罵工人。（二）開除工人。（三）濫罰工資。（四）侮辱女工。（五）虐待童工。（六）大小便不自由。（七）工廠設備疏忽。——乃一般的工人所受痛苦；還有集會結社言論之不自由，工會之受摧殘，工人領袖之遭逮捕甚至槍殺，更是使罷工爆發的直接原因。最後，上海總工會代表全上海工人，提出十一條最低的總要求：

- ① 工資至少每月不得低於十五元。
- ② 工資當按照物價至少每年必須增加一次。
- ③ 每日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十小時。
- ④ 星期日休息，工資照給。
- ⑤ 不準打罵工人，濫罰工資。
- ⑥ 不準任意開除工人。

㉑ 規定因工作而死傷之工人的撫卹金。

㉒ 工人在疾病時廠主須負責醫治，並須給發半數以上之工資。

㉓ 改良女工和童工之待遇，女工在生產前後應有一月之休息，工資照發。

㉔ 工人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之自由。

㉕ 工廠改良設備，如增設門窗天窗廁所等。

以上這十一條真可謂最低限度的要求了。但是中外資本家却連半條也不肯實行。

他們不特根本拒絕工人米貼的要求，不理會改良待遇的呼籲，而且向工人作種種反攻，如開除歇業等。可是自上海總工會發表「上海工人的總要求」以後，在數十萬的工人羣衆中却起了劇烈的作用，差不多個工人都願爲此十一條要求而奮鬥，一般貧民對此要求也表示充分的同情。因此罷工浪潮更不斷洶湧起來。茲舉七月份上海罷工統計（根據第一百六十七期嚮導週報施英同志的統計）如下：

● 總統計表

同盟與單獨罷工之罷工次數	五四
參加罷工之企業總數	三業又一〇五廠
參加罷工之人數	七〇・四九四
罷工之時間(以鐘點計算)	六・六一二・一九七
罷工所提之條件	一八〇
勝利的條件	六〇

● 罷工企業類別與總數

手工業	三業又三五廠	郵務	一
印刷業	三七廠	船業	一廠
紗廠	一八廠	鐵廠	二廠

③ 罷工原因分析

援助的	時間的	工會的	待遇的	工資的
七	五	五	四	一九
總計	反對廠方用人	經濟與援助的	經濟與待遇的	經濟與時間的
五四	一	二	九	二

④ 罷工勝利條件

總計	反對用人	時間的	待遇的	工資的
六〇	一	八	一七	三四

染織	烟廠	碼頭	絲廠
一廠	三廠	四	三廠
			總計
			工業又一〇五廠

### ⑤ 罷工條件分析

工資的	六二
時間的	一八
待遇的	四五
工會的	四五
反對用人	七
援助的	二
求開廠的	一
總計	一八〇

### ⑥ 罷工時間分析

一月以上	三
七天以上	一三
三天以上	九
一天以上	一四
一天以下	一一
一小時怠工	四
總計	五四

上列六表表明七月份上海罷工之情況，這六個表格裏我們看出重要的現象是：

①七月份上海罷工總人數又超過七萬。

②七月份上海罷工企業仍爲百餘廠，但手工業的罷工較六月份加多。



③罷工的原因，屬於廣義的經濟意義的（即包括工資，時間，待遇諸條件）佔百分之八十。

④罷工時間較長了，在一月以上者已有三個罷工，在一週以上者有十三個罷工，而三日以上，一日以上下的罷工，亦有多數。

⑤一百八十個罷工條件中，工人結果得勝利者僅六十。六十二個工資要求條件中，工人結果僅得三十四。

以上所述都是經濟罷工，這種經濟罷工正在繼續發展和擴大，到了八月下半月，上海的工人又走到民族的政治的戰鬥場上來了。因為日本資本家對於工人之積極進攻，同時又發生陳阿棠被殺案，從八月二十日起，上海小沙渡日本內外棉紗廠工人遂又爆發了反日同盟罷工。二十日上午六時，上海紗廠總工會發布第一次罷工命令，原文如下：

『內外棉東西五，七，八，十二各廠工友們！東洋人橫暴無理，在萬里丸船上，竟秘密殺我同胞陳阿棠；在日華廠中，又敢用電網害死我工友郝霍卿，三廠

四廠九廠的全體工友，又備受日人無理停廠之壓迫，飽嘗拘捕毒打開除之苦；最近九廠工友石萬才，又被毒打，生死不明。日人之種種罪惡，擢髮難數！我工人爲爭國權，爲爭工人生命安全與利益，決以最後手段對付。聯絡各界，一致抗爭。我東西五，七，八，十二廠全體工友，着先於即日起，實行同盟罷工，聽候工會命令！勿怠勿忽！切切此命。

上海紗廠總工會八月二十日

此次首先實行罷工者，即命令中所述內外棉東五，西五，七，八，十二共五廠，計一萬餘人。日本內外棉廠在上海者共有十一廠，上述五廠先發動，乃該五廠工會自動向紗廠總工會所要求；但在發動後數日內，其餘六廠亦經紗廠總工會繼續發為命令，先後加入同盟罷工。各廠發動時，多以陳案及各廠情形爲準，如十三，十四兩廠，於二十五日見報載陳案消息，日本總領事對陳案抵賴，及證人發表之口供，憤慨不已，即時宣布罷工。在罷工後，全上海各日廠（紗廠及紗廠以外各廠各業）工會，復舉行代表會議，決議爲陳案及反抗資本壓迫謀自身利益起見，請求上海總工會發布全上

海對日總罷工令。會議後，各處即着手組織罷工委員會。最初內外棉廠發動時，僅提出下列五個簡單的條件：

『一解決陳阿棠案，引渡兇手交中國法庭辦理，撫卹被難家屬，保證以後不得再有此等事件之發生，日本領事向中國道歉。

二改良工人待遇，不得雇用武裝巡捕流氓入廠毆打工人及濫罰工資與蔑視工人人格（如打腳摸手印等事）等。

三增加工資十分之二。

四釋放各廠被捕工人，恢復被開除工友工作，以後不得任意開除工人。

五賠償關廠期內工人之損失——三，四，九廠關廠期內工人之損失及此次罷工期內之工資，須一律照發。』

可見在民族政治性的罷工中，其主要原素仍包含有經濟的鬥爭。工人階級之政治自由完全沒有，工廠的待遇又萬分苛虐，工會組織之百折不同的奮鬥乃罷工的原素之一。二十日開始發動以後，罷工即日漸擴大，直至九月十八日始被迫上工，計共支持

二十八天，參加人數共二萬二千六百餘人，所佔日廠共十二家。

以上是上海日廠工人反同盟罷工之情形。其實在總的形勢上，上海罷工浪潮在八九兩月中之激盪，並不亞於六七兩月。現在根據第一百七十二期嚮導週報施英同志所作八月份上海罷工之總結，簡單說明八月份上海罷工之情勢。先引其所作『八月份上海罷工的統計表』於次：

工廠名稱	產業	罷工之時間(以鐘點計)		參加人數	要求條件			利勝	敗失	決未
		六四八	四三二五		政治經濟	待遇工會	共計			
日華一二紗廠	紗業	六四八	四三二五	一	四	五		五		
老怡和紗廠	紗業	七四四	四〇〇〇	三	三	六			六	
恆豐永地毯廠	手工業	六〇	一二〇	四	二	六	三	三		
大北地毯廠	手工業	六〇	一五〇	四	二	六	三	三		

恆記地毯廠	永大地毯廠	義仁昌地毯廠	德盛永地毯廠	辛昌地毯廠	海京地毯廠	永和成地毯廠	義恆豐地毯廠	公義成地毯廠	北方地毯廠
手工業	手工業	手工業	手工業	手工業	手工業	手工業	手工業	手工業	手工業
六〇	六〇	六〇	六〇	六〇	二一六	六〇	六〇	六〇	六〇
一〇	九	一三	四〇	一一	二四〇	一五	一三〇	四〇	一一一
四二	四二	四二	四二	四二	四二	四二	四二	四二	四二
六三	六三	六三	六三	六三	六一	六三	六三	六三	六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五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新怡和紗廠	上海日報館	花旗烟廠	文記絲廠	張德興地毯廠	陳福祥地毯廠	同義和地毯廠	同義昌地毯廠	同義昌地毯廠	華昌祥地毯廠
紗業	印刷	烟業	絲業	手工業	手工業	手工業	手工業	手工業	手工業
一〇	一二	七二	九	六〇	六〇	六〇	六〇	六〇	六〇
一五〇〇	五	七五〇	二八〇	五〇	五〇	五〇	一五	七五	七五
一	一	三三	二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一	一	三三	二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二	二	六	三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二	六一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二		五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中華書局裝訂部	印刷	二七六	七〇〇	四四	四四	一九	二七	
義興印刷局	印刷	二四	四五	四二	六六			
美華書局	印刷	一六八	一五〇	七三	三三	七		
中華書局總店	印刷	三	一〇九	四四	一九	九		
祥生鐵廠	鐵廠	六〇	三〇〇	一一	二二			
勤華布廠	布廠	三六	二一〇	二二	四三			
商務書館鐵工部	鐵廠	二四		一一	二二			
內外棉九廠	紗業	一五六	三〇〇〇	一一	二二	二	二	
內外棉東五廠	紗業	二八八	一八二九	二二	五			
內外棉西五廠	紗業	二八八	一九五〇	二二	五			五

內外棉七廠	紗業	二八八	一七〇〇	一	二	二	五	五
內外棉八廠	紗業	二八八	八〇〇	一	二	二	五	五
內外棉十二廠	紗業	二八八	六〇〇	一	二	二	五	五
內外棉十五廠	紗業	二八八	一五〇〇	一	二	二	五	五
內外棉十三廠	紗業	一四四	一三〇〇	一	二	二	五	五
內外棉十四廠	紗業	一四四	一三〇〇	一	二	二	五	五
內外棉三廠	紗業	一二〇	一四〇〇	一	二	二	五	五
內外棉四廠	紗業	一二〇	二一〇〇	一	二	二	五	五
同興紗廠	紗業	九六	二二〇〇	一	二	二	五	五
南北市裝訂業	手工業	四八	二二〇〇		三	三	六	六



金銀業十四家	手工業	四八	一〇〇〇																
華商電車	市政	二四	四五〇		三		三												三
總計		五九堯	三,五三七	二五五	二九三	二八	四五	二〇											

(原註)

① 罷工之總數計有六十企業，共二十三次（以單獨罷工與同盟罷工合算）。

② 罷工時間以八月一日至三十一日計算。

③ 罷工工人總數，以可靠者列入，其未確實者暫不列入。

④ 要求條件之總數，凡同盟罷工有條件相同者只能合計（例如各日廠同盟罷工的

政治條件共爲一條）。

施英同志在他的罷工統計之後并詳細說明統計之內容，總括有下列之結論：① 產業的罷工已爲含有政治性的，其表現爲長期性的；② 手工業的罷工特別加多，這證明在產業罷工已起之後，手工業工人因生活壓迫，亦表現其組織的新力量，增加經濟的

鬥爭生活（地毯工人在本月中之興起，猶如六月中絲廠工人之興起）；<sup>⑤</sup>罷工的條件，屬於工資與待遇的佔百分之八十強，與六七月相同；<sup>⑥</sup>失敗的條件佔最多數，亦與六七月相同；<sup>⑦</sup>八月份參加罷工人數，因手工業佔企業多數單位，將近四萬人，比六七兩月減半，但其中將近兩萬人於月底罷工猶未結束；<sup>⑧</sup>月底華商電車之罷工，證明經濟鬥爭推廣到市政交通工人，這是八月份上海罷工情形之概畧。但按照統計內容以說明，那僅是一個結論，僅能知道一般的現象。至於罷工事件的本身——其經過情形與其教訓，却不是從統計可得而知的。在事實上，這些情形惟有工人自己才知道得最清楚；其次，罷工的對方被反抗者（即資本家）僅知道片面；至於官廳則蠢若豕豚而淫威十足。所以當時淞滬警察廳出了一張肉麻不通的禁止罷工佈告，其口氣大有「格殺勿論」之概，而其內容則處處自己打自己的嘴巴。這張佈告曾被日廠工人的「罷工日刊」反駁個痛快。例如佈告說工人罷工了便沒有飯吃，殊不知工人正因飯不够吃才能罷工；又如佈告公然說五卅慘案中工人罷工乃受人利用之輕舉妄動，這樣的話與五卅時英帝國主義的謠言「賊言」是一樣論調。其餘荒謬言詞甚多，而日本紗廠恰好利用此

佈告翻印數萬份，以二百元僱數十人到處散發。這個佈告對於罷工工人表示着充分的敵意，和後來國民黨壓迫工人鬥爭的伎倆如出一轍。

其次，施英同志在其總結八月份罷工的論文中，還有許多悲壯事蹟的記錄。這些事蹟之最顯著者，如：①各日廠同盟罷工工人的屢次集議；②日華紗廠罷工一月後伴許復工，向廠主取得一元工資後又繼續罷工；③總計一月中前後被廠主僱流氓打傷之糾察隊童子團達二百餘人；④因散傳單或演講或秘密集會被警署及捕房拘捕者數十人，或判罰金或充苦力或判囚數月；⑤『九七』辛丑條約紀念日在民國路與孫傳芳軍隊格鬥，在南京路與英捕印捕衝突，是日罷工工人之講演，是在租界中預為帝國主義唱輓歌，馬路兩旁充滿了悲壯激昂的呼聲，使巡捕偵探等張皇失措。

以上所述乃是上海自七月以來罷工運動的概畧，這一風起雲湧的長期罷工浪潮直至九月十六日紗廠同盟罷工失敗復工之後，才告一段落。

### (三) 萬縣慘案與反英運動

北伐戰爭的勝利，吳佩孚的敗竄，直接影響到英帝國主義在長江的勢力發生動搖。所以自北伐戰爭以至於取得武漢的過程中，英帝國主義由恐慌，咒咀變到了最後的發狂，便不分地域的運用鐵甲戰艦向中國民衆施行武裝的暴行。在九月四日既有英艦駛入珠江，武裝威挾革命政府的嚴重事件；其後遠道的斃耗傳來，一九二六年九月五日英艦在四川萬縣又演炮轟萬縣民衆的空前慘酷的大燒殺。

根據當時萬縣代表劉宗沛君之報告及國聞社與上海各報之重慶通信調查結果，萬縣慘案的經過情形是這樣的：

英輪因有內河航行之不平等特權，又恃該本國政府之後盾，故在川江航行並不遵守航行公約，每於開抵各碼頭時任意疾駛，以致迭次撞沉民船。如滇光輪船，於六月十三在萬縣箱子壩地方撞沉木船一隻，淹斃中國人民何興泰劉吉五張蕪王素雲傅雲生等十餘人；又萬流輪船於七月八日在酆都立石鎮地方，撞沉划子一隻，淹斃川軍第六師營長田雨亭及勤務兵商務人員張復初田雲等二十三人；又嘉禾輪於八月二日在涪灘地方撞沉木船數隻，淹斃差人民張海淑覃邦良崔英峰崔英瑞秦大志等數十八，並沉

沒公款六千八百餘元。川政府會向英領事提出抗議，均置不理不復。詎知英輪『萬流』於八月二十九日復在雲陽地方，故意肇禍，特開快輪，以致撞沉木船十數隻，溺死人民數十人（姓名確數俱無從考）及官兵五六十人，槍枝五十六枝，子彈五千餘發，復沉公款八萬五千餘元。此次損失較前數次尤鉅，而且損害到四川軍閥楊森身上，於是不能不派兵將該肇禍英輪扣留，以便辦理交涉；但是蠻橫的帝國主義者那有理可講，遂由兵艦派兵多名到該輪，將楊部扣船兵槍子彈強行一併提去，并傷亡軍士數人，威迫將萬流輪放行，並同時架置鉅砲，直向萬城南津街等處，勢欲轟擊作對敵行動。居民惶駭，莫知所措。八月三十日，適英輪『萬通』『萬渝』兩輪過萬，楊軍遂將兩輪扣留，以待交涉。於是空前大慘案遂以此開演。

當楊軍扣留萬通萬渝兩輪的時候，重慶英領事即疾駛來萬，極力恐嚇楊森。同時英國兵艦苛克捷夫號（Cochetart）即卸衣實彈，架置120 D.M.（十二生的）之大砲數尊，對準萬城威迫兩輪，作對敵行爲；又立即由渝開來『威警』（Widgen）英艦，脅同示威，意同作戰。九月五日午後五時半，又由宜昌開來裝甲英輪嘉禾，架置巨砲數尊

，機關槍百餘桿，硫磺彈無數，滿載英兵，甫抵萬城，哨聲未絕，即逼近被扣之輪船。於五點四十五分，英兵突然衝過萬淪輪上，用機關槍及大砲轟擊扣輪軍士，無一倖免。同時威迫兩輪之英艦苛克捷夫號，於五點四十八分，一面開快槍，向萬通輪射擊，一面用大砲向萬縣城兩岸亂轟；而威警英兵艦亦於五點五十分開排槍，向兩輪及反抗之民衆進攻，並用巨砲對準萬縣城兩岸及南津街商場萬縣中學等地掃射。同時嘉禾裝來之巨砲，亦向上列各地亂轟。據法艦之統計，三英艦共發大砲三百餘響，而嘉禾輪上更濫用其慘無人道，國際禁用之硫磺炸彈，對準南津街商場地方，放射百餘發，以致萬城繁華興盛之商場，崇偉廣大之民房，遂成烽火冲天，鬼哭神號，愁雲慘霧瀰漫全市之災區！事後調查，計被硫磺炸燬之商店，確有二百餘家之多；而民房之被焚於火者，至少亦以數百計；中國民衆兵士被殺數千人，財產損失則在數千萬以上。

英國帝國主義這次在萬縣既利用不平等條約，任意航行內河，不按航規，橫衝直撞，致撞沉民船數次，沉斃人民數十。地方官提出抗議，一味橫蠻不理，反而用十二生的之大炮野戰砲硫磺彈盡量施行轟擊，傷斃中國人民至五千之衆，焚燬房屋至數千

間，損失財產至千餘萬，整個的萬縣城差不多成了腥血塗染的斷瓦殘垣。這不僅比五卅時的屠殺情形更凶惡慘酷十倍，簡直是近百年來世界史上罕有之慘案奇聞（除向敵人正式宣戰外，沒有如此用大砲肆行轟擊者！）。這種野蠻毒辣的行為，在帝國主義對於非洲南洋之野人尚不敢遽施，今英國帝國主義竟一再施之於中國，他簡直視中國爲屠場，視中國人爲非人類，不過是他任意屠殺的對象罷了！

這次屠殺的起因，表面看是由英輪撞沉中國官船，與楊森衝突的結果；其實英國帝國主義早就在準備一個大屠殺，故屢次挑釁乘機待發。據當時（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三日）上海時事新報所載：由日人方面的調查，截至八月十五日止，英國兵艦在天津芝罘青島上海福州汕頭廣州香港漢口長沙等處淀泊的已達四十八艘之多。當北伐戰爭興師之初，英兵便在梧州上岸捕人，這是挑釁的第一次；當北伐軍到武漢，英艦公然援助吳軍，砲擊北伐軍，這是第二次；九月四日在廣州英艦派兵上岸，佔領碼頭，逮捕工人糾察隊，截獲民船，強行駕駛貨船進口，這是第三次；在萬縣屠殺便是第四次。因爲英國帝國主義在五卅時雖然屠殺了數百個中國民衆，却引起了全中國民衆空

前的反帝運動，英帝國主義在各方面都受了嚴重的打擊；尤其在廣東，昔日繁盛逼人的香港變成了荒島，如今北伐軍又攻下武漢，英帝國主義在長江的勢力將發生動搖。因此，他便不顧一切，橫行無忌盡量地使用他的砲艦政策來施行大屠殺了。

中國所有的軍閥都是外國帝國主義的走狗。萬縣慘案的直接原因發生於英輪撞沉官船，直接損害到楊森身上，然而楊森及北京政府並不敢堅決與英帝國主義抗爭。起初雖然也提些抗議，但是過不了幾天，也就和段祺瑞政府對於五卅慘案的交涉一樣。真正能够反抗帝國主義的暴行的，始終只有被壓迫的民衆。萬縣屠殺開始的時候，英帝國主義者很有一種想頭，牠以爲英國與中國軍閥的衝突。不易於引起民衆的反感；因爲中國民衆敵視吳佩孚及其同系的軍閥（如楊森等），是英國人所熟知的。衝突的地點離開大都會及工人中心很遠，這也足以隱蔽事實使萬縣事件不易於被幾個『鼓動家』利用去做反英的宣傳，如上海五卅屠殺一樣。英國砲擊萬縣，焚燬全城，一下子便擊斃了五六千以上的無辜人民，這樣便是給予中國民衆以絕大的恐嚇，使之戰慄於英國帝國主義砲艦政策之前，拜伏於地不敢動彈。英國資產階級對殖民地政策及其在



殖民地劫掠，積貯了三百年的經驗，其手腕自是巧妙不過；這次萬縣慘殺的動作，更可說是十二分巧妙的。然而五卅運動以後的中國民衆已經不是傻孩子了。在萬縣事件中，中國民衆都懂得，這並非是英國帝國主義與中國軍閥之間的根本衝突問題，而是英國帝國主義武裝進攻中國民衆的狡猾政策，在事件中死傷的都是無辜的中國民衆。帝國主義的砲艦政策只能嚇退高等華人和士紳階級，却不能嚇退工農革命羣衆。英國人不能始終隱蔽萬縣事件之真相。廣大民衆的反英運動，終於像洪濤一樣普遍於全國。萬縣事件發生的時候，英國帝國主義的喉舌——京津太晤士報曾經說：『大家都知道，中國民衆厭惡本國軍事權力，比厭惡英國軍艦還要厲害。四川的外僑絕不怕民衆對他們有何敵視。』可是，不過數日之後，僑居四川的一切英國人，都迫得離開四川的重要城市，以避免中國民衆對他們之日加一日的敵視了。

事變的發展竟出於英國資產階級意料之外。這番英國帝國主義對於萬縣之慘無人道的大屠殺，引起了全國被壓迫民衆轟轟烈烈的反抗。事變起後，萬縣英美烟草公司工人立刻罷工反抗，萬縣商人亦宣言不買英貨。重慶首先聽見屠殺消息，馬上即有熱

烈的反抗運動，學生到處演講發傳單；數日後復有三萬餘人之示威大遊行，『解除英國軍艦武裝』，『廢除不平等條約』，『擁護北伐』的呼聲震動天地。並派代表劉宗沛到長江下遊各地報告真相。長江上游領港工人因此屠殺亦對英輪罷工反抗。漢口上海廈門等地都有羣衆大會及示威遊行，一時反英宣言通電遍載報章。不僅中國民衆，即各國無產階級及被壓迫民族亦都表同情於萬縣慘死民衆，反對英國帝國主義的野蠻暴行。共產國際聽見萬縣慘殺消息，即刻發表宣言，號召全世界勞苦羣衆，切實動員起來反抗英國之暴行。倫敦柏林等地均有熱烈之示威運動。

#### (四) 北伐戰爭與兩湖工農運動的發展

自北伐軍攻下武漢以後，繼而又取得江西與福建。在同時，武漢發生了當地從來未有的猛烈的罷工運動。這一事件震動於全國，影響於世界；適如北伐軍取得武漢江西與福建之震動於全中國，影響於世界一樣。這一事件，在帝國主義的英國議院裏引起了討論，在帝國主義的日本政府機關報裏，提出了對於國民政府的警告；在中國北

部買辦階級地主階級與大資產階級的營寨裏，激起了生產協會的組織；在中國的中部及長江下游，資產階級大商人奔走相告，斥責國民政府不當援助工人，高呼國民政府赤化；在中國的南部之廣東，國民政府甫遷未定，省政府的領袖已開始準備壓迫廣東的民衆運動，傳言要封閉廣州工人代表會。

當時武漢罷工運動所以如此蓬勃的發展，一方面固然是受了北伐戰爭勝利的推動，但同時更重要的原因乃是武漢工人的生活太苦——工資太少，工作時間太長，待遇過於惡劣。在北伐軍尚未佔領武漢以前，武漢工人的罷工鬥爭雖然沒有像上海罷工這樣發展，但在一九二六年五六月間，漢口烟草及紗廠工人即已開始爲改善生活的經濟罷工。至十月間北伐軍佔領武漢之後，自然更加幫助推動武漢罷工運動的發展。北伐軍到達武漢不到兩月，組織在武漢總工會之下的工會會員已擴大至三十萬人，工會擴大至二百左右；九月以後，罷工浪潮便一天洶湧一天。計在一九二六年冬季及一九二七年春初，武漢自郵務印刷紗廠香烟廠銀行職員直至店員手工業工人，無不捲入罷工浪潮，詳細分析和統計，因材料喪失，只得暫付缺如。至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底止，湖

南工會組織亦由五縣增至四十縣，工會會員由六萬增至十五萬人。

同時，農民運動亦迅速發展。據一八一一期嚮導週報長沙通信，在十一月底止，湖南一省有五十四縣已有農民協會組織，農協會員共計有一百另七萬一千一百三十七人。其中有十萬人以上的組織計四縣，有五萬人以上的組織計六縣，有一萬人以上的組織計十二縣，有五千人以上的組織計十二縣，有一千人以上的組織計十八縣，不滿一千人的計二縣。當時組織比較好的地方是瀏陽衡陽湘澄平江來陽湘鄉長沙宜章甯鄉等縣。北伐中湖南農民參戰最勇敢，北伐取得初步勝利，農民鬥爭也跟着擴大起來。此時農民最普遍的要求是：減租減息，廢除苛捐雜稅，要求武裝，打倒土豪劣紳等。這種鬥爭最激烈的地方是衡陽安化湘陰瀏陽醴陵宜章等處；十月間衡陽減租減稅鬥爭參加農民羣衆已達七萬以上。至一九二七年一月間，湖南全省農民協會組織已擴大至二百萬人，農村鬥爭更如急風暴雨般的發展起來；打倒土豪劣紳，並且已經開始自動手沒收地主土地。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底止，湖北亦已有二十餘縣發展農民協會的組織，全省農民協會會員亦已達二十萬人左右，農村鬥爭雖不若湖南之激烈，但亦開始掃

蕩農村封建勢力了。跟着這種工農運動的發展，於是『工農運動過火』的呼聲也就起來了。

### (五) 『一二三』慘案與漢口九江租界之奪取

中國國民革命運動一日高漲擴大似一日，工人農民的廣大羣衆起來爲反對帝國主義及國內反動勢力而爭鬥，在許多大城市中罷工運動如潮而起。許多省的農民也起來成立他們的爭鬥組織，和反動勢力的地主豪紳爭鬥。這些革命勢力之興起，無人能止之。工人羣衆漸漸組織到戰鬥的工會之內，衝破了以前地方的行業的界限，成功了強有力的統一力量，以領導全國民衆反抗帝國主義及國內反動勢力的爭鬥。農民羣衆日益捲入革命漩渦，並且工人階級領導農民爭鬥這個事實也已到來。由於工人農民奮勇鬥爭，由於北伐戰爭之勝利，並且由於帝國主義尤其是英帝國主義之加緊進攻，多數城市小資產階級及手工業工人都一天天革命化了。這些現象都使帝國主義者及國內一切反動勢力見之顛抖！

於是帝國主義一方面『看見軍閥不能作消滅革命運動的有效工具，乃用和平方法，在中國民族革命勢力中，找尋他的同盟者。帝國主義者企圖叫醒民族資產階級，使之脫離革命戰綫。並爲使民族運動內增加帝國主義代理人的勢力起見，於是那些迄今（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底）還站在民族革命鬥爭之外，或甚至仇視革命的某部分大資產階級，甚至軍閥，開始轉變到國民政府方面。帝國主義主謀這種舉動的目的，是從革命的聯合（無產階級，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的手中奪取革命領導權，以阻礙革命的發展并進而破壞革命。』（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底共產國際第七次擴大會議對中國問題議決案）。英帝國主義爲執行這種新政策，且於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共產國際第七次擴大會議閉幕兩星期後）發表其『對華新提案』——這個新提案據英國帝國主義自己說是『本政府通盤局勢慎加熟計後的產物』，標明：

『本政府（英國政府）無不恆持避免與交戰各黨派對峙各政府之間，加以任何種『干涉』之態度。且雖見國內戰爭所發生之紛亂，加以中外洪大商務所受之鉅大損失，乃仍未嘗與任何黨派攜手，及以何公干涉民間之誼訖。……且深信此種

態度，爲現應操持及將來應行繼續操持唯一正當之態度也』（新提案第四項）。可是同時，帝國主義并不能因此就放棄牠們一貫『干涉』中國的態度，這就是說的確艦政策，接着萬縣慘案之後，而且僅僅離開英帝國主義宣布牠的『新提案』的兩星期工夫，就在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英國帝國主義駐華軍隊，便在漢口野蠻『干涉』中國演講隊，刺殺中國和平民衆了。

關於這次漢口『一三』慘案，帝國主義說是『中國暴民侵犯外人生命財產』，中國一般高等華人及機會主義者也說是『羣衆糊塗』，現在我們可以借用素來反對革命的『上海時事新報』當時對於『一三』慘案的一段通信，看看當時事變的真相究竟怎樣。該報一月十一日有一篇『漢口事件之原原本本』的漢口通信，很詳細的記載『一三』事件，現在我節錄他一段『肇禍之真相』如下：

『十六年（即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二日三日，爲武漢各界慶祝國民政府北遷和北伐勝利之期，黨部及中央政治學校宣傳員，爲使各界明瞭慶祝意義，特組

織演講隊到各重要地方演講。前日(三日)下午三時，有宣傳員數人在一碼頭江漢崗前面中英交界之空場演講，聽衆頗多，宣傳隊派有專人照顧，秩序井然，不料英租界當局認此爲挑釁機會，急調大批武裝水兵登岸，挖掘戰壕，架機關槍十餘架，儼然向赤手空拳之聽講民衆，取作戰之形勢。聽講民衆，訓練有素，不爲所動，英兵乃蜂擁上前，實行驅逐。羣衆知其有意挑釁，乃向華界退却，英兵復大隊衝入華界，將刺刀向人叢中亂戳，當將海員工會會員某腹部洞穿，立即斃命；又有碼頭工會會員李大生腹部被刺，大腸隨刀拖出，血流遍地，命在旦夕；市民方漢山，腰部刺入甚深，亦有性命危險；其餘商工各界聽衆被刺刀槍托殺傷打傷手足及面部者，總計在三十人以上。羣衆睹此慘狀，異常憤激，無不願以赤手空拳與英水兵決一死戰，其時幸經國民政府代表徐謙蔣作賓，漢口特別市黨部代表李國璋宛希儼，漢口市公安局長張篤倫等趕到，向民衆宣示對付辦法，力勸民衆暫忍一時之氣，免受重大犧牲，羣衆深爲諒解，漸次散去，一幕慘劇，始告終局云。



慘案發生之後，武漢各界民衆，悲憤異常，當晚即各分途召集緊急會議，討論對付辦法。同時即於四日午十一時舉行民衆團體緊急代表大會，一致決議：

- ① 要求政府向英領事提出嚴重抗議，限英領事於七十二小時以內答覆下列條件：
  - ② 英政府須負責賠償此次同胞死傷之損失，
  - ③ 英政府須立將肇禍兇手交中國政府依法懲辦，
  - ④ 英政府須立即撤退駐漢英艦及英界之沙包電網等作戰物，
  - ⑤ 英政府須向國民政府道歉，
  - ⑥ 英租界內華人須有集會結社遊行演講之絕對自由，
  - ⑦ 英租界巡捕及義勇隊須一律解除武裝，
  - ⑧ 英租界須由中國政府派軍警管理。
- ⑨ 同時要求政府自動辦理下列各項：
- ① 立即收回英租界，
  - ② 立即收回海關，
  - ③ 立即取消英輪在中國之內地航行權，
  - ④ 立即撤消英人在華領事裁判權。
- ⑩ 加英領事對於國民政府所提之條件不能接受時，民衆決自動封鎖英租界，實行對英總罷工。

⑪ 實行對英經濟絕交，由總商會通告，嚴禁買賣英貨。

⑫ 五日下午二時在濟生三馬路，召集市民示威大會，追悼死難同胞，討論對

英辦法。

(六) 通電全國全世界宣布慘案真相。

(七) 組織武漢市民對英委員會。當推定湖北省黨部，漢口特別市黨部，總工會，全省商聯會，漢口總商會，武昌總商會，省農民協會，省學聯會，省婦女協會，漢商協會，漢陽商會聯合會，律師公會，新聞界聯合會，農工商學聯合會等十五團體代表為委員；並即推此十五團體代表，立刻將聯席會所提出之條件，口頭向政府陳述，以備採納。

當時的武漢國民政府，自然還是革命的政府，所以對於民衆提出之條件全部接受，立刻即向英領事提出嚴重抗議。廣大工農羣衆反抗帝國主義的氣焰繼續高漲，五日示威大會之後，武漢革命羣衆使用自己的鐵拳把英租界奪回來了。這是中國無產階級及一般被壓迫民衆以自己羣衆力量奪取租界的第一次！向來殘暴橫到底的英國帝國主義到此雖然仍不脫他的蠻橫氣概，大呼『外人生命財產岌岌可危』，調遣大批兵艦來華，而且在漢口『一三』慘案發生之後，接着一月六日又在九江殺人。然而在廣大

界亦被中國革命民衆奪回（可恨後來武漢國民政府反動，重新又把這兩地民衆奪回的租界送還英國帝國主義！）。

自漢口事件發生之後，英國帝國主義一方面因爲在中國羣衆革命的火焰之下，不能不表示相當讓步；另一方面鼓勵列強協同出兵進攻中國。和義和團時代八國聯軍剿滅中國一樣的目的又不能達到。於是牠同時使用陰謀挑撥和恐嚇欺騙的政策來對付武漢國民政府，以圖實現牠從中國革命營壘中找尋同盟者和分裂中國革命陣綫的計劃。

我們試讀當時代表英國帝國主義者這種態度的一篇重要論文（一九二七年一月七日上午海字林西報社論）：

「雖吾人不願在未得詳細報告之前有所評論，然目前國民黨及國民政府之政治色彩亦不可不加以注意。暴動或許是偶發的不能前知的，一粒火星可使羣衆發狂，然而此等暴動能創造歷史，並且常常是建立一個新政府的機會。國民黨有溫和派（他們主張維持秩序）與極端派（他們主張擾亂秩序），是公開的事。極端派甚恨溫和派掌握政府大權。他們對於英國公使與國民政府間諒解之可能，極爲怨

恨。他們深怕他們的活動將因藍浦生與陳友仁間之談判而縮短，他們尤其恐怕的，是英國對華的友誼的提案（即指新提案）已博得華人之好感，因而使他們的反英宣傳失敗。極端派因此將利用一切機會再煽起反英的火焰；此非因彼等深恨英國，實彼等以此為政治活動之手段。國民黨中究將何派佔勝利，關係於外人對於國民政府之態度，實在不小。

今漢口事件實為試驗國民政府有沒有能力，配不配，的一個非常的機會。一個政府而能保護生命財產商業，則為正當之政府。現在國民政府担任保護漢口英租界生命財產之責任，直到事態能使英國自行負責之時為止。中國之將來命運，全視今日國民政府之能否保護秩序，保護外人商業與生命，以為決定；因在華及在本國之願與國民政府為好友之英人，皆樂觀國民政府之能維持秩序與法律，而引以為榮，若國民政府不克負此責任，則吾人甚覺慚愧（意謂看錯了人，故自慚）。即反對國民政府者，見了國民政府之能維持秩序與法律，亦將變而與國民政府為友，非然者，彼等反對國民政府之意見將愈堅決。承認國民政府問題之最

羣衆的革命鐵拳之下，蠻橫殘暴的英帝國主義究竟亦不能不表示相當讓步了；甚至「收回租界」的哀的美敦書亦不能不表示接受了。於是漢口事件之後，接着九江英租後決定將於此後數日內國民政府處理漢口事件之態度而覘見之。如果羣衆是壓靜了，如果沒有罷工與抵制，如果貨物能應市場之需要而自由進出，如果外人無生命之憂，則國民政府是證明了有權力。非然者，國民政府的前途就可悲觀。

今全世界咸注目於漢口事件。大英是能忍耐的，華人至終將認識究竟誰是他們的朋友。大英能靜待公平之解決。但若羣衆洶洶不休，而國民政府袖手旁觀，則英人的忍耐將至終點。似乎國民政府已担任了保護外人生命財產的責任了，吾人將觀其究竟辦到如何樣的圓滿。當一羣極端的暴徒發狂的時候，政府辦事是極棘手的，可是亦惟有此等事件方能試驗政府是否有價值。中國今日最需要之事，莫如武力維持秩序，負責任，有決斷等等。國民黨與國民政府應該能够做出來給全世界看，證明他們（國民黨與國民政府）是有權力的，有決斷的，如此則他們的許多國際問題就容易解決了。換言之，如果他們沒有辦法，則保護生命財產與

商業的方法一定可以找得。現在是無可躲閃的時機，不論是英人方面或國民政府方面。」

字林西報這一篇社論，可以算得是一篇最巧妙而且最陰險的煽動文，這是英帝國主義對於中國革命的真正態度，值得中國每個革命者來研究研究。這篇社論表明出當時英國帝國主義的願望是：指出當時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內部有溫和派和極端派；溫和派是主張維持帝國主義的秩序的，極端派是反對帝國主義到底而且是要破壞帝國主義對華統治的，英國不能與極端派合作，漢口的以至全中國的反英運動都是極端派作出來的。英國帝國主義當時惟一的願望是：國民黨和國民政府能以武力制止反英運動，「壓靜」羣衆，「担任保護外人生命財產的責任」，保持英國「貨物能應市場之需要而自由進出」并且以此當作承認國民政府的條件。英國帝國主義高聲喚醒并警告國民黨和國民政府說：「現在是無可躲閃的時機，不論是英人方面或國民政府方面」，你們（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現在最重要的責任就是「用武力維持秩序」，自然，「當一羣極端的暴徒發狂時候，政府辦事是極棘手的」，可是只要你們（國民黨和國民政府）

「有決斷和負責任」（自然是負保護外人生命財產與維持帝國主義對華統治的責任！），則我們大英帝國一定極力幫助你們，如果你們自己沒有辦法，只要得到我們大英帝國的幫助，「則保護生命財產與商業的方法一定可以找得」。如今只要你們國民政府和國民黨能够做出來給全世界看，切實「用武力維持秩序」，「證明」你們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是有權力的有決斷的，如此則你們的許多國際問題就容易解決了」。英國帝國主義的願望不會落空，當時字林西報的社論還只說「似乎國民政府已擔任了保護外人生命財產的責任了」，漢口事件發生之後不過幾個月工夫，整個國民黨和國民政府便都回到他們的老家，實實在在成爲帝國主義的工具了。

## 第五節 上海二次暴動與蔣介石叛變

### （一）第一次暴動

自北伐軍克復武漢，進攻江西，與孫傳芳軍隊正式開戰後，上海的局勢即入於搖

動狀態中。在這搖動的局勢之下，就產生一種自治運動。此種自治運動，首先發生於上海市，遠在齊盧戰爭以後，由上海市自治運動，擴大到環太湖區域。閩北自治運動和孫傳芳爭持最烈，其初發動於閩北自治公所幾個董事，漸漸擴大到環上海市所有大小城鎮的紳商團體；然而這種和平式的而又多少帶着一些反軍閥精神的自治運動，終於被孫傳芳用租界帝國主義的援助和丁文江『大上海』的欺騙政策壓伏下去，上海市終於被孫傳芳統治了。這就成了中國資產階級政治生活中做軍閥反對派的投機的初次樣本！其後因孫傳芳在江西軍事失利之消息頻頻傳來，又因浙江夏超之宣布獨立，上海自治運動又重新起來，且因此而有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四上海第一次暴動之發生。

這所謂上海第一次暴動，雖然名之爲『暴動』，可是若在暴動的實質的真實意義上來看，是不能稱作暴動的，實際只能算是一種軍事投機。因爲武裝暴動乃是一種政治鬥爭的特別形式——最劇烈最堅決的鬥爭形式。『要武裝暴動取得勝利，第一，應該不憑藉一小羣黨徒，不憑藉黨，而憑藉先進的階級；第二，應該憑藉民衆革命潮流之高漲；第三，暴動必須憑藉革命進行之歷史的緊急關頭，即當民衆先鋒隊伍的積極



性最大時，即當敵人的營壘中和軟弱的不堅決的同情革命的隊伍中發生動搖最劇時（列甯）。但十月二十三日前前的上海暴動的計劃是受這樣的情形決定的：一方面孫傳芳在江西的戰事屢次失利，主力軍已喪失大半。至十月十米左右孫傳芳的軍事情勢更加險惡，南昌受困，已在岌岌乎不可終日之中。湖北方面十月十日武昌陷落後，吳佩孚失去了最後的壁壘，北伐軍又逼近武穴。福建方面，周蔭人又節節失利，陳調元周鳳岐都有不戰而退的趨勢；最後更有浙江夏超之宣布獨立——據此情形，孫傳芳的勢力實已在分崩離析，瀕於危急之時。另一方面受了北伐勝利的激盪，上海工人羣衆在孫傳芳的高壓之下，久困思逞；一般小資產階級的民衆苦於戰爭的延長，非常憤激；資產階級更想乘機催促孫傳芳勢力的崩潰，奪取上海的政權。

但是中國共產黨雖然已經開始準備暴動，並且組織了一百多個的武裝工人及比較多些的沒有武裝的戰鬥隊，事實上也參加了這次「暴動」，但是可惜竟完全失却了自己無產階級獨立的地位，不但依賴資產階級而且做了國民黨鈕永建等的尾巴，甚至暴動的日期也歸鈕永建指定。鈕永建不但團結資產階級的代表（虞洽卿等）及一些小資

產階級的成份在自己的周圍，而且抓住了一部分流氓無產階級。

十月十六日夏超在浙江宣布獨立，正式宣布投誠國民政府，而且派兵進攻上海（十七日），這時候孫傳芳的軍隊尚未調集，上海的防守很是空虛，恰是上海暴動最有利時機，可是暴動的準備還非常差，不能舉行。到十月二十日武裝工人與鈕永建的隊伍多多少少地準備着暴動時，但是，這時夏超的情形已經很壞了；反之，孫傳芳却比較從容的從南京調集許多軍隊。到十月二十三日，鈕永建得到一個不確實的消息，說孫傳芳的軍隊已被夏超打败了，於是他便發出於二十四日早晨五時實行暴動的命令，其實事實上乃是夏超已被孫傳芳擊敗了。因為共產黨當時根本沒有準備暴動的羣衆基礎，根本沒有計劃并組織上海工人的總同盟罷工；另一方面，鈕永建的實在力量比當時共產黨的估量要少幾十倍，而且根本沒有統一暴動的計劃；也沒有統一暴動的指揮人，所以結果暴動沒有方法實現，僅僅只有少數人與警察發生衝突，所以不但沒有廣大羣衆的實際行動，而且僅在軍事投機上說，也只不過架了一個勢子，何況又失了時機，自然很容易的就被孫傳芳撲滅了。

## (二) 第二次暴動

這一次暴動也與前次一樣，還是在援助北伐軍的口號之下進行準備的。

十月二十四日早晨事件的失敗，並沒有使暴動的進行中止，因為敵人的統治并未鞏固，民衆的勢力也未遭到大損失，所以十一月五號九江陷落的消息傳來而上海自治運動又復高漲。不過這次運動的內容和上次已有多少的改變。第一，上次參加這個運動的只有三種力量：工人，國民黨左派及一部分資產階級虞洽卿王曉籟等；中間因夏超失敗的影響，最後行動的只有工人階級及國民黨左派，而資產階級則已遠避畏縮。此次參加這個運動的分子就更加複雜，除上次三種沒有變動外，連孫傳芳所御用的研究系張君勱黃炎培沈恩孚與褚輔成等政客都參加了運動，甚至奉天軍閥楊宇霆張學良的代表也參加活動。孫傳芳本來是反對自治運動的，但他已知道他的力量不能拒絕北伐軍東下，因此就嗾使研究系參加運動，企圖利用上海市民自治運動在他控制之下以阻止北伐軍之前進。資產階級則又恢復到以前的踴躍狀態，故十一月五日九江陷落，

孫傳芳潰退到南京，上海商總聯合會即發宣言，主張拒絕奉魯軍南下，劃上海為特別市，市政還諸市民，永不駐兵。第二，運動的範圍已比前次擴大，已由上海自治運動，擴大到蘇浙皖三省自治運動，在上海產生了一個蘇浙皖三省聯合會。這個聯合會的分子很複雜，其中包含着許多反動投機分子，他們本來是想利用這個三省聯合會，以自治的名義拒絕北伐軍入境，實際上是為孫傳芳保全三省的地盤，以便他們得以參加政權；嗣因會中激進分子反對，加以十一月十七日孫傳芳北遁，魯軍張宗昌實行動員南下，三省聯合會乃被迫表示其脫離孫傳芳拒絕奉魯軍南下之主張，加以張宗昌準備帶軍用票一千萬元南下，蘇浙皖商民聞之失色相告，於是蘇浙皖三省自治運動，不能不表現出他的相譽革命性了。第三，上次運動的方式完全是少數人的陰謀投機，這一次便已經有了羣衆的行動，共產黨已經不僅注意上層的勾結與武裝的訓練，而且注意政治的宣傳與煽動及罷工罷課的準備。雖然此時中國共產黨指導機關已經中着很深的機會主義的毒素，例如共產黨江浙區委在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七日所通過的「上海自治運動計劃」中竟說：「工人以自己的組織和戰鬥力還不強，又加以全國的政治環境，亦

不便猛進到資產階級之前，更不宜單獨行動（無產階級只該做資產階級的尾巴！）。但是羣衆運動確已比前發展。十一月下旬，每天都有大批宣傳隊出發，一星期之中，散去傳單竟達八十餘萬張。十一月二十八日及十二月十二日，上海曾召集兩次廣大的羣衆大會，反對孫傳芳反對奉魯軍的空氣非常高漲。

到一九二七年二月初旬，北伐軍經過相當休息，開始進一步的行動，二月十七日北伐軍佔領杭州，二月十八日一部分北伐軍且已進佔嘉興，孫傳芳受了更嚴重的失敗。此時帝國主義者尤其是英國，正增派駐華軍隊，外國駐華軍隊在上海各馬路列隊遊行示威，如入無人之境；孫傳芳因在浙江兵敗，猶擬在上海勾結英國作困獸之鬥，摧殘工會，大捕工人，壓迫輿論，濫捕新聞記者與市民，因此民衆更加切齒憤怒。於是從二月十九日起，上海工人階級開始了更偉大的鬥爭，掀起了廣大羣衆革命的怒潮，爆發出自二月十九日起的總同盟罷工。十九日之前夕，全上海工人羣衆之領導者——上海總工會，經代表大會議決之後，發布出下列的命令：

【總同盟罷工令：——】

全上海工友們！民衆革命勢力日強，北伐軍戰爭勝利，軍閥孫傳芳抵抗失敗，惟有由民衆起而行動，以推翻軍閥勢力。本總工會特宣告全上海總同盟罷工，以完全消滅軍閥殘餘，表現革命民衆權力。令到之時，即刻行動，全體工友總罷工。罷工之後，須有組織的有秩序的，聽候總工會指揮；無復工命令，不得復工！切切此令！

罷工響應北伐軍！

罷工打倒孫傳芳！

民衆政權萬歲！

工人自由萬歲！

工人團結萬歲！

上海總工會二月十九日

總同盟罷工開始了，牠是一個極大的革命浪濤。十九日晨六時起，奉到總工會命令而罷工者：在楊樹浦方面，有瑞銘錦鎔鐵廠；黃浦碼頭及製盒廠，東方，老怡和；

緯通，恆豐等紗廠，及電車公司車務機務兩部，南洋烟草公司等全體工人。引翔港方面，有電汽新廠，蘭格木廠，及申新，振華，永安，厚生等紗廠全體工人。南市有華商電車，求新，遠大鐵廠等全體工人，小沙渡方面，有同興，內外棉東五，西五，七，八，九，十二廠及福新內外廠，日華，喜和等十四廠。浦東方面，有日華，祥生，南洋烟草公司等全體工人。英界各郵政局，公共租界電車及南京路四大公司全體工人。法界法商電車，電燈自水全體工人。以各產業計，罷工者紗廠全體工人。市政工人有郵電工人全體。店員方面有商務職工會及先施公司永安公司新新公司麗華公司等。手工業方面有金銀業，茶箱，洋服，蓬業，香業，製茶，線毯，豬鬃等全體工人。金屬業與機器工人，罷工者有十餘家。各輪船方面，有太古公司之廣西，山西，順天，甘州，甯波五隻；日清公司廬山丸，太吉丸，尙陽丸四隻；甯紹公司甯興一隻；舟山公司舟山一隻。印刷工人方面有商務，彩印，美華，華商，墨色，石印等全體工人。以上總計罷工人數，約在十五萬人以上。

罷工之第二日——二十日——罷工人數激增至二十七萬五千餘人，其中多因受資

本家之壓制，或因未奉到罷工命令者，計如，閘北絲廠六萬人，水木作四萬人；南貨業，醬園，米業，估衣業，藥業，洋布業共計十萬餘人。公共汽車工人全體五百餘人。小沙渡紗廠增至二十五家，共增一萬五千餘人。黃浦及十六舖等碼頭合計一萬人。

罷工之第三日——二十一日——罷工人數復增加至三十五萬，其增加者，計如：

○碼頭工人，招商局中棧，北棧，日本郵船會社，黃浦碼頭，大阪碼頭，太古碼頭，匯山碼頭，均已罷工，共計有三萬餘人。○水木作工人增加一萬五千餘人。○徐家匯百代公司全體。○印刷工人有中華書局全體工人。○手工業方面各小廠業都加入，增加六七千人。○紗廠方面原來參加者不計外，又增加二十六廠。○金屬業工人增加二千人。○楊樹浦又增加天章紙廠，中華寶興錫箔廠，亨司達及英美烟廠，共三千餘人。○海員新北京船一百人。

罷工之第四日——二十二日——罷工人數復增萬餘人，其中計：○江西路自來水工人全體，○虹口鐵廠工人增加一千六百二十人，○張羅鐵廠一百五十人，○機器鐵廠公所所屬工人全體參加，○手工業各工會增加一萬二千人，○店員增加一千人，



（中）菜館工會增加六百，公共汽車一部份繼續罷工。

總計以上罷工人數，足足在三十六萬以上，不僅是上海歷來未有的大罷工，亦是全國歷來未有的大罷工。上海工人階級的政治覺悟之進步，與組織發展的迅速，從這一次的行動裏表現出來。然而上海租界帝國主義的報紙（如大陸報，字林西報，太晤士報等）徧徧記載說：上海罷工第一日六萬五千人，第二日五萬五千人，他們很大胆的將實際數目縮小到六倍以上。帝國主義強盜這種計算的伎倆，與他們報告開到中國的外國水兵數目，是同樣的伎倆，故意以多報少。罷工之第二日，帝國主義者的報紙即宣傳工人已復工，而實際上罷工人數反增加起來；第三日確有一部份被迫復工之行動，例如電車開車工人被捕者七人，由巡捕武裝威迫，開車七輛，專門駛行南京路一段，以示驅工人復工，但第四日仍有增加者。第五日總工會既下復工令，帝國主義者的報紙，亦却不得不一致記載說：『因為總工會正式頒布復工命令，果然所有罷工工人一律復工了。』

這次總同盟罷工的發動主要的原是為了援助北伐軍的政治行動，當時北伐軍前綫已

進至嘉興，原定在北伐軍繼續前進時，上海即舉行武裝暴動，幫助北伐軍，驅逐奉魯軍閥，在上海建立市民政府。但到二十日傳出消息，謂北伐軍爲等待後援，暫時停止進攻上海。孫傳芳計算到這一着，便開始對於罷工工人採取殘酷的恐怖手段。孫傳芳的走狗——上海防守司令李寶章，便立刻聯合租界帝國主義的工部局，開始施行白色的恐怖。另一方面，罷工實現後，僅僅在六小時內，繁華富麗的上海，頓變爲死氣沉沉的區域；全市電車停駛，輪船不開，郵局閉門，繁華的百貨公司停止貿易，一切大的製造廠停止工作，工場與作坊的汽笛回聲，喚不進一個工人入廠，只令馬路上的巡捕與軍警打起寒噤來。必然使統治階級由恐慌而憤怒起來，於是屠殺的政策開始。受屠殺之第一綫的戰士，即散發傳單的工人學生，與表同情於工人持傳單閱讀於道旁的平民。第一日第一次犧牲者，乃南市金屬業機器工人蔡建勳史阿榮，因發傳單而被捕立遭斬決。罷工第二日，電車賣票十九號工人，因發傳單被槍斃於西門，學生在曹家渡講演被捕，立遭斬決者三人。老西門有市民持傳單閱讀，被大刀隊斬決，懸首於電桿者一人，暴屍於地者二人。上海大學留校學生五十餘人全體被捕。其他各區被捕

被殺不可勝計，總計此次死傷遭捕者至少在二百人以上。當罷工之第一日，李寶章即公然布告『格殺勿論』。華界租界，軍警密布，任意搜查行人，尤以華界爲更甚，隨處均可見整排軍隊，背負大刀，手捧大令，沿街梭巡，全市頓呈恐怖氣象，南市閘北及法租界之一部，均因之而停市。李寶章軍隊開始搶劫，任意挑怒市民，立捕而殺。南市與浦東居民，過軍隊前，不敢正目而視，浦東小販口呼『賣大餅』，而軍隊誣之爲呼『打败兵』，卽執而痛毆，以刺刀亂刺，行人不敢側目。入夜七時華界卽斷絕交通。此時外國兵已可布防於租界之外，中國兵可自由入租界，逮捕革命羣衆。帝國主義者與中國軍閥的反動勢力，完全合作，以實現此白色的恐怖。

白色恐怖的屠殺，越更激發起上海革命工人學生與市民，因此而發生二十一，二十二等日羣衆奪取武裝的戰爭。二十一日晚起，各工人區域卽開始與軍警的局部戰鬥。二月二十二日下午六時乃共產黨決定爆發暴動的時間，到時各區域大隊工人羣衆向軍警防線與步哨襲擊，亦會奪得少量槍械，且回擊警察巡長致死；海軍兵士因反對軍閥屠殺同情於工人，自動開砲激擊高昌廟兵工廠，使敵人紛向租界逃避。直至二十

三日晚，開北南市猶有數處發生巷戰。但是暴動的時機尙未成熟，革命的軍事勢力相距尙遠；此時上海總同盟罷工形勢已經大大地變劣了，在帝國主義與孫傳芳極野蠻的壓迫恐怖之下，很多罷工工人已被迫復工，因此暴動時未能動員廣大羣衆參加行動，暴動爆發了，但是卒被孫傳芳勢力鎮壓下去。

當罷工之第四日，共產黨與國民黨及廣大工人市民羣衆共同組織之『上海市民臨時革命委員會』成立，此時正是暴動將要開始的時候，暴動既然沒有成功，市民政府也就不能實現。

到二十四日暴動已顯然失敗，上海總工會乃以『非因退讓而復工，乃爲準備更大的爭鬥而復工』的理由，發布宣言號召罷工工人全體復工。

### (三) 第三次暴動

上海無產階級在共產黨的指導之下，雖然在以前的兩次暴動中已受了殘酷的壓迫，雖然受軍閥之空前的白色恐怖，但仍然是繼續着勇敢的有系統的準備新暴動。黨在

職工會中，在城市貧民及小資產階級羣衆中都做了很大的政治工作。黨在事前組織了各階級民衆之代表會議，這一點有很大的政治意義。黨在鐵路工人中也做了很大的工作，還在暴動前十天，鐵路工人已經開始罷工，這使張宗昌運兵幫助孫傳芳之舉，發生非常的困難。黨同樣也做了很大的工作去組織工人糾察隊（計五千人），他們是上海無產階級之武裝力量。最後黨又堅決的決定了這一次暴動中之指導力量應當完全屬於自己。因為他在勞動羣衆中間已經做了很多的工作，所以黨可以做出這樣的結論。

共產黨決定當着杭州方面的北伐軍到了松江，南京方面的北伐軍到了常州的時候，便號召上海無產階級起來實行總同盟罷工與武裝暴動。三月二十夕，國民革命軍佔領逼近上海之龍華。但國民革命軍預奉有令，令避免與上海租界帝國主義武裝之衝突。佔領龍華後革命軍的策略，尙欲納降擁有雄厚兵力的畢庶澄率領下之直魯聯軍。但畢庶澄欲保有上海而降，降而求爲革命軍軍長之一。屬於軍閥之一的畢庶澄，降與不降皆民衆之敵。國民革命軍預奉有令不攻上海，但上海的工人則預有準備，奪取軍閥的武裝而推翻其在上海的統治。

自孫傳芳失敗於九江，狼狽逃歸金陵，上海工人即有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第一次的暴動，暴動未起而失敗，上海工人階級的領袖陶靜軒奚佐堯等十餘人，爲李寶章所殺。自革命軍佔領上海鄰省的浙江，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起，上海工人三十六萬人總同盟罷工，二月二十二日舉行第二次的暴動，暴動亦未成，工人被屠殺者數十人，引起海軍兵士的革命同情，自動開砲轟擊兵工廠，嗣以擴大鬥爭而復工，爲繼續暴動而準備。自此以後，上海工人階級鬥爭的情緒日益高漲，既決然奪取武裝以鬥爭，復決然爲民衆之政權而戰。三月二十一日正午十二時，第二次總同盟罷工令，由上海總工會頒布，依令而罷工者，達八十萬人，空前的大革命運動如潮湧起。同日，同時，上海工人勝利的第三次暴動開始。

三月二十一日正午十二時，全上海各工廠各作坊各機關各大小商店各手工業場及車站輪埠碼頭等全體工人罷工，擁到街市的中心來，紛紛向預定的集合處集合，少數的武裝糾察隊，立刻按照目的地，對各警署各兵營各軍隊駐在所開始行動。所有租界中的工人羣衆，一小時內齊到華界。武裝糾察隊在前，廣大羣衆在後。巷戰開始了。

陸續不斷的槍砲聲，與羣衆口號的呼喊聲，立刻震動於遍城市中各地。鐵路截斷了，電話局被佔領，電燈綫斷，自來水斷，肅靜的空氣籠罩了全城市，只有斷絕不已的槍聲與羣衆的革命呼聲。徒手無武裝的羣衆，逐漸奪得武裝到手中來，革命的武裝力量增加了。敵人在包圍中，或在逃散中。從敵人的隊伍蛇動竄行中發現以竹竿繫手中的白旗，這是敵人投降了！素習兇惡壓迫人民的警察，自剝其黑色的制服而逃散。大小警署的門前，推出了槍械，並懸白旗，這是警察投降了！在頑強抵抗的敵人營壘之四圍街市中，住戶市民，借出木板，磚頭，布袋，建築起障礙物。小飯店與大餅店的店夥緊急工作起來，趕做饅首食物等，由袖帶紅巾的輸送隊，往來輸送於前綫的戰士充飢作戰。袖帶紅十字的男女濟難隊員，往來於戰綫後方；死者與傷者，扛抬過市巷。歷時不久，各取得指揮的中心地，各區域自己的作戰指揮集中起來。至此狀況，城市暴動巷戰的局勢，完全成立。

但因爲敵人所在地的勢力，強弱不盡同。廣大的淞滬區域，有帝國主義的租界橫貫於中央。暴動突起，在當時的作戰劃分於下列七個區域：南市，虹口，浦東，吳淞

，滬東，滬西與閘北。七個區域中的行動，前後開始於一小時以內。惟解決與成功之遲速不同；尤以閘北一區，自二十一日正午起，至翌日午後六時止，前後兩日一夜始行解決，統計激戰至三十小時。

南市是包括上海縣城的滬南區域。暴動未發前，南市全城的羣衆，法租界及公共租界中區的羣衆，陸續齊集於街市。一時半武裝動作開始時，先進攻警察廳，二時許即完全佔領警察廳。同時佔領電話局。警察的一署三所，及一署三所第一分所，次第佔領。從警廳與各分署中，徒手的羣衆奪得了槍械。沿途的遊巡隊，在最短時間中，經羣衆繳械降伏。大隊由警廳進攻兵工廠。無激戰而降伏，四時完全佔領兵工廠。南火車站是時已無敵縱，被羣衆佔領；鐵路工人奪得火車頭往來運輸。五時到華商電車公司集合。廣大的南市區域，在四小時內便全部解決。

虹口在租界區域夾間之中，三面接壤於租界，一面近市郊，無駐兵，只有警署。在時間上說，虹口是首先被佔領的。虹口電汽廠與絲廠及金屬業的工人羣衆，當暴動開始時，最先發難，佔領警署，奪得槍械。逃散的警察，嚇使流氓與工人爲敵，時來



襲擊工會，襲擊已被工人佔領之警署。因此而工人糾察隊既戰勝警察，復抵抗流氓之擾亂，以武裝鎮壓，工人糾察隊乃完全佔領虹口區域。

浦東在黃浦江東岸。黃浦江西岸之暴動起，浦東所有各廠的工人羣衆，均起而響應：全體工人罷工，先撲攻爛泥渡第三區警察署，圍降警察百五十人，全體繳械。素來壓迫民衆，殘害工人的第三區警察署，首先被羣衆佔領。羣衆奪得武裝後，即進而掃除孫傳芳時代所設置的遊巡隊，沿途繳械。羣衆復繼續佔領三區一分所及三區二分所。當時有由前綫潰退的魯軍，包圍保衛團，被羣衆圍攻而繳械。保衛團對工人糾察隊樹白旗，糾察隊長遂召集糾察隊與全體保衛團，暨參加戰鬥之數萬羣衆，合開羣衆大會，宣布成立臨時保安局，武裝佈防。自此以後，工人糾察隊與商人保衛團，合同管理浦東全區。浦東區各業人民代表會，立時成立。暴動前後經四小時，而區民政權成立；國民黨右派與其他反動派之投機分子，攜帶武裝，偽造旗幟徽章委任狀來接收公共機關者，盡被糾察隊拒絕撲滅。

吳淞是砲台防守地。原有駐軍，自前綫潰敗後，畢庶澄的軍隊之一部，復乘車逃

吳淞，欲經水路，奪得輪船，逃離淞滬。但吳淞的工人，與上海的工人已在同一時間內，起而罷工暴動。鐵路工人，鐵工廠工人與紗廠工人，立時圍攻駐軍，奪取其槍械。一部分的兵士，急乘車欲回上海，往滬甯綫逃脫，至閘北江灣路附近，鐵軌已斷，遂據守天通庵車站作戰。吳淞工人勝利後，保衛團亦出而與工人合作。經過羣衆大會後，吳淞的區民代表會立時成立。吳淞各工會聯合會領導近十萬的工人羣衆，實際管理臨時區政權。

滬東是包括租界與華界的廣大工人區域。罷工開始後，羣衆即圍攻虹鎮警察署，繳警察槍械而佔領之。一時許，楊樹浦與引翔港兩地工人羣衆，分頭在韜朋路底之馬玉山路，召集羣衆大會，各處到會者逾五萬人，會後整隊出租界，齊赴閘北。武裝糾察隊至胡家木橋及虹鎮兩處，打碎警察崗亭，佔領五區三分所警局，完全解除警察武裝，奪得槍械甚多。香烟橋警署縱火向羣衆圍攻，羣衆奮勇撲滅火勢而解決之。總計前後，擊斃警官一人，警察三人，餘則僅解除其武裝。大隊羣衆與武裝工人糾察隊向江灣路進發，欲至閘北，達天通庵車站附近時，適由吳淞開來兵車一列，羣衆折斷路

軌，兵車出軌倒地，以排鎗及機關槍向羣衆掃射，死傷甚衆。糾察隊英勇抵抗，羣衆高呼革命口號助威。自此以後，即與閘北糾察隊夾擊倒車之潰兵，直至翌日始解決。

滬西亦是包括租界與華界的廣大工人區域。華界即浜北，連接於閘北。羣衆罷工行動後，先圍攻曹家渡第六區警署，繳警器械，并佔領之。武裝糾察隊護衛羣衆渡河往閘北，並與小沙渡糾察隊會合，圍攻四區警署，經激戰後而佔領。率領糾察隊衝鋒之總指揮死難，警察亦有傷亡，同時，兩處糾察隊分隊圍攻警署第二分所及遊巡隊署，俱獲佔領。各警署佔領後，隨即查封。武裝糾察隊乃集合圍攻北火車站，直至翌日。

以上各區域的行動，都比較的順利。最後的激戰，乃集中於閘北境域內。工人武裝會聚於閘北者，乃滬東滬西兩部及閘北境內之一部，其餘以租界隔絕，均不能來援。各區域均在二十一日次第解決，而閘北獨相持激戰至兩日一夜。當各處行動開始後，總工會代表乘汽車至龍華請兵，當時國民革命軍東路前敵總指揮亦即上海三次暴動兩星期後『四一二』事變開刀屠殺工人的劊子手白崇禧遲疑不肯，又接國民黨駐滬軍

事特務委員鈕永建報告，請緩一日進兵，以待畢庶澄投降。總工會代表涕泣力請終不肯，最後第一師師長薛岳始率全師進攻。

二十二日下午六時薛師至麥根路，適值北站魯軍潰敗而退，暴動勢力已完全佔領華界。在上海工人奪取了城市數小時之後，四月十二號事變的英雄白崇禧纔帶領國民黨的軍隊進到上海。前後兩日一夜中，閘北境內激戰經過如下：

在閘北境內除警崗不計外，敵人盤據的勢力，多至二十餘處。行動以後，羣衆的主要目標在下列六處：（一）北火車站。（二）湖州會館。（三）商務印書館俱樂部。（四）警察五區總署。（五）廣東街分署。（六）中華新路警署分所。嗣後自吳淞開回兵車，在天通庵車站雖被滬東羣衆襲擊，但因敵方人數甚多，武裝極強，於是六個主要目標之外，又增加一處勁敵。閘北的巷戰，遂遍於全境。自二十一日正午十二時起，罷工工人羣衆到街市中者，逾十餘萬。槍聲突然四起。北站魯軍的大砲，對向市鎮轟擊。魯軍中白俄兵，且以鐵甲車開砲射擊；在砲聲密集中，北浙江路口，英國帝國主義的鐵甲汽車，亦乘機開砲射擊，幫助魯軍對民衆作戰。至下午四時，羣衆已奪得各警署與

濟州會館。全境內各處警崗，悉被驅散。居民紛紛懸掛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在當時還是革命旗幟），不及備者，或以毛巾被單作白旗懸掛。自此以後，工人羣衆的武裝，除布防保護居民，免潰兵搶劫外，進攻目標，乃集中於：（一）北火車站。（二）商務印書館俱樂部。（三）天通庵火車站。三處俱在一直綫上。工人糾察隊夾於三處之間：對北火車站取防守勢，對俱樂部取包圍勢，對天通庵車站取進攻勢。

巷戰逐漸激烈了！商務印書館俱樂部中所駐敵軍雖係少數，但擁有多量機關槍與多量炸彈，不斷的向羣衆轟擊，十分頑強。二十一日午後四時，糾察隊以紙作書，口呼停戰，投書入勸降，並負責保護其生命。魯軍亦就紙之背面回書，請求停止攻擊，但不肯降。嗣後糾察隊即取包圍戰略，防守終宵。天通庵車站敵軍，因鐵路軌斷車倒而驚惶不已，伏兩旁溝中，亦防守終宵，以軍械力弱，糾察隊進攻未得手。北站方面，敵人於晚間縱火圍攻，火勢漸熾，燒民房數百間。難民紛紛向工人糾察隊防綫中逃來，糾察隊分隊護送往青雲路空地。火勢盛時，糾察隊乃棄防綫而救火，以水龍皮管，開自來水管猛勇撲救，卒至撲滅火勢。附近居民，義憤填膺，對工人糾察隊感激至

於流涕，居民壯丁，以義憤所激，自願加入暴動。老者少者，自屋中取出木板磚石布袋，爲工人糾察隊佈置防綫，建築障礙物。火勢熄後，敵人不敢進攻，惟時以排槍射擊；白俄人的鐵甲車，則時以大砲轟擊；英國帝國主義的鐵甲汽車，亦時時偷襲向工人射擊。此時的工人糾察隊，爲保護居民，對魯軍作戰，亦對帝國主義者防綫作戰。

通宵的激戰轟動於淞滬全境，各處皆知閘北的戰事，猶贊嘆工人糾察隊的豐功偉績。翌日（二十二日）天明以後，敵人已覺困乏，糾察隊仍從各方面猛勇進攻。當時居民咸傳說革命軍已至，實則革命軍尙未自龍華起程。至正午，天通庵車站敵軍解決稱降，俘虜三百餘人，餘人逃散至廣東街者，被糾察隊繳械；至北四川路者則被日本水兵繳械。下午四時半商務印書館俱樂部中敵軍，易便衣欲逃，被生擒，餘人願降，苦戰一晝夜之地最後解決。糾察隊總指揮處遂由五區總署移至俱樂部中。自此以後，全部武裝集中攻北站。但自上午起，北站敵人復用第二次火攻，延燒房屋無數；是時自來水管已斷，無從施救。糾察隊防綫退至五次，但敵人亦不敢前進。最後各方隊伍集中後，猛攻一小時餘，白俄兵逃入租界，北站魯軍亦潰退，六時許北站遂得克復佔領

。因避免與租界帝國主義武裝衝突之故，糾察隊乃退至車站之後佈防。潰兵大隊逃散時，適國民革命軍第一師薛岳親率軍隊趕到，完全將潰兵俘虜。是時車站地雷爆發，但已無敵蹤。最後薛師進駐北站。鐵路工會下令修復淞滬與滬甯鐵路，鐵路工人首先復工，依工會令組織交通隊三百人修路，恢復交通。寶山路寶通路中興路一帶，居然燃鞭炮慶祝。暴動之功，至是完成。

上海工人階級此次英勇的勝利的鬥爭，真可為全國工人階級之模範。三月二十一日從此成了中國革命以至世界革命史上一個極有價值的紀念日。領導上海三次暴動的主要領袖趙世炎（即施英）羅亦農等，『四一二』慘變後，先後都被蔣介石所捕殺。上海本來是在全中國產業的中心，上海工人階級本來是全中國工人階級中，數量最多奮鬥歷史最長久的一部分。轟動全世界的五卅運動，就是由上海工人首先發難的。自從五卅運動以後，上海工人時時刻刻都站在最急進的地位，為全國工人階級之先驅，因此更為全國革命運動之先驅。此次上海八十萬工人在共產黨領導之下，舉行總同盟罷工并暴動起來反對直魯軍閥的統治。經過二日一夜的巷戰，工人終於解除直魯軍閥的

武裝并自己武裝起來了。正因工人武裝暴動響應，北伐軍始不經戰鬥安全佔領上海。暴動勝利之後，上海市民政府即由上海市民大會中選舉產生。

『無論站在暴動之政治的與組織的預備觀點上，時間的選擇的觀點上，或是站在暴動之指揮以及進行暴動之技術工作的觀點上，在中國當時國民黨與共產黨聯盟之特別條件之下，這一次暴動總算是最好的例子。』（見陳詔玉譯：『武裝暴動』p.79）

『這一次暴動指導之正確，在於他正確選擇了開始總同盟罷工及武裝暴動的時期；在於他正確的把上海附近的軍事行動與上海城內之暴動相聯合：一方面是當着上海勞動羣衆革命情緒之空前高漲的時候，另一方面又當着國民黨的軍隊已經逼近城下，而使着敵人的力量極端紊亂的時候；最後，他又利用軍事行動的方法解除警察，山東軍閥及孫傳芳之軍隊的武裝。』

馬克思的：「暴動是藝術」的提綱，在上海暴動中也如同在一九一七年之聖彼得堡，莫斯科的暴動中一樣很正確的適當的在爲奪取政權的實際鬥爭中極天才



的應用了。』(同上p.81——82)。

但是，我們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的觀點來評斷上海第三次暴動時，一定不僅僅指明第三次暴動是上海工人羣衆的英勇偉大的著作；并且應當指明第三次暴動的主要錯誤和缺點，然後才能正確的去了解所謂『第四次暴動』的特質與我們怎樣去勝利的準備第四次暴動。這次上海第三次暴動，客觀上是中國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爭奪國民革命聯合戰線中的領導權的鬥爭達到最高峯的表現。但因為革命主觀力量趕不上客觀事變發展的進展及當時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機關犯了機會主義的錯誤，所以使上海三次暴動在實際上表現出下列的缺點和錯誤：(一)上海工人階級的武裝暴動，只是成了響應北伐軍的軍事行動。(二)只打倒了舊直魯軍閥統治，沒有準備繼續打倒一切反動統治的工作。(三)只佔領上海的中國地界，極力避免與帝國主義的統治發生直接衝突。(四)工人暴動勝利成立了一個依賴大資產階級的上海市民政府。(五)上海市民政府在他存在的兩個星期中，對於上海廣大勞苦羣衆的許多緊急實際問題(工資，工時，改良待遇，住宅，稅捐，政治自由等)一個也沒有解決。所以當蔣介石公開叛變，大行

屠殺勝利的共產黨員和革命的上海無產階級羣衆時，大部分上海無產階級和勞動貧民不會聽上海市政府之號召而給反革命以堅決的反抗。在此我便要緊接着說到『四一二』慘變了。

#### (四) 上海『四一二』與廣東『四一五』慘變

從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事變到上海暴動這一時期，是中國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爭奪革命領導權的最劇烈的時期，而上海三次暴動結束了這一時期。

資產階級懂得革命的發展對於自己的危險，上海暴動更使資產階級不能忍耐了。

上海二次暴動之後，中國資產階級即已開始叛變，故東方社當時（一九二七年二月五日）漢口電訊，即云：『蔣介石及其幹部已取締過激運動』，實際上，蔣介石已經陸續在南昌九江安慶蕪湖一帶摧殘工人，甚至已經開始屠殺工人，二月間南昌總工會委員長陳贊賢就是第一個被蔣介石開刀的。然而上海三次暴動中，不但八十萬罷工工人的革命勢力不可輕侮，而且一般城市貧民及小資產階級都很左傾，甚至蔣介石自己統

轄的第一軍（薛岳嚴重等），當時也都徘徊於市民會議政權與蔣介石之間，兵士開始與工人糾察隊聯歡。因此雖然資產階級已經決然公開反動，而蔣介石初到上海的時候，也不免有些躊躇，我們記得上海總工會工人糾察隊舉行升旗典禮的時候（三月底），蔣介石還像煞有介事的親贈『共同奮鬥』的匾額，實際上此時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共同』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北洋軍閥的『奮鬥』已經顯然不存在了。資產階級已經開始投降帝國主義妥協封建勢力了。蔣介石亦就因為受着帝國主義的壓迫和利誘，上海資產階級的經濟力量的幫助，才決然反動。蔣介石取得滬甯後的財政與地盤，使豪紳資產階級性的軍閥白崇禧等得有暫時團聚的中心，最後還有當時無產階級政黨的指導機關對於爭奪革命領導權的猶豫，沒有看清資產階級必然的叛變，沒有準備征服資產階級反動的爭鬥，都使資產階級的決心公開叛變有恃無恐，於是四月十二日的屠殺出演了。

共產黨步步退讓，資產階級便步步進攻，蔣介石到上海後，仗着帝國主義的權威，暗示帝國主義者極力向中國人民恐嚇示威，『此時上海已到外兵二萬餘人，尙陸續

開來；租界繼續關閉，鐵網各口僅留一二口以通華界，並發布更嚴厲之戒嚴令，夜間十時後，不準平民在路上行走」（見『中國六十年大事記』P. 1394）。造成緊張空氣，以便他更好向工人進攻。帝國主義者見到上海工人表現偉大的革命勢力並奪取武裝在手，也自然視爲惟一死敵，故用盡種種威嚇利誘的方法督促蔣介石對工人下毒手。何況資產階級的反動早已預定，更何況無產階級政黨無恥退讓，四月十二日的慘變簡直是無可避免的了！當時蔣介石特別見着市民會議對於自身的危險，所以第一步便下令禁止市民會議開會，限制市民會議要立刻解散，『北伐軍來，自然有國民黨的黨政府，爲什麼又要什麼市民會議的政府？這一定是共產黨的陰謀』——蔣介石借着老狗吳稚暉的嘴說出此種『奧妙』。他又知道上海工人的戰鬥力與組織力都十分雄偉，一定不是單純的武力壓迫所能撲滅，因此便唆使他自己青紅幫的夥伴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等流氓頭目，組織所謂中華共進會及上海工界聯合會，以搗亂工人的組織——蔣介石這一切法西斯蒂的組織自然都在帝國主義脅助之下，共進會等法西斯蒂進攻工人的武裝大半都由帝國主義者供給。

在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流氓合作之下，蔣介石在各方面佈置相當得手之後，於是四月十二日的屠殺出演了！四月十一日晚，蔣介石即下令上海駐軍，調集軍隊，準備大規模屠殺，慘變的開始先由流氓隊做先鋒（藍色短裝，袖纏「工」字符號），於十一晚十二時後即開始襲擊工人糾察隊，工人糾察隊加以防禦抵抗，於是蔣介石白崇禧即藉口工人內訌，極盡野蠻殘暴的手段，便將工人糾察隊繳械，當日（十二日）全滬工人聞耗大憤，紛紛奔集開北開羣衆大會，並整隊往司令部請願，司令部早已接到屠殺密令，且事前早有佈置，請願羣衆正前進至寶山路時，大隊軍隊即迎面開槍，後因羣衆愈聚愈多，更用機關槍向徒手羣衆掃射，一時屍橫滿街，堆積如山，適大雨如注，滿街道竟成血河，死傷數目無從統計，據目擊者言，事後屍首係用搬場汽車搬出葬埋，所裝竟有七八車之多，蔣介石白崇禧等劊子手段之殘暴，可謂無以倫比了！蔣介石白崇禧等將工人糾察隊繳械并將工人屠殺後，即用原有法西斯蒂組織「上海工界聯合會」之流氓，盤據上海總工會會所，改名「上海工會組織統一委員會」，并到處協同帝國主義者破壞總工會所屬之各工會，拘捕工人領袖，摧殘一切革命組織。

『四一二』慘變起後，上海屠殺還在繼續，南京無錫甯波杭州等處慘劇接連發生；四月十五日廣東亦發生同樣慘變。所不同者，只有上海屠殺的劊子手是蔣介石白崇禧等，而廣東乃是李濟陳炯天鈞等，至於屠殺的殘酷，則簡直很難有高下可分了！

## 第六節 土地革命深入與武漢反動時期

### (一) 蔣介石與民族資產階級叛變前後的武漢

因爲工人革命運動的高漲，引起民族資產階級的驚恐；同時因爲帝國主義者對於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壓制和利誘，因此民族資產階級決然退出革命戰綫，因此而有上海『四一二』與廣東『四一五』慘變發生。

蔣介石與民族資產階級的叛變，使中國革命遭受了部分的失敗，但同時却推進革命發展到較高的階段，而且中國革命運動的中心已經由廣東遷到武漢。

一九二六年十月北伐戰爭勝利佔領武漢，國民黨左派在廣東開中央委員與各省代

表之聯席會議，通過全國人民團體聯合會綱領等要案，這個會議就表示民族資產階級與工農小資產階級的鬥爭已告一段落。北伐以後，民族資產階級的傾向，就是極力抓住軍權，聯合豪紳地主來反對工農及左派，蔣介石所到的地方，都直接委派縣長，抓住財政權。工農羣衆也要自己起來抓住政權，工農及左派的羣衆團體都想抓住政權影響軍事勢力，使軍隊中的兵士及下級軍官與民衆發生聯繫，在民衆組織強固的地方則直接起來實現羣衆的獨裁。雖然沒有拿到中央政府，但兩湖工會農民協會婦女協會童子團都起來逮捕土豪劣紳，強迫減租，取消債務，分配土地，農民都說：『現在的世畧是我們的，今年減租不成問題，連田地都應歸我們插標號』。從手工業至大工業的工人羣衆都組織起來，總工會之糾察隊即成爲當時極大的勢力，武漢國民政府所不能解決的事，總工會都可以解決，工人羣衆在很痛苦的生活條件之下，劇烈的起來鬥爭，要求增加工資等不斷地提出，而在政治上且有奪回英租界之事發生，差不多一切下層羣衆都動員起來了。武漢政府要反對北京北洋政府，同時反對蔣介石，也正要依靠這種羣衆勢力，以增加他們的力量。工農小資產階級的民權獨裁有些地方已經開始實

現，這便使豪紳地主資產階級感到寢饋難安了！

不過在武漢初期，豪紳地主資產階級也很有牠們自己的弱點，就是：（一）內部不能一致，唐生智蔣介石李宗仁之間都有衝突。（二）三月二十日事變以後，蔣介石雖能保存軍事勢力，但他已不能領導軍事去『革命』，他最後一滴的革命性也不能不與工農發生關係方能表現，一九二六年九月十月間，他的軍隊將要解體，不能不請共產黨重去工作。（三）反對軍閥帝國主義，反對土豪劣紳的口號從廣東帶起出來，打倒軍閥帝國主義的口號，民族資產階級還可利用，而打倒土豪劣紳的口號則是下層羣衆的直接行動，如何行得？！民族資產階級能够把持極大部分的軍隊力量，仍使在他的階級利益控制之下，他在當時雖還不能公開說不要打倒土豪劣紳，但他可以用國民黨的『黨權』，來統一『軍權』；用『國民革命』的帽子來禁止階級鬥爭，這便可以說明階級衝突日漸激烈。最可注意的是蔣介石到南昌，主張遷都南昌（一月一日去電武漢要求）與上海資產階級接近。這就表明工農小資產階級已經有一個中心——武漢。武漢在當時已經成爲革命的中心，革命空氣非常高漲；因此蔣介石爲要鞏固自己軍事力量



，便想在南昌另造一中心。當時在廣大革命羣衆『壓迫』之下終於定在武漢，并且三月間武漢國民黨中央第三次全體會議還通過剝奪蔣介石軍權政權的議案，在羣衆中則有工農審判店東土豪劣紳之事；這都表明地方的羣衆的民權獨裁更進而建立中央的民權獨裁。漢口英租界的收回，帝國主義的商業亦因農民暴動關係而衰落停滯。滬甯反動之後，湘鄂贛三省羣衆革命運動仍舊繼續高漲。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間，武漢還是中國革命運動之中心。

## (二) 土地革命與武漢政府

蔣介石與民族資產階級退出革命戰綫，使中國革命受到部分的失敗，但同時中國亦即進展到了一個更高的時期——土地革命的時期。

事實上，自一九二七年開始以來，湘鄂贛農村革命即日益激進，農民協會組織的發展一日千里，農村中反對土豪劣紳抗租抗糧的鬥爭如火如荼的起來。當時有個做農民運動的同志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不得了，打頭不得他們醒來，不料一醒來就再

不肯睡覺！」很可以表明當時農民鬥爭之劇烈發展。這種廣大農民之覺醒已經自覺的達到爭取土地，減租早已不能滿足農民的要求，很多地方之農民協會已經成了第二政權。

土地革命的進展使一切革命政黨和領袖都遇到了試金石。「農民的土地革命，尤其是在湖南，已經激急的進行，有些地方自己動手分了土地，有些地方「插標」預備田地的分配。沒收地主田地的鬥爭，到處自發的實行。農民對豪紳的罰款等等也是普遍各處。農民自動的禁烟禁酒，禁止糧食出口，禁止鹽運，——都是要整頓物價。以前買辦經過豪紳剝削農民的搜括原料方法，再也行不通了。（國民黨便說，因此經濟停滯，商業金融大受影響）。武漢政府的經濟是在帝國主義豪紳資產階級封鎖愈工之下，沒有強有力的民衆獨裁政府是不能有辦法的。所以最迫切的問題，是地權的問題了。小資產階級左派曾經用黨權與蔣介石的軍權相鬥。革命發展的結果，這黨權在地方上許多下級黨部實際上都到了共產黨之手。因為真正的國民黨左派是這些共產黨員「後來大半背叛共產黨的黨員。國民黨的地方黨部，便「遵照第三次中央全體會議之

湖南省民會議及國共聯席會議決定之精神」認真實行起來了。「你們當真嗎？」「當真」！「果然嗎？」「果然」！「唉！你們這些小子，真正拿着雞毛當令箭，——我們是說說玩的，你們怎麼當真起來，該殺該殺！這類事說說玩是可以的，對我們有好處時，也許是必須的。但這類事是當真做得嗎？你們這些昏蛋！」——武漢國民黨中央就這樣教訓下級黨部了，爲共產黨所霸佔的黨部了。國民黨的下級黨部，許多民衆團體，當時是將國民黨的「黨權」實行起來；而這種黨權一實行，當然要變成民衆政權——民權。湖南許多縣黨部參加「領導」工農團體實行「公團聯席會議」的政權；一般的，各級黨部，只要真具與民衆團體一致革命的，都實行起地方「黨政府」的權力。這使動搖畏縮的左派國民黨領袖不能再容忍，他們要想用「黨權」來和共產黨爭領導了（以前是拿來與蔣介石爭的，拿來在武漢政府初期抑制軍人的）。國民黨中央的黨權，要來控制地方黨權，因爲地方黨權在共產黨手裏變成民權了。軍權與黨權之爭，換一形式，變成黨權與民權之爭。如果軍權與黨權之爭的社會內容，是對於帝國主義與豪紳資產階級式的南方軍閥妥協與否之爭；那末，黨權與民權之爭的社會內容

，便是對於土地革命問題與真正民權問題澈底與否之爭。」（見瞿秋白著『中國革命與共產黨』P.53—56）實際上一九二七年四月間，武漢國民黨中央已經拒絕公布土地委員會關於土地制度改良的決議草案，當然更說不上實行了。

農民運動——土地革命似春筍般的發展起來，成爲中國革命運動中最主要的原素。武漢政府與土地革命日益背道而馳，於是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湖南馬夜事變接着上海「四一二」慘變之後而出演。

### （三）馬夜事變與國共分家

自從資產階級蔣介石背叛中國革命於四月十二日在上海解散工人糾察隊實行公開屠殺工農後，繼之以四月十五日李濟琛在廣州大搜索大屠殺，長江上游的長沙乃有五月二十一日馬夜事變，最後又有武漢汪唐的分共會議。這是中國國民黨背叛革命出賣革命的整個事實。這四件事都是有『連環性』的，馬夜事變不過是這些有『連環性』的事實中的一環，而且有關緊要的一環，差不多是決定國民黨武漢政府政治生命

的一環。

馬夜事變實是當時武漢政府反對土地革命背叛革命的必然結果。湖南是農民土地革命最劇烈發展的一省，因此慘變乃在長沙出演。土地革命的進展使武漢國民黨中央日益恐懼，尤其撼動了一切國民黨代表封建勢力豪紳資產階級的軍人，因此首先便有五月十七日夏斗寅的叛亂，接着就有五月二十一日何健許克祥在長沙屠殺工農之慘變。先是臨湘縣農民協會委員長李中和被團防局長詹仙俠所殺，凌遲處死，割心剖腹，備極殘酷。五月二十日晚益陽農協委員長廖貫一來省報告，而何健部下已於前一日將益陽縣工會農協佔據，農民自衛軍及工人糾察隊均被繳械。於是空氣更緊張更險惡，許克祥乃於五月二十日夜十時許正式圍攻省總工會和省農民協會及一切革命組織，大加屠殺數小時之久，死傷不可勝計。事變之後，羣衆憤激萬分，因此而有五月三十一日湖南十萬工農軍猛攻長沙之壯舉，不幸當時共產黨指導機關犯了極嚴重的機會主義錯誤，居然無恥幫助國民黨同制止，完全失敗，不過無論如何，這次湖南廣大農民羣衆的英勇鬥爭，總是值得我們紀念的。

蔣介石叛變之後，左派國民黨的武漢中央，便一天天動搖起來，一天天的反動起來。武漢中央的動搖，日益暴露，『工農運動過火』的呼聲高唱入雲，尤其到長沙許克祥反動——馬夜事變的時候，更加明顯。『武漢中央的反對土地革命，到馬夜事變就已經是公開的向工農民衆宣戰，反動的惡浪陸續繼起。六月中湖南省農民協會執委擴大會議上約略統計，農民被豪紳軍隊所殺者已經有四千七百餘人。湖南許克祥政變後，全省被豪紳軍隊所殺的不下兩萬。江西朱培德「歡送」共產黨出境，工農團體被摧殘的也非常之多。』（見瞿秋白著『中國革命與共產黨』P. 23）。中國共產黨得着共產國際之指示，也就在七月十三日發表宣言令其黨員退出國民政府。於是汪精衛等從『共產黨的走狗』變成爲豪紳資產階級的走狗，於是而有七月十五日汪唐分共會議，正式宣布反對共產黨，武漢乃由革命的中心變成反革命的中心。

#### (四) 寧漢妥協——武漢政府反動之結果

「四一二」慘變後武漢與滬甯之爭，本來客觀上是革命平民工農羣衆的革命力量

與豪紳資產階級的反動力量之間的鬥爭。然而武漢方面的國民黨領袖和軍官，大多數始終甘心代表豪紳資產階級，只想利用民衆的贊助，以取得自己的權力和祿位，所以等到民衆真正起來要求三民主義和平民權利，特別是土地革命的實現，他們便立刻把工農羣衆及一般平民的利益拋棄，便立刻接受蔣介石等的反革命政策。蔣介石等的反革命政策是什麼？就是：①勾結并投降帝國主義以求鞏固他們自己反動的統治；②和北洋軍閥一樣的把持并搶奪地盤；③屠殺民衆，摧殘人民的自由；④利用工賊和黃色工會以摧殘工人，利用土豪劣紳以摧殘農民；⑤幫助買辦大資產階級，剝削一般民衆和兵士；⑥實行清黨運動以屠殺共產黨員。自從何健夏斗寅許克祥背叛革命以後，武漢的所謂國民政府與國民黨中央，便步步實行這些反革命政策。尤其是七月十五日國民黨中央分共會議之後，汪精衛唐生智等事實上已和蔣介石一樣走入反革命營壘。武漢方面既然自己實行這些反革命政策，那末他們當時所謂東征所謂討蔣，自然不過是地盤權利的搶奪，已經沒有革命的意義。

雖然當時汪精衛顧孟餘等還有臉儘說自己『和蔣介石等滬甯叛徒不同』，然而事

實終歸是事實！七月三十日汪精衛等在漢口已經公開的屠殺車夫，激起武漢工人的總同盟罷工的抗議。他們接着便是大施逮捕與殺戮，且有『甯可枉殺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網』之豪語。蔣介石白崇禧等收受東南特別是上海官辦資產階級虞洽卿等一千五百萬元賄路而屠殺上海工人，汪精衛陳公博等也就會同漢口的買辦奸商解散店員工會。蔣介石等在東南大抽苛捐雜稅，汪精衛等便在武漢濫發國庫券。他們藉口集中現金籌備兌現之政策，實際上將漢口四五百萬現金任令各新軍閥唐生智等分肥。其結果，上海對武漢的封鎖，固然使長江上下游的經濟都起極大的恐慌，而軍閥的朋分現金，要使一般民衆——工人兵士及貧苦的小商人困苦到萬分。小商人大半是破產到不堪，簡直沒有生意做，十家有九家關門，米鹽油等日用品都沒有了。工人每月得幾十元國庫券，實際只得一兩元錢，連飯都吃不飽。農民拿一担米只換幾張沒有用處的廢紙。兵士更欠餉到三四個月，衣履不週，天天挨餓。錢到什麼地方去了？原來軍閥和貪官污吏買辦奸商，正趁着鈔票低折時候，大做買賣從中操縱呢！而唐生智說：『國庫券讓牠倒好了，張敬堯在湖南發過幾千萬紙幣，倒了亦沒有死人！』嗚！這些軍閥濫發國



庫券，等於搶劫現金鹽米，八月間又發四千萬中央銀行鈔票，豈不是更陷人民於萬死之地？這些一切事實，都證明武漢七月反動，汪精衛等已和蔣介石一樣走入反革命營壘。於是，不久，武漢的國民政府之『東征』便變成了『甯漢妥協』。汪精衛等第一步的主張是『聯共反蔣』，第二步是『反共反蔣』，第三步是『只反共不反蔣』。所以八月半蔣介石下野，武漢方面還大叫其『蔣倒是黨權之勝利』，但在精衛一到南京，即馬上改口說蔣是『先知先覺』，自劾『對於共產黨徒防制過遲』并宣布『聽候處分』了！（九月十三日）。『甯漢妥協』之後，武漢已完全同化於南京，雖然他們相互間還時有爭權奪利的衝突，還有許多紛爭混戰，然而反對革命壓迫工農却已是牠們共同的要求了。

## 第七節 「八一」南昌革命與秋收農民暴動

### （一）葉賀南征與「八一」南昌暴動

一九二七年七月武漢反動之後，中國大革命又受着一次重大失敗。但它在另一方

面，却使廣大農民羣衆與城市貧民更密切地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創立了無產階級領導的相當基礎。首先，武漢反動之後，武漢工人就會以總同盟罷工反抗汪精衛的反動政府改組工會及民衆團體，七月三十一日武漢政府軍警槍殺漢口車夫，八月三日宣布總罷工，表示革命反抗。同時便有葉賀革命軍之南征，此時還有一部分國民黨左派羣衆表示願意繼續革命，所以中國共產黨仍舊以革命的政綱號召左派國民黨羣衆起來共同奮鬥。

正當武漢工人罷工反抗政府壓迫的時候，葉挺賀龍革命軍即在江西南昌實行暴動，八月一日葉賀革命軍便完全佔領南昌，成立革命委員會。因爲敵人力量的強大與指導的錯誤，南昌暴動卒歸失敗。葉賀革命軍退出南昌之後，卽向廣東進發，且於九月二十三日攻入潮汕，旋亦失敗。南昌暴動的失敗結束了中國大革命的第二時期——左派國民黨時期。

南昌暴動是反對國民黨中央的軍事行動，這是當時中國共產黨以武裝力量保持革命勝利的嘗試，這一軍事行動在當時是有必要的。南昌暴動失敗的原因，客觀上是敵

人的力量過於強大，至於當時指導機關指導上的錯誤，乃是：①沒有明顯的革命政綱；②對於土地革命不堅決；③沒有與農民運動聯繫起來，沒有武裝農民；④沒有摧毀舊的政權機關而代以勞動者的政權；⑤其他軍事上的錯誤等。指導南昌暴動及南征革命軍之主要錯誤，便是他很久很久，一直到最後幾天，總不能決然的開展澈底的土地革命。南昌暴動的八一革命，一開始就不宣布澈底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而定出只沒收二百畝田以上地主土地的政綱，這是極大的錯誤。所以革命軍到潮汕之間，工農羣衆說：『這是蔣介石第三的軍隊』，這還是要『耕者無其田』。爲什麼？因爲一則軍隊中指導機關提出只沒收二百畝以上地主土地的口號，二則革命軍南征時並沒有和當地農民運動發生聯繫，並沒有勇敢鎮壓剷除豪紳地主工賊的勢力。固然，最後一時期已經拋棄沒收二百畝以上的模糊政綱，而換了比較革命的口號，然而已經太晚了！再則，葉賀革命軍南征之中，政策的客觀傾向是在繼承國民黨的革命方法：（一）純粹想靠組織好的軍隊力量去取得地盤和政權；（二）以『王者之師』來解放民衆，實際上是

以仁君易暴君的辦法，所以對於『安甯秩序』只是保護豪紳地主統治的舊秩序；（三）

是偏重於用聯絡雜色軍隊——某種軍權或武力，勾結敵軍的軍官倒戈（并非鼓動兵士）之投機辦法；總之是不發動羣衆不信任羣衆。軍事上的錯誤是非常之多，然而這種軍事上的錯誤，亦是不澈底革命的態度之反映。這些錯誤也就是南昌暴動失敗的主觀上的原因。

## （二） 各省秋收農民暴動

武漢政府的反動，主要乃是中國革命進到土地革命的階段之反映。此時保障中國革命之主要的方法，就是發展深入土地革命。事實上四月滬粵反動之後，中國土地革命就已開始深入，如果不被當時中國共產黨指導機關機會主義所斷送，土地革命之深入發展乃是顯然的事實。正當南昌暴動之時，中國共產黨得着共產國際的指示，乃於八月七日召集緊急會議，堅決糾正機會主義的錯誤，並且具體決定湘鄂贛粵四省秋收暴動之計劃。現在把當時各省秋收農民暴動的情形大概分述於次：

先說湖南。湖南是中國當時農民鬥爭最劇烈的省份，馬夜事變即在湖南長沙出演

。湖南秋收農民暴動的情形大概如下：『由九月八日至十二日——暴動的開始幾天——我們是得着勝利。我們軍隊（農軍）的槍數增加一倍以上，萍鄉的有七百到一千二百枝，安源的有二千一百枝；刀矛梭鏢武器的農民成千的加入隊伍，佔據了湘東所有重要的縣份——平江，瀏陽，萍鄉，醴陵，株州。株州是到南方的鐵路主要地方，在進攻長沙上有重要的軍事意義，只被有六十枝鎗的農民所佔據。在株州城內有一營兵都逃走了。十三日長沙起恐慌。』（見一九二七年九月三十日出版的『中央通訊』第六期湖南報告）。當時，湖南是直接受馬變之後，農民協會的政權時期，還活躍於羣衆的迴憶之中，唐生智軍隊大半在皖鄂，豪紳自馬變以來時時在受農協襲擊的危險之中。但是當時中國共產黨湖南省委中着很深的機會主義的餘毒，始終不肯堅決發動農民羣衆，沒有領導長沙的工人鬥爭，在暴動中則又單純依靠軍事力量，根本忽略發動廣大羣衆的行動。甚至在醴陵株州等處暴動起來，反又取消長沙的九月十六日暴動。因此湖南秋收農民暴動完全失敗。

其次說到湖北。湖北農民運動雖然沒有像湖南那樣發展，但據一九二七年五六兩

月的報告，湖北全省農民協會會員亦有二百八十四萬二千餘人。七月武漢反動，接着武漢工人罷工抗議之後，湖北秋收農民暴動亦即開始。同時湖北經濟政治情形亦正在動搖之中。所以八月中鄂南蒲圻咸甯嘉魚通山崇陽等地即有農民武裝之騷動。自此農民游擊戰爭繼續發展，直到截斷武長路半月之久，通山等處且有短時期被異動農民佔領。鄂北却成了問題。鄂北有共產黨員張兆豐的軍隊將到，但是當地黨部沒有去認真發動羣衆，不去領導當地羣衆反對捐稅及樊鍾秀的統治，彷彿認爲農民還未抗租并無土地之爭，即不能動，一面又有擬令張兆豐去聯絡樊鍾秀反對方振武的軍事投機的計劃。湖北因機會主義之影響，秋收暴動亦歸失敗。

其次再說到廣東。廣東是中國農民運動開始最早的省份，特別是東江海陸豐等地有比較長的農民鬥爭的歷史。海陸豐農民，並不因在反動勢力嚴重壓迫之下，而停止其鬥爭，尤其是自四月十五以後，更無日不在積極反抗之中，如殺戮豪紳地主，破壞反動勢力之一切交通行政，以至抗捐抗稅等等的日常鬥爭。農民革命情緒的高漲，反動統治勢力的動搖與豪紳地主階級之危懼，竟使暴動急遽的爆發。農民暴動開始於十

月三十日。十一月一日農軍即佔領海豐，接着陸豐碣石槌城亦入農民之手。農民暴動勝利之後，即實行分配地主土地，焚燬一切契約債務關係，組織各鄉赤衛軍，編練工農革命軍，建立工農兵蘇維埃政權，海陸豐蘇維埃政府實際上是中國第一個蘇維埃。

此外廣東瓊崖也有農民鬥爭發生，江西鄱陽星子等處隨着也有農民鬥爭的爆發。這一秋收農民暴動的浪潮傳播到十月中直隸的玉田暴動，以至山東的陽穀暴動，大半都是羣衆自發性質。十一月初江蘇的宜興無錫江陰以至崇明的農民鬥爭和暴動，十一月一日宜興的農民暴動且曾佔領縣城兩天。河南四方山等處也有農民的暴動。這些暴動大半是共產黨參加領導，也有許多零星的自發的。

秋收暴動大半都遭到失敗，因此在許多地方也相當擴大了共產黨在農民羣衆之中的影響，將土地革命的口號滲入到農民羣衆的意識之中去。後來繼續發展的農民鬥爭，以至於許多蘇維埃區域的創立，大致亦由於秋收暴動的影響。但是當時秋收暴動政策之機械的應用，亦就有地方發生玩弄暴動和軍事冒險的行動。

## 第八節 廣州暴動

## (一) 廣州暴動前之中國一般狀況及廣東情勢

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與上層小資產階級陸續背叛革命之後（滬粵的四月反動，武漢的七月反動），中國革命受着嚴重的挫折。但是直接革命的形勢尚未完全消失。背叛革命的中國資產階級及其軍閥與國民黨，自從和工農民衆破裂之後，絕對沒有能力去建立他們自己經濟政治的穩定，國內各種經濟——工業商業農業財政國際貿易，都起了很大的恐慌，資產階級國民黨的反革命，事實上證明他並沒有能力實現他內部的統一，更不用說實現中國之資本主義的集權了。當十一月間廣東汪精衛所領導的張發奎黃琪翔政變之前，國民黨領域之內已經爆發了許多軍閥戰爭和搶劫。這種戰爭和過去舊式軍閥戰爭一樣沒有絲毫的革命意義，完全是爲着搶地盤爭權，各省之間有搶奪，各縣之間也有搶奪，——這都是資產階級軍閥和各派各系互相競爭的現象，同時也反映帝國主義列強對華利益的衝突。資產階級愈反動，對於被剝削階級的恐怖政策也愈加厲害，他們屈服於帝國主義之前也愈加無恥，他們內部愈加不能統一而日益



分裂紛爭。當時武漢政府與南京政府的合併完全是一齣滑稽戲；這一幕滑稽戲之後，立刻準備了兩個軍閥戰爭——南京政府和唐生智的戰爭及廣東派軍閥和廣西派軍閥的戰爭。汪精衛張發奎黃琪翔反對李濟琛黃紹雄的戰爭，不過是反動統治內部的紛爭和軍閥混戰的總局面中的一幕。當時全國之中有兩個根本的階級結合過程：一方面，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很迅速的與封建地主勢力及帝國主義結成反革命聯盟；別一方面，無產階級和農民及一般城市貧民在極艱難的條件之下，忍受着無數的犧牲，共同進於革命之更高的階段——從與民族資產階級結合之總的民族革命聯合戰綫，進於工農反對資產階級封建勢力及帝國主義的革命戰綫。在前一時期，革命的旗幟是國民黨，至此革命新時期的旗幟却是蘇維埃的工農革命，這革命要完全由共產黨來領導。這種工農革命力量，表現於民族資產階級叛變後武漢上海廣州的罷工潮，湖南湖北廣東江蘇的農民暴動，以及河南直隸山山西等地的農民騷動，南昌八一暴動及葉賀革命軍的佔領潮汕。這一過渡時期中，革命方面最大的弱點，便是革命正在進於更高的階段，而中國共產黨很幼稚，經驗很不充足，又受着極嚴厲的壓迫和摧殘，他在政治上組織上

指導革命運動的能力太薄弱，而其中又有人對於國民黨左派還存着種種幻想，由此而發生嚴重的機會主義的錯誤，尤其是在土地問題及軍事問題上。此外還有更主要的缺憾，就是三種革命力量之間沒有親密的堅固的聯絡，——這三種偉大革命力量，便是工人羣衆的鬥爭，農民暴動和兵士羣衆的兵變。南昌革命軍隊的起來，沒有能用自己的革命政策去發動工人和農民；同時暴動的農民又沒有得着城市工人的贊助（如湖南秋收暴動時長沙簡直沒有工人運動）；城市工人也沒有會吸引兵士羣衆到自己方面來，所有這些缺點，便發生葉賀南征時期的歷次的失敗。可是無論如何，工農革命總還在生長之中，共產黨機會主義的錯誤，經過八七緊急會議與十一月中央擴大會議，亦已得着比較正確的糾正。特別在當時廣東情勢之下，又正使工農羣衆爲保障革命勝利之鬥爭，使革命深入，直接創造蘇維埃政權的鬥爭，不但必要而且可能。

李濟琛的廣東境內的國民革命軍早已葬送了，廣州的反動只在蔣介石公開反革命行動後的三天（『四一二』慘變）。葉賀革命軍隊失敗於潮汕的時候（十月初），張發奎和汪精衛及一部份廣東省內的資產階級，便準備推翻李濟琛黃紹雄及代表南京政府一

派的豪紳資產階級。十一月十七日，這一政變居然成功了，張發奎黃琪翔朱暉日等軍閥起來搶着廣東政權，自稱『護黨運動』，想欺騙並號召一般民衆來贊助他們，而達到他們反動的目的；同時這一派人也非常之殘酷的壓迫工農和共產黨，比李濟琛的統治是有過之無不及。汪精衛等所謂左派領導之下的張黃政權，第一步的政策，便是取消省港罷工工人的權利，迫逐罷工工人出公共宿舍，封閉罷工委員會及其公共食堂等等，逮捕大批革命工人羣衆，對於徒手的示威羣衆則下令開槍轟擊，命令軍警和反革命的『改組委員』佔領工會會所，特別發布殺盡共產黨的標語。張發奎黃琪翔等對於帝國主義是特別的表示親密和所謂『和平友好』，他們甚至於對於資產階級的團體也嚴禁抵制英日貨，他們那時便命令軍警強佔蘇聯領事館的一部分房屋，對於蘇聯領事的抗議，完全置之不理。廣東全省完全陷於這兩派軍閥的混戰之中，廣州的市民遭着空前掠奪，在所謂（正稅）之外，增加了許多的苛捐雜稅，想盡方法的搜括民脂民膏，甚至於公開的盜用庫藏。如此之戰爭，財政恐慌，鈔票跌價，物價高漲，都使經濟生活的崩潰一天天的厲害起來，再加上屠殺搜捕的種種淫暴政策，到十二月初的時候

，已經岌岌乎陷於破產的狀態。汪精衛張發奎等欺騙勞動民衆的政策，完全失敗。工人羣衆之中，充滿了不滿意於各派資產階級軍閥的情緒，這種革命情緒的高漲很快的變成公開的憤激。共產黨的威信，大大增高，雖然政府對於共產黨的搜捕壓迫非常之野蠻厲害，共產黨存在於極嚴重的秘密狀態之中，可是羣衆對於共產黨的信仰却大大的增加。

另一方面，廣東的民族資產階級，雖然在背叛革命出賣工農之後，立刻便和各種反革命勢力團結聯合戰綫，他和封建的地主，香港的買辦，反動的財政資本家，舊時的官僚，一般投機的軍閥，以及以前孫中山的死敵「紙老虎」的商團等等，還有英美法日的外交官偵探之帝國主義者，結成聯合戰綫。所謂廣東派的軍閥，他們勾結季福林，又因為季福林能領袖廣東的地主武裝的民團，所以他們又和民團聯絡。不論是廣東派或者廣西派軍閥，對於工農革命，都懷着不共戴天的仇恨，但是他們這兩派并不因此而能實行統一，並且互相衝突以至於公開戰爭。廣東派與廣西派的公開破裂，反映着英日帝國主義互相衝突，廣東的資本家有親日的傾向（廣東的張發奎因此想用攀附

廣東資產階級的手段，仰承蔣介石的鼻息——蔣介石在當時是親日的；廣西派軍閥與上海的資產階級——英國買辦却是親英的。廣州十一月十一日黃琪翔政變之後，廣東全省都被軍閥戰事威嚇着。雖然劇烈的大戰還沒有起來，而只有雙方的調兵遣將和小的衝突，可是戰事的影響已經非常之大，因此雙方軍閥的經濟力量也都在非常動搖的情形之中，因為準備大戰的緣故，廣東市內政府軍隊日益減少。

同時被壓迫民衆之中的革命情緒也增高起來。廣州的工人，在四月李濟琛反動之後，受着極大的犧牲，被殺的工人在四千以上，此外還有一千多被拘禁，此後屢次對於革命民衆施行屠殺搜捕的強暴政策。國民黨政府的強暴政策，特別是對於赤色工會運動和共產黨。但是在反動政府恐怖政策之下，廣州的工會——工人代表會與廣州的共產黨部，都還能努力的工作，羣衆的組織力量和黨與羣衆的關係都有相當的程度。九月間，南昌暴動的革命軍隊到達廣東的時候，共產黨曾經準備廣州的暴動。後因潮汕方面革命軍的失敗，使這一口號沒有能直接實現。雖然那時反動政府加倍的壓迫，雖然葉賀革命軍隊失敗，但於工人運動的浪潮，却繼續增高起來。政府或國民黨所派

的工會改組委員，到處被工人羣衆所驅逐。有組織的工人，到處自己選舉工會的委員。十月十四日爆發海員的罷工（這時在上海有英美烟廠工人罷工，在蘇州有鐵機工人罷工潮），各業工人都起來援助，同時即舉行兩萬多工人的大示威運動。『兩萬革命的工人打着鐮刀斧頭的紅色旗子，向反動的政府示威。他們對反動的軍閥與資產階級說：我們的軍隊雖然一時失敗了，但是我們的基本隊伍還是日益增長地存在着，並且存在在你們的心窩裏；我們軍隊的槍把雖然這一次沒有能够擊破你們的腦袋，但是我們工人的鎚頭將在你們的心胸中搗爛臟腑。』（太雷：『廣州工人十月十四日的大示威』，見一九二七年十月卅一日出版的第二期『布爾塞維克』）。極廣大的工人羣衆不顧警察的禁止和拘捕，在羣衆大會之上公開的擁護赤色工會和共產黨，公開的提出鮮明的口號：『青天白日旗已成白色恐怖的旗幟，我們從此要打倒這白色恐怖的旗幟，高高豎起我們自己革命的旗幟——工農的鐮刀斧頭紅色旗！』，當時工人羣衆有些便自動手奪回工會會所，驅逐警察和白黨的工賊走狗，當場打死海員工會會所中的工賊。此後，立刻便有印刷工人的罷工起來。十月十九日汪精衛所領袖的反動政府對於

這種工潮大施壓迫，逮捕大批的工人領袖，省港罷工委員會的糾察隊被解散，海員工會被封閉。那時工人之中便有主張暴動的，但是共產黨威信足以糾正這種過早暴動的傾向。共產黨提出當時的主要任務，是更加緊工人力量的組織，擴大政治經濟日常鬥爭的要求，宣傳暴動的必要和蘇維埃政權。十一月初開始反對白色恐怖的示威。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十週年紀念日，廣州工人開了極大的羣衆大會表示紀念，但被警察解散。黃琪翔張發奎的政變之後，羣衆示威和部分的罷工繼續不斷的發展，省港罷工工人被張黃解散之後，自動的放火燒燬資產階級反動派的房屋，共產黨的宣傳品有極多量的分布，羣衆熱烈的要求釋放政治犯，……這些現象表明階級鬥爭更加劇烈。十二月初羣衆的憤激更增高起來，海員罷了工，公共汽車工人宣布了怠工，許多小企業的工人也開始罷工，郵務工人已經議決罷工。先進的工人武裝起來，自己準備炸彈等等。

至於農民方面，則四月間李濟琛反動後，曾經有一時期的農民暴動，葉賀軍隊到達廣東時，九月間又起了秋收抗租的暴動，十月以後，農民在各縣又重新暴動起來

——這是一九二七年廣東農民的第三次暴動了。各縣農民暴動之中，以海陸豐的勝利為最大。這次暴動的開始時，有葉賀殘部很少的軍力參加，這軍隊在共產黨領導之下改編為工農革命軍的一師。這次暴動開始於十月底，一開始便有極大的規模，而且在土地革命的性質上，也是空前的深入，極有組織，極有活動力量，中國革命之中，這是第一次由幾萬幾十萬農民羣衆自己動手實行土地革命的口號，第一次組織成工農兵羣衆的政權。這一農民暴動帶着充分的革命性質，完全掃除了以前的機會主義餘毒。一切鄉村之中，隨後便是一切區鎮之中，以至東江許多縣的縣城之中，都建立了蘇維埃政權。一切田界（廣東所稱爲田畝志）——地主所有的界限，完全取消。一切地主私有的田地和剝削農民佃戶的田契租約借券等等，完全當衆消燬。一切田地都歸鄉村蘇維埃收歸公有，分配給農民耕種。一切當舖的財物完全沒收，無價發還典質的貧民。一切反革命派豪紳地主的財產充公，作爲蘇維埃工農兵政府的費用，用來救濟貧民，從事公共建設，擴充工農兵政府的革命軍隊。一切反革命派豪紳都公開處以死刑，他們的巢穴都被焚燬。鄰近的鄉村縣市，都激起極大的農民羣衆起來暴動，和工農革命軍



共同圍攻地主豪紳的巢穴，而能戰勝他們，擴大革命的地域。縣城的蘇維埃，如海豐陸豐碣石紫金油尾，以及後來的普甯等處，都由手工工人農民苦力等共同組織。海豐十一月七日開蘇維埃大會到工農代表三百人，賓客一萬人，選舉蘇維埃政權，管理東江的各縣。十一月中旬暴動已經擴大有五十萬居民的區域。新組織的工農革命軍，是由各村選出的志願兵組成的。雇傭軍隊的方法取消，代以團體（各業工人，各村農民）的義務兵役。工農革命軍的武裝，大半是由敵人處奪來的。海陸豐蘇維埃政府（主席彭湃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一九二九年八月三十日在上海被蔣介石捕殺）派人向廣州工人羣衆請求贊助，並發出告工人羣衆的宣言。同時海陸豐的農民將沒收的地主財產之中，取出二萬元來送給廣州工人，作購買武裝之用。海陸豐以外，其他的農民暴動雖然規模較小，但是也已經有許多處開始了：北江方面，海南島，北海地方，沿廣九鐵路，潮汕附近……。

兵士羣衆的生活異常痛苦，并且受長官的壓迫侮辱，專門使他們當軍閥戰爭的砲灰。中國共產黨廣東省委員會及廣州工人代表會，在十月間所發宣言上，便號召國民

黨及其他反動軍隊裏的兵士起來反對軍閥統治，起來反抗反革命的軍紀，起來組織革命兵士委員會，起來力爭自己的生活改良，政治權利和軍紀待遇的改良，起來兵變而站到革命的工農方面來。張發奎黃琪翔政變之後，他們號召羣衆大會來慶祝他們所謂『護黨』之成功，這一大會實際上只能算是閱兵，大多數到會的人，都是奉了上官命令而來的軍警；這一大會之中，突然來了一羣衆革命工人，高舉紅旗，寫着『打倒國民黨』『蘇維埃廣州萬歲』『工農兵政權萬歲』『兵士弟兄們站到工人方面來』等等標語，當時還散發了許多傳單給軍警看，工人高呼口號，當場的兵士都公開的表示對於工人的同情。尤其是廣州的駐軍（教導團等）的兵士，他們對於反革命的統治非常憤激，這些軍隊算是張發奎部隊中最好的一部份，他們還保存着往年國民革命之熱情的影響，而憤恨背叛革命的資產階級和軍閥。十二月初在許多次秘密會議上，這些兵士整連整營的表示贊助共產黨的政策和舉行暴動。

城市的勞動小資產階級，一般貧民及一部分知識界之中，也開始不滿意反動政治的表現，厭惡政治上的混亂和不能容忍的經濟困難，他們對於欺騙民衆的國民黨，不

能實行自己所應許的政綱的國民黨，開始失望和怨恨。小資產階級的廣大羣衆方面，雖然只在找不着出路的動搖徘徊於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然而小資產階級的先進分子，已經決定的站到無產階級方面來。

這就是十二月初廣東階級力量團結的具體情形。

## (二) 廣州暴動的決定和準備

張發奎黃琪翔政變之後，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國共產黨廣東省委員會遵從中央委員會十一月十八日的決議案和指令，討論暴動問題，當日便一致議決堅決進行暴動的政策，可是暫時還不能決定舉行暴動的日期，而先開始組織赤衛軍，最高限度的加緊兵士運動，并且開始組織蘇維埃。到十二月初旬，形勢更加嚴重。一方面東西北三江及南路，幾乎都捲入了戰爭漩渦，李濟探黃紹楨正在積極準備反攻，陳濟棠則在東江獨立，宣布反對張黃，張黃在此情形之下，乃不得不派軍開往西北江禦戰，如此，廣州非常空虛，祇剩保安隊千人教導團一團警衛團一團而已。『在這個困難中間，張發奎

不知怎樣辦法，一方面向有錢的商人磕頭，表示只要商人給他錢，他就去殺盡共產黨；另一方面，他疊次派代表秘密的來找我們共產黨，要求同他們協商怎樣共同保護廣州反對李濟琛黃紹雄。」（見中國共產黨廣東省委號召暴動宣言）。共產黨廣東省委員會公開了張發奎的秘密并發表宣言，指出張發奎等逮捕工人槍殺工人，解散省港罷工委員會，解散工人糾察隊等反革命行動，完全和李濟琛黃紹雄一樣，「就是有人用顯微鏡來看，也不會看出汪精衛張發奎與李濟琛黃紹雄有什麼差別」，共產黨主張以革命暴動消滅軍閥戰爭，打倒一切軍閥。同時張發奎得着汪精衛密令，又正準備解決廣州駐軍中革命兵士的武裝。另一方面，羣衆革命情緒確在活躍之中，於是中國共產黨廣東省委爲先發制人起見，乃正式決定十二月十一日即行發動。

至於暴動的直接準備與組織，則經過下列的六種準備：

(一) 確定暴動之總政綱

(二) 暴動之軍事上的準備

(三) 廣州蘇維埃的組織

(四)經過赤色工會動員工人羣衆

(五)兵士中急進的工作

(六)農民中的準備與聯絡

十一月二十六日共產黨廣東省委員會就公開的號召羣衆暴動，同時就提出下列的口號：

立刻釋放一切政治犯，工農武裝起來，勞動民衆之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絕對自由，一切工會會所歸還工人，殺盡一切工賊走狗和改組委員，立刻恢復省港罷工工人權利，照原薪津貼失業工人，增加一切工人的工資，工人監督生產，沒收資產階級的房屋給勞動民衆住，沒收大資產階級的財產救濟貧民，土地歸農民，殺盡土豪劣紳地主，改良兵士生活，增加兵餉到二十元現洋，組織革命兵士委員會，反對軍閥戰爭，兵士委員會監督軍費的開支，打倒國民黨，打倒張發奎黃琪翔李濟琛黃紹雄及一切軍閥，槍斃一切白色恐怖的劊子手，工農兵聯合萬歲，工農兵代表會議政權萬歲，打倒帝國主義，中國民衆和蘇聯聯合萬歲，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

共產黨而且聯結這些要求，舉出最主要的口號：飯給工人吃，土地給農民耕，打倒軍閥，一切政權歸工農兵蘇維埃。這些口號很可以對一般民衆表示將要起來的暴動之明確的政綱。

對於軍事的準備，共產黨廣東省委在十一月二十六日便決定了下列的辦法：組織「革命軍事委員會」做總指揮機關，組織參謀部做暴動時軍事技術的指導機關。暴動之軍事方面的準備情形是：定出明確的舉行暴動的戰術計劃，全體黨員動員，組織二千工人的赤衛隊，這赤衛隊是有嚴密紀律而按連組織的，又組織可靠而有訓練的敢死隊兩連（省港罷工糾察隊一連，海員及手車工人一連）；準備運輸工人汽車夫等，以及一切運輸用具以備暴動時之用；秘密準備許多鐵尺刀棍手榴彈炸藥等，少數的手槍駁壳及許多冷器，如此武裝了工人赤衛隊及工人羣衆，吸收大多數的黨外工人加入赤衛軍，并担负軍事的指揮任務，建立廣大的消息機關，差不多反動軍隊及政府機關參謀部等處都有共產黨的消息報告員，每天偵察敵情報告黨部，黨部的工會的革命兵士及下級軍官的會議，差不多每天召集，逐步討論暴動的詳細計劃。

因爲秘密狀態異常嚴重，所以蘇維埃只能在決定暴動日期時候才成立：工人代表會選舉蘇維埃執行委員十人，革命兵士的會議選出三人，市郊農民協會上選舉蘇維埃執行委員三人（可是三人中只有一人直接參加蘇維埃的工作）。廣州蘇維埃的執行委員會便由這十六個委員組成，此外還有共產黨的代表參加。蘇維埃的執行委員之中，工人佔三分之一。舉行暴動的最終決定，便在這蘇維埃會議上通過。

兵士中的工作首先在廣州駐軍之中發生影響。可是沒有能夠和駐在外縣及市外的兵士，發生密切的關係。市內所駐各種軍隊之中都能有自己的黨員。廣州市內的教導團，則極大多數都在共產黨影響之下，他們在暴動之中有很大的作用。這十二營的軍隊，其中極大部份是軍官學校學生的知識分子，除少數高級軍官是反動派外，其餘一致贊成蘇維埃革命。再則，廣州的警備團的大多數兵士，砲兵營一部分，有些黃埔軍官學校學生及其他，也都贊成廣州的蘇維埃口號。暴動的一星期前，二百兵士的會議（其中有黨外的普通兵士），一致決議誓死爲工農革命奮鬥。共產黨所提出來的兵士口號，尤其是『土地歸農民和兵士』，在兵士羣衆中遇着熱烈的擁護。

羣衆的宣傳曾經有很大的工作，有秘密日報：『工農小報』『紅旗』及許多傳單，革命軍事委員會，在暴動的前一天便會同印刷工會商定，印佈蘇維埃政府的命令和傳單，這些命令和傳單及日報等計印出七百萬份。

### (三) 十二月十一日的發動

十二月十一日到了。暴動即在這天早上開始。據楊殷同志（廣州蘇維埃政府人民肅清反革命委員，一九二九年八月三十日在上海與彭湃同志同時被蔣介石捕殺）在他『鬥爭中的迴憶』（見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四日出版的『紅旗』報第三期）中說，那天教導團先將營內的反動長官解決，便與工人所組織的赤衛隊分途向敵人隊伍軍警機關襲擊。砲兵團爲敵人重要部隊，當向他進攻時，我們人數不滿百人，奮勇向前，該團兵士即表示服從與工人聯合，將砲槍交出。警衛團於工人都隊到達時，經某連長一呼，并無反抗，便即解決。此時各士兵與工人赤衛隊會合，一路由沙河經東山過廣九站而進攻八旗會館，一路由惠愛東路向公安局及保安隊進攻，其餘則分向各警區進攻。



當工人襲擊八旗會館時，士兵尙未到目的地，只由一個僅僅十八歲的青年工人同志，帶領七十餘人，武器則只有炸彈三顆，盒子砲一支，手槍一支，先將炸彈拋擲未炸，而反動的軍隊已羣起反抗，故由正門無法攻進。於是工人分向各圍牆爬進，徒手奪取軍械一部份，覺悟士兵起而響應，始得解決。於是沿長堤收繳海軍練營，新編二師等部，皆從夢中驚醒，絕無抵抗。轉而向肇慶會館二十五師部，該部頑抗，并用手提機關等利器向我們隊伍射擊，工友傷十餘人，都奮不顧身，抵死相持。

攻公安局係分兩路進的，當時保安隊死力抵抗，總隊長李某親自指揮，卒因工友猛勇進攻，將隊長李某槍斃。所駐的大隊保安隊，不敢抗，都被繳械。其時各路工友已分向城內各區將其攻下；其餘製彈廠，電話局，電報局，政治分會，財政廳，及市各機關，亦相繼佔領。西關七九十等區，亦於同日下午一時佔領。所餘者惟文德路四軍軍部，太平沙貯藏軍械處，潮州會館二十六師部數地。鬥爭最烈，亦爲以上數處，而尤以四軍部爲烈。相持至十二日，大小數十次衝鋒，砲聲隆隆徹夜不絕，雖傷亡甚大，因工友亦死力相持，敵軍卒不敢出衙門一步。至鐵路工人將三路車站克復，廣三

工友更聯合農民向沿路之敵追擊。十二日午，市郊農民更派大隊來會，共同作戰。十二日午後一時，忽來敵軍約一團，由觀音山下沿第一公園馬路，分兩路向我們總指揮部猛攻。已到第一公園，此時在省長公署（即赤衛總部）的工友有鎗者約百餘人，便即分兩路迎戰，并約車夫工人五十餘人來助，公安局方面工友士兵亦洶湧殺來，敵始退去，我們復奪觀音山。十二日午後九時，教導團全部因保全武裝計集中沙河向花縣進擊，黃埔一部武裝戰士亦於十三日早晨趕到，協同向沙河進發。此時廣州只存三千餘武裝工友，然工友仍不稍却，誓死殺敵。

十三日早八時，敵人已四面包圍。東由中流砥柱過河向東關廣九車站等地進攻；石龍方面敵軍約一團，沿廣九路石牌站向東門進攻；北路約兩團，一路由觀音山向第一公園進攻，一路奪黃沙站向西關進攻；另由河南分隊過海，一路由白鵝潭帝國主義兵艦掩護渡海，入黃沙與北路敵軍會合，一路由反動海軍掩護在石公祠登岸，一路由東關登岸與東路會合。當時聞報，工友即分途應戰。東路由同志沈某負責，率同工友二百餘人，與敵人一團對抗，傷亡在一百以上，然猶死力支持。車夫工友某同志已傷

足部，猶指揮前進，敵人卒不得不退去。西路工友在太平南路祇剩一百餘人，仍將敵軍六百擊退，迫殺至大新公司堤，因石公祠敵用機關槍向後掃射，工友已傷亡五六百人，仍死守太平南路。奈太平南路一帶屋內反動分子，由窗口向下射擊，工友又死去數十人，此時祇存二十餘人，猶在西瓜園死戰。其餘如維新路，觀音山，廣九車站，東堤等處均仍支持。爭鬥劇烈異常，敵人至一時仍不能進展。下午三時後，工人因子彈告盡，敵人又愈聚愈衆，漸漸迫進，然在公安局前，猶作一很劇烈鬥爭，敵軍亦死亡不少，工人雖已離公安局（蘇維埃政府），而敵人四面用機關槍包圍，至五時尚不敢進去。工人因受四面鐵桶一般包圍，且彈盡援絕，盡被屠殺。

當十一早二時，工人喊殺連天勇敢作戰時，反動的領袖張陳黃等驚惶失措，狼狽萬狀，張陳均不及衣履，黃在十三日尚未穿外衣，沙面帝國主義者更駭怕異常，爭相下艦去港。

十一早奪得各地後，均嚴守其無產階級態度，各機關搶出財物，均送蘇維埃保存，各市民睹狀，皆表同情，多懸紅布，多送茶飯於就近作戰工友。

十一早奪得槍枝約五六千，將各赤衛隊編練，而工人羣衆領槍去作戰殺敵者不知凡幾，在公安局前，省長公署前約有三萬餘人。另各工會及各佔領地作戰的亦共有二三萬人。滿馬路都是工友，有槍的固去應戰，即無槍者亦各做運輸偵探種種工作。羣衆的勇敢堅決，如汽車工友，除運輸外，都能單獨作戰。三天內未得一飽。海員鐵路工人都能擔任指揮作戰及組織羣衆等工作。罷工工友人力車菜欄酒業酒樓茶室打石棚廠及其他各工友，均勇敢殺敵而犧牲甚多。

教導團兵士固忠實於革命，而被繳械的警衛砲兵團及保安隊兵士，亦舉派代表要求發槍，表示擁護工農，願意參加戰鬥。即素來不過問政治的廣東水兵，當在西瓜園開羣衆大會時，亦自動的派出代表參加，以示團結一致。

#### (四) 蘇維埃政權的成立

廣州暴動是在蘇維埃旗幟之下進行的，所以當十二月十一日廣州被暴動勢力佔領時，蘇維埃政府也就出現。這一行動決不是政權從一派政客之手移轉到別派，而是政

權之階級的社會的移轉；這是全中國以及全亞洲第一次的偉大嘗試：用被剝削者的政權代替剝削者的政權。廣州蘇維埃政府成立之後，立刻發生許多重要的任務：（一）組織蘇維埃政權。（二）擁護蘇維埃政權。（三）實行蘇維埃的政策。（四）向反革命進攻。（五）打通與海陸豐聯絡的道路，使與農民暴動勝利區域相接，而建立革命基礎。廣州蘇維埃存在期間很短促——尙不滿三天，所以這些任務只實行了很少一部分。對於最後的兩種任務，簡直絲毫也沒有實行。

至於前三個任務，則平民行政委員會發布宣言命令，宣布蘇維埃政權的成立，組織革命的軍隊，以及消滅反革命勢力的辦法。平民行政委員會在暴動取得初步勝利之後，立刻開始實行政府的職權，他簽字並公布廣州蘇維埃所決定的一切命令和宣言。他的第一件政府行爲，便是發布告中國工農兵羣衆及世界無產階級的宣言。蘇維埃政府的文件，都在廣州最大的一家印刷局中印發二十五萬份。平民行政委員會主席是蘇兆徵同志——他是一九二五年粵港罷工的領袖，中國共產黨的中央政治委員（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日因工作過勞，在滬逝世）。蘇維埃政府的革命軍事委員會，指揮一

一切革命軍力保衛蘇維埃的廣州，支配軍械軍費及食糧等。蘇維埃政府的主要任務之一，便是根據海陸豐的經驗，建立正式的革命軍隊，從工人赤衛隊，國民黨軍隊中暴動出來的兵士，釋放出來的政治犯，以及志願投軍的工人和農民，組織成工農革命軍。新成立的紅軍，其中一半以上是工人和農民。工農革命軍的連排長和營長大多數是能夠使用槍械的普通工人。反動的雇傭軍隊方法，完全取消，代以志願兵的制度。軍隊的一切需要，完全用集體供給的方法（衣食住等）。蘇維埃政府存在期間，從兵士到最高長官都沒有支餉，而只領取革命軍事委員會所徵發資本家的種種物品食糧。新組織的紅軍很快地便能有真正革命的無產階級的紀律，因為黨員和工會會員的組織的習性本來還好。廣州的工人階級，在革命軍官同志的指導及兵士同志的幫助之下，開始學習軍事，不但學着打槍，並且學着使用最近代的軍事機械，如機關槍，鐵甲汽車，迫擊砲等。就是在最緊急的戰事期間，赤軍的每一部份之中，都進行極緊張的政治宣傳工作，文字的口頭的實驗的都有，所以每一個赤軍兵士都知道他爲着什麼而作戰。甚至於在軍事俘虜——解除武裝的國民黨軍隊之中，也相當的做了宣傳鼓動工作。因

此有幾百兵士和幾個軍官，自願的加入赤軍，努力的爲革命而作戰，一直到最後，他們之中並沒有聽見背叛革命的事實。

蘇維埃政府因爲反動派頑強的抵抗，不得不極嚴厲的鎮壓白黨（國民黨民團等）。蘇維埃政府設立之肅清反革命委員會，爲殲滅反革命派工賊走狗奸細等的機關。工人表現真正布爾塞維克的精神，努力殲滅並逮捕著名的剝削者反動派警察奸細走狗工賊官僚反革命派國民黨的軍官。蘇維埃政府盡他所有的力量去消滅資產階級軍閥的機關，毀滅警察，澈底掃除國民黨在廣州的軍隊。他圍攻中央銀行而佔領了他——這是以前資本家的經濟巢穴，但可惜因爲打不開保險箱，許多金錢都未曾取得爲革命使用。

暴動一開始之後，革命的兵士就將國民黨的青天白日等的徽章完全拋在街上，換上紅領帶。同時勞動民衆將全城的青天白日旗——白色恐怖的象徵，一概撕毀，都豎起鐮刀斧頭紅色旗，張貼工農革命的標語。

廣州蘇維埃政府還發布一道命令禁止國民黨的存在，解除國民黨在廣州的一切黨

部，沒收其財產，宣布通緝國民黨領袖，一般勞動民衆得以隨處逮捕，就地正法，不論左派右派一律如此；並發布命令宣告國民黨政府人員的死刑，嚴加通緝。同時，蘇維埃存在期間，實現了真正平民的完全民權主義，及革命的平民工農兵之完全的政治自由。

蘇維埃的每一舉動：他的發展，他的政策之實行，他的武裝鬥爭，一直到他的失敗，始終是受幾千萬羣衆的擁護和一般貧苦民衆的同情。女共產黨員和女工也加入赤軍作戰。軍隊供給的工作，差不多完全是女工擔任，他們幫助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傳遞消息機關，製造軍用的材料旗幟，幫助運輸工作，實行極廣大的羣衆政治宣傳，看護受傷的革命兵士和工人。蘇維埃政府失敗之後，有許多女工和普通婦女，因此而被白黨（國民黨）所殘殺。

### （五） 廣州蘇維埃政府的政策

當暴動勝利佔領廣州與釋放政治犯的時候，一面組織武裝力量，指揮作戰；一面



蘇維埃政府平民行政委員會立刻便進行實現工人階級及農民的政治經濟要求，反對剝削者的復辟。蘇維埃政府就在新出版的『紅旗日報』上，公布許多命令，他的內容便在實現舉動的口號：

對於工人階級，便是公布命令，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對於手工業小企業的工人也規定工作時間，恢復並擴大省港罷工工人的權利，由國家照原薪津貼失業工人，一切工人都增加工資。

對於農民便是公布命令，宣布一切土地收歸國有，完全歸農民耕種，殺盡一切地主豪紳，消燬一切田契租約債券，消滅一切田界，各村各區即日成立蘇維埃政權。同時通電全廣東及全中國，說廣州蘇維埃政府當以全力保障海陸豐的革命勝利，批准海陸豐蘇維埃政府委員名單，並選任海陸豐暴動領袖彭湃為廣州蘇維埃政府之農業委員長；號召一般農民以海陸豐為模範，武裝起來，組織準備自己的力量發動暴動，建立蘇維埃政權及工農革命軍。

對於一般勞動民衆以及小資產階級城市貧民，則公佈沒收資產階級的房屋給貧民

住，沒收他們的財產救濟貧民，對於貧民取消一切稅捐，取消一切債務，尤其是年關的債務，對於貧民則更取消一切房租，——全市房屋歸公有，沒收一切當舖，將貧民的質物無償發還。

對於兵士，則宣布國有的土地分給兵士失業人民自由耕種，各軍部隊之中組織兵士委員會，組織工農革命軍。

蘇維埃政府宣布承認中華全國總工會系統之下的工會為唯一工會組織，一切種種反動工會完全解散，他們的會員應當加入革命的赤色工會，資本家的走狗工賊組織（國民黨工會等等）——白色工會的指導者和委員，應加通緝就地正法。廣州蘇維埃政府對於一般民衆說明：白色工會中的真正工人會員也是被剝削者，我們應當親密的提攜他們，團結全體無產階級來擁護蘇維埃政府。

這樣工農兵都逐漸明瞭蘇維埃政權的意義，城市的貧民，見着蘇維埃政府的這些命令，也都公開的來贊助蘇維埃政府，赤軍和白軍劇烈作戰的時候，工人羣衆熱烈的參加，但是不大會裝置障礙物，有一個地方的救火隊員，自動的開出救火汽車以爲赤

軍的屏障。滿街都掛紅旗，好幾千普通市民掛起紅星標幟，贊助蘇維埃政府的種種工作。一般積極的羣衆可說都站在蘇維埃方面，廣州在這三天之內，真正是赤色的蘇維埃的廣州。

### (六) 廣州暴動失敗的原因和教訓

雖然廣州蘇維埃政府實行直接的革命政策，雖然得着廣大羣衆的贊助，雖然極勇猛的保衛革命的勝利，然而在三三天三夜英勇的鬥爭之後，廣州蘇維埃政府終究被敵人摧殘了，廣州暴動終於失敗了。簡單的說來，廣州暴動所以不免失敗的客觀原因約有底下幾點：

一。反動軍隊的數量很多，他們立刻調動三師人，從北方西方南方三面進攻赤色的廣州；開始砲擊廣州的是海軍軍艦，於是河南的反革命軍隊得以渡河，而且調動武裝很整齊的民團加入攻戰。

二。赤軍的大多數是工農，他們在軍事上沒有經驗。許多工人苦力都是暴動之後

才第一次開始練習放槍的。因為沒有訓練好的專門家，所以只有一部分機關槍能够使用。因為沒有相當數量的砲兵，所以奪來的二十五尊砲，只能使用四五尊。再則，工人沒有知道巷戰的架築障礙物的必要。

三。各派軍閥在暴動勝利之後，立刻聯合起來，拚死命的用一切方法來撲滅他們所痛恨的蘇維埃政權。

四。帝國主義的列強幫助白色國民黨的軍閥，他們用盡了種種的方法。他們用許多軍艦來反對赤色的廣州。日本水兵在長堤登岸，開槍射擊赤軍，因此長堤的反革命軍隊更難肅清，使赤軍費了一天的工夫，沒有能把全力去抵禦別方面進攻的白軍。英國的軍艦和商船救出許多的反動派和豪紳資本家，運他們到河南或香港，使他們能够從容集中力量來對付廣州的革命。英國軍艦『Moreon』及美國軍艦『Sacramento』也派陸戰隊登岸。中國的反革命軍艦，完全靠着英美日法海軍的掩護，而能運送白軍，轟擊廣州，英國海軍包圍革命的海員加以逮捕。英國商船公開的運載白軍。於是國民黨的反動軍隊在大英帝國的國旗之下得以渡河攻擊赤軍。

除了這些客觀的原因之外，革命的指導機關主觀上也有很大的缺點與錯誤：

第一，廣州暴動之社會基礎還沒有十分的廣大。工農羣衆之中的工作尙未充分，羣衆的組織和團結的力量還沒有十分的鞏固，政治上發動羣衆的工作，以及暴動前黨部與青年團自己各種準備的工作都太薄弱，暴動之前沒有廣大的政治罷工等。同時對於黃色工會羣衆的態度不對，以致廣州黃色工會（機器工會等）的領袖還所移騙取少數黃色工會的會員來攻擊暴動。近郊農民運動也非常不夠，所以暴動爆發後，廣州附近的農民羣衆不能普遍起來援助工人。對於反動軍隊中的兵士工作也是如此，暴動方面雖然已經得到三四千兵士的贊助參加，但是李福林的兵士並未動搖，加以英日帝國主義積極的組織反動勢力，直接幫助他們反攻廣州的暴動，於是廣州暴動便失敗在殘酷的白色恐怖之下了。

第二，指導暴動錯誤之中的另一個主要點，便是暴動一開始的時候，不能一直取得進攻的形勢。暴動主力軍所攻擊的地方，並非敵人的要樞。又未曾即刻佔領軍械局和兵工廠，以致不能擴大暴動者的武裝。在軍事的觀點上看來，革命軍事委員會費了

太多的時間於肅清長堤反革命巢穴以及市內反動派的機關，而沒有開始便舉行對市外反革命軍事中心的進攻，就是沒有很快的進攻河南黃埔以及石龍，以便與農民暴動區域相聯結（海陸豐離廣州有五六天路程，經過石龍可以相聯結），於是經過一些時候，李福林的軍隊由河南過江，暴動軍便陷於反攻爲守的形勢。

第三，指揮上的不統一，工農行動聯繫的缺乏，暴動時又沒有得着各地工人有力的應援。嚴格的說來，廣州暴動中的指揮是有很大的缺陷的。暴動中未曾建立健全的集中的軍事指揮機關（紅軍司令部設在公安局，赤衛隊總指揮處則設在舊省長公署內）。周文雍是赤衛隊總指揮，在赤衛隊中並無普遍足夠的威信，總參謀徐光英更是力不勝任，紅軍總司令葉挺則因斷言這個暴動是「一九〇五」（即俄國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失敗的莫斯科暴動），並且「始終未能確定的相信這個暴動能够支持很久，最後能够得到勝利」（葉挺在他的報告中親自這樣說的），又加之他於暴動前六小時始由香港到廣州，對於軍事計劃不甚熟悉，遂致表示出消極怠工。所以張太雷同志死後，紅軍與赤衛隊便失去了統一的實際的領導和指揮。此時戰爭最烈者爲觀音山長堤及西關，雖

然有些赤衛隊從新編配，並派軍事的人材當隊長及指揮，但因工人對於軍事知識的缺乏，同時因語言不通的關係，作戰時亦各自為戰。這種形勢，也就使暴動失敗後，不能夠有準備有計劃的退却，以致遭受極大的犧牲。當時暴動之前的各種準備工作又很不充分，因此不但參加暴動的社會基礎還不廣泛，而且工農兵行動的聯系亦很缺乏。再則當時武漢上海無產階級經過嚴重打擊之後，還沒有能恢復自己的氣力，未能給廣州暴動以有力的應援，甚至近在咫尺的汕頭香港的工人也沒有鮮明的應援的表示，凡此一切都不能不使廣州暴動的困難加增了。

這些指導上的缺點和錯誤，便是廣州暴動不能勝利的主觀原因，也就是廣州暴動給予我們的重要的教訓。

### (七) 廣州暴動的政治結果及其歷史意義

廣州公社的存在期間不過三天，英勇的廣州工人不能開展他的革命事業。廣州暴動之中，羣衆的熱烈參加與英勇的鬥爭，都被反動勢力所摧殘了。雖然指導方面有很

多的錯誤。但是，廣州暴動的偉大意義是不可磨滅的。只有帝國主義的工具——社會民主黨和托洛斯基反對派才會說：『廣州暴動是純純粹粹的盲動主義，是絕對的軍事冒險』。共產國際六次大會說：

『大會認為將廣州暴動認做盲動的企圖是絕對錯誤的。廣州暴動雖是中國革命過去時期中中國無產階級之英勇的退兵時的一戰（*Arriergard Fight*），雖然指導方面有很大的錯誤，但是仍舊是革命之新的蘇維埃階段之旗幟』。

廣州暴動之中，我們看見的是：變軍閥的混戰為工農兵士羣衆反對軍閥的戰爭，革命與反革命的武裝鬥爭，中國無產階級領導農民兵士羣衆推翻帝國主義豪紳地主資產階級的階級戰爭。反革命各派各種勢力的聯合，超過了革命的勢力，戰勝了革命勢力。但是應當知道：廣州暴動已經是在中國無產階級受着三次鉅大的失敗之後，已經在許多次工農羣衆武裝反抗，以求保持革命勝利，要使革命轉入更高的階段，要推翻豪紳資產階級的反革命獨裁而建立工農羣衆的革命獨裁，而屢屢失敗之後。廣州暴動之前的這些鬥爭：廣東四月間農民的武裝反抗李濟叛變，湖南五月間的長沙撲城，



湖南湖北，九月間的農民秋收暴動，八月一日南昌暴動與葉賀南征……等等，都是中國無產階級保持革命而要使他進於更高階段的鬥爭，他是有完全的權利來實行這種鬥爭的。這些鬥爭的最高的表演，樹立新的階段之旗幟的，便是廣州的蘇維埃暴動。廣州暴動的失敗，不能不使新的高潮，屢次要想抬頭起來的新的高潮，受着最後的打擊，而廣州暴動的本身便成爲過去革命高潮之退兵時的一戰，同時，也使他成爲開闢中國革命的新的階段——蘇維埃階段之旗幟。

不僅如此，廣州暴動雖然失敗了，還有如下的政治結果及其歷史意義是不能磨滅的：

第一，城市中的蘇維埃政權第一次出現於中國及整個殖民地的亞洲；被壓迫及受列強帝國主義與國內反動勢力雙層剝削的民衆，用自己的力量把壓迫者及剝削者的統治推翻了，建設起自己的政權，這是世界歷史上的第一次。雖然廣州蘇維埃政權只保持了三天，而列甯預言在殖民地國家內進行蘇維埃革命的任務已經第一次見諸實行了。廣州蘇維埃政府不是紙上具文，而在事實上已經表現出東方民衆的偉大的力量與何

種政權真正能解放他們。廣州工農兵用自己的力量所爭得的政權，告訴全中國每個人，每個苦力，每個飢寒交迫的農民與被壓迫的兵士說：假使你們想勝利，你們必須在蘇維埃革命的旗幟之下奮鬥。

第二，中國新興的無產階級在廣州表現自己真正是革命的領導者。工人階級在一切困難爭鬥之中，勇往直前，儼然為一般爭鬥羣衆公認的先鋒隊。在上海暴動的時候，中國無產階級還是與國民黨共同行動的，但是在廣州暴動中，中國無產階級已經表現出他是一個獨立階級的力量，反對資產階級，反對帝國主義與封建殘餘，為工農民主專政，為蘇維埃政權而鬥爭。廣州無產階級已經可以在百餘萬人口的城市之中，奪取政權而支持至兩日之久。牠已經在全世界前面證明了中國革命往後的發展，一定要在中國無產階級領導之下。

第三，廣州暴動使無產階級與農民結為親密的革命聯盟。成千成萬的農民暴動，以前都仰望城市工人羣衆的幫助，現在已經成為工人暴動有力的響應者。在工人暴動的怒濤之中捲入了農民戰爭與兵士倒戈的巨波；在這一奪取政權的暴動之無產階級確

能領導起農民和兵士的力量。廣州蘇維埃的信用散布到全省最落後的地方去，傳佈到每個鄉村，告訴每個農民，只有在無產階級領導的蘇維埃政權之下，才能得到土地。再則廣州暴動之中，一部分廣州反動軍隊的兵士宣布不再作軍閥戰爭的工具去蹂躪民衆，開始破壞了反動軍隊的紀律，倒戈向資產階級軍閥進攻，在燦爛光明的蘇維埃旗幟之下，走向無產階級方面來。

第四，「八七」會議前的中國共產黨的機會主義的領導，使共產黨的獨立政治面目和獨立政治主張，不能呈現在廣大工農羣衆之前。廣州暴動在事實上表現出共產黨領導工農兵的偉大力量，提出爲工農兵本身解放的政綱，建立工農兵貧民自己的政權；因此，不僅全中國工農兵士羣衆因廣州暴動而認識了共產黨是中國革命的唯一領袖，即最反動的帝國主義的（如順天時報）和研究系的（如晨報）報紙，也不能不公開的說：「共產黨是有主義，有政綱，有羣衆的政黨」，「共產黨已經是中國政治舞台上的獨立的力量」，而深深地爲「無主義，無羣衆」的國民黨和奉系軍閥担憂着「赤禍之來，期或不遠」！

第五，資產階級和國民黨，特別是所謂「左派」的國民黨，經過廣州暴動之後，他們的醜態已經完全暴露出來了！汪精衛陳公博等自稱在廣州暴動失敗後三天之內，屠殺廣州暴動工人至五千七百餘人。這些喋血的所謂國民黨左派，在廣州暴動之中充分表現他是工農羣衆革命的死敵。他們的醜態掩藏不住了。

第六，廣州暴動不僅是中國革命中英勇的模範，而且牠真正的有全世界的歷史意義。廣州蘇維埃政權之奮鬥，自始至終成爲國際無產階級鬥爭之一幕。指導暴動的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支部之一。工農兵羣衆之奪取政權，不獨反對國內的剝削階級，並反對外國帝國主義的強盜們。廣州暴動已決定領導革命民衆直接反對國際財政資本在殖民地之統治，蘇維埃政府的政綱之主要的一點，便是與蘇聯聯合起來反對帝國主義。廣州蘇維埃政府在第一次宣言之中已經向世界各國覺悟的工人階級請求幫助。

帝國主義者對於廣州蘇維埃政權之出現極爲仇視。列強的駐粵領事都公開的幫助中國反動派，派船替他們運兵，以便進攻廣州。英國在華出版的報紙鼓吹撲滅蘇維埃的廣州。在廣州蘇維埃失敗之後，殘酷的白色恐怖之思想上與政治上的指使者，仍舊

在香港與沙面之內。國民黨的資產階級不知羞的完全降伏於帝國主義。國民黨在廣州暴動之後不特成爲中國一切反動勢力的總參謀部，而且是帝國主義強盜的直接爭鬥機關。帝國主義希望得國民黨之幫助，把半殖民地的中國變成完全的殖民地。國民黨因爲帝國主義者幫助他鎮壓下了蘇維埃的廣州，便向帝國主義者供獻下列的報酬：無人的槍決蘇聯在廣州領事館之館員，逮捕所有在廣州之蘇聯國民，宣布與蘇聯斷絕國交，凡是在國民黨地域之內的蘇聯駐華領事館及商業機關一概撤消承認，驅逐出境。這些行動完全與張作霖一樣。國民黨的資產階級在工農革命第一次露面之時，便破壞了民族解放運動的戰綫，而在廣州暴動之後，更完全的投降了帝國主義。蘇聯是他們主要的仇敵，因爲蘇聯幫助一切被壓迫民族反對國際帝國主義到底。

廣州暴動既然有這樣偉大的世界的歷史的意義，所以中國共產黨六次大會正式決定『廣州暴動』爲固定的紀念日。共產國際六次大會則更在告中國工農書裏高高估量廣州暴動的歷史地位，現在讓我引他的話來做我這章書的結論罷。

『廣州暴動已經深入勞動羣衆的意識之中，這是中國工人之偉大的英勇的模範

。將來廣泛的工農羣衆暴動，組織在列甯主義的澈底堅決的策畧之下的，得着國際無產階級之贊助的——必定要成爲中國之勝利的十月革命。

統一獨立的中國蘇維埃共和國萬歲！

受壓迫民族的暴動勝利萬歲！

世界無產階級革命萬歲！」

一九三〇年二月初稿

# 第五章 中國大革命中的各社會階級

## 第一節 中國地主買辦階級與帝國主義

一個國家內部的階級結構，是其政治組織的基礎。中國因為處在半殖民地地特殊地位，所以此種階級結構，比別國更為複雜。封建制度在別的國家，差不多早被摧毀了；但是中國封建制度的殘餘，直到現在依然保存着。中國革命第一個開刀的，就是封建階級，而第一個公開反叛革命的也就是封建階級。這個階級是最喜歡有人幫着他搶到大地盤以括地皮（軍閥），或者向外國借債而自己拿大回扣（買辦），以及握着統治權，沒有『暴民』造反，而『平平安安』過日子（地主）的。革命的刀鋒指到帝國主義，等於指到他的祖宗，他立即起來與革命為敵了。中國大地主的發展并不厲害，但是地主階級占有着大量的土地，對於農民的剝削非常殘酷，而且地主越小，他的剝削方法越兇惡。帝國主義的侵畧本是要破壞中國封建關係的，但是另一方面帝國主

義爲便利於它的侵略，却又轉而維持中國封建關係，結果中國封建地主階級對帝國主義的剝削竟發生利害與共的關係，而且帝國主義侵略中國，要組織操縱中國的經濟，必須有一種『中介』——就是買辦階級。中國買辦階級的來源之第一種，便是舊時貴族地主階級。中國軍閥的勢力，一方面靠外國帝國主義的扶助，另一方面則靠本地地主階級的奧援。中國軍閥代表一種社會政治的力量，統治了中國的大部分。中國軍閥的國家組織之存在，乃建築於中國半殖民地的地位上。帝國主義便和中國軍閥官僚的政府機關，地主，劣紳，高利貸商業資本等勾結起來以共同壓迫和剝削幾萬萬農民。因此使中國廣大無土地或缺少土地的農民，被逼得更不能不去受地主及重利盤剝商人等的奴隸待遇，及爲城市和軍閥，供給幾百萬苦力和兵士。所以推翻帝國主義的壓迫，消滅一切封建社會關係之殘餘，解放中國民族，國內社會關係之革命的變動，這些事都相互聯接着，成爲中國革命之整個的責任。

中國買辦地主階級根本上是反革命的。但事實上中國革命之中，在他最初的一階段，不但有民族資產階級參加，並且也有豪紳地主階級的『參加』。遠在五四運動之



前，商業化的豪紳地主階級，尤其是南方廣東等處的，便『參加』革命了。這是什麼緣故呢？這個緣故我在前面第二章中已經說到過，帝國主義的侵略，必然要使中國豪紳地主商業化，同時帝國主義爲着自己的利益，乃又保持這一階級在封建剝削的階段上，加強地方市場的發展，經過他來吸取中國農民的膏血。這些地方性的商業豪紳地主階級，利用急遽破產失業的農民（土匪）之雇傭軍隊，擴張了自己的政權；那時他們看見北洋軍閥正統治着中國大部分的地盤，外國帝國主義都承認北洋軍閥是個總的政治買辦——中央政府，帝國主義一切大的借款都只經過這個總買辦，於是他們不得不起來反對北洋軍閥。他們即使不能立刻取北京政府的賣國資格而代之，至少亦要割據一方，要求帝國主義御賜的剝削中國民衆膏血權利之一部分，要求分潤帝國主義給與北洋軍閥賣國賞金之一部分：例如列強帝國主義承認北京政府，所以將『關餘』給他，那時廣州政府便說，至少我也要一分，——『請把粵海關的給我罷』。直到一九二六年廣東北伐，也仍然有一部分南方軍閥買辦地主（例如桂系軍閥等）躲藏在『打倒軍閥』旗幟之下『參加』了革命，自然客觀上當時廣州政府與一九二六年北伐都負

着革命的任務，但是這些南方軍閥地主的目的却並不是來革命，乃是爲搶奪賣國的資格和權利，中國豪紳地主階級是如此這般來『參加』革命的。

再則，前面已經說過，中國軍閥的勢力，一方面靠外國帝國主義的扶助，另一方面則靠本地地主階級的奧援。發生這種制度的原因便是因爲中國農民羣衆破產失業急遽而廣大，正式軍隊容納不下，於是便弄得遍地皆匪，而匪的首領便是當地的大豪紳，豪紳可以替土匪買槍走衙門。這種豪紳率領下的土匪往往不搶本地而『向外發展』。國民黨式的軍閥，大部分便是這種性質。中國社會巨大的『游民化』——造成二十年來的兵匪現象，這是帝國主義侵略的結果，也是反帝國主義革命巨大開展的原因之一。如此生長而向外發展的無量數的小軍閥——豪紳地主性的軍閥，居然也會在孫中山『領導』之下來『參加』革命。這是客觀的事實，這是因爲整個社會經濟崩壞的結果：這些豪紳地主都和地方市場上的商業資本，尤其是貨幣資本 (Monetary Capital——錢莊當舖等) 有密切的關係，全中國的這種商業貨幣資本有集中的積聚的趨勢，他內部的競爭傾軋非常之劇烈，破產而失業的數量也非常之鉅大。這些鬥爭，大半

是以地方同鄉團體或其他宗法社會關係（如同姓，親戚，同學等）的團體之互鬥來表現的。豪紳地主階級所以成爲一個階級，只是因爲他們共同維持着半封建性的對於工農的剝削制度。過此以往，他們內部的鬥爭是複雜到萬分的。二十年來中國各省小軍閥的互爭，就是這種表演——四川福建是最明顯的例子。國民黨的『革命』，——表面上雖然是資產階級的代表蔣介石在精衛來領導，但是事實上不能不是『尾大不掉』的領導，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只能靠着收拾這些豪紳地主階級的軍隊來『革命』。所以國民黨的軍隊之中，分着廣東派廣西派湖南派馮玉祥唐生智閻錫山以及其他七系八派等等無數的派別，派別之內又有派別，就是蔣介石的黃埔軍隊也已逐漸同化於這些性質的軍隊。這些派別，各自都要伸張自己的軍隊，各自都要向外發展，擴充地盤。他們之間的衝突矛盾混戰是不能解決的，除非兵士羣衆起來推翻他們，起來與工農聯合自覺的參加革命，根本解決中國的土地問題。

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國大革命，的確使封建勢力受到很大的打擊，動搖到封建勢力的基礎，可是因爲資產階級的叛變，革命的失敗，封建勢力又相當恢復起

來；農村中依然布滿着封建關係之殘餘，阻礙着中國整個經濟之發展。自然這種封建勢力的暫時恢復，只是一種『回光反照』的表現。暴烈的土地革命鬥爭，從一九二七年到現在繼續的爆發，工農的紅軍在農民鬥爭中一天天生長起來，蘇維埃運動一天天擴大起來，他的前途，將要得到正在復興的城市工人階級鬥爭的領導而走向最後的勝利，以澈底掃除中國封建制度的殘餘。

## 第二節 中國大革命中的民族資產階級

『愈往東方，資產階級愈卑鄙，愈往東方，資產階級由革命跑到反革命的速度亦愈快』。中國資產階級在前一時期革命階段中，也曾參加過革命鬥爭，也曾參加過初期的反帝國主義的革命，可是牠的革命性是很有限的。牠不但不能贊同農民的土地革命，並且不能夠澈底實行反帝國主義的革命。

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發展的歷史本來很短，直到五四之後，民族資產階級才漸漸抬起頭來。國民黨改組是在五四之後，學生工人羣衆的革命運動的結果，是革命勢力一

「民衆的革命勢力之集合。那時資產階級漸漸的覺到自己的力量。尤其是五卅之後，民衆革命行動大大爆發，共產黨獨立的組織與影響大大開展，於是民族資產階級勇敢起來了，公開的參加革命。他同時感覺着兩件『新玩意兒』，以前所沒有的玩意兒：一是他可以利用民衆力量去反對帝國主義爭取革命領導權了；二是民衆尤其是工人階級的獨立行動和組織對於他太危險了。這是矛盾的兩件玩意兒，但是這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八字』矛盾，說句笑話便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中註定的矛盾。當民族資產階級，只估計自己的力量，他是太弱了。同時他又不願意無產階級及農民羣衆的革命力量醒覺起來，然而等到他看見已經有組織好的革命力量，可以利用來反對帝國主義，那他就更加勇敢了。敢於提出比較堅決的要求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到五卅前後是怎樣的勇敢起來呢？那時他與豪紳地主買辦階級分化已經比較明顯了，他一開始便比較勇敢的贊成國民黨改組。爲什麼？因爲他要取得國民黨軍隊的領導權，他模糊的懂得可以利用黨權來支配軍權。黃埔軍官學校的作用，對於民族資產階級是如此的，軍隊中的黨代表和政治部制度也是如此的。三月二十日以前國民黨改組以後，汪蔣國

民政府時期，民族資產階級與工農小資產階級的若即若離的聯合，其意義正是他爲取得軍隊起見，要利用種種『赤化政策』與豪紳地主階級爭取軍隊的領導權；同時，也就是與工農小資產階級爭取國民黨領導權之準備，民族資產階級是如此這般的參加左派的。在這時期之中，若即若離的聯合，最明顯的表現於西山會議派的聯蔣倒汪的政策。西山會議時期（孫中山死後至三月二十日）的形勢是：民族資產階級已經造成一部分兵力，在兩次肅清東江之後，蔣介石的地位提高起來，當時在他面前有兩個嚴重問題：一是五卅後粵港罷工的極偉大的羣衆的反帝國主義運動，二是廣東已經開始的農民運動——土地革命。民族資產階級當時對於反帝國主義是贊助的。是要利用的；對於土地革命是反對的。當時事實上土地革命方才開始，形勢並不緊張，還只有農民運動，而沒有直接提到土地問題，至多還是農民與豪紳開始爭奪地方上的實際政權；那末，民族資產階級對於這種農民運動是『中立』的，然而提到土地問題的本身，他便不能不堅決的反對了。『汪精衛於民國十四年六月沙基慘案後，在廣東對鮑羅庭十二分奉承意旨的時候，鮑羅庭叫汪精衛起草一篇主張用土地革命政策的議案，託孫哲

生先生帶到上海和許多中央執行委員商量，後來幸被戴季陶先生等打銷了。」（見國民黨『中央半月刊』第十三期劉盧隱的『革命與反革命』）。

總之，廣州國民政府時期，直到一九二六年一月的國民黨第二次大會，是民族資產階級拿着自己的妥協政策如『單獨對英』『希望日本人回東方來』等口號，參加反帝國主義的革命。他一開始便站在革命與反革命的交界點。他對於豪紳地主階級已經漸漸開始變更策略：以前他曾經加入左派，藉以反對孫大元帥的舊部——黃埔以前的『革命軍隊』，現在自己有了軍隊，但是力量還不够，他可以並且必須用縱橫捭闔的手段，利用豪紳地主階級的勢力，以逐漸團結將來反革命的豪紳地主資產階級聯盟。他在當時固然還是動搖猶豫於兩方勢力之間：一方面是工農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浪潮，別方面是豪紳地主階級反革命的開始。戴季陶出席西山會議，隨又偷偷的逃席，這件事是當時民族資產階級的寫真。然而客觀上說來，聯蔣倒汪的策略，顯然是豪紳地主階級利用民族資產階級的薄弱，利用他不能獨立克服他所願意抑制的工農小資產階級的革命勢力與左傾政策，而來勾結他，奉承他，擁護他做右派與左派爭國民黨領

導權的領袖。民族資產階級以爭軍隊的手段，爭取豪紳地主階級式的新軍閥在孫大元帥政府之中實際政權。廣州國民政府的成立，應當如此說明。國民黨第二次大會的『黨權』將近完成這一鬥爭。但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不獨沒有獨力反革命的力量，並且也沒有獨力革命的力量呵！廣州國民政府的成立，廖案以來革命左傾政策，都在無產階級以至農民羣衆鬥爭大發展的背境之上。這時代民族資產階級是借着工農小資產階級羣衆的力量，提高自己的地位，打擊豪紳地主階級。革命的發達，使領導權日益落到工農小資產階級方面來，民族資產階級在革命聯盟之中日益感覺到：自己所利用的羣衆力量及國民黨的『黨權』快來利用自己了。所以國民黨第二次大會，事實上已經是汪精衛的領導了，——工農小資產階級及資產階級的革命聯盟已經達到頂點了。這時候西山會議開過了，右派要求開除汪精衛，同時已經對蔣介石說過：你被利用了！當然，那時帝國主義的勸告和警告也很利害了。聯蔣倒汪和『優秀華人』的贊賞是同時並進的。於是民族資產階級與豪紳地主階級一度分化，一度爭奪軍權之後，急於轉變而爲聯合豪紳地主階級，洗刷自己身上的『赤化』，而與無產階級爭領導權。確言之，



便是更進一步的取得小資產階級而鞏固自己的領導權。三月二十日政變便在這基礎上發生了。他是如何取得小資產階級的呢？他是否以「對小資產階級讓步以鞏固聯合戰綫爲政策」呢？不是的！他在這種問題上，並不犯着他們自己的「機會主義」，他是以打擊小資產階級的手段去取得小資產階級的。三月二十日之後，甘乃光陳公博等左派紛紛投降蔣介石和李濟琛，汪精衛是臨陣脫逃，是被驅逐了。蔣介石雖然曾經抑制西山會議派，但是他的三月二十日政變，在政治上是得着西山會議派以及戴季陶葉楚傖邵元冲孫科等的助力。民族資產階級開始革命，是必須得着工農小資產階級羣衆的力量，甚至於短期間聽他們的領導，聽世界無產階級的領導（一九二五年底西山會議時期，蔣介石曾經說過：中國革命必須受第三國際的領導，並說「聽鮑羅庭的話，就等於聽總理的話」）。民族資產階級開始反革命，也是不能缺乏豪紳地主階級的助力以至於領導。

五卅之後，工農小資產階級的革命運動，得着一個中國歷史上空前的總動員。民族資產階級大大的勇敢起來，他僅有的那一些些兒革命作用充其量的表演出來。他要

踏在工農小資產階級羣衆的頭上，來取得政權。於是黨政府便應運而生，——廣州國民政府成立了。可是，羣衆的頭也不是好踏的！當羣衆擁進國民黨，左派汪精衛等大唱其黨權，由國民黨中央委任國民政府的時候，這一政府對於反帝國主義運動的確具有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作用，但是他對於豪紳地主以至於資本家，却是很脆弱的保障者，他不但沒有權利壓迫工農，他並且『放縱』工農羣衆的階級鬥爭。於是豪紳地主大大反動起來。於是資產階級也動員了，他對豪紳地主說：汪精衛是赤色帝國主義的走狗，我來保護你。從此三月二十日政變及五月十五日的黨務整理案出來了。民族資產階級以『黨權』抑制豪紳地主階級的『軍權』之後——國民黨第二次大會之後，他進於建立自己的『軍權』（三月二十日）和奪到自己的『黨權』（五月十五日）的階段了。

可是國民黨的黨權是什麼呢？他不是民族資產階級的力量所能創造的，他是工農小資產階級的羣衆力量所能創造的。五月十五日之後，客觀上中國革命繼續五卅運動急轉直下的發展，民族資產階級的『革命作用』，在他開始『反革命作用』之後，却

還沒有完結。工農小資產階級羣衆的革命力量正在發展澎漲。北伐從一九二六年七月一日宣言，七月底蔣介石出發，十月十日佔領武漢，這時期『民族資產階級還和左派與共產黨結成聯合戰綫，因為如果沒有國民黨左派及共產黨之有力的贊助，便沒有繼續作戰之可能』（共產國際雜誌第七十一期，一九二六年十二月社論『中國革命與共產黨之任務』）。民族資產階級在這期間顯然是抱着軍事的進攻政策，企圖在北伐過程之中，擴大的社會基礎和軍事力量。

中國革命對外的任務，是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當中國革命在工農羣衆急劇的發動之中而進展的時候，帝國主義的特權受着了很危險的打擊；最明顯的例，便是漢口九江的租界由武漢九江的工人苦力收回了。當這種時候，帝國主義以全力來反攻，他們派大軍鎮壓上海漢口，以武力干涉相恫嚇，以經濟封鎖來鉗制，砲擊南京，封鎖長江，這正是『四一二』慘變以前的事情。當時，工農運動的爆發，戰爭的擴大與延長，交通的阻隔之中，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再受着帝國主義政治上經濟上的威逼鉗制，他唯一的出路，只有反革命，只有投降帝國主義，去做新走狗。帝國主義乘機反攻，在

金融上商業上政治上的進逼，並不是逼着中國資產階級更革命些，而是逼着他決然的反革命，逼着他向中國工農進攻。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一方面受着封建階級限制其經濟發展，又遇着帝國主義，以更厲害的資本，排擠他的資本，并且帝國主義還與封建勢力聯合着維持舊的經濟制度，維持不平等的束縛，給他大大的不利，所以他在反帝國主義反封建的革命開始時，曾經參加過革命，工人階級在向帝國主義爭鬥時，他曾加以贊助過，因為他很想利用工人階級的力量打擊一下帝國主義的勢力。但是他自己的工廠裏也有工人，這些工人與外國廠的工人，一樣要吃飯穿衣，一樣要改善生活的，他們看見外國廠中的工人生活改善了，當然也會團結自己，並且要求改良生活；而且這種鬥爭，在同時可以更強大工人的力量，更積極工人反帝國主義爭鬥的，但是民族資產階級看見自己也要吃虧，而且看見工人階級力量的膨大於己不利，於是戴季陶主義與三月二十日事變相繼出現。

加以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多半都從買辦地主蛻化而來，與豪紳地主階級有很密切的關係。那時革命的浪潮已經走到開始土地革命的時候，農民在湖南湖北廣東都起來

奪取政權和土地。雖然剷除封建勢力，是大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的，然而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却不能和農民聯盟，以澈底肅清封建殘餘和帝國主義；相反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却甯可和豪紳地主階級聯盟來反對工農革命勢力，以保存封建殘餘，維持帝國主義的統治。這是因為中國經濟的主要成分是地主豪紳對於農民的剝削，而中國鉅商資本家銀行家工業家的主要贏利的大部分，都是與剝削農民有關的。豪紳地主和工業資產階級在經濟上也是勾連着，結了不解之緣。土地革命的浪潮一到，即使沒有帝國主義反攻進逼的原因，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也必然要完全走到反革命的道路。

因此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特性一方面使牠參加民族革命，同時又時時選擇機會以便掉轉頭來限制束縛以至於破壞工農運動。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雖然薄弱，但在最近十幾年來，特別是在歐戰期間，終究得到了相當的發展，而且中國是處於半殖民地的地位，中國民族工業獨立的發展與帝國主義的利益有不可調和的矛盾，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受着外國資本的壓迫，他是想關稅自主，想取得帝國主義多少的讓步。他當初想利用工農民衆力量去嚇嚇帝國主義，他也會喊幾聲『世界革命萬歲』。這時候他便想同

時和帝國主義磋商得些讓步。帝國主義方面表面的讓步是做的！但是他同時以威力壓迫中國革命，威迫中國資產階級替他鎮壓工農。工農民衆力量的發展也正在根本掃蕩着中國的封建式的剝削，動搖着資本主義的壓迫。中國資產階級想着：他如果鎮壓了工農，一則可以自救；二則可以在帝國主義之前邀寵，帝國主義可以因爲他們已經反赤，而實行應許的讓步。於是經過一些事變的過程，結果資產階級便公開轉到反革命的營壘中去，在帝國主義支配之下，建立了豪紳資產階級的反動統治，這種變動證明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根本不能澈底執行民族革命的任務，只能囿於自己狹隘的利益，然而結果還是投降帝國主義，這便是中國大革命失敗的客觀困難之一與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參加民族革命的結局，因此絕對不能像取消派陳獨秀先生們所說：「中國一九二七年之革命，無論如何失敗，無論如何未曾完成其任務，終不失其歷史的意義，因爲他確已開始中國歷史上的一大轉變的時期；這一轉變時期的特徵，便是社會階級關係的轉變，主要是資產階級得了勝利，在政治上對各階級取得了優勢地位，取得了帝國主義的讓步與幫助」。其實中國大革命失敗之後，只有封建勢力得着暫時恢復和帝國主

義得着對華侵略重新鞏固的地位。雖然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並不因此就完全放棄他自己的民族改良主義的政綱，但是這一政綱的本身只是一種經常與帝國主義妥協的政策，實際不能不使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屈服於帝國主義之下。帝國主義指揮了幫助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與封建殘餘暫時打退了中國工農革命，但是却不能幫助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去進行什麼經濟的建設與政權的穩定呢！取消派陳獨秀先生們由馬克思主義的信徒變成資產階級的歌頌者，但是他們的論調完全經不起事實的一擊！

## 第二節 中國大革命中的小資產階級

因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發展緩慢的關係，所以小資產階級便十分衆多。這一階級在中國大革命中也處着相當重要的地位。在中國大革命的第一時期，即工農小資產階級及民族資產階級結合民族革命聯合戰綫時期，中國小資產階級自然是革命的力量，而且有些還曾被革命春潮擁到威權山頂上去過；到第二時期，民族資產階級公開反革命以後，工農小資產階級聯盟即武漢時期，中國小資產階級的根性必然是動搖和猶豫

徘徊於互相鬥爭的階級及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無產階級如果沒有堅定的政策，小資產階級就容易跟着資產階級走，武漢政府的反動，一方面亦就是這種表演。

中國小資產階級有很大的數量，其中下層羣衆如手工業工人店員及一般城市貧民等，因為他們自己經濟狀況的關係都很需要革命，在過去大革命中他們有過很大的作用，以後也還是一種革命力量，無產階級應該堅決的領導他們。青年學生羣衆大部分都是小資產階級成分，他們因為受着帝國主義與國內軍閥政府壓迫及對社會種種不滿的關係，對於中國大革命會盡過很大的責任，甚至有一部分先進分子還加入過工農暴動的隊伍；但也正因為他們是動搖的小資產階級，自己根本沒有獨立立場，所以革命迅速發展，社會階級強烈分化的影響，於是反動的反動，畏縮的畏縮，脫逃的脫逃，許多從前參加革命的青年學生便都從革命戰綫中脫走了。自然資產階級叛變，革命失敗的結果，一般貧苦青年學生羣衆所要求解決的問題一個沒有解決，所以仍舊須要繼續革命，只要無產階級政黨及青年團能够用正確的策略領導他們。

至於店東小廠主以及所謂中小商人等上層小資產階級則有他們各種特性，他們在



工商業發展的區域裏，常常經過股份公司等等和資產階級的剝削發生關係。而且工商幼稚向中國，這些小資產階級一方面不能在城市之中得很多贏利，別方面中國經濟崩敗而失業衆多，逼着農民忍受極多極重的剝削，只能接受極苛刻的租田苛約，負擔極重的債息；因此這些小資產階級拚命的安頓自己的資本到土地上，買田買地，放高利貸去剝削農民，所以中國小資產階級有很多兼做小地主。同時，店東小資產階級對於店員手工工人，也因為自己處於極困難的競爭擠軋之中，剝削的程度往往比大資本家工廠主，還要厲害；他們比大資本家更不能容忍什麼勞動運動。因此種種，無論小資產階級店東廠主，如何受着帝國主義的壓榨，受着大資本家豪紳地主的壓迫，新舊軍閥政府的苛捐雜稅，但是他們的「革命性」是有限的，他們一遇見農工的劇烈的鬥爭，一遇見真正澈底掃除中國的土地剝削制度的革命高潮，一遇見侵資本主義的階級鬥爭，他們便甯可去投降帝國主義，去受豪紳資產階級的壓榨，轉過來替他們當走狗。這種店東小資產階級，在武漢政府反動時期，就明顯的成爲豪紳資產階級統治的擁護者。他們可以有時候反對這種統治，不滿意這種統治，可以做動搖變換的各派軍閥

豪紳資產階級統治互相爭奪時的某一方面的工具，但是他們更堅決的反對土地制度的變更。反對勞動運動。

土地革命之中，以及一般革命進展的過程中，希望與店東小資產階級妥協，希望這種小資產階級成爲一個革命的力量，——這都是使機會主義的發源的幻想。這裏我們可以簡單的說一點事實。當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破裂聯合戰綫的時候，那豪紳地主階級內部各派各系之互鬥，也在甯漢分裂戰爭的掩護之下，雙力搖着新式的旗幟進行。因此，當時南京所形成的反革命中心，是以民族資產階級做領導，結合東南的豪紳地主階級，復以革命的口頭禪及種種虛偽欺騙政策，對外抗爭的激昂態度（僅僅態度而已！）等等，去征取上海暴動期間革命熱情正衝動的小資產階級，以進攻無產階級及農民的革命鬥爭。同時，當時武漢所形成的革命中心，應當是無產階級領導的工農小資產階級聯盟的形成，應當在劇烈鬥爭的過程之中去提高并保障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去抑制以至排除武漢內部的資產階級豪紳地主的勢力，而力爭民權獨裁之實現。甯漢的分裂，並沒有剴然分明的使武漢之中立刻實現純粹的工農小資產階級的聯盟。當

時的武漢之中，不但有資產階級的勢力，並且豪紳地主階級還握有極大的權力。武漢內部的鬥爭，和武漢與南京的鬥爭，有同樣的社會內容，就是工農的徹底的民權革命與豪紳資產階級的背叛革命相鬥。武漢內部的分化，在武漢政府尙未完全成功的時候，便已經開始。小資產階級大言不慚，而在行動上却懦弱無能，且怯於冒險犧牲，他們的商業交易和他們的金錢出納之小規模性質，特別容易影響到他們的精神，使其缺乏堅定性與進取心，當然類此的性質也反映在他的政治事業上。武漢領袖在當時，真是『所能見到的，只是責難太多了。他們的朋友，他們在企業界的親戚，以及據有土地의豪紳，都對他們警告，這使懦弱的他們發生恐懼。』（美國NATION週報，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七號）。反對蔣介石李濟琛的唐生智軍隊，湖南的豪紳地主階級的勢力，同時對工農進攻，勾結湖北的資產階級之孫科等等也向工農進攻，他們的背後有帝國主義和蔣介石的封鎖政策督促着。小資產階級尤其是店東小資產階級，是在豪紳資產階級率領之下而恐懼動搖。當時就是共產黨的中央以及地方指導機關，也跟着小資產階級動搖，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其結果不是無產階級領導農民之廣大的熱烈的鬥

爭，領導小資產階級去革命，而是小資產階級要領導無產階級去抑制農民的鬥爭，去停滯革命，以至於出賣革命。這是不是工農小資產階級聯盟的實現？當然不是的！這一聯盟是受小資產階級的動搖妥協以及共產黨機會主義的指導機關的妥協而惡化了，而喪失其革命性了。武漢政府的反動，中國革命中心的消失，小資產階級離開革命而動搖，當然是革命暫時失敗的又一表現。此時小資產階級的店東，他們怕革命，比怕反革命還要來得利害。他們夢想着祈禱着『資本統一戰綫』的勝利，以反對手工工人店員的進攻。小資產階級受着帝國主義豪紳資產階級的威脅，日漸惶恐失措，最後終至屁滾尿流。夏斗寅五月十七日的叛亂，許克祥五月二十一日長沙政變，更將他們嚇得失去神智了。『夾攻中的奮鬥』，是汪精衛反共後的名文，其實小資產階級當時早已在夾攻之中了：一方面帝國主義豪紳資產階級握有經濟的樞紐，小資產階級處處受着他們的挾制；別方面工人店員農民的革命運動客觀上形成『第二政府』，又使店東小資產階級的利益受着很大的威脅。他們在這種夾攻之下暴露了他們懦弱無能之後，便滾入反革命營壘中去了。

再則，中國的社會階級本來還有一種特性，便是破落戶的小紳士也是小資產階級。他們在幾百年來中國式的專制政體之下，同時又在非世襲的閥閱制度之下，他們在穿長衫體面紳士之中也可以列名，儘可以於中國式的地方政權中，享受些半貴族式的特權。因此他們在北方軍閥大買辦階級統治之下，他們不反對打倒土豪劣紳的口號，因為他們自己算是『正紳』，並且歡迎這種口號。等到平民羣衆真正起來打倒土豪劣紳了，『打倒土豪劣紳』的口號，被幾十萬工農羣衆輕輕加上一句『有土皆豪，無紳不劣』的註解，那就不得了了，天翻而地覆了。工人店員的要求本來並不過火，農村鬥爭本來還沒有發展到應有的激烈程度，然而小資產階級却有不少因此狗急跳牆的反叛革命了！

#### 第四節 中國大革命中的農民

中國革命從無產階級躍登政治舞台之後，尤其是『二七』以後，已經引導農民羣衆的鬥爭走向新的階段；一九二四年以來，農民運動從減租減息的運動發動不到兩年，便

急轉直下的到了政權的鬥爭，到了爭土地的鬥爭。一九二七年一年，尤其可以說是全國普遍的農民暴動的一年；雖然他們還是互相隔離，還是此起彼落的發動，還不能集中聯合起來，因此也沒有能得着大範圍的勝利。但是農民羣衆在鬥爭中已經不是處於完全孤立的地位（這是從前中國以至西歐歷史上許多農民暴動失敗的最大原因之一），已經有一個可以依靠及可以領導他們的堅固而忠實的同盟者（無產階級），他們的傾向與要求也已日漸明顯起來：廢除苛捐雜稅，打倒土豪劣紳，並且要求羣衆自己的革命政權之建立，要求澈底肅清中國封建制度的殘餘，改變舊的土地關係。農民之中不但一般佃農要求土地，貧苦不堪的自耕農也要求土地，尤其是失業的貧民苦力要求土地十分逼切。他們同時要求取消一切債務，剷除一切豪紳地主的權力。中國豪紳資產階級的剝削（重租重債等等），軍閥的戰禍，帝國主義買辦商賈的搜括，使極大多數的農民羣衆窮苦萬分，即使是自己有幾畝田地的，也都簡直不能生活。土地問題的解決是萬分的緊迫。中國經濟生活中還有一個非常之大的問題，就是帝國主義搜括原料，輸入商品，製造軍閥的戰爭，使極大多數的農民迅速破產；但是工廠之中却不能容

納這些「勞動後備軍」，於是他們大都變成所謂「游民」「土匪」以至於兵士。這些一切情形前面第二章第二節都已詳細分析過。這種鉅大數量的游民，要求解決他們的生計問題，客觀上也是要求土地和工作。二十年來，軍閥豪紳一直用戰爭屠戮來延宕這一問題。但是廣大農民羣衆既然得着無產階級的贊助和領導，便不能不看見自己的真正出路：實行土地革命。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間農民運動公開的時候，吳稚暉胡漢民汪精衛顧孟餘等，就痛罵流氓地痞的農民運動，痛罵甚麼「二十世紀的張獻忠李闖」，正是因爲農民運動之中失地失業的貧民站着最積極的地位。

事實上中國大革命之中，農民羣衆的革命力量是很偉大的，大革命中最有力量的，除了無產階級，就是農民羣衆。一則中國農民羣衆有極廣大的數量（百分之八十），二則他們的經濟政治地位趨使他們不得不勇敢鬥爭。在一九二六年整個北伐戰爭的過程中，湘鄂贛等省的農民羣衆大都直接參加作戰，廣大農民羣衆的鬥爭實際上是當時北伐革命戰爭勝利的重要原素。農民協會的發展真是一日千里，到一九二七年三月間，湖南一省農民協會的組織居然發展到一千萬以上人數的廣大範圍，很多地方農

民協會事實上都變成第二政權。革命向前發展，減租減稅的口號都已不能滿足農民羣衆的要求，一九二七年開始以來，農民的土地革命，尤其是在湖南，已經激急的進行，有些地方農民都自己動手沒收地主的土地，有些地方則插標預備田地的分配。武漢政府的迅速反動，直接便是土地革命深入的反映。

武漢政府反動之後，土地革命的鬥爭仍然是突飛猛進，馬夜事變首先激起湖南幾十百萬農民羣衆直撲長沙的英勇奮鬥，此次英勇的行動如果不被當時共產黨機會主義的領導所斷送，毫無疑義的要成爲國民黨新軍閥許克祥何健等反叛革命嚴重而且實際的答覆。其後整個國民黨公開反叛革命，用極野蠻的手段屠殺農民羣衆，秋收暴動還是到處爆發；農民游擊戰爭，殺戮豪紳地主，沒收土地的行動還是如火如荼的進行，特別是十月間的廣東海陸豐等處農民暴動獲得勝利，真正實行沒收地主土地，根本剷除舊土地關係，推翻豪紳地主統治，第一次建立起蘇維埃政權。

總之，一九二七年特別是廣州暴動前後，中國許多省份的農民暴動與游擊戰爭，實在充分表明中國農民運動高漲的形勢。如許多地方蘇維埃政權的建立，奪取並分配



地主土地，消滅鄉村統治的地主豪紳等。當時這種農民運動的範圍不但展布到江浙等地，而且一直蔓延到中國北部與滿州（直隸京東玉田暴動與奉天刀匪暴動等）。當時特別顯著的情形，是農民運動的帶地方性與不平衡發展，這一方面有它的客觀原因，如地方經濟遼闊，交通的不發達與各地經濟情形的差異；另一方面實由於農民羣衆的散漫與缺乏組織性，以及中國共產黨對於農民運動缺乏集中的指導與配合。

同時，當中國大革命中全國各地農民羣衆所表現出來的要求亦顯有差別。在中國南部與中部一帶如廣東湖南湖北江西等處，無地的農民佔鄉村人口大多數，其鬥爭的主要的方向在於反對地主階級，奪取土地與奪取政權的問題。在北部如河南山東直隸滿州等處，則大半爲小的自耕農，其鬥爭的方向，大都爲反抗軍閥官僚與豪紳等的苛捐雜稅，反對軍閥拉夫派款等的剝削和打倒軍閥政權，這就是破壞封建土地關係的另一方式。當然，同時在北方亦有佃農奪取地主土地的鬥爭，不過主要的還是自耕農保持實際的土地所有權的鬥爭，廣大農民的組織也多半還是停留在原始的半封建的紅槍會大刀會等形勢之中，農村的階級鬥爭還不激烈，鬥爭的領導還操在中小地主與富農

的手裏。

中國農民的上層分子（富農），一般的說不是純粹的鄉村資產階級，而是兼有或多或少之半封建半地主的剝削。所以中國富農與俄國富農有不同的社會實質。俄國富農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以前，代表着農村的資本主義的關係，與地主階級處於完全對立的地位，因為地主的經濟勢力完全建築在封建剝奪上。中國富農在大多數情形之下，都是些小地主，他們時常用更野蠻更殘酷的條件以剝奪農村中之大多數的基本羣衆。中國富農之這種社會實質是由許多原因造成的。在這裏，外國資本的統治自然有不少的作用。很明顯的，在中國這種半殖民地國家中，外國資本扶助與利用這種落後的半封建的關係，使這種東西服從它的統治。外國資本阻礙着中國農村經濟之資本主義的發展，這種阻礙作用使農村中因商品貨幣經濟而發生的階級分化，表現着各種奇怪的形勢就是由於保存着農村經濟之半封建式的關係。在這裏再加中國土地關係的特點（參看前面第二章第二節之三三項），使中國富農應用僱傭勞動所得利益反不如對農民羣衆用半封建式的剝奪。中國的富農，將土地出租兼放高利貸資本，在經營自己

經濟的時候，不願將資本用在改良土壤及整頓水利上，他要使自己免除軍閥戰爭及一切破壞的責任不受飢荒的痛苦，將這些條件所造成的重担，一併放在佃農羣衆的肩背上。中國農村中之過剩的人口，大多數農民沒有充分的土地，使富農以及一切地主，可以利用其資本與私有的土地以施行野蠻的佃租與高利貸的掠奪。因此，進行自己的經濟租取土地，應用僱傭勞動而努力生產的富農，在中國却實非常薄弱。中國富農之另一種形式便是半地主。依據這種特質，所以中國富農分子在農民運動初起的時候，還可參加反軍閥反豪紳地主的鬥爭，但是他就極力想奪取這一鬥爭的領導權。到了土地革命深入的時候，尤其是在鬥爭失敗的時候，便很快的而且公開的站到反動勢力方面去而反對農民羣衆鬥爭，另一方面雇農貧農反對富農的鬥爭，也已經日益激烈起來。由於不了解中國富農這種社會實質，因此發生聯合富農的機會主義的策略，這實在是很嚴重的錯誤。其實在中國革命鬥爭條件之下，不僅對於半地主式的富農應堅決的與之鬥爭，就是對於在中國比較少的這種自己進行生產的富農，也是要一樣的應用。對於他們，黨同樣不能放鬆了雇農的階級鬥爭，無論如何不能使自己活受富農態度的

支配，我們在行動中不能對於富農有任何一些的讓步。這才是正確的無產階級政黨的  
策略。

## 第五節 中國大革命中的無產階級

中國無產階級處於帝國主義及軍閥資本家數重壓迫之下，他的鬥爭一開始便是革命的，一開始便是政治的，不但是一階級的階級鬥爭而且是中國民族革命的先鋒。從一九二一年工人運動的發生以來，工會的組織運動，罷工運動，表面上看去似乎是工人階級的經濟鬥爭；實際上呢，這些運動緊跟着五四以來的排日民族運動而來，足見是當那商人學生的鬥爭疲弱下去的時候，獨有工人階級繼續着革命的鬥爭——反對各國帝國主義，反對軍閥資本家，海員罷工，唐山罷工，京漢罷工，先後繼起，的確給國內國外的反動勢力以重大的打擊，這一時期，差不多可以說民族運動之中只有工人階級的階級鬥爭。因為工人階級鬥爭的猛進，國內的民族革命運動便漸漸有興起的勢頭，於是資產階級也跟着抬起頭來。同時軍閥和帝國主義也很知道：如果能够摧殘了

這一支生力軍——職工運動，其餘的什麼商會，什麼民意都不足懼了。因此，京漢總工會被封時的大罷工，受了二七屠殺的大打擊而失敗之後，不但北部鐵路工人的工會完全受摧殘，不但全國的職工運動都受着鎮壓而趨於消沉，而且不過半年，直系軍閥和英美帝國主義的勢力一天天高壓下來，曹黨驅黎，賄選成功，全國各階級都屈服在軍閥淫威之下，而且接着便暗助陳炯明以全力圖粵，以謀摧殘當時民族革命的根據地——廣州政府。總之，這一時期，因為工人運動受軍閥的鎮壓而消沉，其餘一切進步的解放的爭自由爭民權的運動，都連帶着而鎮壓下去，這是二七以後兩年來的事實。

二七之後，中國工人階級的職工運動雖然表面上有一時期的沉寂，然而實際上各地的工人運動仍舊不斷的向前進行。客觀上的狀況稍稍鬆動，工人階級便開始反守為攻的鬥爭。湖南水口山鑛工工人的罷工，北方鐵路工人的全國鐵路總工會運動前仆後繼的發展，江浙手工業工人，上海紗廠，紡織業，烟業的工人，也是屢起屢仆的和中外資本家奮鬥，雖然結果大半失敗，然而二七以後中國工人階級的覺悟却在增高，全國工人階級的團結力日益增進。加以陳炯明的猛攻廣州的時候，南方勞動階級都積極

的資助革命勢力反抗這一帝國主義的工具；陳炯明失敗之後，廣東方面的工人運動便得着些公開的可能——工人代表會組織成功，工人反帝國主義的行動日趨激昂，由民族意識而進於階級意識的傾向日益鮮明（沙面罷工，反抗商團等）；海員工會加入太平洋運輸工人的組合。南方民族革命運動因有工人階級的這種積極參加，力量便一天天增長起來；南方的職工運動本身又在向前發展，這兩方面的潮勢自然也影響到北方來。於是在這中國民族的總鬥爭日漸興起的時候，工人階級自然力求奮起而領導他。一九二四年以後，北方職工運動雖然沒有得着急進的機會，然而職工運動反守爲攻的趨勢和民族運動的興起，大致有同時並進的形勢，到一九二五年二七紀念節全國鐵路總工會代表大會的舉行，則已經是五卅運動的前夜了。

五卅反帝國主義怒潮是工人階級首先發難的；上海方面日商紗廠的工人早在二月間便已開始鬥爭，因此而顧正紅被殺，南京路發生屠殺——全上海二十餘萬工人宣布總同盟罷工，甚至於英日各廠之外，各國的工廠企業以至於華商工廠的工人，都以同情罷工加入；這次罷工的性質，便從內外棉一廠內的經濟鬥爭變成政治罷工。漢口的

屠殺，也起因於碼頭工人反抗外國資本家的虐待。廣州香港的罷工，更是響應上海的極大規模的反抗帝國主義的階級鬥爭；經過英法帝國主義者殘忍的大屠殺之後，工人民衆的堅決勇敢的鬥爭一直支持一年半之久；一方面省港罷工與民族抵制竟使香港變成荒島，另一方面廣州國民政府便在罷工工人力量之上建立並相當鞏固起來。青島方面，同樣是發生於日紗廠的工人，雖然在五月二十九日已經經過帝國主義走狗張宗昌的一次殘殺，他們始終還能聯合膠濟路工人等各業工人第二次的起來發難。天津方面，則七月初海員方首先發動罷工，接着日商報館內的印刷工人，碼頭工人陸續的加入；美商寶成紗廠及華商北洋紗廠罷工相繼勝利；後來日商裕大紗廠罷工，外國資本家指令李景林以空前的屠殺和逮捕，方才把工人及一般民衆運動鎮壓下去。其他長沙安源水口山河南南京廈門等處，凡是運動的範圍及力量比較擴大的地方，無一不是工人階級做先鋒隊。總之，五卅運動的發難，完全是因爲中國工人階級，覺悟了自己階級地位及利益，與帝國主義勢不兩立，起而實行階級鬥爭。這次反帝國主義運動的發展，從上海青島開始，而漸漸波及全國，差不多沒有一處不是工人階級最勇敢最積極

最持久的階級鬥爭做一般民族革命運動中的骨幹。中國的工人階級既然有這樣的階級覺悟和鬥爭力量，又因為他的階級地位是被帝國主義壓迫剝削得最厲害的，他的奮鬥自然而然一開始便在階級鬥爭中含有極徹底的政治意義，——他不但實行階級鬥爭而已，而且他的階級鬥爭亦就是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的先鋒。所以這一發難於工人階級的運動，立刻使結合革命的學生羣衆和一般小資產階級而擴大這一運動的範圍。譬如上海的工商學聯合會，以結合二十餘萬工人的上海總工會爲主幹，一開始便提出民族解放的總要求：撤退外國駐華海陸軍，取消領事裁判權，收回租界，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自由等。隨後各地的民衆，尤其是南方國民政府之下的工農羣衆，漸漸集中民族解放和階級鬥爭的總要求，於是廢除不平等條約，關稅自主，承認工會，增加工資等的呼聲普遍全國。

吉了同志在一九二五年八月十日出版的第一百二十三期的『響導週報』上曾經寫過一篇『中國工人及其工會在此次運動中的作用』，描寫中國無產階級在五卅運動中的作用非常深刻，現在我可以引他幾段在這裏：



『幾十萬工人罷工，使外國工廠停止工作，使上海香港這樣的碼頭寂然無人起貨，這個對全運動有何等重要經濟政治上的意義！帝國主義者所引以為憂愁恐怖和危險的，正是工人的罷工。倫敦，東京，紐約的政府，爲着這個，十分小心并異常害怕來處理中國發生的事件；北京外交團，爲着這個，引起了分裂；帝國主義者及其報紙，爲着這個，坐臥不甯，警惶失措，恐嚇也不好，甚至假意恭維也不好。

我們設想，假使工人罷工一旦停止了；那麼，單是學生和商人運動的影響，必定及不到現在上海香港工人對於帝國主義的打擊千百分之一。

中國無產階級，在近年民族運動史上，早已做過幾樁光榮的事業。一九二二年香港海員的罷工及去年（一九二四年）夏天沙面罷工這兩件事便可證明。可是，這一次罷工（指五卅罷工）中，中國工人表現出來的團結力，持久力，特別是組織力，自然不是前幾次的運動所能望其項背。中國工人，特別是上海的工人，大大地向前進步。這是無論朋友或仇敵，誰都看見的，誰都感覺到的。因此，上

海總工會更成了我們敵人暴力仇恨攻擊的中心，同時也便得着中國民衆中所有革命分子之擁護推戴了。

實在說來，上海總工會的作用確是很偉大的。在風潮當中，上海總工會正站在敵人的砲火之下；當萬國商團在上海街上『獵人』，鐵甲砲車橫行全埠，陸戰隊不斷登岸之際，總工會出來創立自己的組織，成立新的工會，擴大舊的工會，吸引廣大工人羣衆於這些工會裡頭，——其中有許多羣衆乃是從未參加過工人運動并完全沒有鬥爭經驗的。所以能够做到這樣，自然是有一番廣大的宣傳鼓動及教育工作。普通至少要幾年才能做到的工作，上海工人從自己的經驗學習并受總工會指導，居然能幾個星期之中便做完工了。

確實不錯，中國的歷史不是步行而是飛跑的，這種歷史運動的速度，在工人運動中特別表演得明顯。緊接五卅運動以後不久，中國無產階級還表現出了他更大的作用，這些重要的事變便是一九二七年一月漢口九江工人奪取英租界與上海三次暴動及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廣州暴動。租界是帝國主義者統治中國的直接營壘，漢口九江的工人

與苦力完全用自己羣衆的力量奪回來。上海三次暴動中，八十萬工人在上海總工會旗幟之下一致實行總同盟罷工，工人糾察隊直接驅逐奉魯軍，使北伐軍不費一彈一卒而抵上海。廣州暴動中，工人首先宣布：「青天白日旗已是白色恐怖旗幟，革命民衆應一致打倒青天白日旗，豎起鐮刀斧頭紅色旗！」暴動工人奮勇作戰，佔領廣州三天之久，在中國第一次建立大城市的工農兵蘇維埃政權。

我們可以確定的說，在中國這種偉大的革命變革之中，只有無產階級能夠做領袖。這並不是所謂「無產階級天生是中國革命領導者」，而是因為他們的實際生活，決定他只有堅決的勇敢的鬥爭，才有出路。中國無產階級數量雖然很少，年齡雖然很幼稚；然而他不比資產階級，他是唯一能夠領導農民起來解決土地問題的力量，也是中國革命史上第一個偉大的力量，五卅以來的事實，尤其是一九二七年上海三次暴動與廣州暴動，每一件事都可以充分證明出來。

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國大革命的本質是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但是革命中的主力軍却是無產階級。



# 第六章 大革命中的中國共產黨

## 第一節 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關係問題

研究中國大革命問題，絕對不能撇開與中國革命息息相關的中國共產黨。中國大革命的發動和發展，在極複雜的階級關係之中，在極迅速發展的階段之中，中國共產黨顯然都演着極重要的作用，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同時，中國共產黨過去指導機關所犯的機會主義錯誤，也就是中國大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我們在記載大革命經過之後，更不能不用點篇幅來說明一番大革命中的中國共產黨。不過，這是一個極其複雜的問題；這裏，我只能在這中心問題上加以扼要的說明，至於要詳細論列中國大革命中之各種爭論問題，則應讓另外的專書去完成牠。

這一章中之劈頭的問題，就是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關係問題，因為在這一問題中包含了中國無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聯合戰綫與爭奪革命領導權等重要問題，自然這

裡的任務並不是有系統地詳細敘述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歷史，而只能扼要說明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發展之關係的歷史。

國民黨在辛亥革命之後，原已崩潰瓦解，經過一九二四年改組才復生的。中國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也就從一九二四年改組時開始。共產國際爲什麼要決定中國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呢？因爲中國國民黨自始就不是一階級的政黨，當牠初發生的時候，就包含着中國各種複雜的社會階級，自初生的資產階級（主要是華僑），小資產階級的智識分子至一部分的工人（如海員），破產的農民，失業的羣衆（如貧民）等各種社會階級都有，甚至在當時只反對滿清的漢族封建地主軍閥勢力，也有很多加入國民黨。辛亥革命之後，國民黨孫中山與袁世凱妥協，一方面許多官僚軍閥買辦都加入了國民黨，另一方面國民黨原有黨員，大部分腐化反動，投降袁世凱，投降種種軍閥，於是國民黨更加成了一個無所不包的垃圾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其所以從孔子道統以至平均地權，甚至階級鬥爭的思想都染着一點，成爲一種夾七夾八的東西，固然是反映當時社會思想的複雜，同時也就是反映國民黨內成份的複雜。這種複雜的政治集團，

『如果他牽制共產黨的手足，不妨害共產黨煽動和宣傳工作的自由，不阻礙無產階級團結在共產黨的周圍，而又使共產黨這方面便於作事實上領導革命運動的事』，那末共產黨就可以加入進去，使他轉變到真正民族革命聯合戰綫的組織。而且『共產黨爲得在反帝國主義的爭鬥中去分離妥協的本國資產階級，與夫引導城市和鄉村幾十百萬的小資產階級羣衆隨着自己走，他儘可以而且應該加入公開的聯合，與資產階級的革命派合作』。自然這裏所說『合作』的意思並不是『混合』，因爲『我們共產主義者，幫助殖民地的資產階級的解放運動，僅僅當這種真正革命的，且運動的代表不阻礙我們組織農民和被壓迫羣衆的時候』，而且就在與革命派資產階級暫時合作的過程中，也必須堅決保存無產階級的獨立性，那怕這種運動尙在萌芽的時候；不僅如此，無產階級在民族革命的聯合戰綫當中，應極力爭取革命的領導權，以領導資產階級性的革命之澈底完成，以爭取非資本主義即社會主義的前途。共產國際根據這一系列主義的路綫，所以當國民黨孫中山表示接受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所提出的『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聯合蘇俄』等革命政綱的時候，便正式決定中國共產黨員加入

國民黨，中國國民黨亦因此得以改組成功。國民黨經過一九二四年這一次改組，因為得到最急進最革命的共產黨員的加入，因為接受了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聯俄』等革命政綱（一九二四年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及政綱），便開始轉變到成為中國民族革命聯合戰綫的組織，成為中國國民革命的旗幟。於是在國民黨的領域之內，工農組織及鬥爭的發展，也開始得着相當的自由；一九二四年勃興的反帝國主義宣傳和馮玉祥政變以及國民會議廢除不平等條約的要求，都在國民黨的聯合戰綫之中發展出來。國民黨在當時的確是反帝國主義聯合戰綫的政治組織。孫中山赤化和馮玉祥赤化的名聲，也在這一時期喧騰於帝國主義者之口。而且國民黨改組不久，就發生了反帝國主義的沙面大罷工（一九二四年九月），當時國民黨左派對這罷工是與以積極幫助的。一九二五年五卅事變發生，接着廣東爆發省港大罷工，這一罷工是極明顯的反帝國主義的革命運動，當時國民黨左派的確是在積極的支持這一罷工，在各方面來幫助罷工，對於反對罷工的都加以打擊。同時廣東農民運動也在這個時候發展起來，許多地方與豪紳地主發生武裝衝突。國民黨左派當時主要



的傾向也是站在農民方面，相當幫助農民去反對地主，農民的組織也可得相當的自由，可以有自己的武裝，並且曾經收繳一些地主的武裝來交給農民。這些事實證明中國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的路綫是很正確的。

然而中國國民黨既然不是一階級的政黨，國民黨之中，不但有民族資產階級，並且還有地主買辦階級的成份；這些地主買辦階級的成份自然不願意國民黨革命化，所以一開始改組，國民黨內便有馮自由等所代表的極右派起來反對，這種鬥爭事實上繼續到消滅劉鎮寰楊希閔的戰爭。馮自由等被打擊下去之後，接着便又發生西山會議派，西山會議派所代表的階級背景，實際上和馮自由等所代表的一樣，亦是地主買辦階級，不過西山會議派發生的時候，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已經有些反動的端倪，五卅之前，孫中山死後的第一次國民黨中央會議上（一九二五年五月），戴季陶沈玄廬等已經起來提出所謂國民黨的最高原則——反對工人階級鬥爭，這是民族資產階級的戴季陶主義的發端。自此以後，國民黨內反對改組的右派表面上消滅，而承認改組，同時要求控制共產黨的新右派之鬥爭已經開始。五卅之後，戴季陶主義便公開的發動，孫文

主義學會組織起來，黃埔軍官學校的右派形成起來。於是國民黨的右派中央委員在北京西山開會，以廖仲凱被刺後廣州國民政府成立與省港罷工開始時之左傾政策爲反對目標，中心的反革命政綱是在打擊共產黨。這一轟動一時的西山會議實際是在戴季陶主義的旗幟之下，進行他們反共的鬥爭，不過當時的民族資產階級還只很小心謹慎的發動自己的鬥爭，覺得公開反動太早於己不利，所以戴季陶本是發起西山會議之一人，結果竟不得不中途逃席，這一複雜的過程，我在前一章已經分析過了。

可是另一方面，當時中國共產黨雖然執行了加入國民黨的策畧，但是對於列寧主義對於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革命的理论却並不瞭解。首先，『中國共產黨，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時（一九二二年），已經決定中國無產階級應該參加民族革命運動並贊助中國國民黨，提出的口號是：「民主的聯合戰綫」「推翻帝國主義推翻軍閥」。在此大會後，共產國際派代表向中國黨提議：中國同志們應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黨，使民主革命的聯合戰綫更進一步實現，使中國民族革命運動加速的進行。當時黨中雖尊重國際的提議，而大多數同志只贊成民主革命的聯合戰綫，對於加入國民黨的組織十分

懷疑，因此，在實際上，國際的提議未曾實行。」（見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大會『對於民族革命運動之決議案』中之第四節『中國共產黨對於民族革命運動政策之經過』。到第三次大會（一九二三年六月）重新討論共產國際加入國民黨的指示的時候，又曾經發生爭論；陳獨秀領導的右傾的思想，贊成加入國民黨，同時主張『一切工作歸國民黨』，共產黨不應該有甚麼獨立的工作，甚至說：『中國共產黨早生了五年』，這是無疑的取消主義的思想。同時有一派左傾的思想則『反對在勞動羣衆中發展國民黨的組織，主張工人應該在自己的政黨旗幟之下參加民族革命，若加入資產階級性的國民黨，便不免有混亂無產階級思想的危險』（見同上）。他們起初是反對加入國民黨，後來贊成共產黨加入國民黨，但要保留產業工人不要加入，這是一樣的不了解與資產階級爭奪革命領導權的策畧。

這兩派主張的根本思想，都是機會主義的『二次革命』的理論。前一派的主張認為現在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無產階級應該竭力幫助資產階級；將來的社會主義革命等到將來再說，所以甚至覺到共產黨都可以取消。後一派的主張認為現在是資產階

級民主革命，我們固然應該參加，可是我們的任務是準備將來的社會主義革命，所以產業工人決不應該加入國民黨中去受資產階級思想的洗染。很明顯的這兩種思想都是把資產階級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看做有一座萬里長城的隔離，而不知道從資產階級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綫。

三次大會的結果，沒有能够把這樣的机会主義的思想駁斥下去，因此一方面固然實行了共產國際加入國民黨的指示，另一方面機會主義的思想却充滿了當時的指導機關。於是『一切工作歸國民黨，共產黨不要有獨立的工作』『一切運動都是國民運動，工人運動只是國民運動的一種』，便成爲當時指導機關的路綫。甚至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大會宣言中還說：『中國國民黨應該是國民革命之中心勢力，更應該立在國民革命之領袖地位』。這是很明顯的與列寧所指示的『不要與資產階級混合，而要保存無產階級運動的獨立性』完全相違反；這就是極可恥的以階級利益去服從民族利益，以無產階級去服從資產階級的機會主義。這樣自然不會去在這聯合戰綫中去力爭的革命的領導權，更不會有『對待同盟者要猶如對待敵人一樣』的認識。所以在接受共

產國際加入國民黨的策畧時候，就只認識了應當『加入』的一點，而完全沒有注意加入以後在聯合戰綫中爭奪革命領導權的策畧。他們遂這樣的把列甯主義的路綫，變成了孟什維克的機會主義的路綫。

當時中國共產黨中央既在機會主義路綫領導之下，於是加入國民黨以後，對共產階級採取極可恥的讓步的政策。實際上共產黨加入國民黨，並不是積極去爭革命領導權，反而去到國民黨裡送領導權給資產階級。有時雖然也模糊的提起爭領導權的問題，但是，『只要國民黨能聽從共產黨的主張與政策，便可以說實際上的領導權在共產黨之手；因此說國民黨的左派是有的，不過不能對他們有過分的奢望，革命口號要是他們所能接受的才能提出去，如此可保領導之權；因此，國民黨黨部的委員與職員，共產黨不可多佔，以免惹起左派反感而踏包辦之嫌』。中國共產黨既然學得這樣一種『謙讓之德』，自然便不會積極去爭革命領導權。一九二五年冬發生西山會議派，同時民族資產階級已經有反動的端倪，已經開始反對工人階級鬥爭，極力控制共產黨，而共產黨的路綫乃是認代表半封建勢力的西山會議派為右派，而以戴季陶思想為中心的

資產階級爲中派，採取向中派讓步以孤立右派的策略，實際上對右派也是一樣的讓步。當時廣東的黨一方面反映着階級鬥爭的發展，另一方面在廣東的國際代表鮑羅廷同志在那時還能相當執行國際的指示，於是廣東黨與中央在許多問題上都發生過爭論。當時廣東黨的路綫，一方面發展羣衆的組織與鬥爭，另一方面在國民黨內採取不斷的向右派進攻的政策——一般人叫他剝筍政策。征服了商團事變之後，馬上肅清東江，削平劉楊，繼續又驅逐胡漢民許崇智等，左派與共產黨的勢力一天一天的發展起來。機會主義的中央却天天斥責廣東太急進了，罵廣東的黨破壞了中國民族革命聯合戰綫。最值得記憶的一次爭論，就是在國民黨第二次大會以前，廣東黨堅決主張反對右派，把當時幾個著名的右派領袖如戴季陶孫科等都驅逐出廣東，並且準備在這次會議上把國民黨造成左派與共產黨聯合的中央。可是當時中央的主張却確實與廣東相反，認爲當時革命形勢（郭松齡反奉失敗後），在全國各處都受到了打擊，因此必須向右派讓步以保持聯合戰綫。於是廣東驅逐出來的右派領袖科葉楚傖鄧元冲等到了上海，中央却馬上與他們實行「談判」（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並訂立了極可恥的條件：①共

產黨員在國民黨各級黨部指導機關中不得佔過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數；(三)由共產黨中央命令廣東黨部延遲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等候這些右派領袖回到廣東以後再開。於是這些被廣東驅逐出來的右派領袖在共產黨中央自行讓步的政策之下，又回到廣東參加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了。

國民黨二次代表大會之後，不久就發生了三月二十號事變。這一事變的意義，很明顯的是當時資產階級要先打擊無產階級的力量取得國民黨的領導權，然後再行北伐，使北伐的結果完全合於他一個階級的利益。在這一事變中廣東黨與中央又有不同的意見：第一討論這一事變發生的原因，廣東黨認為是『當進攻而沒有進攻』的結果，中央的主張又確實相反，認為是『當退讓而沒有退讓』的結果。第二個爭論就是對於三月二十號的策畧問題。廣東黨認為『退出國民黨就等於放棄廣大的工農勞苦羣衆，放棄革命的國民黨旗幟給資產階級，這就是莫可補救的損失，在這個時候是應該採取暫時讓步的政策，以保留在國民黨之內，同時積極的準備着新的進攻以繼續奪取領導權的爭鬥』。另外在上海有少數同志的意見，認為三月二十號是莫大的恥辱，應該毫

不猶疑的退出國民黨。當時中央的主張却是第三種意見：陳獨秀在當時提出來的有名的一句話可以完全表現出當時中央的意見。就是「辦而不包，退而不出」，這一句話的意思是說：三月二十號的事變是共產黨的急進政策，是想包辦國民黨的事逼出來的，所以以後只應「辦而不包」；馬上退出國民黨是錯誤的，但是一定要向右派退讓，所以只要「退而不出」。當時主張退出國民黨的固然是錯誤的；可是陳獨秀的名言「辦而不包，退而不出」却正十足的表現了專一奴服資產階級的機會主義的精神。

三月二十號的事變，已經在事實上充分暴露了資產階級的動搖與反革命的必然性，共產黨經過這一事變的教訓之後，應當更堅決的在政治上擴大自己的政治影響，積極征取一般小資產階級的羣衆，尤其是要積極征取農民與兵士羣衆，使之團結在無產階級的周圍，并切實批評資產階級的動搖，積極的領導羣衆的鬥爭準備自己的力量，以鎮壓不可避免的資產階級的反革命的到來，以奪取這一革命聯盟到自己的領導之下。廣東省委當時對於與國民黨關係的策略，雖然比中央的投降路線要正確些，但是對擴大羣衆基礎的工作也不十分堅決。北伐開始的時候，曾向中央提出這樣的問題：



「在北伐過程中，到底準備推翻蔣介石呢還是擁護蔣介石？」廣東黨的路綫是主張在北伐過程中要同時積極準備推翻蔣介石的。可是當時共產黨的中央答覆得異常奇妙：「不是推翻蔣介石，也不是擁護蔣介石」。這無異於說：「現在是北伐的時候，爲什麼想到推翻蔣介石呢」，這是幫助資產階級的最妙的理論。可見當時共產黨中央始終沒有想到與資產階級爭奪革命領導權這一重要策畧。反之，「既然要聯合戰綫，就應當自己讓步」這一機會主義策畧的原則，倒是當時共產黨中央的政治路綫。

中國大革命的最劇烈最複雜的鬥爭時期，是革命發展到長江流域的時期，中國共產黨便站在那些主觀與客觀的條件之中。雖然前幾年的革命發展時期，國民黨改組後及五卅以來的革命時期，已經孕育着許多機會主義的理論與方法；雖然共產黨的組織在這期間已帶着這種機會主義的傾向，自然也就帶着許多宗法社會的習性，指導機關之中不能推出工人同志的領導者，甚至工會之中也都是知識分子的「革命職業家」，但是客觀上勞動羣衆的鬥爭却依然急遽發展；赤色工會運動發展到將近三百萬會員，吸收極多的店員手工工人參加；農民協會以湘鄂贛粵計算，發展到將近一千萬會員；

國民黨左派運動有極大的發展，軍隊之中也有一部分的力量。雖然這些發展大半屬於自發的。可是前一階段中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的政策，以及客觀上革命勢力的發展，使「取得國民黨取得國民革命軍取得一般小資產階級」的策畧事實上部分的實現，而形成部分的革命勢力，共產黨以工農團體中的領導權之取得而成革命的先鋒與主幹。當時的任務，就在「一面鄧清五卅以來『中國無產階級暫時還沒有革命之領導權』（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共產國際雜誌的社論）。一面堅決的進一步而取得政權與軍權的領導權。這是革命發展到長江流域的形勢。中國共產黨中央便放在這種形勢之前。

那時，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底，共產國際執委第七次擴大會議，便議決中國革命問題的議決案，指出中國共產黨當時的行動政綱，指出中國革命非資本主義的前途，須以無產階級爭得革命領導權來達到，須以工農小資產階級的聯盟來對付必然要背叛革命的民族資產階級，指出中國革命的主要社會內容是土地革命，必須勇敢的去領導農民之自發的鬥爭，指出無產階級及手工工人的階級鬥爭之劇烈，須要勇敢的去領導，以成爲爭取整個革命領導權的力量，須要加入國民黨以擴大并贊助工農的鬥爭，建立工

農小資產階級的革命聯盟，並且要『有系統的堅決的反對國民黨右派及戴季陶思想，反對他們想把國民黨變成資產階級政黨的企圖，澈底的批評在左右之間的一切動搖。使國民黨成爲真正平民的政黨——包括無產階級，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以及其他堅決反對帝國主義的被壓迫者之堅實的革命同盟』。

事實上一九二六年十月至一九二七年三月，亦正是工農左派聯盟的『極盛時期』，如果將當時的多觀形勢與國際第七次擴大會議的『中國革命問題議決案』相對比，大家都可看出國際決議案是非常正確的。可是當時中國共產黨中央已陷於機會主義的泥坑，一切原則都在動搖之中，根本沒有執行國際『爭取國民黨領導權』的指示。

此時客觀上革命運動是突飛發展，一九二七年一月漢口九江工人苦力等革命羣衆奪取租界的奮鬥，二月間上海的總同盟罷工，一直發展到上海三次暴動，但是共產黨中央對於國民黨領袖依舊一味退讓，甚至當時共產黨領袖陳獨秀竟和國民黨左派領袖汪精衛發出那種可恥的聯名宣言（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汪陳宣言），因此有人說，共產黨與國民黨的合作，可以說是以一九二三年『越飛與孫中山的宣言』始，以『汪陳宣

言」終。

汪精衛在「武漢分共之經過」一文中說，他的分共是經過三個階段：第一，是由四月下旬至五月中旬，國民黨中央議決在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組織特別委員會以「制裁違反本黨（國民黨）主義政策之言論行動」；第二，是五月二十一日長沙政變至七月十五日的國民黨分共會議，算是「和平分共」；第三，是「因爲」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議決退出政府，「對國民黨厚誣醜詆」及葉賀舉兵，便實行嚴厲反共。不論汪精衛的「供詞」如何的矯揉造作，說得「仁至義盡」，但是，這幾句話中有一個真理：就是武漢一面下令討蔣，一方便已下令「討共」；討蔣和查辦湘鄂贛各省「過激」言論行動之特別委員會組織的決議，差不多是同日同時的（四月十九日下令討蔣，四月下旬即組織特委）。這時中國共產黨正在開第五次大會的時候，正是共產黨五次大會高唱「共產主義和三民主義合作到底萬歲」的時候啊！

這時候，一九二七年五月十八日，共產國際執委會開第八次擴大會議，再議決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決議案。這次會議對於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關係，更有如下之進一

## 步的決議：

「中國共產黨要把他肩上的任務完成，只有保存自己工人階級先鋒的政治面目，就和那最急進的小資產階級革命家的政治面目也須劃分清楚。

無論在何種條件之下，共產黨不許融解於別個政治組織之內，他必須成爲獨立的力量，他是一特殊階級的組織，是無產階級的組織，是全國最澈底最革命的階級的組織。因此，共產黨在宣傳自己的政見時，在自己的旗幟下動員羣衆時，不能爲外力所阻，對於革命小資產階級民主的動搖不定，尤不能放棄批評的權利。恰恰相反，須知只有這種批評，才可推動小資產階級的革命家向左，才可以在革命鬥爭中，鞏固工人階級的領導權。

不過中國共產黨的獨立性，不可解作是與無產階級勞動羣衆，尤其是與農民斷絕關係。從這一點出發，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最堅決的反對那退出國民黨的要求，因爲在目前的瞬間，無產階級的政黨恰要在國民黨，確定無產階級的領導作用。中國國民黨是中國固有的組織形式，是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與農民合作的

黨。

在目前情形之下，共產黨——工人階級的政黨不能在國民黨內取得領導作用，即無產階級便不能在全國取得領導作用。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認為，如果看輕國民黨這個革命運動的特殊組織形式，實際上便是助成右派攫得國民黨的旗幟，正因為國民黨的旗幟是國內一個非常重要的政治因子，所以蔣介石引着資產階級領袖們，千方百計，要打起國民黨的大旗前進。共產黨的策略，萬不可為蔣介石的機變作保障（退出國民黨路綫，便不能免這種結果），而要揭破資產階級的政治家是民族革命的叛賊，是國民黨的叛賊，是中山主義反帝國主義的叛賊，是投奔帝國主義者的降將。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認為，說民族（反帝國主義的）革命已經『告終』，另一革命即工農階級革命已經『開始』，這種見解是錯誤的。在蔣介石政變之後，便是廣大的羣衆也明瞭了民族革命只有在工人階級領導下才能繼續進展。正因為這樣，所以不能把國民黨的旗幟，不能把民族自由鬥爭的旗幟讓給民族自由鬥爭

的叛賊。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認為，中國共產黨既要大胆的堅決的擴大羣衆運動，也必要一般大胆的堅決的努力變國民黨爲真正的羣衆組織。使他包納城鄉勞動民衆才行。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認爲，國民黨爲完成其自身任務，須使其組織形式能相當適應。趕快改組，儘量接近羣衆，實爲必要；其次，要在工農手工業者中間大徵黨員，容納工農兵士手工業者之整個組織入黨（工會，工廠委員會，農民委員會，農民協會，手工業者行會，軍隊組織，農民游擊隊如「紅槍會」以及工人自衛團等等，惟須肅清其反革命分子）；國民黨的地方及中央指導機關厲行選舉等。只有把定這個堅決的路綫：使國民黨發展成爲真正廣大的羣衆的革命民主的組織，指導機關真正由選舉產生——才能爲中國民主革命之鞏固與勝利的發展，造下先決條件。

只有把定這個路綫，才能爲防止那國民黨左派某個動搖部分之可能的而且必

然的退伍（如廣州的事實），爲防止那某個動搖軍官及其他軍事領袖之叛變，造成制裁手段。應時的揭破一切勾結蔣介石或帝國主義之動搖趨向，并在宣傳煽動上採用具體辦法，或竟用組織上的制裁手段，這是共產黨的任務。

中國共產黨維持且擴大自己黨的組織外，尤須極力影響國民黨的行動。要想實現這種任務，必須先完全了解自己無產階級的階級地位，澈底把定向自己思想的政治的路綫，加強鞏固自己的組織，使工人同志加入黨的指導機關，在工農羣衆中加強黨的影響和黨的威信。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認定，在中國共產黨中，恰恰對於這點有無數動搖存在；黨在批評國民黨的領導者，不能常常表現充分的堅決，而且在黨內對於發展羣衆運動表現相當的畏怯，尤其是在農民運動中，關於沒收土地，驅逐豪紳地主等問題上，可以看出。這些動搖，在目前階段中，特別有害於革命。在這裏可以看出，中國共產黨的同志，並非人人都能充分了解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路綫。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認爲，大規模的說明中國共產黨同志內上述的錯誤和動搖，是



必要的；不然，則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之中，相當的動搖之危險便加高了。〔共產國際第八次擴大會對於中國問題決議案〕。

然而在這一方面，中國共產黨中央所有的活動，簡直與國際決議案上所明明白白指出來的路線相反。國際決議再三指出，中國共產黨要想把他肩上的任務完成，只有保存自己工人階級先鋒的政治面目，就和那最急進的小資產階級革命家的政治面目也須劃分清楚。然而實際上當時中國共產黨中央竟完全放棄自己獨立的政治面目之任務，而且儘可能的做到了與國民黨右派指導完全同化的工作。例如在中央五月（一九二七年）通過的關於國民黨聯席會議的決議案（國民黨工作大綱）上說：『共產黨員在聯席會議應討論各種主要的問題，提出具體的建議，但是這些具體的建議不應根據我們黨的最大要求，而應注意到民族革命發展的利益與團結國民黨的左派』。從這個中央的決議中，可以得到的結論是：①『共產黨的最大要求』與民衆運動的利益是兩不相容，互相衝突的兩方面；②共產黨的『具體建議』不應當建築在黨的『最大要求』，就是說在現在革命的階段上不適用共產黨的政綱，策畧與一般的政治路線；③民族革

命運動與團結國民黨左派只有在共產黨放棄自己『最大要求』的條件下才能發展。再此決議案上又說：『在國民黨報館服務的黨員，不當使此等報紙變爲共產黨的報紙，而應照國民黨決議的精神去工作』。這豈不是放棄共產黨獨立政策與政治路線完全服從國民黨之表示？！

當時中國共產黨的這種『服從作用』，到處可以表現出來，國民黨內的共產黨團作用（如在聯席會議中）、實際上已被黨的指導者所完全取消。在某一次國共中央聯席會議上，汪精衛說：只有國民黨中央有認可與公布通過的決議之權，而共產黨領袖陳獨秀的回答，竟同意於這種辦法。當時共產黨領袖也有這樣說的。一方面自然共產黨員不應完全放棄自己的獨立，但在另一方面則又不能保持百分之百的獨立，因為我們現在還須與國民黨聯合，有了這種根本修改革命的多數主義策略基礎的妥協辦法，還要裝出莊嚴的樣子說，這是實際的『共產主義的策略』，共產黨領袖簡直沒有想過政治上的獨立。那末，對於國民黨的動搖與各種不徹底的騎牆政策，實際上當然不會有什麼批評，共產國際所要求的徹底激烈的公開的批評，當然更不用說了，對此最

明顯的就是中央在黨整個公開的時期中，都沒有打算出版一份黨的日報，雖然經過國際之多次催促，中央關心的不是這些事，而是怎樣使共產黨員不在國民黨報上發表共產主義的文章！

中國共產黨中央不見國民黨羣衆，永遠沒有打算過與他們接近，而只看見領袖。遇着重要的政治問題，總是想着應當看看某某領袖對此的態度如何，但不是說工人農民羣衆對此的態度如何，往往爲要想使某某領袖中立而減低自己的口號，譬如爲要使李濟琛在廣東中立，所以把改選國民黨省黨部的口號取消；爲要使汪精衛中立，所以把國民黨中央土地委員會（一九二七年四月）對於土地問題的建議取消；爲要使唐生智中立，所以不堅決的去取締湖南的叛徒；爲要使朱培德中立，所以當他驅逐共產黨的時候（一九二七年六月初旬），亦不提出反對他的口號；當時幾乎所有的中國共產黨的政策，都由國民黨「左派」領袖之願望來確定，而所謂左派領袖之願望，就是武漢軍閥的要求。因爲「左派」要求共產黨人到東部去工作，而中央要停開第五次大會；又如中央一向贊成北伐，但當左派決定東征，則中央也馬上通過那樣的決議，雖然

中央以前很堅決的反對國際代表不主張北去的建議。在其他許多問題上，都是如此。

共產黨這個空前的妥協的機會主義的總路線，是繫於一個總的理論。這一理論就是「既然要聯合戰綫，就應當自己讓步」。列甯說：「要幫助動搖的人，先要自己不動搖」，而事實上，那時中國共產黨中央的格言是：「要自己退後些，免得人家跟不上」。那時不是運用工農小資產階級聯盟去革命，乃是爲工農小資產階級聯盟所束縛而阻礙革命。那時共產黨中央不但自己確信，並且還要使全黨及在共產黨指導之下的革命羣衆也要確信下列的理論：「共產黨及跟他革命的工人農民已經走得太遠，現在必須退讓以挽救與國民黨的聯合」。當土地革命剛剛開始發展，當工農羣衆剛剛走上革命大道，並且羣衆自己想到武裝自衛的組織正須要共產黨的積極參加和領導，使革命發展并鞏固與國民黨羣衆之實際聯合，築下堅固的革命基礎的時期，而共產黨的指導者却說：「要退讓，要退讓」，以爲這樣就可以營救自己在國民黨的狀況，創造了整個退讓的理論。不僅如此，當時中國共產黨不僅有這樣一個可恥的理論，而且還要步步實現於中國共產黨中央的日常工作中，拒絕土地革命。爲着所謂「過火」，贊成

成批的解散農工的組織，以同樣的口號去解散勞動童子團。在湖南問題的胆怯政策與最後所幹的自動解除武裝的工人糾察隊。所有這些，都是一九二七年五六月間武漢時期共產黨中央整個的退讓投降政策之一部分。

這條退讓投降的道路，集大成於一九二七年六月三十日中央擴大會議所通過的一條國共兩黨關係的議決案，現在指幾條出來看看：

「(四) 中國國民黨既然是反帝國主義之工農及小資產階級所聯盟的黨，當然處於國民革命之領導地位。

(五) 國民黨中的共產黨分子，雖然參加政府（中央及地方）工作，而只是以國民黨員資格參加，不是以共產黨員資格參加。兩黨聯席會議，是協商決定共同負責，而不是兩黨會議公開執行形式，這件事並不含有聯合政權的意義（現在參加政府工作之共產黨員為圖減少政局之糾紛，可以請假）。

(六) 工農等民衆團體均應受國民黨黨部之領導與監督，工農等民衆運動之要求，應依照國民黨大會與中央會議之議決案及政府公布之法令，但國民黨員亦應該

依據黨的議決案及政府之法令，保護工農羣衆之組織自由及利益。

⑦ 依照國民黨主義，須武裝工農，但工農武裝隊均應服從政府之管理與訓練。武漢現有之武裝糾察隊，爲因避免政局之糾紛與誤會，可減少或編入軍隊。

⑧ 工會及工人糾察隊不得國民黨部或政府之許可，不得執行司法行政權，如捕人審判及巡邏街市等事。

⑨ 店員工會應即由黨部會同省總工會派員組織，店員的經濟要求不得超過店東的能力以上，工會不得干涉店東的用人權，管理權，更不能侮辱店東，如逮捕罰款及戴高帽子等事。

⑩ 童子團執行警察職務，如捕人，干涉行人等事，應嚴行禁止。」

這在客觀上已經是十足的取消派；不僅完全放棄共產黨的獨立，並且代替帝國主義軍閥資本家取消了一般革命羣衆運動之存在！把所有的羣衆運動完全交給國民黨資產階級的領袖去監督，並且是自動的交出來，還要說是「照例」。——這不是客觀上對於羣衆運動出賣，對於革命變節是甚麼呢！

當時中國共產黨領袖所認識的與國民黨合作的方法就是這樣！這種方法已經完全喪失共產主義政策的精神。列甯說：「我們共產主義者，幫助殖民地的資產階級的解放運動，僅僅當這種運動真正是革命的，且運動的代表不阻礙我們組織農民和被壓迫羣衆的時候。倘若沒有這種條件，則我們共產主義者，應當奮鬥，堅決反對他們。」（列甯對於民族與殖民地問題的演說）。列甯對於與小資產階級聯合又時常說：「要注意友軍如同注意敵人一樣」。當時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聯合的態度却恰恰相反，以致於不是共產黨指導國民黨，而是國民黨的上層分子完全在政治上俘虜了共產黨的指導者。

集機會主義之大成的十一條國共關係政綱發布的時候，共產國際的緊急訓令到了，這一緊急訓令嚴厲斥責中國共產黨所犯機會主義的錯誤，訓令中國共產黨要立即示威式的宣言退出國民政府，要加倍發展工農運動，以制裁國民黨領袖之叛變，對於國民黨的策略則說：「不退出國民黨，雖國民黨的指導機關要大批的開除共產黨員，但仍留在內，要密切的與國民黨的下層羣衆聯合，由下層羣衆提出堅決的反抗國民黨中

央的決議案，要求撤換現在的國民黨的指導機關，並且在此基礎上就準備國民黨的大會」。於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宣言退出國民政府（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三日）。但是並不退出國民黨，而且還在七月二十九日發布了中國共產黨告國民黨同志書，號召國民黨左派羣衆起來反抗國民黨中央。此時武漢國民黨中央七月十五日分共會議已經開過，正是南昌暴動發難期間，這對於國民黨左派羣衆，號召他們反對甯漢反動中央在當時是有必需的。但是共產黨對於這種行動政綱過於伸張，於是「八七」緊急會議——這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反機會主義鬥爭的新紀元，有非常重大意義的一次會議，我們以後還要說到——竟還迫過復興左派國民黨的決議，甚至決定中國共產黨還應當組織工農暴動於革命的左派國民黨旗幟之下，認爲「革命的國民黨的這種組織，可以使將來發展到更高的階段時，政權形式將要進於工農兵代表蘇維埃——那時的過渡更容易些，更沒有流弊些」。當然是很大的錯誤。事實上武漢反動以後，整個國民黨的政治生命已經宣布死刑。假使那時在國民黨中還有些單獨的革命的反對派的成份發現，但是整個國民黨以前在羣衆中的革命威信，已經因爲資產階級軍閥及小資產階級領袖之陵



續反動，到處利用國民黨的旗幟實行流血屠殺，恐怖與壓迫而消滅了。國民黨主義在中國革命前一時期的發展上固然實現了相對的積極作用，但到此時新的發展階段中已經完全變成反動的力量了。所以不久之後，廣州革命工人羣衆即首先宣布「國民黨已經反革命的象徵，已經是白色恐怖的旗幟」，於是中國共產黨亦即取消「復興左派國民黨」之決定，正式提出蘇維埃的口號。至十二月廣州暴動，工農兵士羣衆高高豎起鎌刀斧頭紅色旗，國民黨左派汪精衛陳公博等亦大大屠殺工人，於是整個國民黨更成爲反革命的旗幟，更成爲共產黨及一切革命羣衆之死敵了。

## 第二節 中國共產黨對於中國革命性質及

### 動力的估計

中國共產黨「八七」緊急會議告同志書上說：「黨的指導有機會主義的錯誤，其基礎在於不了解中國革命的性質，不了解各種階級在每一革命階段裏的作用，以及共產黨的作用」。因此我覺得在中國共產黨對於中國革命性質及動力的估計這一問題上

應該有專門的說明。自然關於中國大革命的性質本身問題的內容，上面第二章中已經有很詳細的分析，這裡我只說一說中國共產黨對於這一根本問題的估計。

爲使問題更容易處理得清楚起見，我們可以先把共產國際對於中國革命性質的估計介紹一點在這裡。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底共產國際第七次擴大會議對於中國革命之性質就已有明白之指示：

「中國革命發展之現在階段，從歷史上說是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性質；但是如果無產階級握到革命的領導權，則革命的結果不一定造成使資本主義發展的社會政治環境，而將成爲無產階級農民及其他被剝削的階級政權，過渡到非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的前途。中國共產黨決定要用全力去實現過渡到非資本主義的發展之革命前途。否則資產階級倘若勝過無產階級，則中國實際統治又將落於帝國主義之手。」

「必須從經濟上打擊帝國主義勢力的基礎，就是革命政府，應當逐漸沒收屬於外國資本的鐵路，租界，工廠，礦山，銀行，企業等。因此以爲中國革命目前

的任務僅限於：①推翻帝國主義，②消滅封建勢力，這是錯誤的。中國革命若不超出於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範圍之外，決不能推倒帝國主義的」。

但是中國共產黨對於中國革命性質與前途這一根本問題是不了解的。中國共產黨所了解而且成爲黨的正式意見的實際上就是機會主義的『二次革命』的理論。遠在一九二二年五月中國共產黨二次大會時候的意見就是如此，二次大會宣言中說：『我們無產階級還有我們自己階級的利益，民主主義革命成功了，無產階級不過得着一些自由與權利，還是不能完全解放。而且民主主義革命成功了，幼稚的資產階級便會迅速發展，與無產階級處於對抗地位。因此無產階級便須對付資產階級，實行『與貧苦農民聯合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第二步奮鬥』。根據這種孟什維克的觀點，無產階級對於民主主義革命便只好取『隔岸觀火』的態度，用不着熱烈去參加，更用不着積極去領導，使民主主義革命澈底勝利，實現工農專政，走向非資本主義即社會主義的前途。而只須等待民主主義革命成功，幼稚的資產階級迅速發展與無產階級處於對抗地位的時

候，無產階級才可『因此』對付資產階級，實行『與貧苦農民聯合的無產階級專政』

的第二步奮鬥。所以無產階級應該把革命領導權交給資產階級，交給國民黨。使資產階級「迅速發展」起來和無產階級來「對抗」。機會主義者永遠不會懂得下面的真理：資產階級因其自身階級的地位，必然產生他在民主革命中的不徹底性。無產階級則因自身階級的地位，逼使他不得不為徹底的民主主義者。資產階級的頭是往背後看去的，因為他們害怕民主主義的進化，因為這個進化有使無產階級強大起來的危險。無產階級却除了失落套在頸上的鎖鏈而外則別無所失，而得民主主義之助，反可得着全世界。所以資產階級革命在其民主主義的改革方面愈徹底，則這個革命對於資產階級有利的範圍將愈縮小，而在另一方面却愈能保證無產階級與農民在民主主義革命中的利益。我們固然不能跳出目前革命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範圍，但我們能擴大這個範圍，我們能夠而且應當在這個範圍之內，為無產階級目前的直接需要及爭取革命領導權使革命過渡到非資本主義的前途而奮鬥。

由於不了解上述這一淺近的列寧主義的真理，所以到一九二六七月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中央擴大會議還依然繼續自己孟什維克的錯誤，而且擴大這種錯誤。在對中央政

治報告決議案中說：『中國民族運動的前途，我們可以看出有兩條道路：一是由工農階級領導小資產階級，推動資產階級，以革命的手段達到民族資本主義的建設；一是由買辦性的資產階級拿住小資產階級，并結合買辦階級與帝國主義妥協，撲滅革命運動，實現道威士的資本主義之侵略。我們（共產黨——恕我加了這樣一個失當的註釋！）的責任，就在努力擴大工農羣衆的力量，拿住小資產階級，推動資產階級，始終能夠鞏固民族運動的聯合戰綫，則中國民族運動便有由第一條道路之可能。』（見一九二六年九月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中央擴大會議決議案』第十三頁）。共產黨領導工農羣衆參加民族革命的責任，是爲『達到資本主義的建設』，這在現在看起來，好像過於荒謬，不知道正是過去中國共產黨指導者的政治路綫。

中國共產黨對於中國革命根本問題既然墮入了極庸俗的機會主義的泥坑，所以對於共產國際『現在是資產階級性的革命，無產階級的任務是要力爭革命的領導權，建立工農小資產階級政權，力爭非資本主義前途』的指示自然不會接受，而且把國際決議案加上一些機會主義的曲解，說什麼：『國際這個提案，不是說現在的革命就是無

產階級革命；不是說現在已經不需要國民革命，而立刻就實現無產階級革命；不是說現在的國民革命完全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也不是說完全沒有資產階級的民主性；（一九二六年底中央政治局通過的對於國際第七次擴大會中國問題決議案的解釋）。

越解釋越糊塗，中央只在過着文章的快樂生活吧了！

自然，當時中國共產黨中央內部並不一致，然而無論如何，這種機會主義的二次革命論却是當時共產黨指導機關中多數而且是正式的意見。共產國際七次擴大會決議案到達中國之後，形式上中國黨雖然一致接受，甚至也能跟着高叫幾聲「非資本主義的前途」，然而實際上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機關依然充滿着機會主義的精神。對於中國革命性質與前途這種根本問題都沒有正確了解，自然在許多實際問題中都很容易發生錯誤，各種錯誤中之最嚴重的一點便是沒有和資產階級堅決爭奪革命領導權；以為中國資產階級等於零，革命領導權「天然」在無產階級手裡，根本用不着去爭；或者以為我們無產階級的任務是準備將來無產階級革命，目前資產階級革命應該達到資本主義的建設，所以革命領導權應該交給資產階級，結果中國共產黨在大革命緊急關頭，

完全對共產主義變節！

這就是一九二七年「八七」之前的情況。八七之後，經過極艱難的反機會主義的鬥爭，經過武裝暴動之英勇的嘗試，中國革命已進到較高的階段——工農蘇維埃革命階段，此時中國共產黨對於中國革命性質的估計又發生不正確的觀點，認為中國革命是「無間革命」（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央擴大會議決議案），想跳過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階段，這種觀點顯然是陷入了托洛斯基主義的錯誤，這一錯誤是當時國際代表羅米拿茲同志與瞿秋白同志所做出來的，所以共產國際第九次擴大會議便公開批評糾正了。

關於中國革命之社會動力之估計，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指導機關之間亦表現出顯著的分歧。

中國共產黨機會主義的指導者對於中國革命的性質與前途既然沒有正確的認識，因此也就不能懂得各種社會動力之作用及其根本趨勢，依據一九二六年七月間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中央擴大會的估計。中國「資產階級在民族民主的革命運動中，乃站在

非常重要的地位，依現時世界政治環境，中國的國民革命若沒有資產階級有力的參加，必陷於異常困難或至於危險」。又說：「在事實上，自五卅以來，中國的資產階級已漸漸成了民族運動中之重要成分，且有領導此運動之趨向，特別在上海是如此」。決議案中雖然也曾指出過中國資產階級「不能革命到底」，但同時却肯定說中國資產階級要得到關稅自主，廢除不平等條約，取消領事裁判權，收回租界等，「方可與帝國主義妥協」，換過說，便是資產階級如果沒有得到這些東西，便不會與帝國主義妥協，這是何等機會主義的觀點！其次又說：「中小商人受帝國主義經濟之壓迫，苛捐雜稅之剝削，只有感覺革命之必要，無反對革命之必要」。可見共產黨指導機關根本不了解中國資產階級的特性，只看見中國資產階級參加革命之表象，却不懂得資產階級參加革命的真正用意，而且沒有同時「在事實上」指明資產階級當時已經發端的妥協背叛的傾向，如五卅運動中及以後的各種事實。所以自然的結論便只能是：「因此我們（共產黨）此時對於資產階級的態度，應該一方面努力拉住小資產階級，使之接近工農羣衆，而不完全爲資產階級的政治思想所統治以與資產階級爭此革命運動的領導地



位，以防其將來之妥協，一方面極力鞏固各階級的聯合戰綫，促進資產階級之革命化。」（以上括弧內引文均見一九二六年七月中共中央第三次擴大會議案）至於在聯合戰綫中對資產階級之批評監督則根本沒有必要。這種對於革命動力之錯誤估計，也就是前面第一節中所說共產黨退讓投降政策之張本。

反之，共產國際的估計却完全根據馬克思列甯主義的原則。國際指出：中國革命中階級力量的發展，是在非常落後的中國經濟背景裏。其原因則為工業資本主義低度之發展，農業經濟停留於原始技術，大多數中國人民生活程度異常的低微以及許多半封建制度的殘留等。現時中國經濟情形的主要特點，就是中國經濟的成份，可比雜色的荷包，從財政資本以至於宗法氏族制度的經濟關係之餘跡，都同時存在，其中占優勢的乃是各種形式的商業資本及城市鄉村的小手工業和小工業。這就使中國民衆之階級分化不明顯，並使國民革命中之社會政治力量的組織程度不甚高。中國革命運動發展之連續的階段，可以各種社會力量的改變結合以證之。在第一個階段中，民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為主要動力之一，他們在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隊伍中

找助手。第二階段，社會力量轉變到另一方面的結合形勢。爭鬥的方式，亦發展得更新而更革命，工人階級在中國鬥爭場上出現，成爲最重要的政治原素。現在（一九二六年底），革命運動已到第三階段之門，正是階級的新結合之前夜。在這個階段裏，發展運動的主動力，將是更有革命性的結合——無產階級農民及城市小資產階級的結合，而離開一大部分的大資產階級。可是，在這階段中，革命運動的領袖權，將日益落在無產階級身上。在此時期，是從民族解放運動過渡到新的革命局面，大資產階級看見反帝國主義戰鬥，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進行，超過了他的控制，客觀上不免危害他的階級利益，於是大資產階級拚命搶奪領導權，以達破壞革命之目的。反革命力量之形成與革命力量之結合是同時並進的。這個反革命團結之進程與帝國主義的政策，有密切關係並受其影響；猶之乎中國革命勢力之發展，是與世界革命（蘇聯與西方無產階級）有密切關係並受其影響一樣。帝國主義者見軍閥不能作消滅革命運動的有效工具，於是用和平方法，在民族革命勢力中找尋他的同盟者。帝國主義者企圖叫醒民族資產階級，使之脫離革命戰線，并爲使民族運動內增加帝國主義代理人的勢力起

見，於是那些迄今還站在民族革命鬥爭之外，或甚至軍閥，開始轉變到國民政府方面。這種舉動的目的，是從革命的聯合（無產階級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的手中，奪取革命領導權，以阻礙革命的發展。這些反革命舉動的主謀者，便是國際帝國主義猶在此過渡時期，歷史上必然的，大資產階級必定日漸離開革命。當此時際，無產階級應該從很廣泛的利用現時在事實上還作反帝國主義反軍閥鬥爭的各種資產階級。另一方面，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應該在策略上利用離開革命的各種資產階級間的衝突。如利用帝國主義間的一切衝突一樣，但是決不要忘記無產階級的主要目的，而要在利用敵人的各種衝突之時，使戰術上的應付和策略上的步驟都能一貫的奔赴這些目的（七次擴大會對中國問題決議案）。

這一指示已可使我們了然於中國革命各階級結合關係之變動，各種社會動力的作用及我們應有的戰術和策略。但是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之間總隔着不可逾越的鴻溝，所以這樣明確的指示也竟驚醒不起中共機會主義的領導，故中共政治局竟以下列機會主義的解釋表示『接受』以了之：『國際告訴我們：革命的主要成份是無產階級及

其所領導的農民和其他被壓迫的勞苦羣衆，而不是富裕的資產階級；因此，中國國民革命前途之發展，得超過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照這種「無產階級是天然的領導者」的孟什維克的理論。自然要把與資產階級鬥爭的問題依舊置諸度外，這種解釋很可代表中國共產黨「接受」國際指示之滑稽的典型。

對於革命動力的估計之錯誤，必然要產生在實際行動中機會主義之惡果。對此最明顯的例子便是當時中央直接指導下的上海三次暴動。

在第一次與第二次暴動的時候，黨只發出「歡迎北伐軍」的口號去號召羣衆。後來雖然提出了建立「市民政府」的政綱。在暴動開始的時候，已實際的建立各區市民政府。可是在這當中仍然犯了極嚴重的機會主義的錯誤，就是拋開一般急進的小資產階級，而極力與資產階級妥協。當時資產階級已經開始叛變，蔣介石已經從南昌開刀，經過九江安慶蕪湖一直殺來（殺工人）上海；武漢已經提出「打倒蔣介石」「反對反革命的資產階級」的口號，而中央的路綫仍然是聯合資產階級，仍然提出「歡迎蔣總司令」的口號。結果市民政府因資產階級的背叛，因蔣介石一紙禁止的命令，遂至

無聲無臭的消滅了。到「四一二」的一天，上海工人階級遂遭受了空前的大屠殺，革命的上半，一瞬間遂變成了反革命的上海。

當時客觀的形勢，革命正是空前的高漲，上海八十萬工人都組織在上海總工會之下，廣大的小資產階級羣衆，離開資產階級而同情於工人階級；就是在軍事上，同情於革命的軍隊，仍然是優於反革命的軍隊，蔣介石直接指揮的軍隊都動搖起來。所以假如中央是一貫的堅決執行國際的路綫，在進行北伐的過程中，已準備着鎮壓資產階級的反叛，退一步說，就是在三次暴動的時候，不採取專與資產階級勾結的機會主義的路綫，而是極力與資產階級鬥爭，在準備暴動的時候就很堅決的有計劃的預備第二步鎮壓資產階級的反叛，那麼當時上海的工人階級不一定遭受這樣可怕的失敗，全國的革命也不一定受到這樣可怕的打擊。上海三次暴動是中國革命史上偉大的一頁，是暴動的藝術上偉大的成功（參看本書第四章之第五節），可以垂爲歷史的教訓，可是並不因此就掩蓋了當時機會主義的錯誤，這是值得我們重書一筆的。

資產階級與其軍事領袖背叛革命之主要原因，一方面在於工農羣衆運動之發展與

中國共產黨的勝利，另一方面在於帝國主義聯合壓力之加大。民族資產階級看見羣衆革命運動發展，看見了革命工農羣衆的要求與口號，必然要恐懼起來而與帝國主義軍閥相勾結，不願革命繼續進展——他也真這樣做了，這樣一來，資產階級離開了民族革命聯合戰線，跳到反革命的營壘中去，革命受到部分的失敗，但是走進了更高的階段——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農民與無產階級的聯合破裂了，開始轉變到無產階級農民與小資產階級的聯合，無產階級的作用同時加大。此時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指示之一，便是：『資產階級叛變以後，革命已發展到更高的階段——工農小資產階級的聯合。革命繼續的前進與深入，國民黨左派領袖與某些軍官的繼續叛變，很有可能而且必然不可免。共產黨必須極力調動廣大的下層工農羣衆，嚴厲批評一切的動搖，應時的揭破一切勾結蔣介石與帝國主義的趨向，採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制裁這些動搖的分子，然後才能防止或鎮壓那些國民黨上層領袖不可避免的叛變』。而當時中央執行的路線，却是一味懼怕上層領袖與將軍們的動搖，極力遏止羣衆的鬥爭，以讓步妥協來企求這些領袖將軍們的諒解，不離開革命。實際情形與共產黨所估計的相差甚遠

，結果諒解不可得，共產黨反而跟隨動搖的小資產階級領袖跑，實際上就是跟隨反革命的資產階級跑。

中國共產黨對於革命動力估計之錯誤，更莫過於把國民革命與階級鬥爭相對立去看待這件事了。

中國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不可避免的使他與帝國主義接觸而引起最堅決的衝突，中國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足以掘斷帝國主義力量之根源。中國工人階級的生活程度之低，真是聞所未聞，這種情形，保證了外國資本在中國取得了最高的利潤，反對中國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正可以掘斷帝國主義壓迫所依據的支柱。中國工人階級則因客觀狀況的關係，是力爭中國民族解放最堅決最徹底最不妥協的階級，此種情形，使中國無產階級應得民族解放運動中之領導權。可是中國無產階級要履行自己解放中國民族的使命，只有隨着力爭自己的階級要求鬥爭發展，就是反對外國資本及中國資產階級鬥爭的開展而日益實現這個使命。

中國資產階級因為工農羣衆革命力量之發展，乃亟亟由參加革命而走入反革命營

黨，因此反對封建勢力的資產階級民權革命之完成（土地革命亦在其內），尤其是反帝國主義鬥爭之完成，更必須實現於反對資產階級鬥爭中；澈底的民權解放鬥爭，不但會和工農羣衆運動的開展及土地革命的要求相衝突，而且能直接發展廣大的下層民衆的羣衆運動。誰要民族解放革命得到勝利，誰要中國完全脫離外國帝國主義的壓迫，他便應當促進，擴大并激勵工人農民羣衆的社會階級鬥爭，因為這是澈底完成國民革命的重要原素。然而過去（特別是一九二七年武漢時期）中國共產黨中央却完全是孟什維克派似的，居然把民族解放運動與階級鬥爭對立起來，彷彿認爲階級鬥爭的開展，足以破壞國民革命，而要想叫全黨及工人階級和農民都自己來限制階級的要求，對於中國的資產階級及地主不用革命的鬥爭方法。中央在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九日所發給上海黨部的信，對於上海鬥爭的指示說：『一方面反帝國主義運動消沉下去，別方面工農運動發展到最高限度，至少小資產階級看來是如此。單調的去武裝工農沒收土地，高叫非資本主義前途等等口號，使小資產階級懷疑。』快要革國民黨的命，要進行階級革命而不是國民革命』。足見那時共產黨中央認爲階級鬥爭是一事，國民革命又



是一事，兩者之間有不能相容的衝突存在着。這一信裏又說：『小資產階級看不見沒收土地是國民革命的必要前提，以為只有共產黨要沒收土地實行十月革命似的革命，以增加工農的力量，因此小資產階級不能不提出這種問題，不能不要求限制工農運動，甚至於與共產黨破裂。在這種情形之下，能不能完全接受小資產階級的政策呢？如果這樣，那就是取消我們的力量，拋棄無產階級的領導權而投降蔣介石，這就是資本主義的前途。然而（好一個『然而』！）能否硬要沒收土地武裝工農呢？這個結果就要立刻破裂而消滅革命的根據地。如果我們不能用相當的方法過渡這種難關，那就是資產階級的勝利。我們若因此就拋棄沒收土地武裝工農的政策，這當然不好。譬如湖南反許的問題，我們已經決定領導農民自動的沒收土地，武裝起來，這是獨立的政策。但這種政策太危險了（十足的機會主義者的口吻！），假使我們完全獨立的幹起來，那末，我們和國民黨的關係將要破裂。固然這是光榮的失敗，但是破裂對於我們是不利的，我們應該找新的道路。經過新的道路來渡過現在所遇的危機與困難，使革命深入廣出，而得到最後的勝利』。這一指示的結論是：中央叫上海的黨部『不要看着

國民革命運動是工人問題，而要到了各階級中去宣傳反帝國主義』；這就是說要去宣傳上海資產階級。這真是聞所未聞的不革命的非共產主義的方針。當時中國共產黨中央在這問題上的機會主義是共產主義者受資產階級影響的反映，中央的這種方針，完全與共產國際的指示及決議不符。完全與黨員羣衆工人階級及革命的農民之鬥爭不符。

『誰要替這種機會主義者辯護，或者主張繼續這種機會主義，他便永久和共產主義離別了。』（八七緊急會議告同志書）。

### 第三節 中國共產黨與工人運動

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就是無產階級最先進最革命，階級覺悟最高的一部分。共產黨的工作應當永久從工人階級根本利益出發，要求以革命的方法，變更全社會的組織。共產黨既然以工人階級利益爲最重要的前提，同時，更要提出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時期中客觀上可以解決的要求，在這一革命還沒有達到社會主義革命的軌道上的時期中，都是如此。共產黨主要任務之一，便是組織工人羣衆而指導他們的鬥

爭，堅決的力爭增高生活程度，增加工資，實行八小時工作制，爭得絕無束縛的工人組織及階級的工會之完全自由，爭得無所限制的罷工權，努力反抗以及消滅工人無權無利的奴隸狀況。

這種要求，工人都可以在民權革命中提出，但是必須用無產階級羣衆的獨立鬥爭。共產黨應當發展擴大并激勵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應當領導工人每次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共產國際屢次命令中國共產黨（共產國際第七次與第八次擴大會對於中國革命問題決議案等），要我們力爭增進工人階級羣衆的物質生活，堅決的要求改良工廠生活，提高工人的社會生活，激進的取消一切壓迫工人的法律，要求實行八小時工作，增加工資，極力爭取自己組織工會及罷工之權利。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共產國際第七次擴大會議決議案中說：

「無產階級要在革命中占領導的地位，必須堅強其政治的經濟的階級組織。

共產黨的第一個任務，就是組織和訓練無產階級，使他能盡這個歷史使命。中國無產階級數量之少及其幼稚，須以有組織的力量及明確的思想補償之。

共產黨的基礎，是現在代表幾十萬產業工人的全國總工會與鐵路總工會及海員總工會。共產黨最緊急的任務，是吸收廣大的工人羣衆，以鞏固這些組織。在二年來之國民革命爭鬥中，工人階級展開了很大的力量。在實際鬥爭中，他已獲得革命運動的領導。在這些經驗及成績的基礎上，工人階級的組織，應當按照下列各項，以求更強固發展：

- (A) 創造羣衆的產業工會，以產業爲基礎聯合一切工會，強固全國總工會。
- (B) 加緊羣衆的工作，鞏固工會上級指導機關與下層工人羣衆的關係；職工聯合會之中，要吸收手工業工人，小企業工人以及文化教育工人等。
- (C) 更加注意工人經濟鬥爭，這種經濟鬥爭，應當變爲政治鬥爭；規劃罷工運動的策略，組織互助和罷工基金；幫助和創造協作社等。

(D) 作反對改良主義的方法之鬥爭，以加緊工人羣衆中的教育工作。

(E) 加緊中國職工運動與世界職工運動的關係，對於遠東各國的職工運動，特別須密切聯絡。

爲吸引工人階級羣衆到鬥爭陣地，並加強他在革命中的地位起見，中國共產黨應當宣傳下列的要求之實行。

(A) 革命的工農組織的活動完全自由。工會公開。頒布最進步的工會法，承認罷工權。

(B) 勞工法；八小時工作制，每星期休息一天，規定最低工資。

(C) 社會法；衛生監督及勞動條件之檢查，改良住房，疾病，衰老，殘廢，失業等的危險。保護女工童工。禁止女工作夜工，禁止雇用十四歲以下的兒童做工。

(D) 創立監督工廠的機關。

(E) 取消罰金及肉刑制度。

(F) 撤退工廠裏各種駐兵及警察等。

(G) 救濟失業；擴大工會在失業者中的影響；工會中設工人職業介紹所。

在革命的現在階段中，還有一個很大的後備隊，未曾充分利用他們的革命力

量，這就是被帝國主義破產的城市手工業工人羣衆，他們是反對外國資本的。代表無產階級的先鋒的共產黨，必須組織並吸引這些羣衆，使之參加國民革命運動的總潮流』。

一九二七年五月共產國際第八次擴大會中國革命問題決議案中對於工人運動亦有同樣之指示，並且特別指出發展與鞏固階級工會，爭取罷工權及實行八小時工作制之重要。國際認爲這一政策是萬分必要的。共產國際的這種指示和各地工業區工人羣衆自己鬥爭是相適應的，和共產黨各地黨員團員羣衆的行動亦是相符合的。然而過去共產黨指導機關，特別是武漢時期的中國共產黨中央所走的却是別條路，他只在阻止或緩和階級鬥爭和工人的一般革命行動，中央不去開展推動罷工運動，却同着國民黨領袖規定強制的仲裁辦法，而且最終決定主權屬於政府。這種決定對於資產階級很有利益，可是實在大大的阻礙工人運動；那時國民黨中央已有『不得政府同意，工人不能實行罷工』之決議，又有要工會不爲工人要求而鬥爭，須要遵守勞動紀律的決議，共產黨中央並沒有表示反對。中央以爲限制些工人運動，可以保存和資產階級的聯盟；

沒有懂得我們不堅決的擁護工人階級的利益，只有使資產階級更加右傾。中央想盡方法限制工人的經濟鬥爭，不使他們爲自己階級直接的利益而鬥爭，其實這種要求不能實現，便永世也說不到工人階級在革命中的領導權。中央當時規定這種策略，實是因爲對於工農小資產階級聯盟的觀察是錯誤的。且對於國民革命之利益的觀念也是錯誤的。

自然爆發而發展的工人運動，自下而上建立了強大的工會，完全在共產黨員影響之下，並且發生了武裝的工人糾察隊，及廣大的勞動童子團等等。工人階級自己覺得有些力量，便直接起來反抗資本家，而資本家早已反革命，對於生產則怠工，故意造成工業的危機及金融的紊亂。只要工會逮捕幾個廠主店東，一般資產階級便大叫其『過火』，如是不僅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跟着亂叫，而且那時共產黨中央也跟着這種承認，中央有些文件之中堅決說『過火』怎樣不好，中央竭力的解說給工人聽，說不應占領工廠，即使工廠主的故意關廠，也不應當；說不可以封店，即使店東故意抬高物價，也不可以；又說決不該自由逮捕，即使那些人顯然是反革命黨，也是不該。

潮流似的工人階級向着真正工農民權獨裁進行，中央却盡力阻止工人運動走上這條革命的路。

中央不但沒有設法武裝工人，他反一遇見資產階級方面的不滿意，立刻便自動的解除武裝，解散漢口工人糾察隊。爲保存與小資產階級聯盟起見，中央便下令解散勞動童子團。武漢國民黨中央下令叫工人嚴守革命紀律，還要工會去執行，工會只準處罰工人，違法者交政府處理。共產黨中央對於這種命令，連一句抗議也沒有提出，湖北省總工會接受這等命令，中央亦加以默認。中央對於工人階級表現的獨立性，每次都說是『過火』或『幼稚』。他們根本沒有注意自己所說的話，實在是反革命的大資產階級的話。

黨的指導機關的錯誤，在工人的政治行動上有更壞的影響。武漢工人奪回英租界，是有很大的歷史意義的（參看前面第四章第四節之（五）項），但是這不但不是經過黨的指導機關而實行的，並且中央在事後還說這種舉動不對。又如在中央直接指導下的上海暴動中，中央竟使上海工人階級的武裝暴動，只是成了響應北伐軍的軍事行動



，同時又使工人暴動勝利只成立了一個依賴大資產階級的上海市民政府。當時中央又曾傾向於自動取消上海秘密工會（四一二以後），而使工人加入蔣介石的黃色工會，同時却又沒有注意在黃色工會中工作的任務。凡此種種，都可證明當時共產黨指導機關實在沒有盡他無產階級先鋒的責任，而且還有壓制工人階級鬥爭之可恥的現象，我們必須根本掃除這種機會主義，以開闢工人運動之新的革命的道路。

#### 第四節 中國共產黨與土地革命

土地革命問題是中國的資產階級性民權革命中的中心問題，因為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壓迫，極大部分是依據中國經濟的落後，依據於中國農村中的封建關係；中國社會經濟關係及政治制度中的封建制度遺毒，是外國資本無限制剝削中國民衆之最好的依據。帝國主義維持着地主豪紳及封建式的行政機關，封建階級又轉而維持着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統治。所以非常之明顯的是：反帝國主義的解放運動，同時就在以全力反對地主豪紳的政權。封建勢力的掃除，就是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上嚴重的致命的打

擊。而要根本掃除中國的封建勢力，又只有用劇烈的土地革命。土地革命愈堅決愈劇烈，農民羣衆加入鬥爭的愈多，殲滅地主豪紳的統治愈厲害，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的規模愈廣大，國民革命取得勝利愈有把握。所以土地革命實是中國國民革命的中樞。共產國際特別說明這一問題已經不止一次了。

當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共產國際執委會開第七次擴大會議的時候，就在中國革命問題決議中嚴重的指出了這一問題：

『在現時革命發展的過程階段中，土地問題開始緊張起來，成爲現在局面的中心問題。那個階級能够毅然攫住這個問題而給以澈底的答覆，這個階級就是革命的領袖。中國現在的環境，只有無產階級是能够實行澈底的土地政策的唯一的階級，澈底的土地政策之實行，乃是反帝國主義的勝利及革命往前發展的先決條件。』

中國軍閥的勢力，一方面靠外國帝國主義的幫助，另方面則靠本地地主階級的奧援。軍閥的統治，建築在奴隸式的半封建制度之上——軍閥官僚的政府機關

，地主，劣紳，商業重利資本等的壓迫和剝削幾萬萬農民。發生這種制度的原因，因為那些無土地或缺少土地的農民，他們不得不去受地主及重利盤剝商人等的奴隸待遇，及為城市和軍閥，供給幾百萬苦力和兵士。推翻帝國主義的壓迫，消滅一切封建社會關係之殘餘，解放中國民族，國內社會關係之革命的改革，這些事都相互聯接着，成為中國革命的整個的責任。

要完全推倒軍閥，人口大部分之農民的經濟與政治鬥爭，必須使之發展，成為反帝國主義鬥爭的一部分。以為加緊鄉村間的階級鬥爭，可以削弱反帝國主義聯合戰綫的顧慮，是不對的。不去勇敢地接近土地問題，以擁護農民羣衆客觀的一切政治與經濟要求，這才是革命的大危機。如果因為猶豫，且誤給資本家一階級單獨協作，而怕把革命的土地問題放在民族解放運動政綱的主位上，那便是錯誤的。這不是無產階級的革命政策，共產黨必須免去這個錯誤。

現在情況的特質，就是過渡性，此時無產階級應當選擇他自己的將來：或與大部分資產階級聯合，或與農民強固其同盟。倘使無產階級不能提出農村政綱就

不能把農民拉進革命爭鬥，而失去他自己在民族解放運動中的領袖地位。如此則直接或間接在帝國主義影響之下的資產階級，必將重新起領導作用。假使這個可能性，在現在情形之下實現，就是加強外國資本在中國的地位。

如果不能使民族解放運動，和農村革命，合而為一，則廣東國民政府將來不能保持政權，革命將來不能進展至完全戰勝外國帝國主義與國內反動派。鄉村階級分化的增長，加緊農民羣衆與剝削階級間之爭鬥。共產黨必須十分注意鄉村間的階級分化，及從此而起的劇烈鬥爭；共產黨應為農民運動的指導者，並提出相當的政治經濟口號，以助農民運動之發展。

中國共產黨應當承認『土地國有』為無產階級的農村政綱之基本要求，但在現時，必須按照中國各地的特殊經濟政治情形而分別的應用農村策略。

在農民運動中，關於政權問題，中國共產黨應當努力贊助推倒鄉村間的土豪劣紳的官僚政權，以革命政府之下級機關代替舊的半封建的官僚政權。這種鄉村間的革命政權，須是能執行革命政府命令，及擁護大多數農民利益的。農民應當

參加縣政權機關之創造。

在國民黨政府管理下的境界內，農村革命的政綱，須有具體的方式。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必須立刻實行下列辦法，使農民到革命方面來：

A 減租至最低限度。

B 除去加在農民身上的各種名義的雜稅，而代以劃一的農業累進稅。

C 對於大多數農民羣衆所負擔的稅額，須爲之作最高度的整飭和減少。

D 沒收屬於反動軍閥的寺院地產，及對國民政府作戰的買辦，地主，劣紳等之土地。

E 担保佃農永久租借給他所耕種的土地，并由農民協會與革命政權的代表決定最高限度的地租。

F 廣東政府必須竭力擁護農民的利益，特別保障農民，使不受地主劣紳重利盤剝者的壓迫與束縛。

G 解散民團和其他種種地主的武裝隊伍。

H 武裝貧農與中農，使鄉村間一切武裝力量，服從革命政府。

I 政府給與農民組織（農民協會在內）以最高度的幫助。

J 組織國家低息借錢的機關，堅決的反對重利盤剝。并幫助這一類的農民組織及其他互助組織。

K 國家幫助協作社及互助機關。

共產黨的任務，就是要使廣東政府實行上列的辦法，亦即是使農民革命，進到更發展的階段的過渡辦法。實行這個極重要的任務，必須建設在共產黨領導之下的農民委員會。在革命的發展過程中，農民委員會必能獲得實行上述各種要求所必需的威信和力量，并能加緊鬥爭，提出更澈底的要求。」。

一九二七年五月共產國際執委第八次擴大會議對於中國土地革命問題仍舊繼續以前的指示。這一決議案中說：

『中國革命中艱鉅的困難，尤其是因帝國主義聯合勢力的武裝干涉或他種干涉，以及中國國內動搖的社會成分叛賣革命投降敵方所生的困難，造成了目前鬥

爭的條件；爲戰勝這種困難計，必須廣大勞動羣衆加入鬥爭始可。要想引導羣衆加入鬥爭，只有在鄉村實行土地革命，在城市中滿足工人的政治和經濟要求，才有可能。要堅決取消繳納富豪之佃租，分配土地，沒收大地主官僚寺院等等之一切田產，禁止高利契約，取消貧農受重利盤剝之債務，大減賦稅，課稅攤派於富豪之家等等，——這些要求必須在全國，首先在武漢政府領域之內實現出來；必須拿這些口號去發動羣衆，使之反對地主及叛賣革命的資產階級，並反對北洋軍閥。

土地革命，其中包含沒收土地及土地國有——這是中國革命新階段之主要的社會經濟內容。現時主要的就是要用『平民式』的革命手段來解決土地問題，使幾千百萬農民羣衆起來自下而上的解決土地問題，而共產黨則應當做這一運動的領袖，指導這一運動，並且共產黨應當在政府中實行一種政策，使政府自己贊助土地革命之發展的政策。只有如此，方能將現時的政府，變成工農運動的政治組織之中心，變成工農革命獨裁的機關』。

然而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機關的工作，恰好和這種革命方針絕對相反，湖南農民運動發展，成了強有力的土地革命，其他各省，亦有極大的農民羣衆起來反對豪紳地主，然而這都不能算是過去中央所指示發展的，乃是違背他的指示意旨而做出來的。事實上中國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中，只有自下而上的農民運動，各地農民運動只有下級黨部及黨員羣衆領導着，中央只是時時阻滯革命的農民運動，甚至於拉他向後轉。『這一問題是最主要的問題，是機會主義最深的禍根。中國共產黨當初對於農民問題差不多沒有注意。中國革命中無產階級之主要的聯盟者是農民，無產階級的領導革命，必須是取得對於農民羣衆的領導權，這就是說必須有明確的土地革命的黨綱。但是中國共產黨並沒有，——直到五次大會。五次大會（一九二七年五月）之前，對於農民運動的意見有許多：①最早有說「國民革命不得農民參加也難成功」的；②有說「誰能真正打倒軍閥，幫助農民反抗地主的壓迫，農民便跟着誰走」的；③有說「不得農民參加，革命不能成功」的。但是關於土地問題，誰也不會說起——認真的說起。後來農民運動事實上大大發展，農民政權與土地問題成了事實的問題，中央才一步步「落



後的」追着農民羣衆走。總之，當時有一個一般傾向，便是認農民運動是日益重要起來了，無論中央主觀上如何的講「鄉村聯合戰綫」，也不能拉得住農民了；無論中央如何認爲「不應當空想出地主問題來講土地問題」，也不能「勸醒」農民或鄉村中的「共產主義的實行家」了；於是對於農民運動，不得不認爲他是國民革命中的重要動力，但是對於土地革命始終懷疑。中國革命只被認爲反帝國主義革命——五卅式的革命，不認爲土地革命。一切「耕地農有」直到「不宜由農會議決實行減租」之激進的或妥協的決定中，都沒有堅決明顯的對於革命內容之認識在內。所以對於以土地問題來決定國民黨左派是否真正左派，始終是不贊成的』（見瞿秋白著『中國革命與共產黨』第七十八至七十九頁）。當時各省歷次的農民協會代表大會時（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湖南全省農民協會代表大會及一九二七年一月江西省農民協會代表大會），中國共產黨都沒有拿出自己對於土地問題的政策。直到一九二七年三月湖北省農民協會代表大會方才提出這一問題。

在第五次黨大會時（一九二七年五月），土地問題決議案雖然通過了，但是當時

黨的領袖陳獨秀譚平山（後來都背叛無產階級已被中國共產黨陸續開除出黨）等，却說現在只要擴大而暫時不能深入革命，所以沒收土地還要等一等。

國民黨中央的土地委員會開了三個禮拜，以譚平山爲領袖的共產黨員改變了自己的主張，兩次都是看着國民黨代表是否接受而改變的，最後擬出了一個草案，只在原則上定出解決土地問題，而不求立即解決，當到國民黨中央決定不公布這一議決案，共產黨黨員之中，沒有一個人提出抗議的。

共產黨湖南省第七次省委擴大會議，甚至決定凡田租超過收入百分之五十者始行要求減租——這個時候是湖南農民協會開始積極的鬥爭，甚至於已經實行分配土地的時候了。

中國共產黨指導機關反對土地革命的方針到處可以發現。一九二七年六月一日中央宣傳部通告說：『我們應當記着，我們黨對於農民的政策是堅決的實行制止反對小地主，革命軍人，小資產階級的過火行動』。六月十四日中央通告中又說：『放任農民無組織的自由行動來解決土地問題，已經引起了無數的過火行動，這種情形，必須

糾正」。當時中國共產黨中央不但跟着地主軍閥及小資產階級極力反對農民運動中的「過火行動」，而且甚至於還有一種非常可恥的論調，居然說武漢境內的過火行動是蔣介石奸細所做的——這簡直是代表武漢將軍們說話，因為他們也說這種過火行動是蔣介石奸細做的，可恨共產黨的指導者也居然這樣無恥的替壓迫農民運動的人辯護。全國農民協會的訓令說：「蔣介石及土豪劣紳利用少數農民，侵犯軍人家屬的事，專門從事挑撥離間，他們故爲左傾之宣傳，而後再從而壓迫農民運動」。中國共產黨負指導者之一會說：「自由逮捕，使小資產階級戰顫不安，他們覺得彷彿國民政府做了共產黨的俘虜了，他們這種感想必須使之消滅」。實際上當時國民政府並沒有做共產黨的俘虜；倒是我們這位替反革命抱憂的共產黨員却實實在在做了國民黨的俘虜！

上述情形，足可說明，當時偉大的兩湖農民暴動，不但驚嚇了地主軍閥及資產階級，甚至於驚嚇了共產黨的指導者；那時正是各地共產黨羣衆力爭這個運動的發展，勇敢的犧牲的精神非常之可貴，然而中央受着國民黨領袖恐嚇猶豫的影響，不但不能提出革命的行動政綱來解決土地問題，而且還處處阻礙農民運動的前進。對於農民政

權問題，也是非常之機會主義的，不去考察農民羣衆革命鬥爭的經驗而引出相當的結論來，却想只靠着死板組織鄉村自治的系統表——這不但不合實際生活，且大有害於革命，其實客觀革命潮流已經將革命的政權交付於農民協會，發動了沒收大地主土地及減租的運動，解除了民團豪紳的武裝，懲治鄉村中的反革命派。

黨的中央不去贊助並發展這一革命政權的方式，反而同意國民黨中央提出死板的組織農村自治，這農村自治的意義是怎樣的呢？只要看全國農民協會的訓令就可以知道了。這一訓令上說：『建立鄉村自治以鞏固農民之勝利，而消滅鄉村中之無政府狀態』。這就是說農村中一切農民自動沒收土地，自由逮捕豪紳的現象，都應使之消滅，而恢復地主豪紳之秩序。這還說得上甚麼『鞏固農民之勝利』呢？！

中央雖不敢公開的反對沒收土地，然而一切實際政策都是取消這一口號。五月二十五日的中央決議上說：『關於土地問題，我們固然不能放棄第五次大會所議決的政綱，但我們須知道中國土地問題尚須經過一相當的宣傳時期，並且必須解決土地問題之先決問題——鄉村政權問題。因此，我們即須：（一）擴大土地問題在各方面之宣傳

，尤其在軍隊中；（二）着手建立鄉村自治政權及縣自治政權』。如果將這一決議和各地農民羣衆自動沒收土地之事實併在一塊兒看，那末共產黨中央機會主義的方針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了！

這種政策對於湖南政變中黨的行動有異常之惡劣的影響，長沙馬夜事變之後，因湖南共產黨員的建議徵調農軍，進攻長沙的反革命，如果農民的武裝進攻不受黨的指導機關之懦弱的猶豫的阻滯，那末，一個長沙城被十萬農軍所包圍，並不是不容易打下来的。最後的幾分鐘，正當進攻長沙的前夜，中央政治局的委員湖南黨部的指導者下了一個命令，取消進攻長沙的計劃，說武裝進攻長沙可以引起整個政局之糾紛，應當等一等中央的訓令，隔了一天，中央的信到了，也說應當等一等進攻，先團結些力量，等國民政府來解決，停止進攻的命令送到了各地的農軍，大多數農軍因此而退却，只有瀏陽的農軍部隊偶然沒有接到命令，因此而有五月三十一日下午瀏陽農軍單獨進撲長沙之壯舉，經過堅決的奮鬥方始因爲衆寡不敵而退却。這一總敗退的結果就使反革命大奏凱歌，後來弄到幾月幾年全省的大反動。共產黨中央在農民暴動的關頭，

表現這樣沒有鬥爭的決心，簡直等於出賣革命，這是無論如何不能辯護的，的確是我們黨歷史上的一個污點。中央何以決定停止暴動呢？只要看看五月二十六日議決案就可知道：『現在本黨的責任既不是推翻他們（仇敵），也不是我們完全投降，還有中間的路；要找這中間的路，現在不宜於直接和他們武裝衝突，我們的責任是等候時機，深厚自己的力量以準備不可免之進攻』。中央表現如此可恥的無決心，實際上不是幫助農民運動等候時機，乃是幫助反革命的長沙叛徒等候時機。長沙事變時，中央的投降政策到了如何地步，只要看當時決定贊助唐生智專電的主張，中央總說唐生智的好話，引起許多幻想，彷彿長沙事變，是違反唐生智的志願的，中央雖然有時在口頭上提出對於長沙摧殘工農團體的抗議，並要求懲辦革命的叛徒，然而中央在實際上的動搖猶豫，完全幫助了湖南事變的反革命派鞏固政權。

這種敗亡的失策，應當給我們以嚴重的教訓，中央對於土地革命問題上的機會主義竟如此之深遠，甚至於弄到所有緊急關頭與指示，都帶着有背叛羣衆運動的性質。

不僅如此，共產黨在國民政府中的代表譚平山（農政部長）的行爲，更是萬分可

恥！當時國民政府農政部極力反對土地革命，極力想使農民運動就範，走上資產階級式改良主義的道路。農政部在五月裏出了一個佈告說：『必須糾正農民幼稚行為，尤其不能不懲辦其出軌範而侵害無數農民之分子。至於與反革命奮鬥，懲辦土豪劣紳，則須以合法的手續進行，遵照黨及政府之訓令規章，即須交付正式官廳，不得自由行動』。這一佈告及一切農政部的行為，最足以表現當時共產黨對於土地問題之反革命的妥協的方針。

中國共產黨這種對於土地革命機會主義的方針支持得很久，一直到八七緊急會議都沒有完全糾正過來，甚至還依然定出『沒收大中地主的土地，對小地主則減租』這樣不正確的策畧。在實際行動上則在八一南昌暴動與葉賀南征過程中，起初有『只沒收二百畝以上地主的土地』之規定，接着又改爲『只沒收五十畝以上地主的土地』，都顯然是機會主義的留毒！

到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央擴大會議，雖然糾正了這些錯誤，但是黨中對於土地革命問題還始終沒有一個明確的認識，所以中央接着便又提出『沒收一切土地』的口號

，這自然又犯了抹殺農村中階級意義的錯誤，同時各地農民暴動及少數鄉村蘇維埃區域不能堅決實行沒收地主土地的現象也還有不少存在。直到一九二八年六月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才得堅決確定『沒收地主階級土地』的口號，通過土地問題決議案，定出土地黨綱，於是中國共產黨對於土地革命問題才算得到了初步的認識。

## 第五節 中國共產黨與參加革命政府問題

中國共產黨中央對於國民黨政策之不正確與違背共產主義原則，在其參加國民政府委員的同志的行動上，與黨對於參加國民政府的整個方針中也充分表現出來。中國共產黨中央對此問題的立場，亦與其他許多主要革命問題一樣，和國際的方針及初步的共產主義政策都發生衝突。

本來在廣東時期，共產國際就主張中國共產黨應該堅決參加國民政府，領導廣東國民政府走上工農民權獨裁的道路，共產國際在其七次擴大會議對中國問題決議案中說：



「爲着加緊共產黨在國民黨裡的活動，以推進革命運動往前發展起見，共產黨應當加入廣東政府。以幫助左派反對右派之懦弱而動搖的政策。廣東政府轄地之廣大的伸張，使共產黨參加國民政府的問題，比任何時更成爲必要。」

廣東政府，雖然是資產階級民權性的，但究其根基和客觀上，則包含有無產階級，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等革命聯合的民權獨裁制之萌芽。小資產階級民權運動在中國之所以是革命的，因爲他是反帝國主義的。廣東政府之所以是革命的，第一亦應有此反帝國主義的性質。因爲中國的革命及由革命而產生的革命政府，第二均是反帝國主義的，故必須打擊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之根基。取消不平等條約與收回租界，尙不足削弱帝國主義的地位。必須從經濟上，打擊帝國主義的勢力的基礎。這個意思，就是革命政府，應當逐漸沒收屬於外國資本的鐵路租界工廠鑛山銀行企業等。如此才能即刻擴充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狹路，而走入到革命獨裁的過渡階段」。

中國共產黨雖然曾經參加廣東政府，而且曾經指導廣東國民政府反對帝國主義及

其工具，在中國大革命的第一階段中，廣東國民政府所以能够形成全國革命運動的中心，毫無疑義的，中國共產黨有着很大的作用。然而嚴格的說來，共產國際這一明顯的正確的指示當時並沒有被中國共產黨所重視，中國共產黨過去參加廣東政府的根本政策與國際的指示是不符合的。

革命的進展使共產國際八次擴大會對於中國共產黨參加革命政府問題不能不更有深切的指示：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以爲看輕武漢政府的意義，因此實際上否認他極偉大的革命作用，這種見解是錯誤的。武漢政府及國民黨左派領袖，就其階級成分而言，不僅代表工農及手工業者，亦代表一部分中產階級（資產階級）。所以國民黨左派的武漢政府還不是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專政，但他已經走向工農專政的路上；在階級鬥爭中，如果無產階級獲得勝利，趕去了那些跟着資產階級跑的人們，戰勝了無數叛變之後，則武漢政府便必然發展到這個專政的方向去。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認爲，中國共產黨積極參加武漢「臨時革命政府」的活

動，是必要的。那個不主張參加，或對於此問題抱一種不定的懷疑的態度，他形式上很是「激進革命」，但在實際上是重演一九〇五年俄國少數黨的錯誤：俄國少數派那時以為參加臨時革命政府是不可能的，甯願組織「極端左派的在野黨」，但是實際上跟在資產階級自由派的背後，搖尾乞憐！

少數派的態度的特點，正因為他反對參加革命的政府，而參加反革命的混合政府。

參加武漢革命政府與歐州資產階級社會黨的混合政府，並無絲毫相同之處，因為武漢政府的確用革命的戰爭，反對帝國主義者，反對封建制度，現在更反對本國資產階級之大部。

因此，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認為，中國共產黨必須積極參加武漢中央及地方政府機關；同時，對於自己最親密的盟友之不十分堅決，也要加以批評，並確定政府的政策之正確路線。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促中國黨特別注意：革命政府與民衆間的親密聯合，在

目前實在是在空前的必要。只有靠着這種親密的聯合——這種聯合是特別要國民幫助才能做到的，只有堅決的打條走向羣衆的路綫，才能永久加強革命政府的威信和地位，使政府成爲革命的組織中心。

爲武漢政府劃定這條路綫，是中國共產黨的任務。不實現此項任務，不擴大羣衆運動，沒有農民革命，不堅決改善工人階級地位，不變國民黨成爲勞動羣衆的真正的偉大的組織，不繼續加強職工會，擴大共產黨，不造成武漢政府與羣衆間之最密切的聯絡，則勝利的完成革命是不可得的。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以爲，共產黨人參加政府，僅僅可用這策略辯護。不是這樣，則參加政府將成爲領袖結合政客勾結的戲劇，受了實際生活的沖刷，受了偉大的階級鬥爭之進展，必至烟消雲散。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樁任務，便要把政府中的活動和羣衆中的活動聯結一起。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以爲，在目前的條件之下，擴大國民黨內民主化，收容最廣大的羣衆，迅速發展各種工農的羣衆組織，最合革命的需要。中國發展中的

特點，像革命的國民黨這樣特殊的組織，可以直接決定政府的成分，是絕不可忽路過去的。用國民黨收容廣大民衆，使羣衆選舉國民黨的指導機關，經過這些在選舉制的基礎上建設的組織，成立民族革命的政府——這是勞動羣衆和革命的國家政權間聯合的特殊形式，此形式適合中國革命的目前階段。因爲武漢政府統治下各省狀況之不同，則地方政權的組織，在最初時期，必然採取種種色色的形式（在鄉村間「農民委員會」「農民協會」政權，以及國民黨委員會政權等等）。共產黨人組織地方政權時的主要任務，便是領導廣大勞動羣衆，領導千百萬工農參加組織和工作」。

這就是共產國際爲參加武漢政府問題對於中國共產黨的指示，當時中國共產黨固然也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而參加武漢政府了，然而中國共產黨參加武漢政府的政策却恰恰與共產國際所指示的相反。當時共產黨中央與國民政府中共產黨員所擔任的部長做了些什麼？請看八七緊急會議告同志書中所舉出來的事實：

共產黨員在得到委任令後兩月，才開始組織自己的部務。農政部長譚平山（當時

的共產黨員後來公開背叛革命，組織反革命的第三黨）就職典禮的演說，除批評他是可恥以外，沒有別的話說。他對於土地革命沒收土地，消滅土豪劣紳地主階級在農村中的政權，都默默無言，他却說了一些自由主義的『改良農民狀況』和反對『過火』的話。譚平山就職後馬上就發表對農民的訓令，禁止農民反對豪紳地主的『妄動』，違犯則『嚴罰』。

實在的說，當時武漢國民政府中共產黨員所擔任的農政部及勞工部與其他的官僚機關並沒有什麼區別。他們就職後幾個月內沒有公布過一個減輕農痛苦狀況的法律，沒有一個改變城市和鄉村中剝削壓迫的法律及改良經濟關係的法案（如勞動法案，土地法案等等）。有些並沒有預備向政府提出。這些部長的共產黨員的工作，照國際的指示應該堅決引導武漢政府走向羣衆的路綫，用最大的努力贊助農羣衆運動，造成革命政府與羣衆的密切聯系，同時要堅決批評自己的同盟者所表現的一切動搖與妥協性；然而實際上竟完全和這一革命政策相反，當時我們共產黨中央與政府中農政勞工兩部長不會有過一個革命的建議，對於武漢政府包蔽反革命之種種錯誤，也沒有一

點批評，而且農政勞工兩部亦竟成了最腐爛的資產階級官僚政治，只是在羣衆面前消去共產黨的面貌；特別是農政部長的政策，除了說他是反對農民的政策，孟什維克的政策，簡直沒有別的適合名稱。土地問題應該是農政部頂主要的問題，但是完全被他忘却，甚至農政部發到各省的調查表，竟無一個對於土地關係問題的。不僅如此，當時農政部長譚平山上任第一件事情，就是打算『鎮壓』湖南的農民運動；中央對此是贊成的，並且還要他到湖南去做出征的領袖，實行『恢復秩序』的任務；這一次出征已經成行，但走到了目的地，而長沙已發生反革命的叛變，這次叛變很敏捷的很徹底的實現了譚平山所担任的出征之任務。

當譚平山結束他那不光榮的部長之地位時，還是藉口長期請假的退去。當反革命漸漸在武漢境域內鞏固，當國民黨正在醞釀不要共產黨參加政府的趨向，以便可以完全的自由壓迫工農運動，而與蔣介石及其他反革命軍官妥協時，譚平山却很願意去迎合反動軍官與多情的國民黨領袖之希望。他的拿手的辦法，是藉口於理想的病症，來實現他的部長假。並且他的請假，是事先與汪精衛商量，然後再與中央討論；但中央

不僅不反對他這種行動，反而完全同意這種計劃。因為六月三十號中央會議上通過的國共關係十一條大綱中有說：『參加政府工作之CC分子，爲圖減少政局之糾紛，可以請假』（參看前面『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關係問題』一節）。在中央看來，同意於臨陣脫逃，乃是所謂『革命』的政策。

譚平山既因病（！）而請了長假還不夠，還要說：『因政局困難未能納農運於正軌』。一個當國民政府部長的共產黨員在最負責任的時期中，由戰場上脫逃還不夠，而且重新要向農民進攻一次。每個人都應當問一問，從這句話裏得到的是什麼結論？即：（一）農民運動走上不正的道路；（二）只有武力能糾正他，因為共產黨員的部長有了共產黨與羣衆組織的完全威權，尙還不能『納入正軌』呢！這是直接承認許克祥之在湖南，夏斗寅之在湖北的動作（屠殺農民）是對的，這簡直是直接號召反革命的代表們進攻革命。共產黨員的部長在政府內做了這些玩意，實在是共產黨的最大恥辱！但是中央對於譚平山這種反革命的行動，不僅沒有處罰，並且沒有發表一句話。本來中央亦無從反對起，因為這正是他自己的政策。



共產國際主張中國共產黨參加武漢政府，是爲的要更左的去推動此政府到革命的路上去，是爲的要消滅所有的反革命成分，并經過堅決的實際的革命鬥爭去得到廣大羣衆的贊助，變武漢政府爲工農民權獨裁。中央對此問題的革命提議，完全不了解。他變共產黨參加政府爲資產階級改良的部長主義。這與多數派主張共產黨員參加『臨時革命政府』（一九〇五年）的見解相差不知有多遠。當一九〇五年俄國亦是同樣的民權革命的任務（自然中國的民權革命還有自己的特點），亦有無產階級政黨參加革命政府之要求，而且亦是與小資產階級聯合的問題，列甯對此，在其『兩個策略』的小冊子中說：

『我們還應當爲臨時革命政府，指出一個合於目前歷史客觀條件，且合於社會民主派目前責任之行動與無產階級之德謨克拉西的政綱。這個政綱，就是本黨的全部的最低限度的政綱，是在現有的社會的經濟之關係的基礎上，最近儘可實行的政治經濟改造的政綱，亦即本黨最近將來全能見諸實行的政治要求與經濟要求，這是一方面根據目前社會經濟關係的必要，別方面就是爲今後鬥爭起見，爲

實現社會主義起見，這都是不可少的要求。』

『無產階級爲要實行自下面的來威逼政府，就應該武裝起來。武裝威逼的目的，是爲保持鞏固并發展革命的勝利，從無產階級的利益觀點上看來，這些勝利，應爲本黨全部最低限度黨綱之實現。』

『臨時革命政府是爲革命趕快得到勝利且即時壓倒反革命的鬥爭機關，而決不是求實現一般資產階級革命的歷史任務之機關。』

『且這種勝利定將成爲一種專政，就是他必須要依靠武力，依靠武裝的羣衆和暴動，而不是依靠什麼別的機關——用合法的和平的方法而造成的機關。因爲要實現爲無產階級及農民一些急不容緩的要求，必是要引起地主與大資產階級以及專制政府之殘酷的反抗，只有用專政來對付，沒有專政便不能壓倒此種反抗與打破反革命之企圖』。

一九二七年七月之後，武漢政府亦變成專政的機關，但不是工農的革命專政，而是地主軍閥資本家的專政，而中國共產黨的指導者之機會主義的政策，即是客觀上幫

助這種專政的實現的。

這裏連帶有一個問題必須加以簡單的說明，這就是托洛斯基取消派主張在武漢時期（一九二七年五月）建立工農兵蘇維埃的問題。托洛斯基這一主張，是從他整個路線之下得出來的結論。他認為國民黨是資產階級的政黨，資產階級是反革命的，武漢的國民黨政權就是反革命的政權，所以應當建立蘇維埃的政權來推翻國民黨的政權。共產國際的路線是認為國民黨是民族革命的各階級聯盟的特殊的組織，一九二七年四月蔣介石的叛變，是反映資產階級的離開革命，武漢國民黨便是代表着革命的新的階級結合——工農小資產階級的聯盟。所以當時武漢國民黨是革命的組織，武漢政府（一九二七年七月以前）是革命的政府，因為國民黨是一種民族革命的各階級聯盟的特殊組織，所以他的階級內容可以隨着客觀的階級關係的轉變而轉變。因此在武漢時期共產黨的政策，應該號召廣大的工農羣衆加入國民黨，使他成爲一種羣衆的組織，同時極力擴大國民黨的民主化，實行羣衆的民主選舉，漸次推翻動搖的小資產階級的領袖，以至把他開除出國民黨，使國民黨政府轉變成爲工農政權，使工農民權獨裁在

國民黨這一特殊組織的形式之內表現出來。這就是革命政權內部轉變的策略。如果革命已經向更高的階段發展，預備過渡到無產階級專政的時期，當然毫無疑義要建立蘇維埃以代替國民黨政權，所以應當極力擴大并鞏固工會農會的組織以準備蘇維埃的基礎。在理論上如果說托洛斯基主張在武漢時期（一九二七年五月）建立蘇維埃是對的，那末便應首先退出國民黨；若一方面留在國民黨之內，同時又建立蘇維埃去推翻國民黨政權，便是不能解答的矛盾。在當時的事實上，運用革命政權內部轉變的策略來建立工農政權比較用蘇維埃政權來推翻武漢國民黨政權的策略更便利得多，所以托洛斯基取消派的主張是錯誤的。

## 第六節 中國共產黨與革命武裝問題

過去中國共產黨對於這一問題的觀點，亦是完全錯誤的。有一個俄國同志所做的一本『武裝暴動』小冊子上，曾經簡單的確切的論到這個問題，現在節錄如下：

『說到共產國際支部對於軍隊中工作之缺點，在這裏應該簡單的論到中國共

產黨之錯誤。當與國民黨合作的時候（一九二七年七月以前），中國共產黨有非常順利的條件，可以在國民革命軍中進行政治工作，使兵士羣衆革命化。但是中國共產黨，正確的說，中共的中央委員會（在一九二七年八月會議以前之黨的指導機關），因爲他對於中國革命中之最基本問題採取的是投降的雙料的機會主義的政策，所以對於國民革命軍中奪取兵士羣衆的革命工作也完全沒有進行。試看一九二五年廣東軍事委員會關於在國民黨軍隊中之工作大綱會怎樣說：「我們在革命軍中的工作，不在於破壞國民黨的軍隊而在於鞏固國民革命軍而保持其統一。我們不應當在軍隊中進行我們的觀點與國民黨的觀點不同的政治宣傳而引起軍隊的破裂」。這一段對國民革命軍之關係的論調，可以看作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合作時自始至終的政策的一覽表，牠完全與中國共產黨在八七會議前之一個著名的領袖陳獨秀的觀點相符合。陳獨秀說：「先要擴大革命，然後再深入」就是說在國民革命還沒有打倒北方軍閥（張作霖等）和佔領北京以前，土地革命的發展，與國民黨政策不符的工人階級之革命運動的發展，在軍隊中之革命的工作（爲

的是不破壞他的一致及不損害他的戰鬥力起見)也是不容許的。這些事情僅只有在北伐成功以後才可以實行。因此共產黨僅只在軍隊中做了合法的工作，而拒絕在軍隊中組織秘密的黨的支部。因此在國民黨叛變的時候，他很容易將共產黨員由軍隊中趕出去，而我們黨在軍隊中表示沒有一點組織上鞏固的影響，於是黨便失了軍隊。

當北伐的時候，中國共產黨甚至於完全沒有提出奪取革命軍中之軍官地位的問題，雖然在當時對於實現這種任務的條件是非常順利的。因此在國民革命軍中之共產黨員的軍官是很難以遇見的，有之則是幾個下級軍官班長，排長，連長，至於營長便非常之少了。一九二六年末命令葉挺當團長，與其說是共產黨自覺的工作之結果，不如說是乃是李濟深當時的策畧，但是事實上即是在葉挺這一團中，雖然這裏有很多的共產黨員，而實質上仍然是與其他軍閥的軍隊沒有什麼區別。在這一團中既沒有驅逐反動的軍官，在兵士羣衆中也沒有進行政治工作，軍隊中也沒有政治機關。他的變動僅只是將這一團的領袖，用共產黨員代替了軍閥。

在中國共產黨的整個指導時期中，未曾有一次提出將葉挺這一團擴充爲師，而在裏面設立政治工作的問題。僅只是在南昌暴動不久以前，才將這一團擴充爲師。缺乏政治工作，沒有適當的政治口號，這是葉挺及賀龍於一九二七年十月在汕頭失敗之基本原因中的一個。

在北伐時期中，黨員的數量是很快的增長了，但是在軍隊中之共產黨員的數目仍然是很少的。如在一九二六年十月初國民革命軍計有九萬四千人，內中的共產黨員僅只有一千二百人，其中有九百個是在留守廣東的軍隊裏。在一九二七年中，軍隊中之共產黨員的數目固然已經增加了不少，但是對於軍隊中工作之指導是一點也沒有的，因爲根本就沒有指導軍隊中共產黨員的工作之中央機關。

在下層兵士羣衆中的政治工作幾乎完全沒有進行的（若在有些地方進行了的話，則完全是當地軍隊中之共產黨員自動去做的），雖然黨的領袖們有時也記得這一句漂亮話：必要鞏固共產黨在國民革命軍中的影響。兵士羣衆們往往不知道共產黨的存在，或是知道他的存在而不能看見他與國民黨的區別。黨的領袖們不

注意軍隊中之真正的革命工作，盡量去與軍閥將軍們做上層拉攏的伎倆，目的在保持軍隊中的一致，高談其左派國民黨之真正原則』。

除此之外，中國共產黨八七緊急會議（一九二七年）告同志書中還舉出了下列的事實：

「人人都知道武漢政府之中極大多數（少數共產黨員及黨所號召他們加入軍隊的工農除外）都是雇傭軍隊，和中國其他軍閥的軍隊是一樣的，人人都知道這些軍隊的將領大多數都是由地主和資產階級出身，他們暫時與革命相伴，不過是借此升官發財。共產黨的領導者應該了解對這種軍隊的關係，共產黨的路綫應完全以兵士羣衆為標準，而不是以反動將領為標準，共產黨應當在兵士與下級軍官中發展廣大的工作，在軍隊中造成堅強的基礎以資反對那些反動的將領。

然而中國共產黨的觀點與行動却完全與此相反，一切政策及工作都只是和將領辦外交，只注重種種方式的軍事結合，實際上在兵士羣衆中沒有任何工作，也沒有想到要進行這種工作。雖然軍事問題很重要，然而第五次大會（一九二七年



五月）竟沒有討論牠。而中央軍委討論了三四個月的軍隊中工作的問題，也沒有結果。

可是和蔣領談話辦外交却有許多的時間，對於唐生智朱培德等類的反動派，中央那時的政策都是非常機會主義的，湖南政變及隨之而至的對工農羣衆的大屠殺，都是唐生智部下幹的。唐生智當然是與謀的，他到後來都正式和與以合法的承認。然而中央所決定湘贛事件的宣傳大綱之上說：「湖南政變是背叛唐生智的，因唐贊成湖南民權運動，並表示好意於被壓迫的農民」（六月十四日）。那時湖南的情形已是很明顯的了。

湖南每一個工人，每一個農民，每一個共產黨員聽見了這種宣傳，豈不要冷笑？然而中央還不限於此種口頭上的宣傳，甚至於組織總示威反抗長沙的事件的時候，同時還在歡迎北伐凱旋的北伐將領，這樣奇怪的事。居然是事實，居然在武漢實現——難怪汪精衛說共產黨勾結軍人。

關於朱培德的事亦是如此，朱培德驅逐共產黨員及左派國民黨員出江西，我

們自然要反對這種策畧和他們的陰謀，然而中央始終等待猶豫，繼則決定，開始總的反對江西之變動，不提朱培德的姓名，彷彿是說，朱培德總算爲人好些，如果他也離開我們，反動更要厲害，這樣說來，朱培德還不是江西反革命領袖，而是我們的保鏢，所以應當對他包涵些。黨的指導機關的機會主義，竟陷落到如此之深。

這種對於軍隊的態度，也就使中國共產黨中央始終沒有認真想到武裝工農的問題，沒有想着武裝工農的必要，沒有想着造成真正革命的工農武裝。中央軍委對此完全沒有工作，也沒有提及一般共產黨員的軍事訓練——這實在是共產黨第一等重要的責任，沒有提及有系統的集聚那散亂零碎的工農武裝隊伍，使以後成爲有組織的堅固力量時，便做發展革命的真實的擁護者，沒有想盡方法去取得武器以武裝工農。中央那時認爲武裝工農是次要的問題，甚至於以爲武裝工農是有害於與國民黨軍隊領袖聯合的，所以根本不積極去做，到國民黨左派領袖已經由動搖而趨於反動，中央忽然「積極」起來，然而可惜是相反的積極，是積極自動

解除武漢工人糾察隊和勞動童子團的武裝（一根短棍子也被解除）。「爲避免挑撥離間的衝突起見」，自動的解除武裝，這不是公開的取消主義是什麼？」。

中國共產黨領導機關對於革命中這樣重要的問題，却採取了這樣的態度，這便是他對於中國革命一切根本問題之機會主義路線的直接結果。

## 第七節 黨的生活與國際的關係問題

黨在組織上的機會主義也非常厲害。對於羣衆的懼怕，不信任羣衆的力量，在黨內問題上也是如此。黨的指導機關中佔大多數的是知識分子及小資產階級的代表，而不是產業工人同志。因此在階級鬥爭的緊急關頭，常常表現動搖以至於背叛革命利益。共產黨中央完全受不着羣衆的監督，不提出黨的政策交一般黨員討論，黨內完全被一種家長制度支配着，陳獨秀便是施行這種家長的制度的典型。一九二七年八七會議以前，下級黨員羣衆可說從來沒有討論過黨的政策，一切問題只有黨的上層領袖決定，下級黨部只有絕對服從，根本沒有發表意見的機會，而且根本沒有黨內民主與自我

批評。

組織上另一個重要弱點，便是沒有建立起真正的支部生活，支部僅僅成了黨的命令傳達所和宣傳機關，很少健全的黨的生活，沒有支部生活便沒有黨內健全生活的基礎，也就沒有無產階級黨的基礎。

黨對青年團的工作沒有正確的指導，甚至不承認青年團工作有政治地位，當一九二七年六七月間中國共產青年會經表示反對中國黨中央機會主義的錯誤政策而表示擁護共產國際路線，黨的中央竟因此不許青年團說話，陳獨秀則更拿出牠那家長式的威風，隨便將青年團的意見書撕毀，不肯提出討論，因為恐怕讓青年團一說話，不免要妨礙黨中央自己機會主義的領導，同樣青年團自己也做了許多錯誤，如工作不青年化，團的工作始終沒有深入青年工人羣衆中去等，黨也沒有給團以足夠的幫助和指導。

黨與羣衆的關係也是如此，黨辦工農會的傳統政策很深。自然在中國大革命中國共產黨對於廣大工農運動起過極偉大的領導作用。但是在一般工作中黨總是命令羣衆，而不是說服羣衆。黨在羣衆工作中總是使羣衆依靠政治勢力而不依靠羣衆自己的

鬥爭力量。因此發生很壞的影響，革命鬥爭一失敗，羣衆便與組織脫離關係。黨內充滿着委派制度命令主義，却不知道如何取得羣衆組織羣衆，甚至用黨的組織去代替工會農會的作用，結果便走到取消工會。

尤其重要的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機關與共產國際的關係非常惡劣，陳獨秀這班英雄常有一種奇怪的論調，就是說共產國際不懂中國實際情形，於此便造成一種口實，去拒絕共產國際的指示，或者只在口頭上接受，而實際對共產國際的指示怠工。事實上八七會議以前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很少對共產國際做工作報告，甚至爲要維護他們自己機會主義的錯誤，而不惜破壞共產國際的紀律，把共產國際的指示對黨員羣衆隱秘起來，實際上去做他們背叛革命利益的事業。

這種種非布爾什維克的現象，經過共產國際的批評斥責與六次大會的鬥爭，總算克服了一些，但是它的傳統還很深錮，有時僅在表面上受着一下打擊，而實際的勢力還在黨內潛伏着，遇着有一點機會便又抬頭起來，加之黨內無產階級基礎的薄弱，以治水平線的低下，黨內派別鬥爭的滋長，使黨在走向布爾什維克化的途程上常常受着

嚴重的阻力，後來黨內發生反列寧主義反共產國際的立三路線與瞿秋白同志兩面三刀的政策，實際上都是這種歷史錯誤在一種新形勢之下的爆發，所以公開揭發大革命中黨內生活及對國際關係問題上這種非布爾什維克的實質，乃是幫助黨走向布爾什維克化的一種重要工作。

## 第八節 反機會主義鬥爭與盲動主義

上面我已經在幾個中心問題上指明了中國共產黨在大革命中所做的機會主義錯誤，中國共產黨中央過去這種機會主義，應當要說是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國大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究竟甚麼是過去中國共產黨指導機關所做的機會主義的根源呢？是不是共產國際主張中國共產黨在大革命初期可以有條件的和民族資產階級暫時妥協和聯盟這一路線根本便是機會主義的路線呢？再則共產國際決定中國共產黨應當加入國民黨以建立民族革命聯合戰綫的策略是不是根本便是機會主義的路綫呢？這種問題本來在上面幾節中都已經有了事實的答覆，現在可以總起來再

說幾句。

現在從托洛斯基反對派到中國機會主義者陳獨秀等（他們已經結合成爲取消派，所以以下便簡稱他們爲取消派）差不多一致都說：中國共產黨根本不應該加入國民黨，民族革命聯合戰綫的策畧乃是違反列甯主義的路綫，而且說『這是機會主義的根本來源』。因此他們共同的口號便是：『共產國際的機會主義的路綫斷送了中國革命』。顯然是無恥的躲閃與卑劣的誣蔑。其實我們只要把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教訓，仔細考察一下，馬上就可以瞭解共產國際列甯主義路綫的正確與過去中國共產黨機會主義錯誤的內容。

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的路綫，完全是依據列甯主義對殖民地民族革命的理論。中國資產階級因爲感受帝國主義的壓迫，會積極的起來與帝國主義鬥爭，很明顯的有反帝國主義的革命作用，所以無產階級應該與資產階級暫時的協作，建立民族革命的聯合戰綫，推進這一革命更有力的向前發展。同時無產階級在這一民族聯合戰綫中要力爭革命的領導權，使這一革命不致在資產階級領導之下而半途失敗。中國國民黨原

來就包含了各種複雜的成分，所以很有可能使他成爲民族革命的各階級的聯盟，所以共產黨應當加入進去，並領導廣大工農羣衆加入進去，爭取國民黨的領導權，同時保存共產黨的獨立的活動，極力發展羣衆的組織與鬥爭，以監視資產階級的妥協動搖。這樣可以使中國革命得到更快的發展，在客觀上便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很好的助力，同時中國無產階級的組織與鬥爭的力量，在這一革命發展的過程中，也就可以很快的壯大起來，而漸次奪取並鞏固在這一革命中的領導地位。

托洛斯基主義的路綫，認爲資產階級對革命是妥協的，無產階級開始活動便應堅決的反對資產階級，決不應與之協作。國民黨是資產階級的政黨，所以共產黨不應加入，而應該反對，就是根本不同意民族革命聯合戰綫的策畧，這是完全不瞭解應當把殖民地從帝國主義的後備軍中奪取過來成爲無產階級革命的後備軍這一重要的策畧，中國革命歷史的事實，已經充分證明這一觀點的錯誤了！托洛斯基表面上用列寧主義對俄國資產階級革命階段中的策畧來反對列寧主義對殖民地民族革命的策畧，這已經是錯誤的了！實際上還是用他的不斷革命的理論來反對列寧主義的路綫，因爲他始終



沒有注意到中國最嚴重的農民問題，同時還造出中國沒有封建剝削關係的奇怪論調來證明他之不要農民的觀點爲正確。

中國機會主義的路綫，執行了共產國際「與資產階級暫時協作，加入國民黨」的一點，但是根本不瞭解共產國際兩主義的整個的路綫。不只是不知道加入國民黨應當保存共產黨的獨立活動，並且主張一切工作都歸國民黨，甚至認共產黨沒有存在的必要。不只是不知道無產階級應當毫不放鬆的對同盟者的資產階級的動搖給以嚴厲的批評，力爭革命的領導權，而且公開的主張對資產階級讓步，犧牲階級的利益去服從民族的利益，——這是十足的資產階級的尾巴主義。當時有一種所謂左傾的意見，認爲共產黨可以加入國民黨，但應保留工人羣衆不加入。他們的理論基礎一樣的是二次革命論，一樣的不瞭解爭奪領導權的策略，所以不過是機會主義的另一方面的表現。所以共產國際的根本路綫是無疑的正確的，而中國的機會主義者開始執行的時候，便把他修改成爲孟什維克的路綫了。

事實是不容假借的。共產國際的路綫，認爲在實行聯合戰綫的開始，便應一點不

放鬆對於資產階級妥協動搖的批評，到了北伐的過程中，便應積極準備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因為資產階級的反革命是決不可避免的事實。在蔣介石叛變革命以後，資產階級已成爲帝國主義的新工具，更應堅決的反對資產階級，極力深入土地革命，使廣大農民羣衆，脫離資產階級的影響，而與無產階級親密的合作，並且要儘可能的武裝工農羣衆以鞏固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領導。同時對於小資產階級，應以堅決鬥爭的精神去領導他，對於他的動搖猶豫，也是要毫不讓步給以批評與監督。因此應當把資產階級分子不斷的排除出國民黨去，引進廣大的工農羣衆加入國民黨，使成爲工農小資產階級的革命聯盟，鞏固無產階級的領導。同時準備着進一步的排除動搖的上層的小資產階級，而轉變到工農民權獨裁，繼續着便是建立蘇維埃政權形式以過渡到無產階級專政，這就是實行革命政權內部轉變的策略。所以共產國際在一九二七年五月第八次擴大會議便提出了工農政權的口號，同時指示中國共產黨應當堅決深入土地革命，擴大國民黨的組織，參加武漢政府，極力武裝工農等。可是當時中國黨所執行的策略却恰恰與這一路綫相反。

中國共產黨過去指導機關的機會主義是一貫的孟什維克的路綫，對於共產國際的指示完全怠工。在北伐的過程中固然沒有準備反資產階級的鬥爭，而且在蔣介石叛跡已露，上海的三次暴動，還是採取與資產階級妥協的政策。在武漢時期則不只是沒有積極去領導土地革命的深入，而且跟着小資產階級的尾巴，實際上也就是跟着資產階級的尾巴，咒罵工農運動『過火』。不只是沒有積極去武裝工農，而且自動的解散工人糾察隊，禁止湖南農民以暴動來反抗馬夜事變的屠殺和叛變革命的將軍。對於引進廣大工農羣衆加入國民黨始終沒有執行，對於參加武漢政府則把國際的革命政策變成部長主義，勞工和農民兩部成立數月之久沒有進行絲毫的革命工作，反而成爲阻遏工農運動的官僚機關。中國共產黨這一路綫，很明顯的與共產國際的指示完全相反，所以中國大革命失敗主觀方面的錯誤，完全是中國黨的機會主義違反了共產國際的路綫，決不是共產國際根本路綫的錯誤。

從以上各節所述，可知中國共產黨陷落到機會主義的泥坑是很深遠的。在討論共產國際第七次擴大會議案的時候，中央內部雖然發生了爭論，瞿秋白同志不同意中

央的解釋，尤其不同意中央對上海暴動的策略，寫了一本小冊子叫做『中國革命的爭論問題』。批評彭述之主義，批評當時的機會主義，這本小冊子，對於當時的機會主義，的確是一個相當有力的攻擊。但是一則因為瞿秋白同志自己當時對於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也還沒有弄清楚，例如秋白同志在『中國革命的爭論問題』小冊子中把中國革命性質解釋成『可見中國現時的革命，既是資產階級的，又不是資產階級的；既不是社會主義的，又的確是社會主義的』。對於土地革命問題雖然已經指出『中國革命的中樞是農民革命』，然而還沒有很認真很實際的指出無產階級應當堅決領導土地革命深入的路綫；對於民族資產階級亦只說：『不僅反對買辦階級的壓迫搗亂政策，而還要反對資產階級的妥協軟化』，並沒有指出民族資產階級不可避免的叛變與我們積極準備羣衆力量以鎮壓資產階級的叛變的路綫，其實當時（秋白同志寫這本小冊子的時候是在一九二七年二月中）民族資產階級叛跡已經表露。因此打擊機會主義的力量還不大。二則瞿秋白同志這本小冊子在當時並沒有能引起全黨同志嚴重的注意，甚至在五次大會時也沒有很熱烈的討論，於是黨的機會主義的危險，並沒有挽救過來。

本來一九二七年五月黨的五次大會以前，中國共產黨中央的機會主義錯誤已經很深，特別是在北伐戰爭中與上海三次暴動及四月滬粵事變中，黨的機會主義已經使革命受到很大的危害，然而五次大會上，雖然有反機會主義的鬥爭，但是對於國際整個的路綫仍舊非常模糊。反機會主義鬥爭的陣綫既然這樣的軟弱，當然不能攻擊機會主義的要害，發動全黨同志的注意，無法使機會主義受嚴重的打擊。同時，當時國際代表羅易（現在他完全是右派的主張，共產國際已經將他開除黨籍了。）：自然是站在共產國際的路綫上，可是他只注意鮑羅庭的右傾，而忽視了中國共產黨的機會主義。在他的演說中竟這樣的說：『中國共產黨是從鬥爭中產生出來，決不會發生機會主義』。這不僅是當時調和傾向的思想，而且是極端錯誤的意見。於是軟弱的反機會主義的鬥爭在五次大會上的影響，幾乎完全消滅了。自然在組織上更形成了一種調和派的結果。

五次大會後的新中央，集合了黨內各種不同意見的代表，但是舊的機會主義派仍然是居於領導的地位，所謂反機會主義的分子，既然是十分軟弱，且不久都跟着鮑羅

庭的路綫跑了，就是五次大會前號稱反對機會主義的秋白同志也是如此。的確武漢時期整個的共產黨中央都墮入機會主義的錯誤。時勢是日益嚴重起來，中國共產黨中央的機會主義却日益深沉下去。當時動搖與猶豫是黨的政治路綫。於是黨的指導，不成了羣衆的尾巴，而且是替資產階級服役，破壞革命的進展。

後來中國機會主義者陳獨秀等竟無恥的說：『共產國際機會主義路綫斷送了中國革命』。其實當時（一九二七年五月）與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大會同時舉行的共產國際執委第八次擴大會議，不但根據七次擴大會一貫的路綫，對於中國革命的形勢前途與策略都有更深刻的指出，不但對於當時一切嚴重的問題，都有極正確的解答（參看上列各節所引共產國際八次擴大會對中國問題決議案），而且指出了中國共產黨的錯誤和動搖，指出『大規模的說明中國共產黨內有上述的錯誤和動搖是必要的；不然，則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之中相當的動搖之危險更加高了』其實如果共產國際八次擴大會決議案在中國實際的鬥爭中發生了些微的影響，武漢的危機，都不是不可以挽救。然而中國共產黨當時的路綫與國際的指示不僅不符，而且完全相反，於是革命的危險固

然更加高！

豈但「更加高」而已，客觀革命形勢是迅雷閃電似的急轉，而黨還是動搖猶豫；結果，黨的機會主義的領導，遂使革命受到嚴重的失敗。尤其是黨受到莫大的打擊，政治上已經走到絕路，黨在羣衆中的威信幾乎完全喪失；組織上已經走到分崩離析的狀態，一般同志無所適從。許多動搖的分子如施存統之流，遂實行叛變，公開投降敵人。當時的形勢，黨真有暫時瓦解消滅的可能。共產國際爲挽救中國共產黨的滅亡，因此解散當時中央政治局，超過中國的組織，直接召集臨時緊急會議——這就是在黨的歷史上有極重大意義的八七會議。

八七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反機會主義鬥爭的新紀元。雖然八七會議本身還有很大的缺點：例如因爲對於土地革命問題認識的模糊，因此而有「沒收大中地主土地，對小地主則減租」的錯誤決定，對於國民黨左派關係問題也是如此（參看前面「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關係問題」與「中國共產黨與土地革命」各節）。可是，無論如何，八七會議始終有極重大的意義，當時共產黨簡直是在潰散的狀態中，他將黨救出來

，他只是洗刷舊的機會主義，建立新的布爾什維克路線的第一步；沒有他，中國共產黨簡直是要「亡黨」的。八七會議改選五次大會的中央政治局，發出告全黨同志書，將機會主義的錯誤都明顯的指摘批評出來，這在政治上組織上都是有非常重大意義的。告同志書中指出當時反機會主義鬥爭的意義說：

「現在的情勢是反革命派屠殺工農羣衆，壓迫羣衆運動，搗亂工農團體；所以中央委員會首先要告訴你們的便是你們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中國共產黨從羣衆運動裏發展成了偉大的力量，在革命鬥爭的時期，他的作用是絕對的偉大的，現在我們黨的作用更加要大了。」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對於中國問題的歷次決議案，都說黨的政策及黨的指導有非常重大的意義。過去中國革命的進程，大半與本黨政策有關係的。將來革命的命運在形勢變更之後，更加要靠我們黨的政策正確，要看我們黨對於形勢變更之後的職任之履行如何而定。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最近決議指出我們黨的指導做了極大的機會主義的錯



誤，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要全黨積極的自己批評這些錯誤而糾正他們。這些錯誤並不是指各個的偶然的錯誤而說的，而是說黨的指導執行了很深的機會主義的錯誤方針。如果不拋棄這一機會主義的方針，糾正過去的錯誤，那就不能正確的規定將來的工作，自然更不能進行革命的鬥爭，以適應當前的艱巨職任。要糾正錯誤的方針，必須指明是怎樣錯誤的，應當要使每個黨員都得着過去的教訓，我們黨如果不糾正指導機關的錯誤，那就一步也不能向革命的道路前進。工人階級的革命黨，要糾正自己的錯誤，只有公開的批評這些錯誤，而且要使全黨黨員都參加這種批評。無產階級的政黨不怕公開的承認自己錯誤。如果共產主義者不能無所畏懼無所忌諱的批評黨的錯誤疏忽和缺點，那末，共產主義者也就完了。我們的黨公開承認並糾正錯誤，不含混不隱瞞，這並不是示弱，這正是證明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力量。我們深信本黨的生命與力量決不致於怕披露和批評我們的疏忽和缺點，甚至於披露之於我們階級仇敵之前也無所怕。等共產黨的敵人幸災樂禍好了！讓他們去亂叫共產黨崩壞好了！這種攻擊，是嚇不了我們的，我們勝過敵

人的地方，正在於我們是最先進的階級，無產階級之先鋒隊，能够在自己錯誤經驗裡學習出來，絕無畏懼的披露自己的錯誤并且有力量來堅決的糾正。

我們黨有這種偉大的力量，不但因為我們黨的階級性使然，而且因為有羣衆之奮鬥，無產階級及貧苦農民羣衆之奮鬥做保證——這些羣衆是我們黨的基礎，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決議上說：「中國共產黨英勇的鬥爭，中國共產黨廣大的黨員羣衆，艱苦犧牲的在社會下層工農城市貧民之中，實行真正革命的鬥爭」。我們黨的指導機關却有機會主義的錯誤，經常的動搖和猶豫，在緊急關頭總是沒有堅決行動的決心，既有非共產主義的不革命的理论，還有更加不革命的行爲，這些情形，不但絕對的與共產國際的決議和指示相矛盾，並且和我們黨員羣衆工作相反。

譬如說：上海，廣東，湖南本黨普通黨員羣衆都有過偉大的奮鬥，屢次光榮的總同盟罷工，上海三次工人暴動——最後今年三月的一次得着了勝利，這些都是光榮的歷史，不但在中國歷史上有無上的光榮，而且在世界革命運動史上也是

如此。這一頁光榮的歷史，是上海共產黨——無產階級所寫的。

上海無產階級在共產黨員指導之下所表現出來的勇敢性，革命性，階級意識的堅決和政治意識的高度甚至於歐洲各國無產階級所不能超越的——那些國裏的工人革命運動，差不多都有了幾十年的歷史呢！中國共產黨可以以上海的共產黨羣衆自豪了！上海工人在蔣介石屠殺之後，雖然受着聞所未聞的壓迫，許多最好的指導者（如陳延年，趙世炎及其他同志）被殺，一切運動都被壓迫到非常秘密的地位，然而仍舊繼續着鬥爭，表現不可摧殘的偉大力量。廣東的共產黨員領導了鐵路工人的暴動，以反抗李濟琛，領導農民羣衆的武裝暴動，能够在各地方繼續抗爭至兩月之久，真正像勇敢堅決犧牲的革命黨人，奮鬥到最後一滴一點的可能。這些共產黨員真正可以做革命形勢中工人階級的先鋒的榜樣。湖南同志領導農民運動的鬥爭，亦是這樣光榮的中國歷史裡的一頁，農民協會實際上的政權，是共產黨員領導，而農民羣衆所創造的，自動沒收大地主，分配土地於鄉村貧民解除豪紳團防的武裝，創立武裝的農民軍，嚴厲的鎮壓封建的反動分子，極偉大

的農民運動的規模，而且會和國民黨下層羣衆結合革命的聯盟——而不是機會主義聯盟，最後組織農民暴動，以反抗長沙的反動政權（這次暴動如果不是中央黨部機關在緊急關頭採取可恥的退讓政策，無疑的是勝利的）。這都是湖南共產黨員努力的成績。這是解決土地問題最好的方法。其他各省的共產黨員羣衆，亦是如此。黨員羣衆的行動真正是英勇澈底的革命鬥爭，這種鬥爭要忍受很大的犧牲，但是我們黨的羣衆沒有怕犧牲的。中國革命之中，他們的奮鬥，使得我們的黨取得偉大的光榮和信用。黨的羣衆是我們力量之源泉，有他的幫助，黨的指導機關之錯誤，無論如何大，都是很容易糾正的。固然指導機關的機會主義，動搖猶豫，沒有堅決實行的能力，這對於中國民衆的革命鬥爭，和共產主義的運動大有損失；然而本黨有上海廣東湖南的經驗，決不會因為指導機關之錯誤而陷於敗亡。本黨一定有這個力量，保證今後有正確的革命的布爾什維克的領導」。

八七會議，既然堅決批評了過去黨的指導機關的機會主義的錯誤，同時在政治上指出武漢失敗使革命又受了一次打擊，但是革命因為階級關係的新的變動，必然向着

新的階段——工農革命的階段發展。因此堅決的決定了新的策略，決定湘鄂贛粵四省秋收農民暴動計劃，並且決定了對於農民土地革命及職工運動的新路線。在組織上提出了徹底改造黨，引進工人同志參加指導機關，實現黨的布爾什維克化的口號。所以雖然八七會議本身還有缺點，然而他始終在政治上組織上都給了黨以新的生命，全黨同志在黨的新的精神與策略之下，重新興奮起來，把黨在瓦解崩潰的前面挽救過來，走上布爾什維克的道路。同時黨的新的口號深入了羣衆之後，得到了羣衆的擁護，使工農羣衆感覺到政治上找到了新的出路，而重新在黨的領導之下進行堅決的鬥爭，把黨因機會主義喪失了的在羣衆中的威信，也相當的挽救過來。所以八七會議的確是黨的歷史的一大轉機。只有這一歷史轉變的落伍者陳獨秀們才會極力詆毀八七會議，一方面說他是盲動主義的開始，另一方面又說並沒有把機會主義根本糾正過來。他們根本不瞭解這一歷史轉變的意義，所以便永遠墮落在機會主義的泥坑，無可解脫。

固然不錯，八七會議之後，各地黨部與團部確實發生很多盲動主義的錯誤，首先便是江蘇蔣倒時期的『暴動』問題，那時（一九二七年九月）甯漢妥協，蔣介石下野

，上海政權在更迭反動人物之際。自然，反動統治因爲內部糾紛而混戰。江蘇省委便決定武裝奪取上海總工會舊會所（湖州會館），而稱之爲『暴動』。這顯然是不顧羣衆力量的冒險主義，當時國際代表便加以制止。其次便是順直『大暴動』問題。那時（一九二七年十月）奉晉戰爭發生。當『戰爭開始之時，北方局即決定在三特區，南口，京津，唐山，京東六處準備暴動，現在奉軍日潰，當時已迫，各級黨部應迅速準備』，『暴動的軍事計劃——係以三特區和京東四縣爲目的地，及天津唐山暴動不能持久時，則一直衝出三特區保持熱河北部與外蒙聯，如此則進可以戰，退可以守』，『各級黨部於接此通告，便應火速進行暴動的組織和佈置，山東山西亦應於接此通告後準備動作，以資策應』（摘錄十月六日所通過的『北方局暴動計劃』）。這顯然是玩弄暴動——而且北方局決定暴動的顯明的目的，不是建立工農羣衆的政權，而是想造成第二個五卅似的，以『大暴動』來發展工農會和黨的組織，及『建立我們的軍事勢力和根據地』（見同上）。這更加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暴動觀點了。何況當時主觀條件都還沒有成熟，於是北方局的『暴動計劃』，便祇好成爲歷史的諷刺料。第三

，在十一月初江蘇宜興無錫的農民暴動起來，於是又引起了上海暴動問題，以上海響應無錫的傾向在省委中發現出來，省委也認為「暴動實實在在已經到來」（省委第八號通告）。於是「發動」上海暴動的特別方法就來了：先用幾個武裝的紅色恐怖隊去一廠一廠的威嚇工人罷工，以為等到如此弄成總罷工，暴動就可起來而成功！這更是玩弄暴動的傾向。第四便是湖北暴動問題。上海問題是在甯漢戰爭之中，湖北問題也是甯漢戰爭之中。當時有人專看軍閥內部衝突，希冀他們內潰，不管羣衆如何，只想『趁火打劫』。主張武漢那時（一九二七年十月）立即暴動，『即使組織一兩天蘇維埃也是好的——就算暴動沒有相當勝利的希望』。湖北省委爲『避機會主義之嫌』起見，也就閉着眼睛下總同盟罷工令，下動員令。實際上羣衆的情形是還不能暴動。唐生智下野時，武漢許多黨員團員還在這『假暴動』之下露出臨陣脫逃的也有，慌張失措的也有，這都是機會主義弱點的暴露。但是，並不因此而『暴動命令』就不是盲動主義的。其他可以舉出的盲動主義錯誤還有很多，這裏用不着一一舉明，總之，八七會議之後，盲動主義的錯誤確實是有的，這是無可辯難的確鑿的歷史事實。

然而我們決不能因為有這些盲動主義的錯誤，就根本否認八七會議決定暴動政策的重大意義。當時（八七會議之後）提出『暴動推翻國民黨的統治，建立蘇維埃政權』的總方針，不只在政治的意義上針對着過去機會主義的錯誤，適合羣衆的要求；而且在政治的形勢上，一般說來，武漢與南京政府都是在動搖崩潰的狀態中，工農鬥爭雖然受到新的打擊却仍在不斷的爆發，革命的浪潮高漲並未完全過去，所以提出號召羣衆武裝暴動的口號，在總的路綫上是很正確的。至於在每一個實際暴動當中而發生了策略上錯誤或時期估量的不正確及發生或多或少的盲動都是事實，但並不能因此遂推翻這一總的路綫。

因此在八七會議以後，黨所組織的南昌暴動，秋收暴動，廣州暴動，雖然在每一個暴動的具體的策略上，都發生了或大或小的錯誤，並且都不是勝利的暴動，但在總的路綫上是毫無疑義的是正確的。

機會主義者與托洛斯基指示這些暴動都是盲動，這是根據他們一貫的政治觀點出發得出來的結論。他們認爲武漢的失敗，『已經是中國革命最後的失敗，已經是歷史



的轉變時期，就是武漢失敗以後，資產階級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勝利，已經開始了資產階級政權的隱定，與資本主義發展的新的時期，黨應當取消一切革命的口號而準備在資本主義制度中的合法運動』（托洛斯基）；『武漢反動之後，中國革命已經完全失敗，各國革命史告訴我們，大革命失敗之後，必然要經過一個反動時期，中國也沒有例外，在這種時期，黨只可採取防禦戰略，要求召集國民會議』（陳獨秀）；自然要覺得這些暴動在總的路綫上都是盲動，八七會議的路綫根本就是盲動主義的路綫了。這不過是證明中國機會主義者與托洛斯基在這時候都已經開始走上取消主義的泥坑了。

廣州暴動是中國革命的先鋒隊——無產階級企圖挽救革命的一次英勇的鬥爭，開始了中國蘇維埃革命的階段，有他偉大的歷史意義。暴動的爆發，使全世界帝國主義與全國反動勢力，都震驚起來，馬上互相妥協聯合一致的來鎮壓暴動。同時在指導這次暴動的主觀方面也犯了不少的錯誤，遂使暴動受到嚴重的失敗（參看前面第四章第八節）。

廣州暴動失敗以後，反動統治階級對工農羣衆的革命運動，尤其是共產黨加以極殘酷的壓迫，一切革命的羣衆組織——工會農會都被解散，許多革命的幹部與領袖尤其是共產黨員，遭受空前的大屠殺，革命勢力受到莫大的打擊。因此第一次的革命高潮，隨着廣州暴動的失敗而完全過去。所以廣州暴動，的確劃分了中國革命歷史的時期：一方面在革命的階段上，開闢了中國工農蘇維埃的革命；另一方面在革命的形勢上，結束了第一次的革命高潮。

革命的形勢轉變了，領導革命的黨，應該很迅速的抓住這一轉變，而提出新的策略，然後才能適合於領導革命的新的任務。如果不能極靈敏的注意客觀的革命的轉變，而死守着自己劃出來的環圈，那末不成爲時代的落伍者，便要不可避免的脫離羣衆。暴動是『玩』不得的，沒有相當的前提就舉行暴動，決不是列寧主義的路綫。廣州暴動以後，黨的盲動主義的錯誤，沒有抓住革命形勢的轉變是最主要的原因。

廣州暴動的失敗，不可否認的革命勢力是受到了極嚴重的打擊。中國工農廣大的革命運動之第一個浪潮已經過去。固然革命的根本矛盾一點也沒有解決，統治階級決

不可能穩定他的政權，革命具有新的高漲的必然趨勢。可是革命的主觀力量經過這樣嚴重的挫敗以後，決不是馬上可以恢復，而且統治階級在經濟上政治上也還沒有表現馬上就崩潰破產，所以革命浪潮，決不能馬上高漲，尤其不是一直高漲。因此當時黨的策略的路綫，應該轉變到重新聚集力量，徵取羣衆，組織羣衆，以準備新的革命高潮，應該把「武裝暴動」的口號從直接行動的口號轉變爲宣傳的口號。當時指導機關，忽視這一革命形勢的轉變，只看到統治階級無法穩定的一點，而忽視革命隊伍在經過嚴重的壓迫以後的潰散疲困的狀態。不知道自己的隊伍在這樣零亂的狀態，就是敵人的力量異常的削弱，仍然是無法向敵人進攻，因此而誤認革命的形勢是「繼續高漲」，「一直高漲」，並使主觀的造出「在革命形勢的方面，也是無間斷性質」的理論。在這樣的錯誤估量與忽視盲動主義危險的情形之下，自然在策略上無法轉變過來，而仍然機械的守着在革命高潮時「直接暴動」的政策。用這樣零亂薄弱的隊伍而去與強大的敵人作拚命的嘗試，甚至自己隊伍完全潰散了，而以少數幹部作毫無把握的孤注一擲的犧牲，這毫無問題的就是玩弄暴動的冒險主義了。

所以盲動主義發生的根本原因，主要是由於不認識革命的轉變，不承認革命的失敗而發生對革命形勢的錯誤的估量，盲動主義的表現是脫離羣衆，不顧羣衆，而以少數的先鋒隊作拚命的犧牲。黨在這樣盲動策略之下，又受到了可怕的損失，如果繼續的是這樣發展下去，將不可避免的要使黨走到滅亡的道路。所以盲動主義是與機會主義一樣的可以損害黨的生存的危險。幸而經過共產國際第九次擴大會議的糾正與中國共產黨六次大會堅決的鬥爭已經開始轉變，中國共產黨遂又前進一步走上布爾什維克的道路。六次大會以後，中國共產黨又開始了新的鬥爭——反機會主義，反托洛斯基主義及反對取消派調和派的鬥爭，然而敘述這種鬥爭的歷史已經不是本書的任務，本書的任務應該從此結束了。

## 第七章 結論

留到結論裏來說的話已經很少，因為在前面歷史分析中對於許多重要的問題都已經給了相當的結論。然而終究還有些話應該補說的。

中國大革命雖然已經發展到很大的規模，可是始終受了失敗，革命在這一歷史的階段裡，沒有充分的力量戰勝當前的許多的困難。這些客觀的困難和原因之中，應當說到：

⊙中國革命的主要敵人——帝國主義的力量強大。外國帝國主義是一切反動力量的組織者和支配者，帝國主義利用自己經濟上政治上的威力，對於民族資產階級做些小小的讓步，威逼利誘的分裂民族的聯合戰綫，用賄買軍閥的舊方法，用武力的砲艦政策壓迫革命，實行經濟封鎖，利用自己強大的威力（銀行公司軍艦軍隊等等）——造成阻礙中國革命發展和勝利的最嚴重的困難之一。

③民族資產階級背叛革命的聯合戰綫。資產階級在革命的初期是參加革命的，這一事實早已伏下他必然要退出革命戰綫的叛變。民族資產階級的叛變，暫時削弱了革命的勢力而加強了反革命的聯盟。

④中國軍隊是雇傭軍隊，這是中國軍閥的特點。因此，反動派有着數量上佔很優勢的武力，許多地方這種武力是足以決定勝負的。革命曾經利用這種軍隊，可是這些軍隊的軍官都是豪紳地主資產階級的代表，他們的兵士羣衆大都是久已脫離了生產的羣衆，和工農的聯繫比較很弱。事實上這種軍隊，還是豪紳封建地主及資產階級馴服的工具。

⑤革命運動發展的不平衡。中國無產階級實行嚴重的鬥爭的時候，農民運動才開始發展（例如五卅運動及上海三次暴動時）。中國工人階級本來組織很弱，又是很分散的，他的力量並不充分。可是很早就加入政治鬥爭的舞台，首先受着反動統治的歷次打擊，沒有得着農民方面及時的贊助。中國工人階級沒有能等到農民運動發展到羣衆的廣大的規模，就受着打擊而失敗。再則，地域上革命的發展也不平衡，南方的廣

東及中部的湖南湖北，農民已開始推翻豪紳地主的政權，沒收地主的土地，有些地方已開始分配土地；可是在北方，那時農民剛剛才開始鬥爭，還只在開始農民運動的嘗試。這種情形，當然使資產階級封建豪紳的反動更加容易實行自己的任務。

⑤中國城市上層小資產階級，極大部分是和半封建土地關係有密切聯繫，並且和外國資本有相當關聯（參看前面第五章中之第三節）。所以當反帝國主義運動及土地革命急劇進展之中，這些小資產階級日益動搖，而終至於投降到豪紳資產階級的反動營壘中去。這種小資產階級分子動搖而背叛革命，也就是中國大革命失敗的客觀原因之一。

然而這些客觀上的困難，並沒有完全決定中國大革命必然要失敗的力量。我們每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都應當坦白的承認：中國大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就是當時無產階級的先鋒——中國共產黨指導機關的機會主義政策。當大革命危急存亡的關頭，離開布爾什維克路線的機會主義政策，客觀上簡直是背叛正在鬥爭的勞動羣衆的利益。『機會主義是傳播資產階級影響於工人階級，并傳播社會民主黨傾向於共產主義運

動之一種間諜』。這種機會主義的政策，最先便是由於當時中國共產黨中央違反共產國際列甯主義的指示，對於中國革命性質及聯合戰綫的任務有不正確的觀念，不能保持共產黨自己的獨立性，對於革命同盟者不能實行階級的批評，不去動員革命力量，以求戰勝自己暫時的同盟者之反動的企圖；有時候反而去阻止羣衆運動的發展，以遷就自己對於聯合戰綫的不正確的觀點。當時中國共產黨指導機關，不去發展土地革命和工人羣衆的階級鬥爭，却只做上層勾結工夫，蒙蔽階級的矛盾，不去征取兵士羣衆，不去武裝工農，不能利用參加政權機關的機會，去爲羣衆謀利益；再則，當時中國共產黨指導機關不瞭解從一階段到另一階段，從一個政治和策略到另一政治和策略的轉變，所以在緊急關頭不能打破敵人的包圍，不能事先準備反攻的力量，俾能在一個過渡的階段上取得勝利，而反被敵人包圍，常常受到敵人『出其不意』的攻擊。實際上中國共產黨過去指導機關不但沒有堅決的爭取革命領導權，反而自己斷送無產階級領導權。這樣，中國共產黨當時指導機關這種機會主義政策，就使中國革命受着不可避免的失敗。



以上便是從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中國大革命中所得到的總的經驗和教訓，我們指出這些過去的經驗和教訓對於現在及往後的革命鬥爭都有非常重要的實際意義，這自然不是說我們現在和往後的革命鬥爭將走過去同樣的道路，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十七年的時期已經很壯烈的同時又是很悲慘的過去，已經成爲可歌可泣的歷史年代了！中國無產階級退兵一戰——廣州暴動失敗之後，中國第一次大革命已經閉幕，同時革命的歷史車輪已經導引我們走上了新的工農蘇維埃革命的道路。

不僅如此，我們現在所經歷着的國際形勢也和過去不同了，一切事變指示我們：現在正是資本主義一般危機增長起來而帝國主義內外矛盾日加劇烈的時期，『此時期的矛盾將要達到帝國主義新的戰爭，將要達到偉大的階級衝突，將要達到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新的革命浪潮之發展，將要達到殖民地反帝國主義的大革命』，總之是必不可免的有極巨大的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事變將要到來。因此，中國革命的國際意義更加增高起來，他本來是總的世界革命過程中主要的組成部分之一；中國勞動羣衆的鬥爭，反帝國主義，反對他的政治上經濟上的統治，剝削他的力量，要求解放幾萬萬的

中國勞苦民衆，要求脫離異乎尋常的剝削和壓迫，同時也就減少帝國主義進攻蘇聯及壓迫各國工人階級的暴力，這就是幫助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前進。中國革命的第一階段，資產階級性的民權主義革命，對於世界社會主義革命是一個助力，亦是主要的組成部分之一；將來的第二階段——中國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更成爲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直接組成部分。同時，中國革命波及鄰近各國——巨大的殖民地，如印度，印度支那，高麗，爪哇等，喚起被壓迫民族廣大的羣衆起來實行政治鬥爭，根本上要動搖日本英國帝國主義的基礎，而且給北美合衆國的金元帝國主義以巨大的打擊。因此，中國革命的完成，亦就是世界無產階級專政之勝利的序幕。所有這些新的時期與任務都更要求我們要以比過去更多幾倍以至幾十倍的努力和採用許多新的方法去實行鬥爭，然而無論如何，過去大革命的經驗和教訓對於我們目前及往後的革命鬥爭始終是極重要的實際意義。

首先過去大革命失敗主要的客觀困難與原因，現在都還擺在我們面前，我們絕對不應該有絲毫的忽視。因此，積極的力爭反帝國主義反軍閥鬥爭的領導，引起極廣泛

的工人農民以及貧民小資產階級羣衆來參加；暴露贊助帝國主義的民族資產階級及改組派第三黨取消派等各種改良派的罪惡，極力揭破他們種種式式的反革命面具；聯結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和反對軍閥反對國民黨政府的鬥爭；鞏固的發展工農紅軍，積極領導農民主地革命，積極的領導兵士羣衆以及貧民小資產階級的羣衆，實行反對軍閥及軍閥戰爭的嚴厲鬥爭，實行變軍閥戰爭爲工農革命戰爭，成爲我們當前最基本的任務。況且，中國革命的新時期中——蘇維埃革命階段，階級關係已經與過去大大不同，因此，我們要戰勝曾經遇到過的困難，在反帝國主義的鬥爭以及推翻軍閥的鬥爭中，一定要發動更多更廣大的羣衆，一定要激起加強幾十倍的劇烈的羣衆直接運動，才有可能。軍閥軍隊的強大，他們能夠得到帝國主義者幫助，又有最新技術的武裝，因此無產階級應該積極以革命的口號，加緊征取廣大兵士羣衆加入革命戰綫，破壞軍閥的軍隊。革命運動發展不平衡，對於革命非常不利，因此，努力配合并匯合各地及各種革命運動，使成爲有組織的發展。也就是我們在研究過去大革命的經驗時應有的結論。

將要到來的新的革命高潮，更加要使黨將準備武装暴動以至實行暴動，建立工農蘇維埃政權，認做當前的實際任務，——這是完成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推翻帝國主義封建地主資產階級國民黨統治的唯一可能的方法，但要實現這一主要任務，對於過去大革命中許多經驗必須認真的學習，其中特別是上海三次暴動與廣州暴動的經驗更給了我們許多有益的教訓。

對於力爭並鞏固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問題，則過去大革命給予我們的教訓，對於我們目前的鬥爭仍舊有很深切的意義，共產黨如果不能加強革命的工人運動，不能樹立和鞏固無產階級領導權，則不但不能澈底完成農民主地革命，而且不能保證往後革命的轉變——由民權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這種重大問題，我們絕不應有絲毫的疏忽。

正確的政策，需要對於環境有正確的估計，這也是過去大革命教訓中重要的一點，不能嚴格的冷靜的依據馬克思列寧主義切實估計革命形勢某一時期的特點，便不能提出切合實際生活的革命口號，定出無產階級先鋒的正確策略與戰術。

中國共產黨的布爾什維克化，是從反對機會主義鬥爭而得來的，現在不但要加緊反對機會主義反對取消主義，而且要繼續過去反機會主義鬥爭的精神，肅清一切尾巴主義調和思想及一切不正確的傾向；在組織上鞏固無產階級的領導，加強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武裝，不然，共產黨是沒有可能執行並完成自己的革命任務的。

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國大革命已經失敗了，我們應該認真的精密的學習大革命的經驗和教訓，我們應該從過去大革命的血泊中找出真正的革命道路，得出許多鬥爭的實際結論，這些經驗與教訓乃是我們往後取得勝利的起點。『沒有一九〇五年的總演習，便沒有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勝利』，大革命的勝利從來沒有不經過失敗的，誰怕失敗，誰便沒有勝利，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應該便是將來中國『十月』之預演。

一九三〇年三月底脫稿